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简明世界通史(上)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组织编写的，各章的执笔人如下：

上古篇第一章：毛昭晰；第二章：寿纪瑜；第三章：张树栋；第四章：刘家河；第五、六章：寿纪瑜。

中世纪篇第一、二、三章：寿纪瑜；第四章第一节：涂厚善；第四章第二节：沈仁安；第四章第三节：寿纪瑜；第五章：艾周昌；第六章：金重远；第七章：寿纪瑜。

近代篇第一章：王觉非；第二章第一、二、三、五节：李纯武；第二章第四节：陈之骅；第三、四、五、六章：李纯武；第七章：金重远；第八、九章：李纯武；第十章：韩承文。

上册各章最后由李纯武负责定稿。

简明世界通史（上册）

上古篇

第一章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大约始于三百多万年前，其结束的时间各地参差不齐，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末至三千年年代初，在印度河和黄河流域则在三千年代末，在某些地方，原始社会甚至延续到今天。有些学者把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作为原始社会的最早阶段，如果这样，那么原始社会的上限一直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万年之前。但是一般不这样上推，而是把“完全形成的人”的开始作为原始社会的开端。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这种情况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时，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和剥削。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产品有了剩余，于是私有制和阶级逐渐产生，原始的氏族部落公社便为奴隶制国家所取代了。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因此，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一些神话和传说。直到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和民族学等许多学科的发展，才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前人和当代人的成果，特别是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了原始社会的许多重要问题，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私有制和阶级永存的错误理论，为科学的原始社会史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原始社会史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摩尔根(1818—1881年)，杰出的美国学者、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187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重视这一著作。马克思写了《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恩格斯就此书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称道“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体系的人”。

第一节 人的形成和发展

从猿到人的过渡 人类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即古代的类人猿。它们成群地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中,恩格斯把它们叫做“攀树的猿群”。

生存年代最早的古猿可能是发现于埃及法雍的原上猿和埃及猿(前者定年在三千五百万年前,后者定年在二千八百万年至二千六百万年前)。较晚的则有森林古猿(生存年代约为二千三百万年至一千万年前)。

森林古猿的化石在欧、亚、非三洲都有发现。一般认为森林古猿可能就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森林古猿是从埃及猿发展来的。

在地质学上的第三纪中期,地球上气候发生了变化,森林地区减少,出现了林间空地和稀树草原。一部分古猿为了寻找食物,经常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了用两脚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而前肢则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经过千百年的劳动,手变得愈来愈灵巧,终于发展到能够制造工具。

同时,肢体的各部分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也愈益发达。在集体劳动中,迫切地需要一种交换思想和表达意见的工具,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而语言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大脑的进化。

从古猿下地直立行走,到双手能够制造工具,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大约始于一千四百万年前,终于三百多百万年前。恩格斯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

根据目前的化石材料,“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早期代表是腊玛古猿,晚期代表是南方古猿。

腊玛古猿生存于一千四百万至八百万年前。其形态特征主要是:吻部短缩,犬齿不突出,牙齿排列较紧密,整个齿弓两侧向后张开呈拱形,颊齿齿冠宽短并有较厚的釉质。这些都表现出从猿到人过渡的趋势。一些人类学者推测腊玛古猿可能已用两足行走,而且能够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有些学者从解剖学的资料分析,认为腊玛古猿可能已有说话的能力。

南方古猿生存的年代大约是五百五十万年前至一百万年前。其头骨枕大孔的位置接近颅底中央,骨盆比猿类宽,表明他们已能直立行走。根据目前的研究,南方古猿至少有三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又称纤细种)、南方古猿粗壮种和南方古猿鲍氏种。现在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是从南方古猿纤细种的某一支发展而来的。但近年也有人认为另一支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阿发种是人类的祖先。

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 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结束后,开始了“完全形成的人”的阶段。我国人类学家根据体质形态的发展,把“完全形成的人”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

目前所知的早期猿人化石都是在东非发现的,其年代约自三百八十万年前至一百八十万年前。

最早的早期猿人可能是从 1974 年开始在东非坦桑尼亚莱托利尔地层发

第三纪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新生代。它经历了六千二百万年,开始年代距今六千五百万年,终结年代距今三百万年。

现的人类化石。到 1979 年为止，除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的部分骨骼之外，还发现了成年人的两个下颌、一部分上颌碎片及一些牙齿。定年在三百八十万年至三百六十万年之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8 年在莱托利尔地层中发现了留在火山凝灰岩中的三百六十万年前的人类脚印，有两个个体，一大一小，自南往北行进。小的脚印长度为 18.5 厘米，大的为 21.5 厘米。脚印有凸起的足弓，圆形的足跟，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并列位于足前方，证明他们完全是直立行走的。估计他们的体高小的约 1.2 米，大的约 1.46 米。可是在同一地层中没有发现石器。

1973 年至 1974 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发低地的哈达尔地区发现了一块较完整的人类上颌化石和半块右上颌化石，年代可能在三百五十万年前。也没有发现石器。有的学者认为阿发和莱托利尔地层发现的化石都是南方古猿阿发种，而不是真正的人类。

1972 年在东非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库彼弗拉发现了编号为 KNM-ER1470 号人的头骨，经钾氩法定年为二百九十万年前。其脑量约七百毫升，头骨上没有晚期猿人那样明显突出的眉嵴，肢骨也和现代人相似，因此，它在进化系统中的位置还有争议。在 1470 号人层位之上三十余米，曾经发现一些石器，定年为二百六十一万年。一些人认为这是 1470 号一类人所制造的。

从 1960 年起，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陆续发现了一些早期猿人的化石。1964 年定名为“能人”。能人的脑量约为六百八十毫升，手骨及足骨与现代人相似。在发现能人化石的层位还发现了一些砾石工具，主要是砍砸器。能人生活的年代大约距今一百八十万年。

晚期猿人又称直立人，我国通常称之为猿人。生存年代约从一百八十万年前至三十、二十万年前。

最早发现的晚期猿人是 1891 年在爪哇特里尼尔附近发现的爪哇直立猿人。当时一些反动的学者否认它是人，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 1929 年 12 月我国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这一争论才告平息。在北京人遗址，不但发现了约 40 来个个体的猿人化石，同时还发现了用火的遗迹及几万件石器。这就充分说明北京人是人而不是猿。

晚期猿人的化石在亚、非、欧三洲都有发现。除爪哇猿人和北京人之外，还有我国的蓝田人，元谋人，肯尼亚的 KNM-ER3733 号人，KNM-ER992 号人，KNM-ER 3228 号人，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的 OH9 号人，OH28 号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人，德国的海德堡人。近年在匈牙利的维特沙洛斯、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普累西勒提及德国的比尔钦斯勒本也发现了晚期猿人化石。

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生活于距今约三十万年（或二十万年）至约五、四万年前。

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早期智人化石是 1856 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中一个洞穴里发现的，因此有人把早期智人叫做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

早期智人的化石在欧、亚、非都有发现。在我国发现的有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许家窑人、大荔人和周口店第四地点的龙骨山人等。

目前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早期智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典型的尼安德特人”，以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及圣沙拜尔人为代表，他们的身材粗短，脸面大而向前突出。另一种称为“进步的尼安德特人”，以亚洲的斯虎耳人

为代表，其化石发现于亚洲、非洲及欧洲的一部分地方。他们的脑量虽不如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大，但形态特征却与晚期智人比较接近。一般认为“进步的尼安德特人”后来发展成为晚期智人。可是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却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他们不可能转变为晚期智人，而是西欧的一个灭绝了的旁支。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并没有灭绝，而是后来欧洲人的祖先。

人类体质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包括现代人类。不过从古人类学来说则是指五万年前至一万多年前的化石人类。公元前一万年以后的人类一般称为现代人类。

晚期智人的体质形态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的化石不仅发现于亚、非、欧三洲的广大地区，而且发现于美洲和澳洲。在我国，山顶洞人就是晚期智人的一种。根据本世纪七十年代的报导，在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曾发现一个近于完整的颅骨，定年在四万八千年前，在加拿大阿尔勃他的塔勃尔也曾发现一个四万多年前的小孩头骨。说明人类大约在五万多年前已经通过冰冻的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在澳大利亚，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发现于蒙戈湖，一个是女性颅骨，定年为距今二万六千年至二万四千五百年前，而一具男性的骨架定年为三万年至二万八千年前。石器遗址的年代比人类化石更早，季隆和维兰特拉湖的遗址表明四万五千年至三万五千年前澳大利亚东南部已经有人类居住。由此推测，人类可能是在五万年前（有人甚至认为在七万年前）经过东南亚来到澳洲的。

当晚期智人出现的时候，现代人种也形成了。人类学者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大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人种的形成是长时期自然和历史条件影响的结果。不同的人种在身体的表面形态特征上，例如肤色、眼型、发型、鼻型和身材比例等等方面，表现出某些差异，但是这种外表的差异并不影响各人种的基本解剖生理特点。那种认为人种在体质上有优劣之分的论点，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第二节 血缘家族和母系氏族的产生

旧石器时代 狩猎和采集 人类最初制作的工具是石器，考古学上把使用石器的时代叫作石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主要使用石器，但也使用木器、骨器和角器。

根据石器制作技术的演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考古学者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大致相当于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阶段，中期相当于早期智人阶段，晚期大致相当于晚期智人阶段。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石器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弗拉，1969年用钾氩法测定其年代在二百六十一万年前。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曾发现二百五十万年前的石器。在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发现的石器，年代也较早，大约在二百万年至一百七十五万年前。

这些早期的石器，主要是砾石打制成的砍砸器，也有一些形状很不规整的石片工具。它们虽然制作得十分粗糙，但是已经足以砸碎坚果、切割植物的根茎或肉类了。当时的人们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到了晚期猿人的时候，石器的制作方法比以前进步。我国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对不同的石料采取不同的加工方法，石器的基本类型如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已经具备。在欧洲，晚期猿人使用的典型工具是扁桃形的“手斧”，它的一端比较钝厚，便于握在手中，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刃。这是一种可以用于切割、砸击、投掷、挖掘等各种用途的“万能工具”。除了手斧之外，还有许多较薄的石片工具。

北京人使用的工具

大约也是在这时，人类学会了用火。北京人的遗址，灰层厚达六米，证明当时已能长期保存火种。在欧洲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中也有用火的遗迹。火不但可以用来御寒取暖，使人类能够突破气候条件的限制，在结冰线以北的地区生活；而且可以用来猎取大动物，扩大狩猎的范围；火还可以变生食为熟食，缩短消化过程，使人类吸取更多的营养，促进大脑和体质的发展。所以火的使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的制作比前一阶段更为精确规整，形状也更多样，在欧洲，典型的石器是小型尖状器和刮削器，我国的丁村文化则以大型的尖状器及砍砸器为主。这一时期是冰河到来的时代，在许多遗址中发现用火的遗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可能在这时发明了人工取火。骨器也在这时出现，法国多尔道尼穆斯特文化的洞穴中发现的骨针，证明当时人类已能缝制皮衣。

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除了用打击或琢削的方法来制造石器之外，还使用压削的方法，因而可以压出长石片，有很多石器呈柳叶形或桂叶形，有的石器遍体加工，十分美观。磨制石器的方法也在这时出现，但磨制的部位仅在锋刃，这类石器数量很少。在澳大利亚的阿南姆兰半岛发现的磨制石斧，定年在二万二千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磨制石斧。

早期智人使用的工具

(1. 燧石手斧，2. 刮削器，3. 刮削器形燧石工具，4.5. 尖状器)

在这一时期，骨器和角器大量流行，有些骨角器和石器还装上了木柄。矛和投矛器的出现，使狩猎的功效大大提高。在许多遗址留下数量惊人的动物遗骸，捷克斯洛伐克巴甫洛夫附近曾发现

晚期智人使用的工具

(1.带角切刀，2.扁平砾石制成的刮削器，3.底部有裂口的骨制尖状器，4.骨制鱼叉)一百多头猛犸的骸骨；法国南部梭鲁特的大岩壁下，在奥瑞纳文化层中发现五万匹以上的野马遗骸；乌克兰的阿甫洛西耶夫卡曾发现一千头左右野牛的残骸。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发现，这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经使用集体围赶的办法来猎取大动物。这种大规模的围猎，很可能是许多哺乳动物绝种的原因，所以有的学者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生态学危机”的时代。

尽管狩猎的范围扩大了，可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要花费很大力量，而且狩猎具有偶然性，所以能够为人们提供经常性食物的采集经济在这时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血缘家族 从猿到人的过渡是在集体的情况之下完成的，这种集体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群”或列宁所说的“原始群”。这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集团，是从猿群到人类社会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继承了动物界的杂乱的性关系，没有婚姻之可言。

到了完全形成的人出现之时，就产生了社会。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中，婚姻是按照班辈来划分的。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从兄弟姊妹之间都可以互为夫妻，而祖先和子孙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则排斥了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和原始群的杂交相比，这种婚姻形态无疑是一大进步。

在血缘家族内部，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资料不易获得，所以这种集团不可能很大，估计只有二十至四十人左右。为了寻找食物，整个集团不得不经常过着游荡的生活，因此集团与集团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血缘家族存在的时间很长，大致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才进入氏族制度的阶段。

母系氏族的产生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狩猎和捕鱼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类转入了相对定居的生活，这种情况为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同时，人类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通婚的害处。于是婚姻形态就从血缘婚转入了普那路亚婚（群婚）。普那路亚婚不但禁止了不同班辈之间的通婚，而且也排斥集团内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这一过程是逐步实现的，大约先从禁止亲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开始，然后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到一切兄弟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之间的婚姻关系都被禁止的时候，就组成为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集团，也就是转化为氏族了。由此可见，氏族是与族外婚同时出现的。在氏族制度下，它的成员只有在氏族之外才能找到通婚的对象。因此氏族不可能单独产生，它是和部落同时出现的。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构成为一个部落。

最初的氏族是母系氏族（或称母权制氏族），这是因为在群婚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另一方面，当时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形成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的

重要原因。

母系氏族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本社会细胞，人们不论从事哪种生产活动，都是以氏族成员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氏族内，土地归集体所有，劳动成果也归氏族全体成员所共有。对食物实行平均分配，是当时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

第三节 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大约从一万五千年以前开始，进入了中石器时代。这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弓箭的发明。弓箭与旧石器时代的投掷武器相比有许多优越性，它的射程远，命中率高，而且携带方便。弓箭的创造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在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地用细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和器物

(1.3. 燧石工具, 2. 石制圆槌, 4. 骨制箭头, 5. 陶器)

石器镶嵌在木棒或骨棒上制作成各种镶嵌工具，用来剥兽皮或树皮。

中石器时代之后是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和陶器的发明。不过近几十年国外考古学界已知有“前陶”或“无陶”的食物生产阶段，这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深入了一步。新石器时代是食物增产的农耕畜牧发生的阶段，而陶器的制造是这一阶段的普遍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新石器时代应有陶器，只是在最初曾有过一个还没有出现陶器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前陶新石器时期。它是新石器文化的最初阶段。

在西亚伊拉克的沙尼达、耶莫，巴勒斯坦的耶利哥，以及希腊色萨利的亚尔吉萨、罗斯克罗、索弗里，都曾发现前陶文化。这种文化没有陶器，但是有新石器，特别是有农耕和畜牧业的生产，所以应归入新石器时代。到陶器发明之后，新石器文化就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 在新石器时代，从北纬 50 度到南纬 10 度之间的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西南亚、东亚和美洲中部。

西南亚是小麦和大麦的故乡。在东亚，主要种植小米和大米。小米大约源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大米则源于中国的南方，在中美洲和秘鲁，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和倭瓜。

原始农业规模不大。使用的工具只是掘杖（一端烧尖或削尖的木棒）、木锄或骨锄，稍后出现了石锄。耕种时往往先用火烧掉树木荆棘，然后掘松土地，撒上种子，听其自然生长。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只有依靠整个氏族的力量才能进行耕种。

原始畜牧业是从狩猎发展而来的。原始人将一些易于驯服的动物与野生种隔离开来，把它们驯养成家畜。根据考古材料，距今约一万三千年前绵羊已被驯养，到一万一千年前狗也被驯养了。此后山羊、猪、牛、驴、马、象、骆驼、羊驼等许多动物也先后成为家畜。

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使人类不再单纯地依靠自然的赐予，而是学会了用自己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的生产。谷类作物的栽培和家畜的饲养，为人们提供了经常的食物，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可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在新石器时代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比旧石器时代要大得多，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有一定布局的许多村落。

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 随着氏族人口的增殖，从一个氏族中派生出别的氏族，它们合起来构成大氏族，或称胞族。有的胞族包括好几个氏族。

氏族组织不断复杂化，使氏族之间的群婚难以继续维持，于是族外的群婚逐渐为对偶婚所代替。对偶婚已经组成了比较确定的男女对偶，但是这种

结合并不牢固，婚姻关系随时可以解除，它还不是后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

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仍是母系氏族，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氏族议事会，一切重大的事情都由议事会讨论决定，族长也由议事会选举产生。担任族长的一般是年长的妇女或她的兄弟。如果族长不称职就会被撤换。每一个氏族有自己的名称，有共同的宗教节日，共同的墓地。氏族成员有互相援助和血亲复仇的习惯。妇女受到高度的尊敬。

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固然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生产力毕竟还是很低的，人们仍然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因此除了个人使用的工具之外，一切财产都归公有，生产和消费都建立在集体的原则之上。直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时，母系氏族社会才让位给父系氏族，而原始社会也逐步趋向解体了。

第四节 原始社会的解体

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社会大分工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能使用金属。最早使用的是金、银、铜和陨铁等天然金属。到公元前五千年代，西南亚的居民开始用铜矿石冶炼纯铜。纯铜质地柔软，在生产上不能取代石器，所以纯铜时代又称金石并用时代。

公元前三千年代，人类发明了青铜。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它的熔点比纯铜低，硬度比纯铜高，易于锻制，所以被用来制造各种武器、装饰品和生活用具。

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冶铁术也被发明了。

从金石并用时代到铁器时代，是原始社会解体的时期。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差异，各地的发展很不一致。有的地区在金石并用时代原始社会就已解体，并进入了阶级社会；而在另一些地区，这一过程要到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才发生。

金属工具的冶炼和使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类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适合经营农业的地方，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只起辅助的作用。而在适于经营畜牧业的草原地带，则以放牧畜群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在这里只起辅助的作用。于是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分离出来了。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制革、制陶、榨油、酿酒等等手工业都日益趋向专门化。这样多的行业，已经不可能由同一个人来承担，于是又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变成了经常的现象，因为农业部落需要畜牧部落的畜产品，而畜牧业部落也需要农业部落的农产品。不过开始时交换是部落与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首领来进行的，后来出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发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到这时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形式逐渐占据优势，最后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

两次社会大分工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产物，它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为原始社会的解体创造了物质条件。

父系氏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犁耕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男子的劳动，无论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都处于重要地位，而妇女的家务劳动则变得无足轻重了。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他在氏族中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产生了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以利于自己子女的意图。于是原来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制度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父系氏族（也称父权制氏族）。

在父系氏族里，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母权制时代的居妇家制现在变成了居夫家制，过去那种不稳固的对偶婚也逐步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了。

父系氏族的基本社会经济细胞是家长制大家族（家庭公社），一个父系氏族由几个家长制大家族组成。土地虽然仍归氏族所有，但耕地已分配给各个家长制大家族使用。大家族的成员包括一父所生的几代子孙及其妻子儿女，他们共同居住，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族长往往是年长的男子，他们是

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氏族的首领也改由男子担任。从此，男子在社会上居于支配的地位，而妇女则逐渐失去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变成卑微的家庭奴婢。

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 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所获得的产品除了维持劳动力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这就给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剩余产品之转变为私有财产，和个体劳动的产生密切相关。在父系氏族之前，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有依靠集体劳动才能生存，因此不可能产生私有财产，也不可能产生私人占有财产的要求。现在无论在畜牧业或是在犁耕农业方面，都只要少数几个人就能生产出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有剩余。于是人们逐渐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劳动，一些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就从家长制大家族内分裂出来了。

个体劳动要求个体所有。生产工具、牲畜、农产品等动产首先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后来一部分土地也变成了私有财产。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氏族首领或家族长往往利用自己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权或支配权，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

剩余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可能，人们要求吸收新的劳动力以减轻自己的劳动量，并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战争的俘虏不再被杀死，而是把他们变成奴隶。这样，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就是分裂为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阶级。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之后，奴隶被大批地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私有财产和奴隶制的发展，使氏族内部各个家庭之间的经济状况发生很大差异。贫富的分化愈来愈剧烈，血缘纽带也愈来愈松弛。一些破产的氏族成员或经营工商业的人往往脱离氏族，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杂居在一起，同时氏族公社也不断接受外来人。于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亲氏族逐渐解体，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农具、牲畜及宅旁园地都是私有的；另一方面耕地仍归公有，定期分配给各家庭使用，草地、森林、牧场也归公有，由各家庭共同使用。后来公有制进一步被破坏，农村公社便解体了。但在某些地区和民族，农村公社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长期残存。

国家的产生 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私有制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氏族贵族和一般氏族成员之间的斗争，逐渐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少数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他们既得的利益，镇压奴隶和劳动群众，势必加强暴力统治，把原来的氏族部落机关，转变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于是国家就产生了。

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军事民主制起了重大的作用。军事民主制是氏族管理机关走向国家管理机关的过渡形式。它的产生与当时各部落间频繁的战争是分不开的。由于私有财产和奴隶劳动的出现，掠夺邻人的财富或人口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这就使得战争变成了经常的职业。一些近亲的部落为了向外发动侵略战争或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结成了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虽然还保留了氏族的民主传统，但增加了新的军事的因素，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他们的权力机关由人民大会、议事会和军事首领三者构成。人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参加者已不是全体氏族成年男女，而是武装的战士（成年男子）；议事会由联盟中各氏族和部落的首领组成，它实际上是贵族会议，

在决定一些重大问题时起着很大作用；军事首领由人民大会选出，他们是勇敢善战的人，所以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起初人民大会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掠夺战争加速了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贫富的分化，军事首领和贵族的权势越来越大，而人民大会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氏族制度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掠夺邻人和压迫自己人民的统治机关，转变为国家了。

国家和氏族的不同之处，第一是国家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组织则是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第二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的设立，这是氏族所没有的。

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产生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恩格斯把国家的形成归结为三种形式。雅典是一种形式，罗马是一种形式，日耳曼又是一种形式。不管哪种形式，国家的产生总是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相联系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它的产生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终结。

第五节 原始的文化和宗教

原始文化 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原始的精神文化。这些文化尽管十分幼稚和贫乏，可是它却为后世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原始人在采集狩猎生活中，了解了许多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和许多野兽的习性，这是植物和动物知识的起源。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

地理知识的产生也较早，原始人能清楚地辨认周围的地形，并且能根据星辰的位置辨别方向，还能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征兆预测天气的变化。

原始人类已具有一些医药知识，他们能区别一些病症，并且已经知道一些动植物和矿物的治疗性能。考古材料告诉我们，三、四万年之前，克罗马农人已经能用燧石工具进行外科手术。但是原始的医学往往和巫术纠缠在一起，在治疗疾病时，常常使用咒语或各种魔法。

原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很低，所以数学知识很差，有些部落只能计算五或十以内的数字。有的原始部落甚至只知道一、二、三三个数字。到原始社会末期，才发明了用刻痕、算筹、结绳来计算数字的方法。

大概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的艺术已经萌芽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洞穴绘画和雕刻、雕塑作品。题材以动物为主，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巧非常高明，如果不是对野生动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来的。由于这些壁画大都画在洞穴里非常隐蔽的地方，有些动物身上还画上了箭头、长矛或棍子打伤的痕迹，所以人们推测原始人创作这些作品可能是为了施行巫术。

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制陶、编织等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造型艺术的题材就变为以几何形的纹饰和各种图案为主了。

音乐和舞蹈也是在原始社会就产生的。早在乐器发明之前，人类已能发声呼喊或歌唱，所以声乐比器乐出现得早。在器乐中最先发明的是打击乐器，后来才发明了管乐器。在旧石器晚期的洞穴壁画中有舞蹈的题材，舞蹈者戴着兽面的假面具，伪装成野兽，这种舞蹈很可能带有巫术的作用。

原始的宗教 许多学者认为宗教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萌芽的。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曾发现一些墓葬，和死者一起埋葬的有工具和兽骨，这说明当时的人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生命，所以仍旧需要工具和食物。灵魂的观念很可能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灵魂观念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梦寐和死亡的现象，因而认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肉体的活动，而是灵魂的活动。原始人认为灵魂居住在肉体之内，但是可以离开肉体独立地存在。如果灵魂暂时离开肉体，就会出现种种梦境，如果灵魂一去不返，人就死亡了。原始人不但相信人有灵魂，而且还相信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存在着这种超自然的实体。由此产生了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等各种原始的宗教形态。

图腾崇拜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人的阿尔昆琴部落，意思是“它的族类”。这种古老的宗教形态就是相信每一个氏族都和某一种动物或植物有血缘关系，这种动物或植物受到整个氏族成员的崇拜，氏族也以它命名。图腾动物是禁止杀害的，只在特殊的场合才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吃它，这时吃图腾动物的肉就被认为是从祖先的身上承受特殊的力

量。

在氏族社会里，氏族的祖先在生前是生产的指挥者和生活的组织者，死后他的灵魂就受到崇拜。母系氏族崇拜的是女祖先，父系氏族则崇拜男祖先。祖先崇拜常常和图腾崇拜混合在一起，许多氏族相信自己的祖先就是某一种动物。

到了新石器时代产生了自然崇拜。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是浑然一体地去理解自然界，而是从自然界的许多事物中分出对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如土地、山、水、雨、太阳、月亮等等来进行崇拜了。

在上述种种原始信仰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巫术也产生了。原始人类想用取悦、祈求或威胁等各种办法来控制自然力量，他们以为在各种事业中要得到成功就一定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如唱歌、跳舞、祈祷、念咒、祭祀或遵守一定的禁忌，否则就会失败。这种巫术仪式不只限于生产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例如原始人佩带的每件饰物几乎都有巫术的作用，治疗疾病也离不开巫术，这些东西甚至一直残存到现在。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社会上一些特殊人物（如军事首领）死后也受到崇拜。原始的宗教变得越来越复杂，被崇拜的鬼神越来越多。随之形成了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僧侣集团，进行宗教活动成为他们的特权。他们假借鬼神的名义，打击穷人，保护富人，巩固财产的不平等制度。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僧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二章 古代埃及

第一节 埃及奴隶制国家的兴起

尼罗河畔的居民 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发祥地。蜿蜒的尼罗河流贯南北。上游山高水急，近海水势平缓。沿河整个狭长地带分为南部的上埃及和北部三角洲一带的下埃及。每年7月，上游暴雨，山洪倾泻，两岸一片汪洋。洪水退后，地面上覆盖上一层肥沃淤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尼罗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这里的居民。古代埃及人在这里创造出高度的文明。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古代埃及人是由东北非洲的哈姆人和西亚的塞姆人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一两万年前，人们就在尼罗河谷两边的高地上过着氏族公社生活，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当时气候湿润，高地水草繁盛，宜于居住。后来气候转为干燥，水草地带成为沙漠。公元前五千年前后，人们逐渐移居到尼罗河谷地。他们排干沼泽，开沟筑坝，发展起农业和畜牧业，种植大麦、小麦、亚麻、蓖麻、芝麻、葡萄等农田、园艺作物，繁殖猪、羊、牛等牲畜。下埃及的畜牧业很发达。渔业和手工业也在发展。

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埃及人已经会制造铜器，有铜匕首、铜斧、铜针、铜珠等。在这同时，石器、木器、骨器仍旧在普遍使用。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原始公社走向解体，氏族公社变成农村公社，贫富分化日益发展。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埃及逐渐出现一些最初的奴隶制小国。这种奴隶制小国是由一些农村公社结合而成的，叫做“塞普”，希腊文称为“诺姆”，汉译为“州”。埃及大约有四十个这种小国，各有自己的图腾、主神和旗帜。它们面积不大，散布于尼罗河两岸地带。为了争夺土地、水源、财富，它们不断混战兼并。大约公元前3100年，埃及开始统一为一个国家。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统一是由上埃及的统治者美尼斯开端的。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南边建立孟斐斯城。此后埃及历史进入早期王朝时期。

历史学家们把埃及历史分为几个阶段：早期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2686年），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2040年），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1786年），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1567年），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1085年），后期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085—332年），公元前525年以后，埃及基本上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下。

从早期王朝到古王国时期 从早期王朝起，埃及就开始建立起专制机构。埃及国王称为法老，掌握行政、司法、军事大权。法老拥有许多农庄，并且认为全国土地都属于他。国家统一以后，开始统一管理灌溉系统，观测、记录尼罗河的水位，以便发展农业生产。早期王朝的法老们还曾南征努比亚人，西征利比亚人，东征西奈半岛，把半岛上开采出来的铜运回埃及。

见希腊文化有关部分。

埃及历史各个阶段的起迄年代，各书或不尽一致。这里的起迄年代，基本上据新版《剑桥古代史》第1、2卷附表的年代。

法老是“宫殿”的意思，后来被用为对国王的尊称。

古王国以孟斐斯为首都。这一时期专制机构渐趋完备，法老既被看成君主，又被看成神的化身，人们必须象崇拜神一样地敬奉他。法老下面设有各级官吏，最高的是宰相，辅助法老每天处理全国政务，并且总管王室农庄、司法、国家档案，监督公共工程的兴建。他每天早晨要觐见法老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命令。他还经常代表法老巡视各地，了解和监督地方工作。宰相之下设有一批大臣，分别管理财政、水利建设和各州的事务。上自宰相，下至书吏、监工，各有专职，维系着法老的统治。

法老时常向大臣、贵族和寺庙赏赐土地。在法老和权贵、寺庙的农庄上劳动的有奴隶。他们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管理果园，放牧牲畜，捕鱼，打猎。有些人在农庄上所设的各种作坊里制造消费用品。

古王国时期的奴隶数量随着法老们的掠夺性出征而大量增加。根据古代铭文记载，一次从努比亚掳到俘虏七千人，牲畜二十万头，一次从利比亚掳到俘虏一千多人，又几次出征巴勒斯坦一带，带回俘虏无数。除俘虏外，还有债务奴隶。奴隶由奴隶主任意出卖，转让，甚至残害，根本不被作为人看待，他们和依附者都在监工的皮鞭下劳动，有的奴隶在主人的家里充当奴仆。

埃及农民在劳动

广大农民组织在农村公社里，每家领取一小块份地耕种。国家通过村社向农民课征租税。租税用谷物、皮革、蔬菜、酒等实物交纳。为了防备农民逃跑，法老往往每隔几年要对全国的土地和其他财富进行一次清查，根据清查结果确定税额。如果农民不能按时纳税，他自己和家人就会遭到鞭打。许多农民破产，沦为债务奴隶；或者流落到法老、大臣、贵族和寺庙的农庄里，成为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受他们的支配和压榨。

无论是奴隶或农民，都经常被抽调去参加修筑大型工程，例如兴修水利、营造宫殿、神庙、陵墓等等。

古王国时期的经济在奴隶和农民劳动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增长。占主要地位的农业得到发展。由于修整和扩建了灌溉系统，耕地的面积扩大了，农作物的品种也增加了，豆类、黄瓜、胡萝卜等已经种植。畜牧业和葡萄培植等园艺业在下埃及比较发达。尼罗河上各种船只往来运行，载着各种物产，有的运往国库，有的运到市场上去交换，有的把农产品、纺织品、书写用的纸草等土特产运往红海和东部地中海一带。法老经常指派大臣或率领船队，或带着驮畜，运送物产到地中海东岸或努比亚去换取矿石、优质木材、象牙、金、银，甚至奴隶。通过掠夺或交换得来的珍贵材料，被贵族奴隶主用来大事兴建。尼罗河两岸兴起了新的城市，坚固的石块代替了泥砖，高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埃及古代文明的丰富遗产。

金字塔 从古王国时期起，法老为自己修建起巨大的陵墓。陵墓底部呈正方形，四面向上倾斜，上端为一尖顶。从四面看，都象汉字“金”字，因此我国称它为金字塔。高大的金字塔外形雄伟，内有存放遗体和各种葬物的墓室，还有走廊、通风管道、雕刻绘画等艺术品。各条通道入口都有巨石遮挡，外表不露痕迹，其结构之精巧使历代建筑师惊叹不止。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筑群今天还矗立在开罗西南十多公里的地方，共有七十多座。最大的一座是法老胡夫的陵墓，建于公元前近 2600 年。这座金字塔高一百四十六米半，底边各长二百三十多米，全塔用了大约二百三十万块经过磨制的巨大石块，每块平均重约二吨半，有的重十五吨。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石块要从

山地拉来，中间还要运过尼罗河。道路完全是用磨光的石块铺成的。修路就用了十年时间，金字塔又造了二十年。法老向每个村庄征调劳动人手。他们组成十万人的大队，每队劳动三个月。在艰苦劳役的折磨下，大批的劳动者丧失了生命。

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胡夫以后的一个法老哈佛拉不但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金字塔，还在金字塔的附近立了一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它用整块巨石雕成，高约二十米，长约五十七米。哈佛拉以狮身人面像来象征法老的威严，据说这个人面相就是哈佛拉的相貌。巍峨的金字塔是世界的奇观，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庞大的狮身人面像是古代艺术的珍品。它们是古代埃及人创造性智慧的结晶，但是它们的修筑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状的苦难，因此它们又是劳动人民被奴役的见证。希罗多德说，人民痛恨这两个统治者，他们用一个牧人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曾在这个地方放牧他的羊群。另一位历史学家狄奥多拉记述埃及人民起来反抗暴虐统治，他说，愤怒的起义者把胡夫和哈佛拉的尸体抛出金字塔外，并且公开地要撕毁它们。

古王国的衰落 奴隶、贫民大起义 法老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痛恨，大规模的工程消耗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胡夫和哈佛拉以后，已经没有力量修筑如此宏大的金字塔，所建的都比这些为小。这时候各州的长官乘机扩大势力，他们不向中央交税，拒不服从中央命令，在地方上横征暴敛，俨然以当地君主自居。同时他们极力让自己的家族世袭职位，以免大权旁落。这样，到公元前二十二世纪，矛盾爆发为全国的分裂割据和各州的争霸。法老名义上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能控制局面。古王国逐渐衰落下去。

从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起，埃及的分裂混乱局面延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期称为第一中间期。当时赋税繁重，水利建设破毁，社会动荡，终于爆发了奴隶和贫民的大起义。根据史料记载，奴隶、农民、工匠等贫苦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起义。他们汇集起来，焚烧京城，占领王宫，捉拿国王，杀死大臣贵族，捣毁殿宇神庙，销毁档案税册，分掉仓库里的粮食，夺回奴隶主聚敛的房屋、土地、牲畜、金银财物、华美服饰。起义席卷全国，一时埃及境内天翻地覆。史料作者从奴隶主立场出发，叹息“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财富的所有者却变成没有财产的人了。”起义给予奴隶主沉重的打击，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才被镇压下去。

根据后来希腊人的拼读，胡夫又叫“齐奥普斯”，哈佛拉又叫“齐弗林”。

狄奥多拉，希腊人，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生于西西里岛，著有一部通史，共四十卷，今已残缺。

史料主要有《聂非尔列胡预言》《伊浦味陈辞》等。关于后者所反映的年代有不同的意见，或谓系指第一中间期的情况，或谓系指第二中间期的情况。本段内容主要根据《伊浦味陈辞》。

第二节 埃及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和古埃及的衰亡

中王国时期 在第一中间期，上埃及的底比斯后来逐渐兴起，它的统治者不断地加强势力，先是控制了南部各州，到公元前 2040 年前后，他的统治已经扩大到整个埃及。这样，在埃及重新出现了统一局面，开始了中王国时期，起先建都于底比斯。

前一时期奴隶和贫民的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力量，统一以后，法老逐渐加强权力，扫除地方割据势力，这对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中王国逐渐兴盛起来，灌溉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孟斐斯以南的法雍地区原来是一片沼泽地带，一年一度泛滥的尼罗河水在这里汇成一个湖泊。法老调集大批奴隶、农民排除湖泊四周的积水，筑起堤坝，开出渠道，使河水与湖水相通，河湖之间建有水闸，调节水量，这样，大片沼泽变成良田，湖泊成为水库。法雍地区正好处于上下埃及的交界地带，法老在湖泊附近的尼罗河畔靠近今天里什特村的地方修起庙宇宫殿，建起城镇，迁都到这里来。

这一时期出现了青铜器，纺织和造船业也有发展。为了取得努比亚丰富的矿产资源，向当地人民征收贡赋，重新打开通往南方的水陆交通，埃及再次向努比亚扩张势力，达到第二瀑布一带，在这里建立起要塞，加强控制。商业活跃起来，在第三瀑布偏南的地方建立起贸易据点，努比亚的黄金、象牙又源源运到埃及。埃及的船只和商队远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换取木材、铜、锡，到克里特岛去换取金属制品和精细陶器。法老曾派大臣率领大约三千人的队伍，带着物产，到今天索马里海岸贸易，换回树脂等珍品。大批的劳动者在努比亚和尼罗河以东开采矿石，用来建造大量的殿宇和雕像。

中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开始。中小奴隶主增加了。他们构成新兴的奴隶主阶层。他们拥有土地、奴隶，有的出任官吏，有的经营商业，有的是富裕的手工业作坊主，也有的逐渐贫困没落。他们中的上层在王权的卵翼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很大发展。法老主要就是依靠起用这部分人来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大奴隶主的势力的。奴隶也在增加。中小奴隶主一般都拥有几个至几十个奴隶。法老常向官吏赏赐奴隶。一个法老一次就赏给他的卫队长一百名奴隶。奴隶除了用于最艰苦的劳动外，还成批地被当作殉葬品。

中王国的衰亡 中王国经历了二、三百年以后，埃及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中间期”。中央政权再度削弱，又出现了分裂局面。三角洲西部实际上走向独立，南北双方各成势力范围。但是两方面的王权都不稳定，王位更迭频繁。据传从公元前约 1786 年起，南部原来的王朝在一百五十三年间就换了六十个法老，而北部的王朝在一百八十三年间换了七十六个法老，说明政局十分动荡。南北对峙，互相争夺，在混乱中，努比亚脱离埃及控制，喜克索斯人又从东北侵入埃及，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

喜克索斯人是亚洲的游牧部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屡次侵扰埃及东北边境。中王国没落时，他们乘机大量渗入，定居下来，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在三角洲东北部立足。喜克索斯人使用新武器，又会使用马拉战车，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约在公元前 1674 年，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这时候埃及南北原有的两个王朝虽然存在，但是都没有力量来抵御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南部王朝还曾经从属于喜克索斯人的治下。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破坏城市，毁掉神庙，征收重税，奴役人民。埃及人民身受本国奴隶主和外族统治阶级的双

重压榨。喜克索斯人给埃及带来了马拉的战车，又带来了鳞片铠甲、短剑、弯刀、木头或兽角制成的弓矢等武器装备。他们吸收了埃及的文化，学会了埃及的文字，自己也筑造起神庙和雕像等艺术品。

喜克索斯人统治北方以后，埃及人民对他们展开了长期斗争。埃及统治势力退守南方的底比斯，这里成为埃及人的反抗中心。大约公元前1650年，在底比斯兴起新的王朝。七、八十年之后，它的法老卡莫斯及其兄弟阿摩西斯先后率领广大人民向喜克索斯人作战，公元前1567年前后，阿摩西斯攻陷阿瓦利斯，把喜克索斯人逐出埃及，后来又一直追赶到巴勒斯坦境内。埃及开始了新王国时期。

新王国的强盛 阿摩西斯开始了新王国的第一个王朝，首都是底比斯。

新王国时期前期是埃及最强盛的年代。在军事斗争中，法老的权力加强了。这有利于结束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埃及重新统一。阿摩西斯掌握着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包括步兵和战车兵。有了军队，既可以抵御外族，又可以发动侵略战争，同西亚诸国争雄，因此新王国的法老们十分注意军事训练。他们常常率军东征南侵，从事掠夺。公元前十六世纪末，埃及曾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向南深入努比亚。公元前十五世纪，图特摩斯三世借口平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反抗，再次征服这些地方，在努比亚一直伸展到第四瀑布，向西侵入利比亚，大大地扩充了埃及版图。图特摩斯先后十七次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军，震动了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这时正是埃及领土最大，国势最强盛的时期。埃及成为一个奴隶制军事帝国。

埃及军队每次出征，都要掳掠大量牲畜、财物、奴隶。在此基础上，埃及的奴隶制经济有所发展。图特摩斯三世一次从叙利亚带回二千五百零三名俘虏。

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埃及

他以后的法老也多次进行这种掠夺。根据埃及古代铭文记载，有一个法老从叙利亚带回的奴隶达到十万人左右。因此奴隶数量不断扩大。战利品源源流入埃及，上自法老、贵族、神庙祭司，下至普通战士，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分沾享用。许多奴隶被赏赐给神庙和有功的军人。图特摩斯三世曾经赏给阿蒙神庙奴隶一千五百多名。这样，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役使着由几名到数以万计不等的奴隶。大批奴隶为奴隶主耕种土地，在各种作坊里制作日常用品，从事营建工程，充当仆役。有的奴隶从奴隶主那里领取一块份地耕种，向他交租；还有的被主人租给其他奴隶主去使用。在努比亚和西奈半岛的金矿、铜矿里做工的奴隶境遇最苦。这里气候酷热，令人窒息，饮水艰难，奴隶大批倒毙。

奴隶固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农民的境况也和奴隶相近似。他们耕种奴隶主的土地，租税很重。许多农民连种子、牲畜也没有。春播时由官吏丈量土地，发给种子，然后监督劳动，登记收获。农民往往因为交不起租而不得不把土地转给别人租种，有的甚至因无法交租而被任意摧残，以至置于

一作雅赫摩斯。

这是埃及历史上的第十八王朝。

阿蒙是底比斯的庇护神，被奉为太阳神，成为国家最高神。

死地。农民名义上是自由人，实际上同样处在被奴役的地位。

新王国时期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梯形犁、金属镰刀等农具，进一步修缮了水利系统，又利用沙杜夫提取河水，这对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这时候青铜已经普遍使用，又从赫梯运来了铁，开始使用铁器。金银手工艺品、织物、陶器都有很大改进。新王国时期发展起范围更大的贸易活动。埃及同小亚细亚、红海南岸、希腊、爱琴海的岛屿都有贸易往来，而以地中海东岸为主要对象。来自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的物产也通过叙利亚的港口运到埃及。出口产品仍以谷物、麻布、皮革、纸草等为大宗，进口物品除小亚细亚和黎巴嫩木材外，还有叙利亚酒、油类、树脂，克里特的精美陶瓶、金属武器、饰物等。

新王国的衰落 为了统治扩大的帝国，军队、官僚阶层都在扩充。法老建立了一支职业军队，起先由法老亲自统率，后来由军官统率。那些依靠战功得到赏赐因而起家的人，成为新兴的军事贵族，职业军官尤其地位重要。最突出的是阿蒙神庙，它占有全国大约百分之十的上等耕地，拥有八万六千多个劳动者；它还自备船只，经营商业，设立经济、行政机构；它的高级僧侣经常参预政事。这必然会构成对法老权力的威胁。它的大祭司越来越取得实权，不再服从法老。王权再一次衰落下去。这时候，小亚细亚的赫梯国家正值强盛时期，开始长期争夺埃及在亚洲的土地。公元前十三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叙利亚北部被赫梯控制。

埃及使用马拉战车同赫梯作战

新王国的侵略、掠夺、阶级压迫、繁重徭役，引起了各地的反抗。奴隶经常逃亡亚洲。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爆发了叙利亚籍奴隶伊尔苏领导的奴隶、贫民起义。起义者没收奴隶主的财产，打击了僧侣集团的势力。公元前 1170 年前后，底比斯的造墓工匠掀起罢工。他们本来待遇就很微薄，又加政府拖欠粮饷，无法生活，他们扔下工具，离开工地，直到领足粮饷，罢工才告段落。后来他们又举行了几次罢工。灾难最深重的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他们的土地一次次地遭到蹂躏，劳力、财富一次次地丧失，因此他们经常起来反抗。在埃及国势日衰的过程里，它们纷纷摆脱了埃及的统治。

后期王朝 内外交困的新王国在重重矛盾中走向分裂。大约公元前 1085 年，埃及进入后期王朝时期。这个时期埃及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在最初的一百四十年间，北部存在一个王朝，而底比斯阿蒙神庙的大祭司及其家族实际上在南部掌权。此后常有南北两个王朝并存，统治者有的是军人首领，有的是阿蒙神庙大祭司，更不用说还有地方割据势力。努比亚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脱离埃及，而且在公元前 730 年左右在埃及南部建立王朝，统治了七十年左右。此后，古代埃及又最后一次统一起来。公元前 525 年，亚洲新兴国家波斯灭了埃及。虽然埃及曾经一度摆脱波斯的统治，但又第二次被征服，直到公元前 332 年。此后埃及先后处在亚历山大帝国、托勒密王朝以及罗马

沙杜夫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提水工具，又称桔槔。一根长杆平衡地拴在横梁上，长杆一端系着水桶，另一端绑着泥块或其他平衡物。取水时先将桶浸入水中，再利用平衡物的作用使桶向上升起，把水倒进渠里。如果河岸较高，可以逐层安装几个这种简单器械，一层层地把水引上去。直到现代，有些地方的农民仍旧使用沙杜夫。

见第二编第二章。

的统治下。

第三节 古代埃及的宗教和文化

宗教信仰 古代埃及人也象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相信冥冥之中有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因此产生了宗教信仰。埃及人相信的不是一个神而是许多神。有些神是自然现象——天、地、日、月的化身；有些动物、植物也被作为神的化身来崇拜。从早期王国以来的各种史料都提到大量的神。历代法老神化自己，要把他们的统治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广大劳动人民希望诸神赐给他们安慰、希望和经受自然灾害的力量。

在埃及人信仰的诸神中，太阳神是特别受到尊敬的。拉、阿蒙、阿吞都是太阳神的不同称谓；鹰头神荷鲁斯后来也被认作正在升起的太阳神。埃及很多神庙为敬奉太阳神而建立，正反映了它在古代埃及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古代埃及人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不灭，因此要把死者遗体很好地保存起来，葬进坟墓。他们相信奥西里斯神是冥世的主神，人的灵魂要受他的裁判。在《死者之书》里记有一个死者灵魂对奥西里斯的一段表白：

“我在这，我到您面前来了；我带来的是正直，我曾经制止错误。

“我不是一个对别人作错事的人。

“我不是一个谋害亲属的人。

“我不是一个以谎言代替真话的人。

“我不知道背叛。

“我不是一个故作损害的人。”

在埃及人心目中重要的神除太阳神和奥西里斯以外，还有生命之神伊西斯和恶神塞特等等。到新王国时期，由于同埃及属地叙利亚人经常来往，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诸神的信仰也在埃及人中间流行。

埃及的宗教同政治关系密切，因此祭司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权、有钱、有势。法老把自己神化为太阳神的化身。长期以来，埃及人信仰多神。到新王国中期，法老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79—1362年）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强迫埃及人只信奉太阳神阿吞，禁止信奉其他诸神。他提倡一神教，对埃及祭司奴隶主集团是一个打击。但是他死以后，埃及又恢复了多神信仰。

文字 埃及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埃及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创造出光辉的文化。

公元前三千多年，埃及人就有了象形文字，例如 表示面饼， 表示太阳。后来有些图形逐渐变成表示意思和发音的符号。他们有二十四个表示辅音的符号，还有许多辅音组合符号。把不同的图形符号连在一起，就组成不同的意思。例如口形的符号近似 r 音，一条水纹的符号近似 n 音，那么就读如 rn，就是“名字”的意思；又如下图前四个符号中，鹌雏近似 w 音，脚近似 音，水纹近似 n 音，wn 就是“升起，起来”的意思； 在这里不发音，用来象征升起的含义，以免这个词被误解为其他发音相同的词，这是一种常见的写法。整个句子的意思是“太阳在空中升起”。象形文字十分复杂，主要只有祭司和书吏才会写，普通老百姓很难掌握，以后由它先后演化出草书体、世俗体等，后来逐渐被人遗忘。人们曾经长期对文物上面的描刻莫测高深。直到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通过研究罗塞塔石碑和一块

《死者之书》是咒文和对神的一些颂歌的汇集。

方尖碑上的铭文，才辨认出若干符号和许多名字，读出一些文句，从而取得重大突破。后继者又经过几十年的钻研，才完全解开了这种文字之谜。

象形文字

罗塞塔石见图版(1)

古代埃及文字也在逐渐简化。它有二十四个表示辅音的符号，类似字母，但是它一直没有发展成为字母文字。那二十四个类似字母的辅音符号，对后来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有很大影响。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辗转发展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字母，从这里可以看出埃及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纸草是古代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它是一种水生植物，盛产于下埃及的沼泽之中。人们撕去它的茎皮，然后把茎剖成一条条的薄片，排齐压平，使之联结，最后磨光晒干。一页页的纸草可以粘成长卷。纸草不但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使用，后来还行銷欧洲。古代埃及人用削尖的芦苇秆蘸着颜料在纸草上书写。有些纸草卷被保存下来，成为埃及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科学 古代埃及人的数学知识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每年尼罗河水退后，埃及人都要重新丈量土地，划定田界，因而早在统一国家兴起之前，他们就积累起初步的数学知识。随着水利建设的扩大，大型建筑物的修造，知识不断加深。古代埃及人懂得用十进位的计算方法，能够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推算圆周率精确到 3.16，还会计算简单的算术四则应用题；他们能够解出有一个未知数的方程式，用来测定谷堆和粮仓的容积。他们的数学知识和建筑技术从金字塔的设计施工上充分反映出来。高塔石块层层相叠，没有灰浆粘结，然而异常平整，严丝合缝。下面的走廊和墓室承受着上方的重压，却能屹立数千年而不变，其设计之严密，计算之精确，技艺之高超，无不令人惊叹。

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开始观测天体，从而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他们发现每当天狼星在清晨升起时，尼罗河就要泛滥。天狼星升起的间隔为三百六十五天，他们就把这段时间定为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年终再加五天节日。他们还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泛滥季节、播种季节、收获季节。这个历法虽然每年有大约四分之一天的误差，它却是今天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的基础。

古代埃及的医学也相当发达。医生能治眼疾、牙痛、腹痛、外伤等病。一卷纸草上列举了四十八种外伤病例和疗法。埃及人初步了解心脏和血液循环的关系。木乃伊的制作可以说明埃及人对人体结构已有认识。人们先把死者的脑浆和内脏取出，颈部以下浸入盐水或其他防腐液，泡去油脂、表皮，然后晒干，腔内填塞香料，外面涂上树脂，用细麻布包好，可以经久不腐。一些法老和贵族的干尸一直保存至今。

木乃伊

卡尔纳克神庙

罗塞塔石碑是 1799 年拿破仑征埃及时他的部下在罗塞塔挖掘战壕时出土的，刻于 196 年，上有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方尖碑发现于第一瀑布附近尼罗河中的菲莱岛。

建筑 古代埃及留下许多高大建筑，表现了古代埃及人民的高度的建筑才能。下埃及的金字塔，上埃及的庞大神庙，一北一南，辉煌相映。著名的神庙，在底比斯附近的有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尔神庙，都是用来敬奉埃及的主神阿蒙的。卡尔纳克神庙在中王国时期，还是一座不太大的庙宇，后来历代多有添建，直到托勒密时期，使它成为厅殿层叠的建筑群。它的主殿占地约五千平方米，有一百三十四根圆柱，中间最高的十二根圆柱高二十一米，作开花状的柱头上可以站一百人，柱上刻着象形文字和图形，描述法老们对阿蒙神的敬意。在各种神庙和陵墓的墙壁上，也装饰着许多绘画、雕刻，例如卡尔纳克神庙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图特摩斯三世远征亚洲的情景；在卢克索尔神庙的巨柱间，立有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石像。这些绘刻题材相当广泛，有的描写贵族富人饮宴作乐、打猎、运动的场面，有的描写农民、手工业者的劳动景象。有的墓里还有一排排手执长矛和盾牌的木俑。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第三章 古代西亚国家

第一节 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

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 西亚上古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同古代埃及及文明产生的时间不相上下，分布在一个半圆形草原地带。这个地带的西端包括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延伸到地中海东南角，经西奈半岛与埃及相连；它的东端沿底格里斯河向南直到波斯湾，包括两河流域的南端地区；它的中部包括亚述、米丹尼，北倚石骨嶙峋的高山，南向叙利亚、阿拉伯沙漠。这个地区没有正式名称，只是被叫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

古代西亚

这里，不断有部族迁徙进来，不断有后来者征服先来者。因此这里的文明是多种部族相继创立的。数千年前，这里就曾出现一系列奴隶制国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两河流域诸文明古国。

苏美尔人(石刻像)

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波斯湾。两河流域在两河相距的最狭地方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为美索不达米亚，自亚美尼亚高原至现在的巴格达，属高原地区，产大理石、石灰石、铜、铁、铝和沥青，主要居民是胡里特人和亚述人。南为巴比伦尼亚，从巴格达至波斯湾，西临阿拉伯沙漠，东隔底格里斯河与埃兰相望。巴比伦尼亚面积虽小，却较北部肥沃，盛产大麦、小麦、黍和椰枣。尼普尔以北，住着操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尼普尔以南，主要居民是苏美尔人，因此称苏美尔。苏美尔人穿羊毛短衣，大部分是圆颅、短颈、光头光面，他们同长脸多须的塞姆人迥然不同。早在公元前 4300 年以后，他们就从游牧转入定居，开始城市生活了。约从公元前 3500 年起，他们又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国家如乌尔、拉尔萨、乌鲁克、尼普尔、波尔西巴、拉伽什、基什等。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小国家的主要建筑物大多是塔庙（ziggurat）。

乌尔神庙废墟和复原模型

乌尔的塔庙系用泥砖建造，仅在外面砌以烧砖，并用沥青粘牢。庙高二十一米多，有阶梯通向顶端。墙基和帕德嫩神庙一样，呈曲线形而不是直的，说明苏美尔建筑师是雅典人的先驱。乌尔墓葬中的工具、武器、器皿和装饰品是用金、银、铜、石等各种材料制作的。象银质牛头、银质狮头、金银合金驴这样的艺术品，造型完美，加工精细，接近晚期希腊水平。在一件七英尺长九英尺宽的大型铜雕上，雕着一头狮首鹰，下面还有二只牡鹿。它构图巧妙，布局合理，堪称苏美尔艺术家的杰作。乌鲁克的包华利土丘原是一座

古代的波斯湾较现在长约一百三十英里（向北）。但近年有人认为，今日的波斯湾与古代并无多大差别。这是希腊、罗马的称呼，来自希腊文 mesos（中部）potamoi（河流），义为“两河之间的地区”。

在幼发拉底河南岸，又称 Hur，汉译《圣经》作吾珥，据说是犹太始祖亚伯拉罕的故乡（《创世记》，第 11 章，31 节）。

又称 Huruk，Erech，希腊人作 Orchoe，在幼发拉底河东岸。

巨大的塔庙。发掘时，庙高三十米，总体积约八万五千多立方米，是用大约三千万块泥砖或烧砖建成的。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波尔西巴一个土丘上，有巴比伦尼亚最著名的神庙遗址。这是一座七层塔庙，表示七星神分管的七个领域，颜色互不相同。第一层是献给土星的，用沥青涂成黑色；第二层属于木星，使用橙黄色烧砖；第三层属于火星，使用淡红色烧砖；第四层属于日神，表面镶以金片；第五层属于金星，使用淡黄色烧砖；第六层属于水星，作天蓝色，第七层属于月神，表面镶以银片。顶端的神殿装饰华丽。这座塔庙甚至在当时就被誉为“波尔西巴的奇观。”

社会经济生活 神庙既是城市国家的中心，僧侣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人们认为，只有他们懂得宗教礼仪，知道如何献祭，并能同城市保护神交往，了解神意。此外，他们还观察天象，占卜吉凶，并具有文化知识。所以，他们不仅主持宗教活动，而且象生产、战争、外交这样的事务，也统归他们处理。他们逐渐从社会分化出来，成为管理者和权力的化身，被冠以特殊的称号。这些“祭司王”受长老会议节制，尚非专制君主。军队可能属于民兵性质，但已有军旗和用马、驴拉的战车。战士戴铜盔、持战斧、投矛、弓箭和大盾，以六排密集方阵队形前进。可见早在希腊、马其顿人之前，苏美尔人就采用方阵战术了。农民种植谷物，也饲养牛、羊、驴。主要食物是椰枣、肉类、乳制品和面包。土地归贵族所有。农民缴纳实物税，还要服劳役，如建筑神庙、兴修水利等。他们住在简陋低矮的土屋或茅棚中，处境与奴隶相去无几。富人住长方形砖屋，自有院落，地上铺毯，傢具齐全。富压贫、强凌弱已是日常现象。公元前二十四世纪拉伽什王乌鲁卡吉那的改革，说明巴比伦尼亚各城邦的阶级关系已很紧张。

文化与宗教生活 除农、牧、手工业外，苏美尔人也从事商业活动。商人带着谷物、椰枣以及羊毛和金属制品同西亚各族甚至印度河流域互通有无。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已在苏美尔发现。

活跃的经济生活，日趋复杂的行政事务，加速了文字发展的进程。苏美尔文字来自图画文字。人们用方头芦杆笔在泥版上压出一排排符号。符号呈楔形，故西方学者称它为楔形文字。随着贸易的发展，楔形文字逐渐向外传播，终于成为西亚以至伊朗的通用文字。公元前六世纪中晚期，楔形文字被波斯人改造成字母文字。

神庙连同附近的僧宅，既是宗教中心，也是工、商和教育中心。出土的泥版文书表明，孩子们在这里学习数学以及读和写。教师（僧侣）在泥版的一边写上字，学生在另一边学写。他们多数是祭司、官员、医生和建筑师的子弟。苏美尔人是最早制定历法的民族之一。最初使用阴历，分一年为数月。为便于经商，又分每月为三十日，后来才改用阳历，并知闰年。月名来自农业和宗教节日，年名根据当年重大事件而定。他们使用六十进位法，为后来划分圆（ 360° ）和时、分、秒奠定了基础。在计时器方面，他们已有日晷和水钟。

苏美尔人崇拜日、月、星辰、天、地、河流以及风暴，每城（或数城）

公元十七世纪，意大利商人彼得罗·德拉·维尔（Pietro Della Valle）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王宫废墟中的铭文拓印下来，带至欧洲。从此，西欧才首次见到楔形文字。1802年，德国学者格罗特芬（Grotefend，哥廷根的中学教师）自古波斯文认出三个王名和十四个字母。半个世纪后，英国学者罗林逊（Henry Rowlinson）通过古波斯文进而研究楔形文字，作出了巨大贡献（详后“贝希斯敦铭文”）。

有一主神。崇拜形式主要是举办节庆、献祭、祈祷和唱赞歌，宗教事务操在富有的祭司阶级手中。祭司分术士、卜师、歌人三类。不论国家或个人在采取重大行动以前，必须进行占卜。卜师选一头洁白无疵的羊，杀以祭神，然后掏出肝脏（据说是生命之所在），根据其形状、大小、纹路判断神意。此外还根据飞鸟、星辰、睡梦占卜吉凶。这类占卜方法后来通过伊达拉里亚人传到罗马。苏美尔宗教将神的奖惩限于今世，这一点和重视来世生活的埃及人是不同的。

发现于尼普尔的《洪水篇》是苏美尔最著名的宗教文学遗产之一，这部泥版文书叙述西苏德拉一家与洪水斗争的故事。一个夜晚，神在西苏德拉的梦中显现，告诉他某月第十五日将发洪水毁灭人类，要他将文书埋在太阳城西帕拉，还要造一只船，并准备充分的食物。他醒来以后，令人造了一只大船。如神所说，洪水果然来临。他带领妻子儿女，装上足够的粮食酒肉和飞禽走兽，航行在茫茫洪水之中。当洪水渐渐退去，他放出几只鸽子，鸽子很快便返回船上，说明既找不到食物，也没有歇息之处。第二次，鸽子又飞回来，但爪上带着泥土。他第三次这样做的时候，鸽子便一去不返了。他知道洪水已经退去，就揭开篷盖，发现船停在一座山上。他欣喜若狂，下山筑坛向神献祭，然后便突然不见了。留下的人四处寻找，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但听到的却是来自上天的声音：我已与众神同住，你们应返回巴比伦，并取出埋藏的文书，晓示众人。众人遵命而去，故事到此结束。《洪水篇》包含某些历史事实，对圣经文学有很大影响。

公元前四千年代到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初，是苏美尔城邦发生、发展的时期。随着阿卡德人的兴起，它们的影响开始削弱。阿卡德王国（2371—2230）灭亡后，苏美尔城邦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2113—2006年）一度复兴，但终于被埃兰、阿摩利人取代。此后，在两河流域的政治史上，塞姆人充当主要角色。他们曾先后建立三大帝国，即古巴比伦、亚述和新巴比伦。

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1至22节。

第二节 从古巴比伦王国兴起到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

古巴比伦的兴亡 公元前 1894 年，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1894 - 1595 年）第六个王汉谟拉比在位时（公元前 1792 - 1750），巴比伦已从微不足道的村落发展为一个繁荣的大城，

巴比伦城废墟以致整个南部地区都根据这个名字而称为巴比伦尼亚。大量商业文件、五十五件王家文书以及汉谟拉比法典表明，他不仅是个征服者，也是一个有才干的管理者和立法者。他把昔日各地的“祭司王”

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古巴比伦

降为听命中央的地方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系列法庭，不服从法庭判决的人可直接向王上诉；向各阶级征税，包括僧侣在内；征兵令严格执行，违者处死；奖励农商，兴建神庙，开挖运河。一则铭文说道：“安奴及贝尔神令我治理这巴比伦尼亚地，并将王笏授诸我手。此时，我开掘汉谟拉比运河。这人类的滋养者，带给巴比伦尼亚以充沛之水。我变运河两岸为沃壤，我聚粮成堆，我为巴比伦尼亚取得无穷之水。”这则铭文说明了两个问题：君权是神授的，君主关心水利。

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土地掌握在国家、贵族、僧侣手中。他们把一部分土地租给贫苦农民，租金约为产品的三分之二，如遇天灾，酌情减免。阿摩利人本来是游牧部落，因此对羊群十分关心。每逢春季剪羊毛季节，汉谟拉比即将地方官员召到京城，举行庆祝，象过节日一般。城市工匠生活优于农民。主要产品是金、银、铜器和羊毛、亚麻制品。贵重原料如金、银、铜、象牙等来自东方。出口商品包括金属器、纺织品、椰枣和谷物。巴比伦商队往返于各城市间，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可见商业比较发达。在古代废墟中，发现不少帐单和货单，上面有男人和女人的签名，说明妇女也参加经商。这些商业文书，外商必须能够认识，否则无法进行交易。因此随贸易发展，巴比伦文明及其楔形文字也和商队一同传播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

汉谟拉比是真正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在宫廷向地方发号施令。书记官抽出芦秆笔，摆上小泥版，将他的指示记录下来。为防止软泥版粘连，在有字的一面撒上干粉，然后将一片片泥版捆扎，送炉烘烤。王室信差把这些“文件”送至全国各地，同时也把地方官员的信函、报告送达王宫。来自各地的文件通常由书记官启封，对王大声宣读。有一份报告说，乌尔、拉尔萨之间的河道淤塞。汉谟拉比听毕，立即命令拉尔萨长官尽早疏通，以便恢复通航。

考古学家发现一处遗址，是一所汉谟拉比时代的学校。学生们在湿软的泥版上练习写字，由教师指导，先学写单个的楔形的笔划如横、竖、斜（- | /），然后再组成文字符号（𐎶，足）。直到他们能辨认单字和短语时，才学习句子和古代文献。在一块当年的泥版上，有这样一句话，“善于在泥版上作书的人，就象太阳一般显现光彩。”说明学会楔形文字是颇不容易的。

汉谟拉比以后，巴比伦王国渐趋衰落。公元前十六世纪初，赫梯人突入

布勒斯特（J.H.Breasted）：《文明的征服》（Conquest of Civilization），纽约、伦敦 1926 年版，第 153 页。

巴比伦，洗掠而去，古巴比伦灭亡。此后巴比伦出现的三个王朝，不能同汉谟拉比时代相比。公元前八世纪，巴比伦尼亚终被亚述帝国鲸吞。

汉谟拉比法典柱见图版(2)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巴比伦王国编纂了一部法典，这就是历史上所称作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著名古代法典刻在一个高二·二五米的石柱上，据说是汉谟拉比执政三十年后下令公布的。它原置于巴比伦马都克神庙，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被埃兰人作为战利品带到苏撒，1901年，由法国、伊朗考古队发现，现存巴黎卢佛尔博物馆。石柱上端是浮雕，沙马什（日神）端坐右边，将法典授予汉谟拉比。浮雕下面满布楔形文，共四十九栏，三千六百行，八千余字，可分为序、本文、跋三部分。序言和跋将国王描绘成神圣君主，尽情称颂他的文治武功，宣扬编法目的在于发扬公道，铲除邪恶。

正文包括二八二条，大致可归纳成七个部分：

（一）法院（一至五条）

旨在反对诬告（一至四）以及对法官、证人的贿赂行为（五）。第二条反映一种古老有趣的审判方式。如甲控告乙但提不出证据，法庭将被告投之于水（幼发拉底河），交河神审判，如被溺毙，证明有罪，其房屋归原告所有；否则，原告应予以处死，其房屋归被告所有。

（二）财产（六至一二六条）

1. 关于偷窃、抢劫、藏匿逃奴的刑法（六至二十五），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

2. 关于军役和士兵财产的规定（二十六至四十一）；

3. 关于租佃、租税、税额的规定（四十二至六十六）；

4. 关于房租、借贷和利息的规定（六十七至一一七）；

5. 关于酒店和酒价的规定（一一八至一一一）；

6. 关于债权、债务、人质、信托的规定（一二二至一二六）；

（三）关于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一二七至一九五）

（四）关于人身保护和“同态复仇法”（一九六至二一四）

（五）关于劳动、报酬、工具和责任事故的追究（二一五至二四一）

1. 人医和兽医（二一五至二二五）；

2. 理发师、建筑师、船工（二二六至二四一）；

（六）租赁牲畜、船只以及佣工和报酬（二四二至二七七），这一部分提到八种手工业工人（二七四），说明手工业有很大发展。

（七）奴隶（二七八至二八二）。

奴隶是主人的工具和财产，不属于人的范畴，因而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法典》的基本思想。对奴隶主给以无条件的法律保护，这是《法典》的基本特征。杀死或伤害奴隶不算犯罪，只须向主人赔偿损失，就算了事（二一三至二一四，二一九）；盗窃或隐藏他人奴隶者处死（十五至十六）；消灭他人奴隶标记者断指或处死（二二六至二二七）；殴打自由民或反抗主人的奴隶处割耳之刑（二一五，二八二）。《法典》另一特征是采用“同态复仇法”，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九六，二一四），这种办法可能只用来解决上层自由民之间的纠纷。此外，这部法典还对社会上各阶级阶层的人的权

利和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

在一个实行君主专制和神权政治的社会，能出现这样一部多少体现一点法制精神的法典，是颇不容易的。这部法典强调保护孤寡，并把债奴期限缩短为三年（一一七），也是值得注意的。汉谟拉比法典的产生有其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奴隶主的现实生活的要求和经济的要求，因此不能把《法典》单纯视为某人头脑中的产物。

亚述帝国的兴起 亚述人本来生活在一个以亚述城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关于亚述的知识只限于《旧约》和希腊史家的零星报导。随着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进行，古代王宫、神庙遗址以及泥版文书相继出土，其中包括亚述四大京城，王室图书馆和萨尔贡二世的王宫。在这个王宫废墟上，发现一块泥版，列举了自公元前二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中期的所有亚述王名。

亚述帝国

（公元前 650 年左右）考古材料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知识。

在亚述军事强国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是新亚述时期。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 746—727 年）建立帝国，对外扩张，先后进兵巴比伦、大马士革，击败推罗王希兰姆、犹太王亚撒利亚（Azariah 或乌西亚，Uzziah），迫使他们称臣纳贡。他的儿子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2—705 年）即位伊始，便南侵埃兰、巴比伦，并攻占撒马利亚，灭以色列国，把二万七千二百八十名居民变为奴隶。公元前 721 年，他入侵叙利亚，镇压大马士革等城市的联合起义；次年进军埃及。一战击败巴勒斯坦、埃及联军。前 715—707 年间，他反复用兵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兰、巴比伦，并入侵阿拉伯、亚美尼亚、乌拉尔图、米底等地区，使亚述成为一个几乎包括埃及和整个西亚的大帝国。公元前 708 年（或 707 年），塞浦路斯王遣使至巴比伦献金银乌木。萨尔贡用自己的雕像回敬使者。雕像上面有简短的铭文“安放陛下之雕像。”受此礼物者，意味着向他屈服。使节返回后，把雕像置于伊达利厄姆城。

人首带翼牛

萨尔贡大规模推行强制移民政策。二十五年间，约二十余万人被他驱逐。以色列人从萨马利亚被赶到米底，扎格罗斯山民被迁往亚述，亚美尼亚人被迁往哈马特、大马士革，阿拉伯人被迁往撒马利亚，迦勒底人被迁往巴勒斯坦和遥远的北方。亚述军事贵族把大批居民变为奴隶，强迫他们修建运河、道路、城市和宫殿。都尔·沙鲁金便是其中之一。这座宫殿饰以精美雕刻，有攻城、野战、处置战俘等场面。巨大的人首带翼牛和人首带翼狮守卫着人口。王宫建于大砖台上，有六个大厅和许多小间。嫔妃住后宫，由阉人看守，不得与外界交往。再向后去，是一座七层塔庙，高约五十米，每层颜色不同。这时，亚述人首次使用透明玻璃和凹雕法。釉砖、高足杯等水平很高，臂锡、剑柄，权杖等做工颇精。他们善于刻画动物，马头画得栩栩如生。为把帝京

亚述、凯拉（Kalah、Kalhu）、都尔·沙鲁金、尼尼微。

亚述史始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分为古亚述（约公元前 2500 年）、中亚述（古帝国，公元前 1400—1070 年）和新亚述（新帝国，公元前 746—609 年）三期。

DurSargina，义为萨尔贡之城或萨尔贡堡，遗址在今伊拉克霍尔萨巴德附近。

萨尔贡堡与尼尼微连接起来，萨尔贡下令修建一条大道，沿途设路标、驿站，并委派官员负责传送王室和六十个地方总督的来往信件。这是邮政制度的开端。亚述筑路术为波斯人仿效发展，后来又传给罗马。

尼尼微（复原模型）

萨尔贡的后继者继续对外扩张。阿树尔巴纳帕尔（公元前668—627年）是个极端残忍的君主，但有搜集、保护文物之功。他下令兴建的大图书馆，收藏不少圆形印章和二万二千多件泥版文书。文书包括宗教颂歌，神话传说、王室信函、商业档案、编年史、数学及其他著作。管理人员分类编目，件件泥版都打上王印。阿树尔巴纳帕尔图书馆是亚洲第一个图书馆。它的“藏书”现存大英博物馆。

亚述的军队 亚述帝国是一个军事帝国，它的军队是第一支使用铁武装的军队（公元前八世纪已广泛使用铁武器）。在萨尔贡二世王宫发现铁器二百余吨，其中有长矛、刀剑、盔、盾、胸铠和弓箭。亚述军队的主力是得到重装步兵支持的弓箭手。此外还有著名的尼尼微骑兵以及车兵、工兵和攻城部队。亚述人首次使用投石机、破城槌和坑道战术。在这样的军队面前，东方的泥砖城墙是无济于事的。亚述人征服一地，即进行烧杀，或将被俘首领活剥，穿刺在尖桩上；或将剥下的人皮和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头。阿树尔巴纳帕尔时代的浮雕，描绘着屠杀战俘的情景。屠杀伴随着掠夺。被征服的人民赶着牛、羊、驴、马，长长的驼队载着谷物和财宝向尼尼微前进。带队的是战败的首领或达官贵人，他们颈上挂着被斩下的人头。亚述君主和军队靠他人的血汗过活。他们杀人如麻，狼如虎狼，难怪尼尼微被犹太先知比作血腥的狮穴。

狮穴的陷落 阿树尔巴纳帕尔死，他的儿子阿树尔尼米德林（公元前627—626年）继位。这时，米底王齐阿克萨及其盟友埃兰人分别自东、自南向帝国进攻。亚述王亲自率领军队抗击齐阿克萨，派遣迦勒底人那波帕拉萨尔至巴比伦阻止埃兰人。那波帕拉萨尔乘机与米底秘密结盟。齐阿克萨答应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尼布甲尼撒。那波帕拉萨尔于是掉转矛头，驱逐亚述人，占领巴比伦（公元前626年）。数年后，迦勒底、米底联军攻陷尼尼微（公元前612年）和卡尔赫美什（公元前605年）亚述军队被消灭，帝国灭亡。联军攻打尼尼微时，阿树尔尼米德林无力抵抗，便在绝望中躲进王宫，下令放火，同自己的帝国和金银财宝同归于尽。此后，亚述地区先后受米底、新巴比伦、古波斯、希腊·马其顿、帕提亚（安息）、新波斯等一系列外族统治。现在伊拉克等地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是古亚述人的后裔。

新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那波帕拉萨尔自称巴比伦王，这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开始（公元前626—539年）。他死后，尼布甲尼撒二世继位（公元前605—561年）。这时，巴比伦成为西亚最大的城市。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普遍使用金、银、铜、铁制作雕像、傢具和装饰品。考古学家发现玻璃碎片，甚至小玻璃瓶。质地优良的毡毯上，编织着各种怪兽图案。这些产品远近驰名，行销国外。波尔西帕是亚麻布主要产地。平纹细布牢固耐穿，很受欢迎，包括波斯皇帝在内。

迦勒底或新巴比伦王国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巴比伦座落在一个平原上，呈正方

形，每边长一百二十斯塔德（约十四英里）。外面有护城河及高大的城墙。它的一百个门，全是青铜的。幼发拉底河将城市

伊什塔门（复原图）

分为两半。两岸有道路和码头。在河中造了一排石墩，昼间架吊桥让行人通过，晚上移去。据说还挖了一条宽约四点五米、高约三点七米的水下隧道。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王宫有外、中、内三重围墙。内墙十分考究，用彩色瓷砖组成人物及各种动物图形。一座奇特的花园是正方形，每边长四百希腊尺，座落在由层层拱形建筑重叠起来、高达二十三米的人造山上。上面种有各种花卉、灌木和大树，有些树的直径达三米以上。王和王后（阿密蒂斯）登上山去，如置身米底山区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假山底部小室中有机械装置，可把河水引到山顶。这座“空中花园”被希腊人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贝尔（Bel）神庙是仅次于王宫的巨大建筑。正方形的底部，每边长约近二百米。外面有阶梯盘旋而上到达顶端，上下有两个神殿。波斯征服前，里面有贝尔、米莉塔和伊丝塔尔的金像。米莉塔像前有二 狮和各重三十塔兰特的二条银蛇。每尊像前均有巨大金桌，上面陈设的两个大酒杯与银蛇同重。此外还有二个大香炉，三个大金钵。这些黄金总重八百塔兰特。希罗多德东游时，上殿已无神像，只有一个巨大的卧榻和金桌。

尼布甲尼撒二世一面大兴土木，一面对外扩张，最重大的事件是两次进兵犹太王国（公元前 597 年和 590 年），毁灭耶路撒冷（公元前 587 年），将大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他死后，以贝尔神庙祭司为首的僧侣不愿再受迦勒底人统治。当居鲁士兵临城下，他们摒弃末王那波尼德（公元前 555—539 年），打开城门。塞姆人在两河流域建立的最后一个强国灭亡了。

天文学的发展 苏美尔人除日、月外，已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他们还用肉眼观测月蚀。据现代天文学者推算，那次月蚀发生在公元前 2283 年。据说系统的观测始于公元前 747 年，此后连续三百六十年没有中断。观测记录刻在一系列泥版上，其中大部分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块属于公元前 568 年。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泥版残片上，有这样的记录：

一日，水星出现。

三日，秋分。

十五日，晚，日落后四十分，月蚀开始。

二十八日，日蚀。

在古巴比伦尼亚天文史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迦勒底人。纳布·里曼努根据二百五十年来的观测记录，算出一年是三百六十五日六时十五分四十一秒，比近代的计算只多了二十六分五十五秒。他编制的时间表是古代最重要的天文著作之一。基迪努也编制了一个时间表，并且发现二分点（春分、秋

希罗多德：《历史》，I，178—180。

米莉塔又称 Beltis，是贝尔的妻。伊丝塔尔，金星神，爱神。

《历史》，I，181。

据库勒（Kugler）推算，月蚀发生在公元前 425 年 10 月 9 日，日蚀发生在 10 月 23 日。见 J.H.布勒斯特（Breasted）：《世界上古史》（Ancient Tim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波士顿，1944 年版，第 212—213 页。

Nabu-rimannu, 前五世纪时人，希腊人称为 Naburianos; kidinnu, 前四世纪-- 时人，希腊人称为 kidenas。

分)的时间不尽一样,实际上等于发现了岁差。他们的计算后来传到希腊。雅典制定历法时,曾利用纳布·里曼努的研究成果。

第三节 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岸诸国

赫梯的兴衰 赫梯文明的中心在小亚东部的卡帕多细亚。赫梯国形成于前二千年代初，经历了二次强盛期。第一次在公元前

公元前 1300 年左右的赫梯十八至十六世纪间（古王国），第二次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纪间（新王国）。公元前十三与十二世纪之前，赫梯人受海上民族和西北部部落侵袭，首都哈图斯被焚，帝国瓦解。

公元前十六世纪初，穆尔希尔一世洗劫巴比伦。十六世纪后半期，铁列平实行改革，确定王位继承法。新王国时期是赫梯极盛时期，它的影响扩及整个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亚述地区。当时，赫梯同埃及争夺叙利亚。后来，由于双方无力再战，遂于公元前 1295 年缔结和约。两国国王后来相互祝贺。“贺信”已在哈图斯出土。为表示友好，赫梯王嫁女给法老。在尼罗河第二瀑布埃及古庙的墙壁上，描绘着这个新娘到达埃及时的情景。

小亚细亚是欧亚交通的桥梁。北部高原的铁矿，使赫梯人成为西亚最早的铁器使用者和传播者。同埃及缔约后，赫梯国王赠给法老一柄铁剑和一艘“纯铁”。但直到此时，铁尚未完全代替青铜。赫梯法典大约编纂于公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纪之间，大部分（二百节）保存下来。同《中亚述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相比，有明显进步。同态复仇法与断指、割耳之类的酷刑已经废止，甚至杀人罪亦可免处死刑（第一表一至三条）。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民打死奴隶，除赔偿外，还要负责安葬（第四条）。人人要服从法律，国王也不能例外。在活跃的西亚贸易中，必须学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为此，他们编制了也许是最早的字典。已出土的泥版字典分三栏。第一栏是苏美尔文，第二栏阿卡德文（巴比伦尼亚文），第三栏是赫梯楔形文即涅西特文。第一次大战期间，捷克学者赫罗兹尼释读涅西特文成功。他发现这种文字吸收了许多阿卡德文的单词符号。德国学者埃米尔·弗利尔（Emil Forrer）证明，在哈图斯发现的泥版文书中，除涅西特语外，还包括七种不同的语言。掌握了文字之后，赫梯人开始接触巴比伦尼亚文学作品。通过他们的抄本，整个小亚都熟悉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事。这个英雄由此传至希腊，变成赫拉克利斯和后来的海格力斯。

公元前 700 年左右的腓尼基及其殖民地

腓尼基和它的商业殖民活动 腓尼基夹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大致相当今日的黎巴嫩，公元前三至二千年代之交，产生一些城市国家。最著名的是推罗（今苏尔）和西顿（今赛达），此外还有比布洛斯（今朱拜勒）、乌伽里特（今拉斯·沙姆拉）以及阿拉杜斯（《圣经》中的阿瓦德）。西顿是首先向外移民的城市，推罗是它的第一个移民点，因而是“西顿的女儿”。它的著名染料“推罗紫”远近驰名。公元前一千年代初，腓尼基人开始进行大规模商业殖民活动。爱琴海、地中海、北非沿岸、西班牙、不列颠等广大地区有他们的移民点。此外，他们的商船和商队还活跃在红海、波斯湾、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阿拉伯、巴比伦尼亚、亚美尼亚、西徐亚和中亚等

哈吐什尔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同盟条约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 15—21 页。

译文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 137—166 页。

地区。他们从上述各地得到粮食，乳香、没药、肉桂、金银、乌木、象牙和贵重石材。用来同别人交换的是他们的染织品，金属器、玻璃制品、彩陶、牙雕、蚕丝以及诸如水果、葡萄酒之类的农产品。他们也从事转运和奴隶贸易。腓尼基人在北非沿岸的主要殖民地有勒普提斯、哈德鲁迈图、乌提卡和迦太基等。推罗王马特金（Matgen）死后，留下一子一女。父亲临终前要他们共同执政。但人民拥立弟弟皮格马伦为王，而将姐姐伊丽莎排斥。不久，她丈夫吉查巴亚尔又被弟弟派人刺死。她纠集一批贵族打算报仇，但阴谋败露，遂偕同党逃往北非，并建立一城（公元前 814 年），这就是后来堪与罗马抗衡的迦太基。

腓尼基字母文字 腓尼基字母至少有二种：一是乌伽里特字母，共二十九个，由于受巴比伦尼亚影响，是用楔形符号写在泥版上的；一是比布洛斯字母，共二十二个辅音符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腓尼基字母。1905 年，皮特里在西奈半岛发现了包括二十六个字母的塞姆铭文，年代属于公元前十八至十六世纪，是在西奈劳动的迦南人根据古埃及象形文创造的。西奈字母可能早就传入腓尼基，因为比布洛斯字母是属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比布洛斯字母最初见于阿希兰的石棺上，后来终于成为通用文字，而乌伽里特字母渐渐被淘汰了。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初，腓尼基字母传至希腊。希腊人加入元音字母，使它趋于完善。腓尼基字母是现代多数字母文字的源泉，概括起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埃及象形文字——西奈字母文字（塞姆人对象形文的继承与革新）——比布洛斯或腓尼基字母文字（对西奈文字的继承与革新）——希腊字母文字（对腓尼基字母的继承与革新）——拉丁字母文字（对腓尼基、希腊字母的继承与革新）。

腓尼基第一个字母 来自西奈字母（牛），塞姆语读作 aleph；第二个字母来自西奈字母（房屋），塞姆语读作 beth，所以，希腊第一个字母读作 alpha，第二个读作 beta。公牛“阿匹斯”是埃及的圣兽。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腓尼基人才将（牛头，象征公牛）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字母。后来，拉丁人又作了一次革新，将 竖立起来而写作 A，于是，它就成为几乎所有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了。

希伯来人 巴勒斯坦是个狭长的沿海地带，最初称迦南。公元前三千年代，迦南人已在此定居。二千年代中期，另一支塞姆人在亚伯兰带领下，经哈兰进入迦南。当地居民称之为希伯来人（Hebrews），意思是“渡河而来的人”，“来自另一边的异乡人”。也有人认为，他们原系阿拉伯沙漠游牧民族。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开始，向外迁移，一部分进入迦南，一部分到埃及，不幸当了奴隶。

进入迦南后，以色列部落定居在富裕的北部，犹太部落分布在南部。当时，他们的社会处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公元前 1200—1020 年）。在此期间，腓力斯丁人入据西南沿海地区，巴勒斯坦一名由此而来。

希伯来王国的兴衰 前二千年，希伯来人与腓力斯丁人交战。基利波一役，遭受挫败，首领扫罗在绝望中命人将自己杀死。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号称

亚伯兰，乌尔人，犹太人的始祖，九十九岁时被上帝更名为亚伯拉罕，见《旧约·创世记》，第 17 章，第 1—8 节。

《圣经》作非利士人，可能是被逐出克里特的爱琴人，可能来自爱琴海诸岛，也可能是被迫迁移的小亚南岸居民。

希伯来人的“黄金时代”。大卫王（公元前 1000—960 年）击杀歌利亚，驱逐腓力斯丁人，建希伯来王国。他又驱逐耶布斯人，占耶布斯。相传他把上帝的“约柜”运到此处，使这一设防的据点成为政治与宗教中心。大卫对外扩张，也留下不少诗篇，据说是希伯来第一个诗人。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公元前 960—930 年）。埃及法老嫁女给他，推罗王希兰姆帮助他修建耶和圣殿。完工后，所罗门把“约柜”移入，于是耶路撒冷成为希伯来人的圣地。为建造圣殿和王宫，所罗门强征人力，耗费巨资，致使人民不满，耶罗波安为首的以色列人起义，于公元前 928 年建以色列国。以色列以撒马利亚为中心，犹太国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南北分裂二个世纪后，亚述王萨尔贡二世于公元前 722 年灭以色列。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经三年围攻后，占耶路撒冷，烧圣殿，把数万居民迁往巴比伦，于是开始了犹太史上的“巴比伦俘虏”时代（公元前 586—538 年）。

公元前 900 年左右的以色列和犹太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圣殿

犹太教 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所崇拜的雅赫威神。雅赫威本是以色列部落的雨神和战神。随着他们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这个凶猛的战神也变为慈祥的保护者。但它的威力最初仅限于巴勒斯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犹太教逐渐由多神向一神教转化，雅赫威也开始被目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宇宙唯一主宰。与此同时，在悲观绝望的以色列人中，萌发了弥赛亚思想，希望“救世主”降临。当他们被掳至巴比伦以后，这种想法更为强烈了。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希伯来文古本包括二十四卷。现行《旧约》包括三十九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圣著三个部分。律法书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总称摩西五经。核心是散见于《出埃及记》、《申命记》、《利未记》中的三部法典。它们反映了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的犹太社会历史，有一定史料价值。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记述自征服迦南至俘虏时代的以色列历史。后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圣著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等等。

《旧约》同《新约》一样，是由不同的作者根据不同的观点、材料，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编成的。因此，所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和宗教发展阶段。虽然良莠兼蓄、真伪参半，但它不失为古代西亚文化遗产之一。

歌利亚，腓力斯丁勇士，身高六肘，着铜盔铁甲，出阵挑战，被大卫投石击毙，敌人溃逃。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第 1—10 节，48—58 节。

耶布斯（Jebus）即耶路撒冷，这是迦南人的称呼。

“约柜”，犹太古代圣物，系一木柜，内藏石版，上刻摩西十诫，即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约法。见《撒母耳记》下，第 6 章，第 1—19 节。

雅赫威（Yahven）即以后基督教信奉的“耶和華”（Yehovah）。新译英文《圣经》已不译作“耶和華”而译为“主”（Lord）了。

弥赛亚（Messiah）后来转义为“救世主”。

第四节 古波斯

波斯帝国的兴起 波斯人居住在伊朗高原西南部（今法尔斯省），公元前六世纪初，处在米底统治之下。六世纪中叶，居鲁士（公元前 558—529 年）领导起义，打败米底人，攻占其首府埃克巴塔纳（公元前 550 年），俘米底王阿斯提亚格，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强国，接着对外扩张，在短短十年间征服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吕底亚，并控制小亚细亚沿岸希腊城市。公元前 539 年（或 538 年），居鲁士入主巴比伦，允许犹太俘囚返回。于是他们得以重建耶路撒冷及其圣殿。新巴比伦的灭亡，意味着波斯帝国的建立。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远征中亚，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被杀。他的儿子冈比西二世（公元前 529—522 年）继位以后，继续向外扩张，于公元前 525 年征服埃及。这时，帝国在东方再没有强大对手了。

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波斯

大流士接见使者(浮雕)见图版(3)

大流士一世的专制统治 大流士一世继冈比西统治波斯，在位三十六年（公元前 522—486 年），波斯帝国盛极一时。他残酷镇压米底、埃及、巴比伦、埃兰、亚述等地的起义，据说出征十九次，俘了九个王。他向东入侵印度河流域；向西入侵色雷斯，控制赫勒斯滂（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而成为第一个向欧洲扩张的东方君主。至此，帝国疆域自西方的埃及扩及东方的印度，自南方的波斯湾、阿拉伯扩及北方的里海和黑海。大流士把波斯的广大地区划为行省，亲自控制埃及、巴比伦尼亚，其余二十个省区委派总督统治。属国只要按定额纳贡并提供兵源，即可独立处理内部事务。为监督省区，防止叛乱，每省派一军事长官、书记官和“王之耳目”监督官。这些官员由王任命，对王负责，随时报告总督及地方动态。大流士把军队编成万人团、千人团、百人队、十人队四种。士兵来自帝国各地，服装殊异，语言不同。还有一支御林军，包括万名“敢死军”，二千骑兵，二千步兵。军官多系享有特权的米底和波斯人。波斯本属内陆国家，但扩张政策使大流士重视海洋。他以腓尼基水手为基干，组成一支拥有六百至一千只战船的舰队。使波斯成为亚洲一流海上强国。他下令修筑两条大道。一为御道，自苏撒经两河流域中部到萨迪斯并远至爱琴海东岸的以弗所。一条自巴比伦越伊朗高原至印度边境。沿途有驿站、客栈，要津派兵驻守。驿卒及时

波斯王宫（复原图）

波斯波利斯遗址传递官方信函。苏撒距萨迪斯约二千五百公里，通常要走三月，但驿卒至多二周即可到达。这些道路不仅为战争服务，也利于通商和文化交流。东方的鸡可能就是这时经波斯传入西方的。为便于指挥、控制并同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波斯设四大京城，苏撒是中心，向北、西、南各约三百余公里是埃克巴塔纳、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为培养军事和管理人才，波斯创办了军事和普通学校，并在埃及办了一所医校。波斯采用埃及历法，分年为十二个月，月为三十日。波斯还统一币制，推行铸币。中央有权造金币，号大流克，重八点四一六公分，全帝国通行。省区、自治市只能发行银币和铜币。金银比率是十三比一。公元前五世纪初，大流士对巴尔干希腊发动战

争。这次战争持续半个世纪，以帝国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331年10月初阿尔培拉附近高加梅拉一战，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击败，次年被杀，阿黑门尼德朝统治的古波斯灭亡。

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是波斯的一项宝贵遗产，也是残留在亚洲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这一著名石刻包括浮雕和铭文两部分。浮雕在右上方，刻着大流士等波斯人和九个被俘首领的形象。铭文分三种：（一）古波斯文，在右下方，高约三点六米；（二）古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在左上方；（三）古埃兰文，在左下方。三种文字内容相同，都是记述大流士一世镇压起义得胜事迹。

贝希斯敦石刻高八点六米，宽约十五米余，高悬在距地面九十一米多的岩壁上。英国学者罗林逊冒险登上悬崖，花了十多年功夫（1835—1847年）拓下所有三种铭文。1847年，他公布了一个古波斯文字母表，共三十九个字母，又公布了铭文（一）的一个完整的译本。1852年，他公布了铭文（二）的全译本。后来经其他学者共同努力，死文字的研究工作继续取得进展，终于导致亚述学的诞生。于是，一片片古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泥版文书，变成活的文献材料，开始向人们述说两河流域乃至西亚的历史了。铭文（一）恰如一把钥匙，学者们利用它而认识了铭文（二）。这种情况同商博良通过希腊文而释读埃及象形文一样，所以有些学者恰当地把贝希斯敦石刻比作“亚洲的罗塞塔石刻”。

琐罗亚斯特教 琐罗亚斯特教相传为扎拉图斯特拉创立。他注意观察现世生活，把善、恶加以宗教形象化。他称善为马兹达神，说它周围有一群天使，其中最伟大者是光明之神米特拉。与善神对立的是一群魔鬼，首领是大妖精阿里曼。他认为火是善神的象征，并号召人们站在善神一边，帮助它抗击制造瘟疫、毒物和各种灾害的阿里曼。要战胜恶神，必须消除心中一切邪念，并以务农为本。“谁布下谷物，谁就播下了正义。”这是从游牧转向农业生活的反映，也是高于其他宗教之点。这个教还宣称，人死后都要受来世审判。幽灵必须通过一桥。它狭如刀刃，善人将顺利通过并与马兹达相会，恶人必坠入阿里曼居住的深渊。地、水、火、风是四大圣物，尤以火为神圣。人死以后，禁火化、土埋、投水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免污染四圣。尸体常置塔内，或弃之沙漠任鸟兽啮食净尽。

琐罗亚斯特和穆罕默德一样，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他死后，人们把他的言论辑录成书，这就是阿吠斯塔或《波斯古经》。它是从公元前一千年代上半期至公元三世纪陆续编成的。传世本用东伊朗古方言写成，包括神话、戒律、颂歌、祷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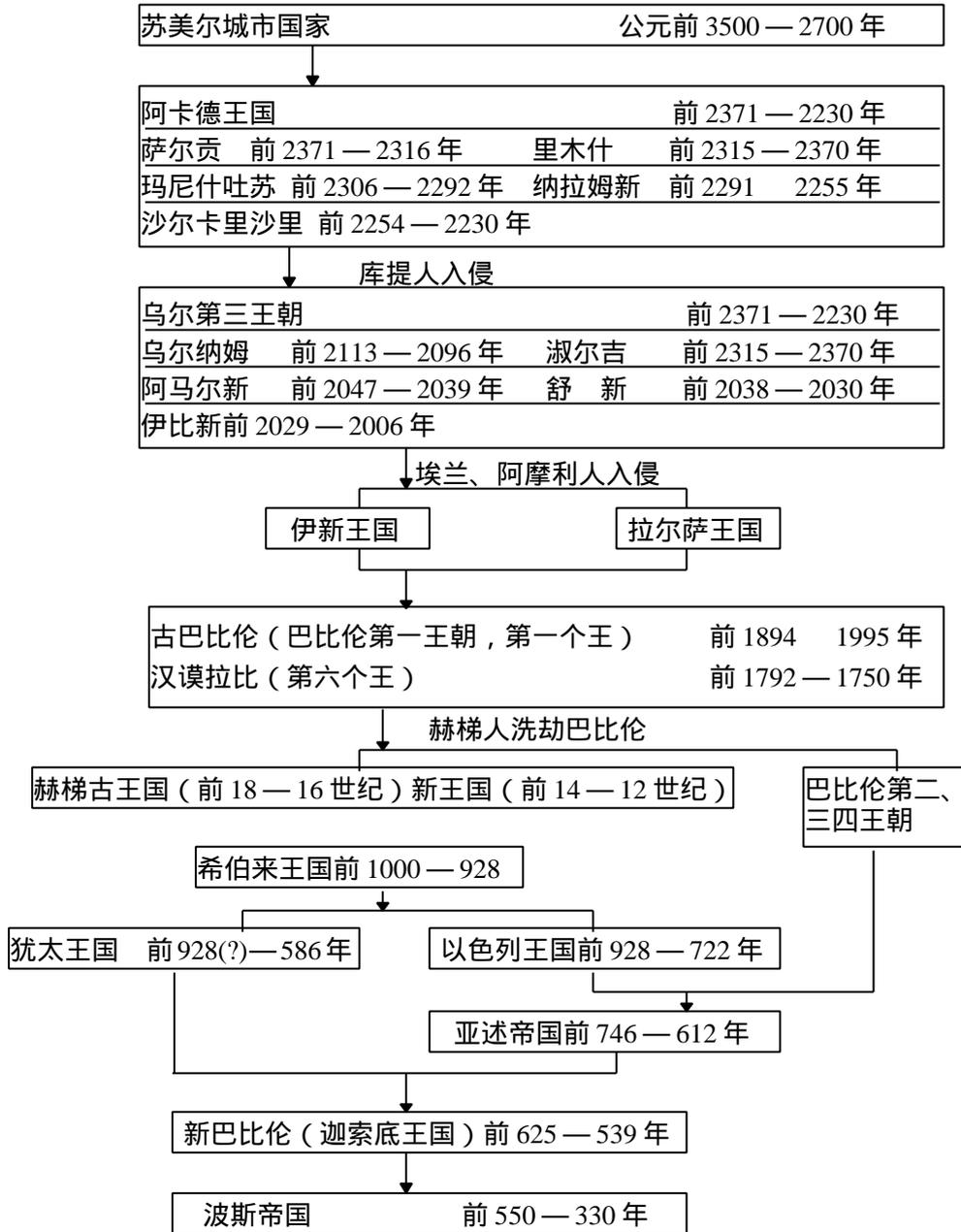
琐罗亚斯特教被大流士一世奉为国教，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在长安建寺，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或波斯教。伊斯兰教传入波斯后，祆教衰落，今日在伊朗、印度尚有少数信徒。

西亚古国兴亡表

该石刻在埃克巴塔纳以西，今伊朗克尔曼高地。

他生活于前十至七世纪间。Zaratushtra，古波斯语，意为老骆驼，希腊人读作琐罗亚斯特，我国旧译苏鲁支。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魔鬼撒旦由此而来。



第四章 古代印度

印度得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著名的大河——印度河。在古代，印度不是国名，而是表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地理名称。

印度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往往差异很大。它基本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隔着一带林莽密布的高山。南部是一个半岛，半岛中央是有山脉环绕的干旱高原，只有沿海地带比较适于农业。在历史上，南部是发展较晚的地区。北部西有印度河流域，东有恒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明成长的主要地区。不过这两大河的流域也有区别。印度河流域气候干燥，往往离河流灌溉区不很远就是沙漠。恒河流域则越向下游雨量越大，在远古是丛林茂盛之区。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兴起的古代文明，都是当地人民长期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成果。

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明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了许多远古城市和村落的遗址。摩亨佐·达罗（在信德）和哈拉帕（在旁遮普）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遗址。因此，人们又把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远古文明称为哈拉帕文化。

这些城市的营建看来是有规划的，而且规划大体相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石刻——人头像佐·达罗的遗址最清楚地显示出城市营建的计划性。在那里，城市分为卫城和市区两个部分。卫城地势较高，周围筑有城墙。卫城里面有一个大浴池，可能是为举行宗教活动用的，还有一个巨大的粮仓以及一些巨大的公共建筑物。卫城大概是城市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在危急时也是赖以固守的据点。市区的布局井井有条，街道基本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有宽阔的、能并行好几辆车的大街，也有比较狭窄的小巷。街道的下面有砖砌的下水道，街道的两边是砖砌的房屋。在街道转角处，建筑物的墙角砌成圆形的，以便于来往交通。居民的房屋有明显的贫富之别。富人的房屋占地几百平方米，有两三层楼房和一个庭院，有卧室、厨房、浴室等用途的房间，浴室和厕所还有陶制污水管道通往街心的下水道。贫民居住的则是十分简陋的平房或茅舍，更谈不上有任何供享受的设备了。

摩亨佐·达罗的粮仓遗址见图版(4)

考古学家在城市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遗物。当时已经有了青铜制造的工具和武器，例如刀、斧、镰、锯、矛、剑等。发现了许多砝码和尺，它们的标准相当精确而一致。这说明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还发现了很多用石材、象牙、粘土等材料刻制的印章。章上刻有图画和文字，也有只刻文字的。在两河流域也还发现过印度的这种印记，是打在货物包装的封口上的，可见两地间已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现在发现的当时文字符号已有五百个以上，可惜还没有释读成功。

现在学者们大体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350 年至 1750 年。这是根据在两河流域发现的印度印章比照两河流域的年代并根据碳测年代估定的。

由于文字没有释读成功，现在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具体历史还不了解。根据考古材料，当时已经是青铜器时代，已经有了工商业和城市，城市中已有大型公共建筑物而且有严格的城市营建规划，居民房屋也有明显的贫富差别，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城市是早期的奴隶制城市国家。有人推测这些城市的建立者是达罗毗荼人，这并不是确有根据的定论。这些城市后来是怎样衰

落的，现在也还没有确实的结论。

早期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 在世代相传下来的印度文献中，最古老的是《吠陀》。“吠陀”的意思是“知识”、“学问”，它是包含着种种知识的宗教典籍。《吠陀》共有四部，其中形成最早的一部是《梨俱吠陀》。它是一部赞颂神祇的诗歌集，同时也反映出公元前十五至十世纪间印度河上游人民生活的许多情况。《梨俱吠陀》所反映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为“早期吠陀时代”。

创作《吠陀》的人们操印欧语，自称“雅利安人”，意思是“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敌人称为“达萨”，说“达萨”是没有鼻梁、皮肤发黑、语言不清、不祭神灵的人。《吠陀》中还称雅利安人为“雅利安瓦尔那”，达萨为“达萨瓦尔那”。“瓦尔那”的意思是“颜色”。这两种瓦尔那的区分，大概是两个在头型、肤色、语言、宗教等方面都不相同的种族对立的反映。《吠陀》中有许多诗歌说到雅利安人对达萨的战争，赞颂神祇帮助雅利安人攻毁城堡、杀死达萨的胜利。

很多学者认为，达萨是较早的当地居民，雅利安人是由西北方逐渐侵入印度河流域的。虽然这还是一种假说，而且也有人有不同意见，但是，雅利安人入侵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因而现在还是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学说。

雅利安人原是游牧部落，到印度河流域以后，逐渐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用牛拉犁耕地，有木工制造犁和车辆，有铜匠制造各种工具。雅利安人包括很多部落，部落之下的组织是氏族。每个氏族居住在一个或几个村落里，每个村落包括几个父系家长制大家族。牲畜等动产归大家族所有，田地也分给大家族耕种，大家族成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氏族部落公社正在分化，逐渐出现一个祭司集团和一个武士集团，他们成了地位高于一般公社成员的氏族贵族。同时，雅利安人不断征服达萨，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富，甚至把一部分被俘的达萨当作奴隶。后来“达萨”逐渐变成为表示奴隶的名称。雅利安人部落之间也常发生战争，被征服的雅利安人失去本部落的自主性，也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样，到早期吠陀时代之末，开始出现瓦尔那制度的萌芽。祭司集团称为婆罗门瓦尔那，武士集团称为王族瓦尔那，后来称为刹帝利瓦尔那，一般公社成员称为吠舍瓦尔那，被征服的达萨和雅利安人称为首陀罗瓦尔那。这时四个瓦尔那就是四个社会等级，与先前的雅利安和达萨两个瓦尔那的区分已经性质不同了。

雅利安人国家的发生和瓦尔那制度的形成 三部较晚的《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闳婆吠陀》和有关解释吠陀的作品，是公元前九至七世纪印度历史的基本材料来源。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只称为“晚期吠陀时代”。这是雅利安人的国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发生的时期，也是瓦尔那制度形成的时期。

后期吠陀时代的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开始进入了铁器时代。人们不仅从这时的《阿闳婆吠陀》中看到“黑色金属”——铁的名称，而且在恒河上游还发现了公元前九至八世纪时冶铁的矿石和矿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进一步的阶级分化。这时期里曾经发生很多战争。雅利安人在早期吠陀时代就逐渐向恒河上游扩展，这时期又征服和控制了恒河流域。长期的战争也加速了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战争俘虏，成了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奴隶制度已很盛行。买卖奴隶和赠送奴隶已是常有的事。甚至人们赌博输了，交不出钱，本人或家属也被抵为奴隶。

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开始出现了许多小的雅利安人国家。氏族贵族出身的奴隶主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最初的国王大概就是从贵族中选举产生的，这是部落选举首领的传统的残余。不过，国王的职位正在变为世袭的，而且他们的权力也在增长。当时还有名为“萨巴”和“萨米提”的两种会议，起着限制国王权力的作用。这是部落里的长老议事会和民众会的残余。不过，这些会议已经与过去部落里的会议不同，它们越来越落入贵族控制之下，而且在性质上已经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了。

前一时期之末开始萌芽的瓦尔那制度，这时也随着国家的发生而形成了。从前作为氏族贵族的两个集团现在成为统治阶级里的两个集团：婆罗门是神权贵族奴隶主，刹帝利是军事行政贵族奴隶主。他们力图用瓦尔那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瓦尔那制度的法规，婆罗门集团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法规，婆罗门瓦尔那是第一等级。他们有权学习和传授吠陀，祭神和替别人祭神，施舍和接受施舍。他们充当祭司，通过为人讲经和祭神取得大量的报酬；有些婆罗门还当了国王的顾问，直接参与政事，国王有时还给与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量赠礼。刹帝利瓦尔那是第二等级。他们无权传授吠陀、为人祭神、接受施舍，但是他们是国王为首的大小军政贵族，可以征收赋税，并在战争中掳获战利品。婆罗门和刹帝利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吠舍瓦尔那是第三等级。他们既无权传授吠陀、为人祭神、接受施舍，也无权获得税收和战利品。他们靠从事农业、畜牧业、商业为生，有向国王纳税的义务。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权的公民。首陀罗瓦尔那是第四等级。他们基本无权参加宗教活动，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当中除一部分是奴隶以外，其余大都是靠替别人干些活谋生的地位接近奴隶的下层平民。从宗教方面说，前三个瓦尔那有权参加宗教活动，能举行盛典——“再生”典礼，是所谓“再生族”；首陀罗基本无权参加宗教活动，是所谓“一生族”。但是，从政治上说，前两个瓦尔那是统治阶级，后两个瓦尔那是被统治阶级。

各个瓦尔那的成员的等级，按血统相传，世代不变。瓦尔那之间的界限很森严。按照法规，低等瓦尔那的成员要想同高等瓦尔那的人平起平坐都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更不许对高等瓦尔那有任何反抗了。

婆罗门教 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崇拜自然。他们感到自然界的种种伟大力量，但又不能理解它们，所以相信那都是神的作用。他们崇拜天神、日神、雷神、火神等等，祈求神的保佑。他们还天真地相信，只要对神祭祀，博得神的欢心，神是会帮助他们的。当时没有什么复杂的教义，专门的祭司集团也是在早期吠陀时代之末才开始发生的。

到后期吠陀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婆罗门贵族集团力图用宗教巩固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并提高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奉《吠陀》为经典，并且作了新的解释。他们大概也从被征服者中汲取对自己有利的宗教观念，把它揉合进自己的教义。这样就形成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承认以前的神祇，并且给旧神增加了新的性质。例如，过去的雷神，由于有威猛的象征，这时又成了国王和贵族们的保护神。这样就适应了国王和贵族们的需要。同时，婆罗门教又要人们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创世主——梵天。据婆罗门教教义，梵天是宇宙的灵魂，是唯一永恒的真实，世界万物都只不过是梵天的化身，是变幻无常的；每一个人的真实的“自我”——灵魂也来自梵天，只是由于贪恋尘世，所以不断投生转世，受“轮回”

之苦。婆罗门教宣扬的最高目的，是所谓摆脱轮回，重新和梵天合为一体。

婆罗门教用骗人的轮回说来为巩固瓦尔那制度服务。婆罗门教宣扬说，生在高等瓦尔那的人是前世行善的，生在低等瓦尔那的人是前生作恶的；要想来世不再受苦，以至最后超脱轮回，那首先就要严格遵守瓦尔那制度的法规，如不遵守，来世甚至会变为牲畜等等。至于瓦尔那制度本身，婆罗门教继续宣扬早期吠陀时代之末开始出现的一个神话。神话说，最初有一个充塞于宇宙的“原人”，后来他的身体分割而成世界万物，婆罗门是从“原人”的口产生的，刹帝利是从手产生的，吠舍是从腿产生的，首陀罗是从脚产生的。婆罗门教力图说明，四个瓦尔那的区分是神圣的、永远不变的。婆罗门教还制订出关于各个瓦尔那的详细法规，竭力维护这种制度。

摩揭陀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六世纪初，印度北部有十六“大国”。它们中的多数建立在恒河流域，如伽尸、鸯伽、居萨罗、跋祇、末罗，摩揭陀等，少数建立在印度河流域，如犍陀罗等。它们的政体有两种类型：多数是王国，跋祇和末罗是两个共和国。十六国以外还有一些部落特点很浓厚的小共和国。比较边远的地方仍然居住着很多部落。大国之间不断发生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战争。

最初，伽尸曾经强盛一时。它同居萨罗进行了长期的争霸战争，而且有时也对鸯伽和摩揭陀进行战争。后来居萨罗征服了伽尸，成为一个强国。同时摩揭陀也正在兴起。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它征服了鸯伽。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期，它与居萨罗发生争夺土地的战争，结果议和停战；但它又征服了跋祇。约公元前 364—324 年间，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征服了它的劲敌居萨罗，逐渐统一了恒河流域。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摩揭陀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逐渐统一恒河流域，同时摩揭陀国王也逐渐加强了专制统治。这一时期里，摩揭陀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施行严刑峻法的残暴君主。这是专制王权正在兴起的表现。摩揭陀的兴起和王权的增长，为以后帝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佛教 佛教发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这不仅是大国进行争霸战争的时代，而且是社会发生巨大的分化和动荡的时代。首先，四个瓦尔那的情况都有变化。这时有些婆罗门占有大量土地，剥削奴隶和农民的血汗，十分富有。可是也有许多婆罗门的经济状况下降，不得不靠劳动为生，甚至有些人干起斗鸡斗狗之类的赚钱营生。所以实际是有许多婆罗门处于为人轻视的地位了。刹帝利们本来就不甘心居于第二等级的地位，这时他们在频繁的战中获得大量财富，而且政治地位也随王权的加强而提高，因而更不愿屈居于婆罗门瓦尔那之下。吠舍瓦尔那中许多人贫困下去，地位渐近于首陀罗。可是也有一些吠舍，他们靠经商和放高利贷发了财，成了占有很多财富和奴隶的奴隶主，有些人甚至还当上了官吏。首陀罗大都处于困苦状态，但其中也有少数人变成了富人。因此，处境恶劣的吠舍和首陀罗固然反对瓦尔那制度，就是富有起来的吠舍和首陀罗也对自己的瓦尔那地位深感不满了。这样，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起来反对或非难瓦尔那制度，维护瓦尔那制度的婆罗门教当然也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佛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释迦牟尼头像

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 566—486 年），生于释迦部落。相传，他是迦毗罗卫城（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于刹帝利瓦尔那。

他于二十九岁出家，七年后自称得道，又传教四十多年，年八十时去世。他被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隐修者”，又称为“佛陀”（“佛”是汉语中的简称），意思“彻底觉悟的人”。他所传的宗教称为佛教。

印度佛塔

（此塔在佛教发祥地婆罗奈附近的鹿苑，相传释迦牟尼最初在这里向五弟子宣场佛法。）

释迦牟尼宣传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意思是“四条真理”。第一，他说人生一切皆苦，生、老、病、死等等全都是苦。第二，他说苦的根源在于有欲望，想长生达不到，想不死总要死，这就产生苦，而且有欲望就会有言行，结果造了“业”（“业”指言行的后果），不断轮回转世，不断经受生、老、病、死等一切苦。第三，他说要消灭苦，就要消灭造成苦的欲望，消灭欲望就能达到一种“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佛教称这种境界为“涅槃”。第四，他说要达到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就要修道，这主要包括学习教义、遵守戒律、打坐静修等。这些说教，让人们放弃对现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们不想对现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斗争，而想虚无的“不生不灭”。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佛教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也不承认婆罗门的宗教特权。佛教认为，不论出身于哪一个瓦尔那，一个人只要自己按照佛的教训修行，就能达到所谓的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佛教这种不承认瓦尔那区别的态度，吸引了很多下层群众。可是，佛教给与人们的实际只是信佛的平等。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佛教是不让人反抗的。因此，佛教特别得到刹帝利和吠舍上层的支持，居萨罗和摩揭陀的一些国王都是佛教的赞助者。在这样情况下，佛教迅速地在印度传开了。

孔雀帝国的兴衰 约公元前 324 年，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人推翻了摩揭陀的难陀王朝，自己登上王位。据说他出身于一个养孔雀的家族，因此他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称为孔雀王朝（约公元前 324—187 年）。在难陀王朝领域的基础上，旃陀罗笈多又把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并入自己的帝国。他的儿子继位时又征服了南印度的一些地方。他的孙子阿育王（约公元前 273—236 年）又进行了许多战争。除半岛南端以外，他基本上统一了印度。这是孔雀帝国极盛时期。

阿育王是一个专制君主。据说，他曾专门寻找恶人帮他建立“人间地狱”，用以残害人民。他征服南方羯陵伽国的时候，羯陵伽有十万人死于战场，十五万人被俘，还有几倍于此的人死亡。据阿育王自己说，他从这次战争后忏悔了，不再发动战争，而热心宣扬佛教。他派人四出传布佛教。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强大一时的孔雀帝国并不巩固。印度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中心地带以外，还有很多部落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同时，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很少，没有形成巩固的联系。阿育王死后不久，各地纷纷独立。虽然孔雀王朝在摩揭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可是孔雀帝国已经解体。印度又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公元一世纪初，大月氏人在中亚建立起一个贵霜国家，它逐渐把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入自己的帝国版图。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王时期（约公元 78—108 年）最为强盛。迦腻色迦崇信佛教。佛教就是通过贵霜开始传入中

国的。迦膩色迦死后不久，贵霜帝国分裂。在印度河流域，贵霜人的小国一直延续到公元五世纪。公元四世纪初期，笈多王朝在摩揭陀兴起，并逐渐征服恒河流域。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中国东晋僧人法显游历印度，正当笈多王朝盛世。五世纪中叶以后，笈多王朝迅速衰落，仅有摩揭陀一带地方，苟延残喘至六世纪。

古代印度文化 印度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代印度人民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古代印度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两部世界著名的史诗。它们都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口头相传的过程，最后在笈多王朝时期写成定本。《罗摩衍那》的主题内容是：一个被剥夺了继位权的王子罗摩和妻子息妲在森林中隐居，魔王把息妲偷到他居住的岛上，后来罗摩在猴王及众猴协助下杀死魔王，夺回息妲，罗摩还回国当了国王。《摩诃婆罗多》的主题内容是：一个国王有两个儿子，长子有儿子一百人，名为俱卢族，次子有儿子五人，名为般度族。俱卢族千方百计夺取般度族那份土地，最后引起一场大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战争以般度族兄弟五人胜利告终。在长期口头相传的过程中，这部史诗里插进了大量主题以外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部巨大的诗歌汇集。在笈多王朝时期，戏剧、故事、寓言等形式的文学创作都很繁荣。迦梨陀娑大约是公元五世纪的一个文学家，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杰出的戏剧家。在他流传下来的戏剧中，最为完美的是《沙恭达罗》。这个剧本描写一个国王同林间隐修老人的女儿沙恭达罗相恋的故事。优美的诗句和散文互相衬托，是这个剧本角色台词的特色。它的曲折情节又展示了当时印度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沙恭达罗》这部杰出的剧本，至今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古代印度的建筑和雕刻艺术也很发达。印度人很重视建塔，塔本是埋骨之所。据说，释迦牟尼逝世火化后，他的骨灰就被一些国家分去建塔供养起来。石窟也是佛教的重要建筑，例如阿旃陀地方的佛教石窟前后曾连续兴建了几个世纪。公元一至三世纪，犍陀罗地区的佛像雕塑艺术很发达，人物造型和衣饰线条都自然而逼真。我国的佛教建筑和雕刻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独特艺术特色。

古代印度宗教很发达，唯心主义哲学很盛行。但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也一直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并且提出了许多对人很有启发的见解。由于剥削阶级和各种宗教势力的反对，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没有一部能够系统地保留下来。现在只能通过其他著作看到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见解。古代印度的一个重要唯物主义学派是察婆伽派。这一学派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地”、“火”、“水”、“风”四大元素构成的，人也是如此：人的肉体来自“地”，体温来自“火”，血液及各种体液来自“水”，呼吸来自“风”。他们用这一类的朴素的说法证明世界的一切是现实的，物质的，不是什么梵天幻化出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他们认为，人的意识是由四大元素结合而产生的，人死四大元素离散也就失去意识，根本没有什么能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魂。他们说，剑能从鞘中找出来，如果有独立的灵魂，那就应该能从肉体里拔出来。他们强调指出，四大元素本身并无意识，合成人体就能产生意识，这就象造酒的原料并不能使人醉，一经酿制就能醉人一样。他们这样朴素地证明意识是物质的肉体的作用或功能，有力地打击了灵魂转世的谬论。他们告诉世人，没有什么来世，要努力使现实的生活过得快乐一些。他们看到婆

罗门教既要人修行，又要人杀牲献祭，还说牺牲本身已能升天，就嘲笑说，如果牺牲真能升天，那末婆罗门为什么不用他的父亲作牺牲呢？古代印度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当时人民反对宗教的思想武器，对后世人民也具有启发的意义。

第五章 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包括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半岛是古代希腊的主要领域，它分作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即伯罗奔尼撒三个部分。在希腊半岛上，山岭交错，把半岛分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地区，平原面积不大。葡萄和橄榄是重要物产。沿海一带有许多良好的港湾，便于发展海上交通。古代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祥地。希腊文明步古代东方文明之后，它们各放异彩，先后互相辉映。

第一节 古代爱琴文明

《荷马史诗》 古代希腊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古老的传说、神话和诗歌。早期最完整的作品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叫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为盲诗人荷马所作，称为《荷马史诗》。这是现在所保存的欧洲最早的文学巨著。

《伊利亚特》描写希腊人同小亚细亚西北沿海的特洛伊人战争第十年的故事。希腊军中最勇猛的英雄阿溪里同统帅阿加米农（迈锡尼王）争夺一个女战俘，受到阿加米农的责骂，一怒之下，拒绝出战，削弱了希腊人的力量。特洛伊人乘机将希腊人逼到海边。在危急的时刻，阿溪里的战友帕特洛克罗斯穿戴了阿溪里的甲冑挥师前进。特洛伊人以为是阿溪里，立刻后退。但是，当帕特洛克罗斯接近特洛伊城门时，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冲杀出来，将他杀死，夺去阿溪里的甲冑。阿溪里决心为战友复仇，立即披挂上阵，所向披靡。他独战赫克托，最后杀死了他。史诗在赫克托庄严的葬礼中结束。

荷马

《奥德赛》叙述特洛伊战争胜利结束后，希腊将领们都纷纷回国，破城首功英雄奥德修斯也离开特洛伊。但是他在海上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妖魔鬼怪，一路飘流，大约过了十年光景，才返回家园同妻子团聚。

希腊神话和传说里还有一个米诺斯王，住在克里特岛上的诺索斯城，曾统治爱琴海诸岛，威震雅典。

希腊的传说、神话和诗歌包含有许多史料。它们提到的地名，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如斯巴达、雅典；有的已经消失，如诺索斯、迈锡尼、太林斯、特洛伊。过去长时期里，希腊神话传说，特别是《荷马史诗》，曾是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远古希腊的仅有的资料来源。《荷马史诗》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笔调优美，语言铿锵有力，英雄业绩经过诗人渲染，尤其引人入胜。学者们深深地为这些神话传说所吸引，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很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其人其事。他们开始进行艰巨的发掘工作。古代爱琴文明就是由此引发而探索出来的。

考古巨大发现 从小就被《荷马史诗》所吸引的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1822—1890年），从1870年到1873年底在小亚细亚西北达达尼尔海峡入口附近，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希沙立克土丘从事考古发掘，挖出七层古代居住遗址，从某些遗址层里挖出堡垒和城市的遗迹，发现了大量金制饰物和碎陶器。他的考察报告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其他学者也来参与发掘，先后共挖掘遗址九层。施里曼曾认为从下面算起的第二层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后来的考察者断定为第七层。这个地点此后就被认为是古代特洛伊城的原址。

迈锡尼王宫狮子门见图版(5)

1876年，施里曼去探索古代迈锡尼的城堡，发掘古墓五处，古尸十多具，大批金银器皿、各种饰物和金面具等殉葬品，还有大量彩瓶残片。这一

荷马是否确有其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表示过怀疑。一般的推断是，在公元前十二到八世纪间，在希腊，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有很多行吟诗人。他们演唱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诗歌。经过他们的长期创造，形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雏形。后来经过一两个诗人的整编，成为两部史诗。

施里曼离开后又出土一处。

发现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886年，施里曼在迈锡尼以南的太林斯发掘古代宫殿，出土的建筑物比过去出土的更加宏大。他接着打算到克里特岛去发掘米诺斯的王宫，但是未能实现。这项工作是由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完成的。

伊文思（1851—1941年）来到了诺索斯城的遗址，从1900年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从事了三十年考古发掘和古物修复工作。埋藏久远的王宫出土了。它的面积庞大，结构曲折复杂，这就是神话中所说的“迷宫”。宫室往往有三、四层之高，倚坡而建；另有浴室，仓库，庭园，供水排水、通光设备，等等。一道道的走廊楼梯将各部分连接起来。墙上绘有壁画，室内支着木柱。这里还找到了无数金石饰物、印章、宝石和数以千计的文字泥版。这些发现又一次揭开了希腊古代文明之谜。学者们继续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进行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希腊历史的知识。

修复后的诺索斯王宫正殿(见图版6)

爱琴文明 尽管施里曼认为他在迈锡尼找到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的遗体，专家们却推断克里特和迈锡尼出土的文物所代表的时期早于荷马时代。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又称爱琴文明。它开希腊文明的先河。

根据考古发掘研究表明，爱琴文明首先产生于克里特岛。公元前4500年到3000年间，这里已有居民，他们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公元前2000年开始，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一个个奴隶制城邦，筑起王宫，创造出初期的象形文字。公元前1700年前后王宫被毁，原因不明。但是克里特人又修建起更宏伟的宫殿，其中包括诺索斯的“迷宫”。以后三百年间，克里特的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它成为地中海和爱琴海一带欧亚、欧非贸易的中间站。这是克里特文明的全盛时代，传说中的米诺斯王就在这一时期称雄爱琴海上，甚至迫使雅典纳贡。克里特文化对希腊半岛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克里特先后有过两种线形文字，后出现的那种与希腊本土皮洛斯和迈锡尼出土的泥版文字一致，已经释读成功。文字上的沟通说明公元前1450年左右迈锡尼等地的希腊人统治了诺索斯。又过了五十年，岛上宫殿再次被毁，是由于希腊人入侵还是由于反希腊的人民起义，或是其他原因，还不清楚。但是克里特文明从此由衰落而逐渐湮没。

公元前十五世纪，在南希腊的迈锡尼、太林斯、皮洛斯等地出现了奴隶制城邦，产生了青铜文化。创立迈锡尼文明的主要是阿凯亚人。他们是希腊人部落的一支。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人部落的迁徙浪潮开始从北方涌到爱琴海地区。希腊人部落主要分三支，即伊奥尼亚人、阿凯亚人和埃奥利亚人。他们迁移到了希腊半岛，伊奥尼亚人住在阿提卡。埃奥利亚人住在除阿提卡以外的中希腊和北希腊东部。阿凯亚人分布在大部分伯罗奔尼撒，这里土地肥沃而又比较接近克里特，他们的社会发展比其他希腊部落迅速得多。

从出土的泥版文书来看，迈锡尼等城邦的统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奴隶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迈锡尼、太林斯出土的陶器花纹和克里特、希腊东部，甚至埃及陶器上的花纹相似，在埃及和迈锡尼都曾发现对方的文物，说明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迈锡尼等地的希腊人曾经统治过诺索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迈锡尼等希腊城邦参加了特洛伊战争。就在这个世

纪，希腊人的另一支多利亚人从希腊半岛北部逐渐南下，迈锡尼等城邦灭亡。

第二节 希腊奴隶制城邦

荷马时代 多利亚人当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一路摧毁城乡，征服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等岛屿和小亚细亚的西南角。经过一次动乱，迈锡尼文明毁灭了，精巧的技艺和文字失传了。原有居民或是迁到小亚细亚沿海地带，或是移居边地山区，住在半岛南部的人大量遭受奴役。希腊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各地的社会经济关系比迈锡尼的社会经济关系要原始得多。各地分布着氏族公社。《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正是公元前十一到九世纪的希腊社会状况，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遗产。因此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荷马时代”。

当时，青铜器已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铁已经广泛使用，不仅用于制造武器，还用来制造生产工具。人们在沿海的平原和盆地上种植大麦等农作物，在山地种植橄榄和葡萄，或者饲养山羊、绵羊、猪和牛等牲畜。手工业开始同农业分离，铁匠、瓦匠、皮革匠、木匠、陶工等许多专业手工业者都已经产生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氏族组织日趋瓦解，逐渐为农村公社所代替，出现阶级分化。贵族占有大群牲畜，占有大量土地；村社农民只能耕种一小块份地。有的农民失去份地，只好去当雇工，或者沦为乞丐。奴隶也出现了。奴隶主要来自战俘和被拐卖的人。史诗描写奥德修斯家里有五十名女奴隶，还有许多男奴隶。男奴隶主要从事放牧；女奴隶主要从事纺织。直接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奴隶还不多。

城邦的产生和海外殖民 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希腊社会进入了奴隶制形成的阶段。那时候希腊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上应用了铁锄、装有铁铧的犁和其他铁制农具，耕作更加精细，大片荒地得到开垦。手工业已经同农业分离，一些手工业作坊开始使用奴隶劳动。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货币和商人阶层。希腊的海外贸易特别发达，橄榄油和葡萄酒大宗运销外地。希腊商船经常远航到地中海沿岸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有的商船有三层桨，桨手近二百人。生产力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化。贵族侵占公社的土地和小农的份地，他们不仅把战俘当作自己的奴隶，而且强迫许多向他们借债而到期无法偿还的村社农民变成债务奴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阶级。

公元前八到六世纪，在希腊产生了许多奴隶制城邦。这些城邦的领域一般都不大，通常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的若干村落。

这一时期，希腊大规模地向外殖民。一些失去土地、生活贫困的农民，在城市中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想寻求更多财富的商人，纷纷转向海外拓殖。希腊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向北，向西。向北从爱琴海北岸到马尔马拉海周围，又到黑海沿岸，向西从西西里岛到意大利半岛南部，又到今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沿海，都有希腊的殖民地；还有的殖民地建立在今天北非利比亚的东北海岸。希腊人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一个城邦，重要的城邦有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高卢南部的马西利亚、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等。马西利亚有优良的港口，成为希腊与高卢和英格兰、爱尔兰之间的贸易要冲。希腊的殖民活动促进了商业发展，加强了文化交流，但是也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灾难。

斯巴达 希腊半岛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

即今天的马赛。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它的名字出现在《荷马史诗》里。但是早先那个城邦已在多利亚人南下之后消失。此处所说的斯巴达是多利亚人来到后在这里兴起的又一个城邦。

公元前 800 年前后，一支多利亚人在斯巴达定居下来，这里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居住在这里的多利亚人称为斯巴达人。大约公元前 800—730 年间，斯巴达征服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这期间，以斯巴达城为中心形成了斯巴达国家。接着斯巴达又征服半岛西南的美塞尼亚地区，从而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势力日渐强大。

斯巴达的居民分为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奴隶主阶级，是享有一切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他们只有九千户左右，但是居于统治地位。国家分给每户斯巴达人一份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希洛人，土地和奴隶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能买卖转让，但是可以传给后代。斯巴达人靠剥削奴隶劳动生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作战。皮里阿西人的含义是周围地区的居民，他们住在边区，约三万户。他们没有公民权，但是享有人身自由，可以自己管理内部事务。他们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有的经商。他们必须向国家纳税，并服兵役。希洛人是被征服的居民，是斯巴达的国家奴隶。他们被分配给斯巴达人种地，每年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收成交给主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战时随着出征，担负苦役。斯巴达人对希洛人严加防范，任意伤害。他们为了巩固统治，为了加强对希洛人的奴役，每年监察官上任，就屠杀一次希洛人，借以铲除可疑分子和在体力、能力方面秉赋较高的希洛人，防止他们造反。

斯巴达城名之为城，实际上并没有城墙。斯巴达人的重要任务是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即筑起一堵“人墙”，以防止被统治者的反抗。斯巴达的一个当权者曾经说过：“一座有人墙代替砖墙的城市就是设防很好的城市。”他们在筑造“人墙”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孩子一生下来，就由长老检查，体弱有病的被抛弃，只有健康的才加以抚养。男孩从七岁起进入由国家开办的军事学校，集中住宿，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学习体操，学习使用武器，参加行军，自己做饭，有时也做苦工，从而养成强壮的体质和勇猛耐劳的精神。他们常常举行军事演习，在夜间突然袭击希洛人。二十岁开始服兵役，三十岁可以回家居住，一直到六十岁才退伍。这套军事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斯巴达随时都有一支军队可以有效地投入战斗。

斯巴达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设置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平时权力不大；战时一个国王带兵出征，一个国王留在国内。一些重大政务都由长老会议处理。长老会议由两个国王和二十八个长老组成，长老从六十岁以上的斯巴达贵族中选出，终身任职。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都能参加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决议进行表决，但只能以呼声的高低来表示议案是否通过。斯巴达设有监察官五人，一年一选，他们的一大任务是镇压希洛人。

公元前六世纪，斯巴达以武力威胁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许多城邦同它缔结同盟，成为同盟的领导者。这个同盟叫做伯罗奔尼撒同盟，它的任务是支持各国的贵族寡头政治，镇压奴隶起义。

雅典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上。荷马时代，阿提卡的居民分为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三十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时没有能占据阿提卡，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纷纷逃到这里，原来的各氏族成员也出现迁徙混居的情况。外来居民和脱离原来的氏族迁居的人，都处在氏族组

织之外。贫富分化在逐渐发展着。居民逐渐分成氏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后两个等级没有政治权利，属于平民；还出现了奴隶。阿提卡各部落以雅典为中心逐渐走向联合。公元前八世纪末，雅典国家形成。

雅典政权掌握在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手里。执政官从贵族中选出，一年一任，公元前七世纪中期，人数共有九人，分别掌管内政、宗教、军事、司法等职务，卸任之后，就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掌握最高的审判权，监督官吏，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成员是终身职。雅典也有公民大会，凡能自备武装出征的人就能参加，权力不大，只能从贵族中选举官吏。

雅典贵族霸占了半岛上最好的土地，他们征收重租，放高利贷，剥削贫苦的劳动人民。农民生活十分困苦。贫苦农民租种贵族土地，必须用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租，自己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如果交不起租，他们本人以及妻子儿女都要沦为奴隶。有的贫民因为还不起债，甚至被债主卖到外邦去当奴隶。平民对贵族的不满日益加深，他们要求取消债务奴隶制度。

公元前七到六世纪，雅典的工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依靠经营海外贸易、掠卖奴隶而发财致富。其中有许多人出身平民，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与下层平民不同，但是在政治上由于受到贵族的压迫和排挤，他们和平民的利害关系有一致的地方。随着经济力量的加强，他们要求掌握政权，为此，需要取得平民的支持，因此同意平民取消债务奴隶制的要求。公元前六世纪初，平民已经组织起来，正在酝酿暴动。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梭伦进行了改革。

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经营过工商业，在政治上倾向于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贵族专权。公元前 594 年，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度；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的人，由国家赎回；永远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为债务抵押。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橄榄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这一切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在政治上，梭伦按财产的多少把自由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每年从田产上收入五百斗谷物或油、酒的公民，第二等级是收入三百斗的公民；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人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可以担任国家最高官职。第三等级是收入二百斗的公民，他们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是收入在二百斗以下的人，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出席法庭当陪审员。当时的官吏都没有薪俸，穷人根本无法任职。劳动者也往往难于扔下工作去参加司法陪审。不过梭伦以财富而不是以出身来划分等级，这是对贵族的又一打击。梭伦还提高了公民大会的作用，除选举官吏外，公民大会还有权决定宣战和媾和等大事；另设置四百人会议，四个部落各从前三个等级中选一百人参加，会议负责审理要提交公民大会的提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贵族会议的权力。

梭伦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工商业奴隶主分享政权，从而扩大了奴隶主的统治基础。这次改革是平民对贵族斗争的一次胜利，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梭伦没有满足下层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也

执政官大约产生在公元前 1000 年到 683 年间，起先终身任职，后来任期十年，从公元前 683 年起一年一任。人数先为一人，后为三人，后增加到九人。

一斗合 52.3 公升。

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他的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雅典，梭伦很有声誉。有人要他出来当终身独裁者，他说独裁统治“是一个美好的职位，但是没有道可以下来”。

克利斯提尼改革 梭伦改革以后，贵族企图恢复本集团的特权，平民认为没有彻底实现要求，因此双方都不满意，平民对贵族的斗争仍旧非常激烈。一个世纪之内，政局动荡，雅典出现了僭主政治。僭主庇西特拉图父子从公元前 560 年起若断若续专权达半世纪之久，但是总的来说仍旧执行梭伦立法，限制贵族权力，采取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的措施。他们之后，贵族一度夺回权力，遭到平民的反对。公元前 509 或 508 年，克利斯提尼作为平民领袖当权，又一次进行改革。

梭伦没有取消部落组织，贵族利用自己在其中的势力，可以操纵选举。克利斯提尼以十个地域部落代替原来四个血缘部落。阿提卡划分为三十个区，十个区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带，十个区在沿海，十个区在内地。每个地域部落包括以上三组区当中的各一个区，这就从组织上消除了氏族制度。克利斯提尼用五百人会议来代替梭伦的四百人会议，成员由十个地域部落各选五十人组成。公民大会仍然存在，年满二十岁以上的公民都是公民大会成员。五百人会议是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管理财政和外交事宜。克利斯提尼还建立了“放逐制度”，经公民大会多数票决定，可以把任何一个有地位的人流放国外，为期十年。

大约公元前 501 年，雅典设立十将军委员会，由十个地域部落各选一人组成，任期一年。

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雅典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成为一个奴隶制共和国。雅典所实行的那一套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没有很大变动，继续了近二百年。这时候雅典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面了。

第三节 希腊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希波战争的开始 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被波斯征服了。波斯扶植它所信任的希腊贵族,建立傀儡政权,向希腊人征收重税,强令服役当兵。希腊人仇恨波斯人和他们所任命的统治者。波斯国王大流士率军远征欧洲,想征服多瑙河下游的强悍游牧部落西徐亚人。征服的意图失败了,但是波斯人占据了色雷斯,截断了希腊与黑海的交通。希腊的生存和商业利益受到很大威胁。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开始酝酿起义。公元前500年,起义首先在米利都爆发,接着迅速地扩大到小亚细亚其他希腊城邦。米利都向希腊半岛的城邦求援。只有雅典和优卑亚岛的爱勒特里亚答应帮助,派去战舰助战。波斯调动大军前去镇压。起义者顽强抵抗,但因力量悬殊,遭到失败。米利都被波斯军队占领,全城被烧成一片瓦砾场。男子大部分被屠杀。活下来的居民都被卖作奴隶。

大流士镇压了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之后,就把矛头指向希腊本土。公元前492年,波斯水陆两路大军沿色雷斯海岸开向希腊。舰队遇到风暴,陆军遭到色雷斯人攻击,损兵折舰,半途而还。大流士一面继续准备,一面派遣使者前往希腊半岛,要求各国向波斯奉献“土和水”,意思是要他们臣服。许多希腊国家害怕遭受米利都的命运,满足了大流士的要求。但是雅典人把波斯使者抛进深谷,斯巴达人把波斯使者扔进井里,叫他们自己去取土和水。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乘战舰横渡爱琴海,第二次进攻希腊。波斯军队先摧毁了优卑亚岛上的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阿提卡西北的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向斯巴达求援,遭到拒绝。雅典决定采取攻势,迅速组成一支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到马拉松应战。他们一无骑兵,二无射手,跑步冲向敌军,以巧妙的队形猛扑过去。仓促之间,波斯军队不能抵挡,只好撤退;战士有的伤亡,有的回船,有的落水。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有六千四百人死亡,而雅典只损失了一百九十二人。雅典战士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波斯军队,他们以刚毅勇猛的斗志制胜。战斗结束,雅典将领立即派了一名战士奔赴雅典报捷。那个战士一口气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告诉人们“雅典得救了!”说罢倒地而死。雅典居民欣喜若狂,希腊人充满了战胜强敌的信心。从前臣服于波斯的城邦纷纷宣告独立。

李奥尼达石雕像

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役 马拉松大捷后,雅典一些有远见的政治人物认为应该加强海军力量。雅典建造了一百多艘有三层桨座的战舰,并且和斯巴达共同发起联合抗击波斯。希腊三十一个城邦结成以斯巴达为军事统率的同盟。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战舰七、八百艘,军队十多万,再次开向希腊。他命令工匠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水面上架起两座浮桥,各用三百多只大船排成长列,上铺木板草席泥土,旁设屏障,供陆军和辎重

今天的马拉松赛跑就是为纪念这个历史事件而举行的。

根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舰队包括战舰1,207艘,另有辅助船只3,000艘;战斗人员有2,641,610人。近世历史学家认为过于夸大,估计战舰大约七、八百艘,战斗人员十万人。

即今达达尼尔海峡。

运行。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开赴中希腊北部的温泉关迎敌，沿途陆续增添一些兵力，整个队伍不过七千来人。温泉关是个狭窄的隘口，形势险要。两军在此激战，一连几天波斯军队没有进展。最后由于奸细引路，波斯军队绕过山隘，抄袭希军后方。李奥尼达迅速调离主力部队，自己和三百名勇士扼守隘口，奋力厮杀，苦战到底，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后人为了铭记他们的光辉业绩，在温泉关他们的墓地上立碑为念，上面刻着：“异乡过客，请告诉拉栖第梦人，我们忠于他们的嘱托，在这里长眠。”

温泉关失陷后，雅典采取应急措施。将军地米托克利说服雅典人放弃雅典城，将城内的老弱妇孺撤走，壮年男子参加海军。在地米托克利的坚决主张下，舰队开到狭窄的萨拉米斯海湾，诱敌来攻。波斯军队进入雅典城，大肆焚毁。接着，两军会战萨拉米斯海湾。薛西斯以为稳操胜算，命令在海边高地上放上黄金宝座，坐而观战。波斯战船高大笨重，在狭窄的海湾里调度不灵，不久就被打乱了队形，自相碰撞。希腊战舰轻快灵便，紧紧追逼。天黑下来，战斗结束，来不及撤退的波斯战舰全部覆没。

希波战争的结束 萨拉米斯战役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波斯溃败之后，薛西斯只得把大部分陆军调回亚洲，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在希腊。公元前 479 年，希腊同盟军在普拉提亚击溃了波斯部队的主力，把残余的波军全部赶出了希腊半岛。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又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尔海角消灭波斯的残余舰队。此后，雅典转入攻势，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雅典拥有强大舰队，希腊军队的指挥权逐渐从斯巴达转移到雅典手里。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的城邦于是退出反波斯同盟，同盟陷于瓦解。公元前 478—477 年的冬天，雅典和爱琴海岛屿、小亚细亚的许多希腊城邦重新组成同盟。这个同盟由雅典领导，叫做雅典同盟，同盟在提洛岛设有金库，因此又叫提洛同盟。公元前 449 年，同盟的军队在塞浦路斯岛大败波斯军队，对波斯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一年，波斯同希腊缔结和约，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

雅典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希波战争以后，希腊消除了外来威胁，城邦发展进入极盛时期，经济繁荣，奴隶数量大大增加。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奴隶最多的国家。

梭伦改革废除了雅典的债务奴隶制度，雅典不能任意奴役本国居民，就大量地奴役来自海外的奴隶。奴隶最主要的来源是战俘。在希波战争中，数以万计的波斯战俘被卖作奴隶。另一个来源是掠夺。希腊有许多专门的海盗组织，海盗们经常拦劫商船或者袭击沿海村落，劫掠人口出卖为奴。战俘和被掠来的人由商人买下来，带到市场上去出售。希腊有好几个奴隶市场。雅典的奴隶市场是当时希腊最大的市场之一。在进行买卖的时候，奴隶被迫跑步，俯卧，举重，让买主检查他的体格，以供挑选。

奴隶劳动被广泛使用于各个生产部门，在手工业发达的城市，例如雅典，手工业作坊里普遍使用奴隶劳动。雅典有多种多样的作坊，如制陶、冶铁、酿酒、造船、纺织、制革、制造武器作坊，等等。它们大多规模不大，使用三、四个到十几个奴隶；大一点的使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奴隶。矿山里使用的奴隶最多，在雅典国有的劳里翁银矿里有一万多名奴隶。有一个奴隶主把一千名奴隶租给矿山。矿山里的劳动时间最长，矿坑低矮狭小，奴隶直不起

即斯巴达人。

公元前 454 年，金库由提洛岛移到雅典。

腰，只能屈着身子，空气污浊闷热，奴隶干不了多久就倒毙。由于奴隶价格低廉，补充容易，奴隶主听任奴隶死亡。

农业生产上也使用奴隶。斯巴达早已用希洛人耕种土地。其他一些城邦的贵族大地产上也役使比较多的奴隶。雅典农业主要由小农户经营，有的小农也占有一两个奴隶。还有一些奴隶充当厨师、舞女、乐师。奴隶主甚至把这些有特技的奴隶出租赚钱。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有一些国家奴隶。在雅典，他们守城，看门，在军队里担负运输，在铸币作坊里做工，充当官吏侍役，有的还担任文书，管理档案。

希腊奴隶被认为是活的工具，是主人的财产，他们的子女也属于主人。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完全听任主人处置，无故地被鞭打，绞杀，吊起脚来，烧死，剥皮，折断关节，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等等。在残酷的奴役之下，奴隶采取多种手段反抗压迫，他们经常怠工，逃亡，有时甚至杀死主人，举行武装起义。大约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地震，希洛人乘机发动起义。起义很快就席卷了斯巴达大部分领土。斯巴达向伯罗奔尼撒各城邦，甚至也向雅典求援，一连十年，仍然不能将起义者完全镇压下去，最后不得不同意他们携带子女作为自由人永远离开伯罗奔尼撒。

雅典的繁荣 雅典是爱琴海上的霸主，它的盟邦有的交纳盟费，有的为同盟制造战船。它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干涉各邦内政，不许退盟，库金也由它随意支配。雅典依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繁荣起来。

希腊黑花纹花瓶

(公元前560年，图饰是希腊人的婚礼场面)

雅典的手工业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手工业作坊象雨后春笋般地设立起来，门类繁多，分工精细，例如制陶，就分拌土、担水、运料、烧窑等粗工和塑型、制坯、绘饰、烧焙等细工，甚至制坯也有专门分工，如制瓶、制碟、制罐、制杯，等等。产品质量精美，光泽夺目。雅典商业十分发达，商人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许多地方。比雷埃夫斯港是个国际商港，商船云集，帆樯林立；码头和街市上可以看到各地区的商人，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看到埃及、黑海北岸、西西里的粮食，黑海沿岸的牲畜和皮革，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木材，米利都的羊毛，等等。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道横贯在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之间，大道两旁筑有城墙，用来保证战时雅典同海上的联系。

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的经济发展和霸权地位处于极盛时期。

伯利克里的改革 伯利克里出身贵族，拥有大量地产，同时同工商业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作为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人物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公元前443—429年，更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他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推进到高度发展阶段。

伯利克里

伯利克里扩大了平民的权利。他规定由国家给予担任公职的人一定的津贴，使普通公民也可以任职。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重大问题。成年男性公民都能参加。五百人会议由十个部落用抽签的方式各选出五十人组成，仍旧是最高的行政机关。陪审法庭由每个部落在三十岁以上的公民中用抽签方式各选出六十人，共六千人组成，

是最高的司法机关，审理重大案件，监督公职人员，判决采用投票方式。十将军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是最高的政府官员，统率军队，掌握实权。

伯利克里用抽签代替了财产资格的限制，而且设立公职津贴制度，使更多的人能担任公职，因而扩大了平民的政治权利，但是能够享受这种权利的人却还是居民中的少数人。大约在公元前 451 年，公民大会就通过了伯利克里的提案，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算是雅典公民，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公民人数。奴隶、外邦人、妇女都没有公民权。十个将军没有薪俸，这个职位总是由工商业奴隶主所垄断，一般公民根本无法担任。许多靠劳动为生的人也不可能经常到雅典去参加公民大会。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是为奴隶制经济服务的。

雅典卫城复原模型见图版(7)

雅典卫城遗址见图版(8)

在奴隶制发展的基础上，富裕的自由民有充分的条件来享受物质生活，也有充分的闲暇来从事文化艺术活动。伯利克里要使雅典不但成为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文化中心。他在雅典大兴土木，奖励学术，提倡文艺。作家学者纷纷来到雅典施展才能，艺术家为美化雅典贡献力量，一时雅典人才辈出，文化昌盛。伯利克里动用国库资财和雅典同盟的盟费，重新扩建雅典的卫城，在那里修建了以帕德嫩神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树立起许多大理石和青铜的雕像，比雷埃夫斯港经过改建，设置了新的码头和防御设施。通向雅典的“长城”就建成于这个时期。经过整饰改建，雅典气象宏伟，分外壮丽。街头和广场上哲学家在发表演说，剧场里在上演戏剧家创作的剧本。为了笼络民心，在节日举行戏剧表演的时候，国家发给公民观剧津贴。

古代希腊文化 古代希腊，特别是在伯利克里时期，创造出辉煌的文化，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希腊戏剧起源于节日的歌舞演出。每年春天葡萄藤上长出新叶，秋天葡萄成熟，都要祭祀酒神。这时候合唱队载歌载舞，歌唱中间夹有道白。合唱队的表演逐渐演变为戏剧。剧本最初主要取材于神话传说，后来也反映人间的现实生活。许多城市建筑了专供演戏的露天大剧场。

希腊出现了许多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 525—456 年)、索福克利斯(约公元前 496—406 年)和幼里披底斯(约公元前 485 或 480—406 年)是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被称为悲剧之父，留下七部作品，最著名的悲剧是根据神话故事编写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种偷到人间，使人类能够享受文明幸福的生活，因而触怒了统治宇宙的宙斯神。宙斯命令把普罗米修斯绑在悬崖上遭受折磨。但他英勇坚定，始终不屈。宙斯盛怒之下，用雷霆击毁悬崖，普罗米修斯壮烈地坠入深渊。埃斯库罗斯成功地塑造了普罗米修斯这个反抗暴力的英雄形象。索福克利斯也留下七部作品，最著名的是《奥狄普斯王》，描写奥狄普斯如何由于命运的摆布而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造成悲剧。幼里披底斯留下十八部作品，最著名的是《美狄亚》，刻画了被丈夫遗弃的美狄亚出于悲愤，杀死了丈夫的新妻和自己的孩子，成为悲剧。

希腊最杰出的喜剧作家是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50—385 年)，被称为“喜

雅典卫城原是一座古老的堡垒，公元前 480 年被波斯军队破坏。经过伯利克里的扩建，它成为雅典的宗教中心和艺术中心。

剧之父”，留下的有《云》《蛙》《马蜂》等十一部作品。他的喜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他谴责希腊各邦奴隶主的混战，嘲笑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派人物；他讥讽诡辩的哲学家，抨击贫富悬殊、妇女无权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笔调生动活泼，喜笑怒骂，逸趣横生，深受人民喜爱。

希腊文学作品除史诗和神话故事以外，流传下来的《伊索寓言》也有很大影响。寓言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奴隶伊索所作，许多故事，例如《狼和小羊》《农夫和蛇》《兔和乌龟》《狐狸和葡萄》等，寓意深刻，饱含哲理。故事短小精悍，比喻生动，至今仍旧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引用。

掷铁饼手

希腊人在建筑和雕刻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最堂皇的建筑物是雅典的帕德嫩神庙。神庙耸峙雅典卫城高处，呈长方形，四十六根高大的圆柱环绕四周，墙壁上装饰着许多精美的浮雕，庙里高高地矗立着一座雅典娜女神的雕像。雕像用木刻成，周身镶着黄金和象牙，显得十分庄严富丽。这是雕刻大师菲狄亚斯的代表作。雕刻家们还创作了许多人像，在精神和体态方面都做到了维妙维肖。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另一位雕刻家迈伦善于表现运动时的人体姿态。他的杰作“掷铁饼手”表现了一个年轻运动员在掷出铁饼前一刹那间的姿势，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健康美。

古代希腊有许多哲学家。泰利斯（约公元前636—546年）认为万物始于水，复归于水，否认万物为神所造。赫拉克利特（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到五世纪早期）认为，世界不是神或人创造的，它是一团永恒的火，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他认为事物内部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他用河水来比喻事物的流动变化。他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是说，当人们第二次踏进那条河时，遇到的已经是新的流水，而不是原来的流水了。他阐述了辩证法的思想。列宁认为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宇宙间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无限的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原子按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各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也就消灭。他还认为人的感觉和思想是由外界事物的影像引起的。在政治上，他支持奴隶主民主政治，反对贵族专制统治。

在希腊哲学领域里，有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也就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年）和柏拉图（约公元前427—347年）是唯心主义者的代表。苏格拉底反对认识客观世界，认为自然界是神的领域，只有神才能够真正认识。他只要求人们“认识自己”。在政治上，他反对奴隶主民主政治。最后他以危害民主制度、毒害青年的罪名被雅典当局处死。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反映，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而现

伊索之名见于希腊希罗多德和罗马普鲁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很难判断寓言是否都是伊索所作，还是后代编者将许多寓言故事都汇编在伊索的名下。

雅典娜是智慧之神，后来被奉为雅典的庇护神。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391页。

实世界是不真实的存在，因而他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政治上他拥护贵族奴隶主专政制度，他的理想共和国是斯巴达那样的国家，由富有知识的“贤哲”实行统治，勇敢的武士们进行保卫，安份守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事生产。

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学识十分渊博。在哲学观点上，他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例如不能说在个别房屋之外，还有什么一般的房屋。他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因而他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但是他又把形式和质料割裂开来，认为形式居于首位，质料是消极被动的，而形式是积极主动的，质料必须靠形式的推动才能成为现实的东西，这就否认了事物本身的运动。他还提出一个一切事物运动的最终的根源，即所谓“纯形式”，实际上就是神。这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亚里斯多德拥护奴隶制，认为奴隶只是活的工具，在本性上就是从属于主人的。他认为奴隶主贵族人数太少，最好由中等奴隶主掌握政权，巩固对奴隶的专制统治。

在科学方面，希腊人吸收了埃及、巴比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就，加以研究发展。许多哲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提出了著名的勾股定理，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圆锥体、角锥体和球体体积的计算方法。泰利斯曾准确地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蚀。亚里斯多德除哲学以外，还研究政治、经济、文学、历史、语言以及医学、生理学、数学、物理等各方面。他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希腊人在史学方面很有贡献。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欧洲第一个大史学家，被誉为西方的“历史之父”。他曾游历小亚细亚、黑海沿岸、两河流域、叙利亚、腓尼基和埃及等地，采访民间传说，访问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后来移居雅典，与伯利克里和文人学者友善。所著《历史》共九卷，主要叙述希波战争，但是也有大量篇幅写到上述各地以及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历史状况，许多记述是他根据采访的材料写成的，包括大量珍贵的史料，当然也有一些不可信的传闻，有的地方甚至带有迷信色彩。这部著作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一部系统地叙述历史的巨著。

第二个历史学家是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0年），他曾经被选为雅典将军，率领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作战，后来因失败被解职，并且遭到放逐，战后回到雅典。他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八卷，基本上用编年体写成，结构比较严谨，从战争的背景写到公元前411年，除战争过程外，还记载了不同政治集团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迷信色彩也比较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继希罗多德的《历史》之后的又一巨著。

除了文化学术活动以外，希腊的体育运动也比较发展。许多希腊城邦都建有运动场、赛马场和角力场，举办体育竞赛。从公元前776年起，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地方举行全希腊性的体育竞赛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竞赛期间，希腊全境不得进行军事行动。每次竞赛会开始前几个月，使

者前往希腊各邦，发出竞赛邀请。各邦都派使节和代表团参加竞赛会。成千上万的观众从希腊各地涌向奥林匹亚，他们在野地上扎营住宿，小贩们也纷纷前来出售饮食和供神物品，艺术家和诗人会聚到这里来进行表演，奥林匹亚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竞赛历时五天，项目有赛跑、跳远、角力、拳击、标枪、铁饼、战车竞赛等。所有的希腊公民都能参加比赛，优胜者得到用橄榄枝编成的桂冠，这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体育竞赛加强了希腊各邦的文化交流。近代从 1896 年起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导源于希腊。

第四节 希腊城邦的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的称霸和势力扩张不但引起参加同盟各邦的反对，也引起另一个强大城邦斯巴达的嫉视和恐慌。雅典和斯巴达都极力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推广到其他希腊城邦，雅典支持各邦的民主派，斯巴达支持贵族派，互相争雄。双方都想称霸全希腊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终于使大部分城邦都卷入了一场战争，历史上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科林斯是个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不但向意大利和西西里经商，而且向爱琴海北岸扩张商业利益，因而同雅典发生了利害冲突。公元前 433 年，科林斯的殖民地科西拉因为同科林斯发生争执而与雅典结盟，科林斯的另一块殖民地帕提地又受到雅典的侵扰。科林斯积极地怂恿斯巴达向雅典宣战。伯利克里知道战争临近，索性割断雅典与斯巴达盟邦墨加拉之间的一切商业联系。斯巴达及其盟邦要雅典放逐伯利克里，解散雅典同盟，当然遭到拒绝。公元前 431 年，战争爆发。

雅典有强大的海军，但陆军不如斯巴达。开战不久，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侵入阿提卡。阿提卡居民纷纷躲进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避难。雅典城和港口城防坚固，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攻取不下，加以围困。城里人口过度集中，发生瘟疫，居民大量死亡，伯利克里也在这时死于瘟疫。

雅典在海军方面占优势。雅典舰队不断袭击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占领皮洛斯城。在雅典人的鼓动下，希洛人从斯巴达各地大批逃往皮洛斯。斯巴达的局势危急。斯巴达军队向希腊半岛北部进军，在色雷斯击败雅典军队。雅典的许多盟邦乘机同雅典脱离关系。

公元前 421 年，雅典同斯巴达都感到精疲力竭，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和约。

和约没有解决矛盾，不久战争又爆发了。公元前 415 年夏，雅典及其盟邦出动一百三十四艘战舰和大量的辅助船只远征西西里岛，围攻斯巴达盟邦叙拉古。斯巴达、科林斯和西西里一些城邦出兵援助叙拉古。雅典劳师远征，统率军队的将军又因受到怀疑而倒向斯巴达，军队大部分被歼，留下来的沦为西西里石矿场的奴隶。西西里战役失败后，雅典赶快动用剩下来的储金修造战舰，训练海军。但是在公元前 413 年，斯巴达军队又侵入阿提卡，破坏惨重。雅典两万名奴隶逃亡，许多矿场和手工业作坊倒闭。在雅典的许多盟邦里，贵族派纷纷夺取政权，推翻民主派的统治，投靠斯巴达。雅典同盟因此涣散。

为了击破雅典的海上优势，斯巴达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统治为条件，换取波斯的援助，加强了海军，几次战胜雅典。公元前 405 年，斯巴达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进攻雅典舰队，雅典大败。第二年，斯巴达从海陆两方面紧紧围困雅典。雅典只得按照斯巴达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同意拆毁“长城”，除十二艘警备舰以外，其余舰只全部交出，解散雅典同盟。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斯巴达取得了希腊霸权。

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干涉各邦的内政，迫害民主势力，扶植贵族建立寡头政治。它的蛮横统治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四世纪早期，许多城

邦起兵反抗，联合打败了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同盟也趋于瓦解。接着，几个比较强大的城邦如底比斯、雅典又为争夺希腊霸权继续战争。公元前四世纪前半期，希腊境内战火不绝，各邦彼此消耗力量，削弱下去。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公元前五到四世纪，也是希腊各城邦内部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的年代。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带来苦难。战争又使大批战俘沦为奴隶，因此奴隶劳动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公元前 338 年的时候，阿提卡的银矿里和其他处所有十五万成年男性奴隶。有的作坊里有一、二百个奴隶。希腊还出现了从事武器生产、大搞投机垄断活动的大商人。加以大奴隶主兼并土地，排挤农民，使小所有者纷纷破产，破坏了原来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经济。失地农民或者当了雇工，或者成了城市游民。据估计，雅典无产公民占雅典居民的半数以上。贫富分化在加剧发展着。自由民内部的矛盾、奴隶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奴隶时常大规模地逃亡，破坏奴隶主的房屋财产。许多城邦发生贫民起义，奴隶常常参加在内，共同反抗大奴隶主。公元前 399 年，斯巴达的破产公民基那东号召希洛人、皮里阿西人、破产公民等被压迫群众起来暴动，由于密谋泄露，起义被扼杀了。公元前 392 年，科林斯的贫民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流血斗争。公元前 373 年，阿戈斯的贫民用棍棒武装起来，打死了许多奴隶主，瓜分了他们的财产。相似的斗争也在其他城邦发生着。风起云涌的起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加速了希腊城邦的衰落。

第五节 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帝国

马其顿的兴起 正当希腊各城邦日趋衰落的时候，希腊北面的马其顿国家日渐强盛起来。马其顿人同希腊人是近亲，但是希腊人认为他们近于蛮人。

马其顿境内大部分是山地，只在沿海有小块平原。马其顿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在希腊的后面。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国王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336 年在位）当政。腓力年轻时曾经作为人质在希腊的一个城邦底比斯居留三年。他羡慕希腊的生活方式，学习了希腊人的作战艺术。腓力要做一个强有力的国王，要统一整个希腊，成为全希腊之王，并为此目的进行了很多改革。他削弱氏族贵族的权势，把国家的统治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建立起正规的常备军，陆军手持长矛、盾牌，以密集的方阵行军和作战，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还组织了舰队。这些改革使马其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在希腊各城邦因为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各国间的征战而削弱下去的时候，马其顿占有了爱琴海北岸的广大地区，接着入侵希腊。对于腓力二世的南侵，希腊各个城邦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些人把腓力二世当作统一希腊的救星，有些人把他看成自由的威胁。在雅典，领导反对腓力的是希腊大演说家狄摩斯提尼。他大声疾呼：“看吧，雅典人，那个家伙的傲慢已达到极点：他发出威胁的叫嚣，又夸夸其谈……他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征服：他总是攫取得更多，当我们无所作为的时候，在我们周围到处撒网。雅典人，你们将在什么时候采取必要的行动？你们还在等待什么呢？”但是此时的雅典已非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了。公民们耽溺于安乐，弄钱比服务于城邦更重要。当雅典决定抵御时，时间已经晚了。公元前 338 年，马其顿军队在中希腊击溃了由科林斯、底比斯、雅典等城邦组成的同盟军。第二年，腓力二世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只有斯巴达没有参加。希腊城邦承认马其顿的领导地位，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停止城邦间的战争。腓力二世到处扶植贵族，建立寡头政治。他还准备远征东方，但是未及实行就被部下刺死。

亚历山大东侵 腓力死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公元前 336—323 年在位）继位，时年二十岁。亚历山大曾经拜亚里斯多德为师，自幼接受了希腊文化，即位之初，人们以为他年轻，不足以实行他父亲的东征计划，事实却证明他是一位军事天才。他慑服希腊城邦以后，于公元前 334 年率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组成的步兵约三万人，骑兵约五千人大举东征，首当其冲的是波斯。当时波斯政治腐败，各族人民不满波斯统治，内部矛盾重重。亚历山大以快速的攻势轻易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公元前 333 年，在伊苏斯大败波斯军队，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落荒而逃。亚历山大转而攻入非洲，占领埃及，公元前 331 年又从埃及回师亚洲，继续对波斯作战，先后攻占巴比伦、苏撒和波斯波利斯等都城，掳获财宝无算。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载，驮运财宝的骡子就大约有两万头，骆驼约五千头。波斯军队全面溃败，大流士三世被杀。希腊—马其顿军队征服了波斯的全部领土。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建立起来。

伊苏斯之战（左为亚历山大）

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率军侵入印度，占领印度河流域。他还企图征服恒河流域。但是经过多年远途苦战，兵士疲惫不堪。印度人民的顽强抵抗，疟疾的传染，毒蛇的伤害，都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兵士拒绝继续前进，要求

回家。亚历山大不得不放弃东进计划，公元前 325 年从印度撤兵。

亚历山大在东侵过程中，沿途建了许多新城，有好几座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最著名的是埃及北部沿海的亚历山大城，它今天已经发展为埃及最大的海港。

离开印度以后，亚历山大建都巴比伦，部署入侵阿拉伯的规划。但是在公元前 323 年他发烧死去，他那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

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 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部将马上展开夺权斗争。经过长期混战，在原来帝国的版图内形成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以马其顿、埃及（由托勒密王朝统治）和塞琉古三个王国领域最大。为了争夺地中海东部的霸权，它们继续竞争，彼此削弱。塞琉古王国的疆域一度西至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东至中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的主要国家亚细亚。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它的东部省分独立，形成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两个王国。公元前二世纪初起，地中海西部新兴的罗马强国不断向东扩张，在一百多年里，先后吞并了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遭受来自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的入侵，后来也灭亡了。帕提亚王国却日益强盛，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成为亚洲西部的强国，同中国和罗马并列为当时世界上的三个大国。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的主要国家

希腊化文化 历史学家们一般把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人的王朝所统治的国家称为希腊化国家，从那时起，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兼并东部地中海地区为止的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东侵把希腊文化传播到广阔的领域里，同时希腊文化也吸收了东方文化遗产，融合为希腊化文化。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化文化的最大中心。

亚历山大的灯塔(想象画)

希腊化时期的许多国王花费大量金钱修饰宫室，奖励学术。新建的城市里矗立着希腊风格的亭台楼阁，庙宇剧场，点缀着园林和雕像。许多城市设有图书馆。亚历山大城里庞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最为著名。博物馆是一个研究教育中心，学者们会聚在这里举行讨论。图书馆里收藏着从各地收集来的手稿，藏书目录就多达一百二十册，作家的作品都附有注释。这些珍藏吸引着各处的亚历山大的灯塔（想象画）好学之士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城里还集中了各种动物，以便对动物学进行探讨。为了便利船只航行，在亚历山大港外的法罗斯岛上修筑了一座高大的灯塔。灯塔屹立海上，极为壮观，被认为是世界奇观之一，它在十四世纪毁于地震。

学者们进行着各种学术活动。他们缮写了一份份希腊著作，传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研究语言，从事文艺批评，写作诗文剧本。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已经不取材于神话传说，而以社会上的生活趣事为主题了。诗歌题材也以现实生活为主，有些诗歌专门颂扬王室显贵，有的崇尚雕琢词句，追求形式。

塞琉古王国又称叙利亚王国，我国史书中称为条支。

帕提亚兴起于今天伊朗东北部，我国史书中称为安息。巴克特里亚兴起于中亚，我国史书中称为大夏。

希腊化时期的雕刻艺术技巧熟练，造型逼真，体现内心活动精细入微。例如公元前一世纪埃吉山德鲁斯等三位艺术家合作的《拉奥孔》群像，把传说中的特洛伊祭司拉奥孔和两个儿子被两条巨蛇缠咬的形象雕塑出来。拉奥孔正在竭力挣扎，一只脚已经迈下祭坛，脸上痛苦的表情刻画得维妙维肖。

拉奥孔群像见图版(9)

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继续存在。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他继承并且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原子不仅形状、大小不同，而且重量不同；原子不仅有直线运动，而且有偏斜运动。他还认为人生应该避免痛苦，寻求正当的方法来取得快乐，因此人应该修身养性，做到心灵平静，这样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幸福。后人歪曲了他的原意，用“伊壁鸠鲁主义”这个词来表示享乐主义。

同伊壁鸠鲁相对立的是芝诺(约公元前334—262年)。他宣扬宿命论思想，认为人应该服从命运，顺应自然。芝诺在雅典市场的画廊讲学，画廊在希腊文中叫做斯多噶，因此相信他的论点的人被称为斯多噶派。

希腊化时期的最大文化成就在于科学。欧几里得(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之交)是当时最大的数学家。他总结了前人的生产经验和研究成果，著成《几何原本》，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公理化的数学著作，它的系统性、条理性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它的内容今天仍然在学校里讲授。这本书在中国明朝末年由徐光启等人译成中文。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是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发现了杠杆定律，发现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的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定律。他还确定许多物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设计了许多机械，改进了灌溉农田的水车。

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公元前三世纪)指出，太阳比地球大得多；地球自转，并按轨道绕着太阳转动，太阳和其他恒星都不转动。埃拉托斯特尼(约公元前276—193年)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又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他根据地球是球形的正确推断和埃及南北两地日倾角的差数，计算出地球的周长约为三万九千六百公里，十分接近实际约四万公里。他还推测从西班牙绕过非洲南端可能航行到印度。这个设想要到大约一千七百年以后才实现。希帕卡斯(公元前二世纪)进行了复杂的天体观察，推算出一年的时间为一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再减去 $1/300$ 日。他编制了几个世纪之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表，用来推算日蚀和月蚀。

第六章 古代罗马

第一节 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的兴起和罗马的扩张

罗马的兴起 罗马发祥于意大利半岛，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水源丰富，中间矗立着纵贯南北的亚平宁山脉。半岛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东部多山，适于畜牧，西部有肥沃的平原，宜于种植橄榄、葡萄和农作物。由于海上交通方便，因此居民很早就与外界往来。

半岛上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和更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居民很早就半岛上过着渔猎生活。公元前三千年代，他们已经过渡到畜牧业。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开始，一批批印欧人从东北进入意大利半岛，其中有一支拉丁人，定居在中部的拉丁平原，在这里发展起农业生产，建立起一些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罗马。根据神话传说，罗马是由一个名叫罗慕洛的人于公元前753年建立的；根据考古发掘的研究，一般认为罗马的出现约开始于公元前八至七世纪。进入半岛的其他部落中，伊达拉里亚人是比较重要的一支。他们住在台伯河以西的地方，能够制造青铜器和陶器，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也发展了手工业和商业。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城市，后来逐渐向北扩张到阿尔卑斯山南麓，向南扩张到拉丁平原及其以南的坎佩尼亚。

罗马城是以台伯河边距离西海岸不远的七座山丘上的村落为起点发展起来的。公元前一千年代初，山丘上陆续出现了原始村落，后来，山丘的坡地上和山下的沼泽旁边，也出现了房舍，这些村落为后来的罗马城奠定了基础，因此罗马又被称为“七丘之城”。公元前七世纪初，七座山丘上的村落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公元前七世纪末开始，伊达拉里亚人逐渐占据了拉丁平原，包括罗马的所在地。在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的大约一百年间，在这一带周围筑起城墙，排干了下面的沼泽，开辟了广场，添置了庙宇等新建筑，把它建成一个城市。这里的居民称为罗马人。

王政时期 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最初经历了一个“王政时期”，实际上那时罗马人处在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阶段。传说罗马有三百个氏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称为库里亚，十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三个部落构成罗马人民整体。由氏族长组成的元老院有权处理公共事务，并且预先讨论向库里亚会议提出的重大问题，元老院还有权批准或否决库里亚会议的决议。库里亚会议是按胞族召开的人民大会，成年男子均可参加，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和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所谓的“王”在内。王既是军事首长，又是最高祭司和审判长，但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

传说在这段时间里，先后有七个王统治罗马，其中最后三个王是伊达拉里亚人。“王政时期”正是罗马从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作为元老的氏族长通常是各氏族由某一个家族中选出的，这反映了家族间的财产分化，也使这些家族处于特殊地位。元老罗马最初的显贵，他们和他们的亲属逐渐变成氏族贵族。同时，随着生产的逐渐提高，特别是公元前七世纪铁器的普遍使用，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有些家族富裕起来，也上升为氏

关于伊达拉里亚人的来源，希罗多德记载来自小亚细亚，但史学界有不同看法。

一说第六个王不是伊达拉里亚人。

族贵族。氏族中间的贫富分化在不断发展着。原来，土地属于氏族，叫做公有地，定期分配给各个家族使用。公元前七世纪时候，氏族贵族利用权势，开始霸占氏族财产和公有地，贫穷破产的氏族成员只好接受贵族的“保护”，从贵族那里取得一小块耕地，被迫为贵族服役，战时随同出征。

除了被保护人以外，罗马还出现了平民。他们起源于外来的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具有自由人的身分，但不属于罗马氏族公社，没有氏族权利，也不能分享公有地。一些原来接受贵族“保护”，后来由于贵族家族没落而又取得经济独立的“被保护人”，也列入平民的行列。平民主要从事个体农业劳动，有的经营手工业和小商业。他们负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许多平民向贵族租地，借债，常常因为还不起债沦为奴隶。债主还有权将欠债的人卖到外地去当奴隶，甚至将他处死。同时，罗马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当时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

由于阶级分化的加剧，由于平民在数量上的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起来。据说罗马第六个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把全体居民，不分贵族平民，按财产多少分为五个等级，五等以下的称为“无产者”，每个等级按规定提供不同数目的军事百人团，“无产者”出一个百人团。在百人团的基础上，罗马设立了百人团会议，服兵役者都能参加，会议可以选举官吏，每团有一票表决权，它取代了库里亚会议的职权。百人团会议总共有九十三票表决权，第一等级占了其中的九十八票，即掌握了多数票，因此富人总是处于掌权地位。此外，原来按氏族组织的三个部落也被按地域划分的四个部落所代替。这样，一个新的、以地域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在罗马产生了。

第七个王塔克文相传是个暴君，大约在公元前509年，罗马爆发了反对伊拉达里亚人统治的斗争，驱逐了塔克文，建立了共和国。

罗马奴隶制共和国 罗马的王被废除以后，百人团会议每年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掌握行政权力，两个执政官权力相等，协议处理政事。遇有战事，执政官要负责统率军队。遇到危急关头，可以选出“狄克推多”即独裁者对付紧急局势。独裁者由元老院提名，由一名执政官正式任命，任期半年。罗马实际上把持大权的是元老院，元老院由贵族和退任的执政官组成，终身任职。由于执政官每年改选，而元老院是常设机构，因此元老院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有权决定内外政策，批准或否决百人团会议的决议，监督执政官的行动，自然地成为维护贵族利益的工具。百人团会议只能就元老院审查过的议案进行表决，不能讨论。

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奴隶制共和国。平民在政治上仍旧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继续受贵族的剥削。平民构成军队的主力，但是不能参与公有地的分配，主要依靠他们而征服的新土地，又落到贵族的手里。在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战争中负担重税和频繁兵役的平民，因交不起税和田园荒芜而大量负债，沦为债务奴隶。债务奴隶制对平民造成了严重威胁。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共和国早期的历史贯穿着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围绕着土地和债务问题进行的。

平民对贵族的斗争 大约在公元前494年，罗马面临着周围外族压境的威胁。这时候平民拒绝作战，带着武器离开罗马。这种斗争方式叫做“分离运动”。罗马兵力因而锐减。贵族迫于形势，只好让步。平民取得选举保民官和举行平民会议的权利。保民官由平民会议选出，有权否决行政官吏侵犯

平民利益的决定。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凡用暴力危害保民官的人，要处死刑。以后平民继续以“分离运动”和其他方式进行斗争。大约公元前450年，罗马制订了十二铜表法。法律保护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承认债务奴隶制度，但是也对高利贷的利息作了限制；法律编订成明确条文，量刑定罪就有了准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因此制订十二铜表法多少具有进步意义。公元前445年，取消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罗马制订了几个法案，规定平民所欠的债务一律停止付息，已付部分折作本金，尚欠部分分三年偿还；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五百犹格；两名执政官中须有一名由平民担任。公元前326年取消了以人身抵债的制度，平民因此免除了因还不起债而被奴役的威胁。此后，平民还取得了担任其他高级官职的权利。同时，在二百多年里，平民曾分到过少量土地，平民会议也逐渐取得了立法权。公元前287年，法案正式规定平民会议决议不须经元老院批准即对全体公民具有法律效力。

经过长期斗争，平民取得很大胜利，但是这时的罗马共和国仍然是贵族奴隶主的共和国。平民远远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平民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政治上，广大平民并没有真正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当时罗马的官职都没有薪俸，只有富裕的平民才有条件担任。他们通过做官，与贵族联姻，卸任后进入元老院，跻身于罗马的统治集团，成为新贵。此后，所谓贵族指的是由原有的贵族和富裕平民构成的新的统治阶层。氏族贵族的概念消失了。平民的概念也起了变化，以后的平民指的是城市和农村的下层自由居民。由于债务奴隶制的废除，罗马奴隶主不能再奴役本国的自由民，随着一系列的对外征服，罗马走上了大量奴役外籍奴隶的道路。

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共和国早期，大多数罗马居民是农民。为了取得更多的土地，为了消除邻邦的威胁并扩大本身的势力，罗马一步步地统一了意大利。

建立共和国的时候，罗马还是台伯河畔的一个不大的城邦，北有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南有拉丁人的城邦和萨莫奈部落，半岛南部沿海地带则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还有一些其他部落住在沿海或夹居在上述地域之间。罗马人兼用结盟和作战的手法，逐步推进。它同一些拉丁城邦结为同盟，又打败伊达拉里亚人，到公元前400年前后，罗马已经在意大利中部居于领导地位。这时候，北边的高卢人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波河流域。他们时时南下抢劫，伊达拉里亚人的一些城邦陷落到他们手里。大约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入罗马城，焚烧洗劫之后，接受赎金退去。罗马人重建了城市，修起了更坚固的城墙，在以后的一百多年内，在南边战胜萨莫奈人，摧毁了希腊殖民势力，在北边扩充到波河流域以南。到公元前三世纪早期，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地中海的一大强国。

罗马对意大利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对不同地区的居民或给予罗马公民权，或给予部分罗马公民权，或完全不给罗马公民权。

布匿战争 统一意大利之后，罗马就把扩张矛头转向西地中海地区，首当其冲的是迦太基。

这些法律条文刻在十二个铜表上，因此得名为十二铜表法。

一说公元前437年。

犹格是罗马面积单位，一犹格约合3.75亩。

迦太基原来是腓尼基的推罗城邦建立的殖民地，位于今天北非的突尼斯，商业发达。非洲北部的农作物，中部的象牙、金砂、奴隶都由这里出口，不列颠的锡，西班牙的金、银、铅等矿产也在这里集散。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垄断了西地中海的贸易。当腓尼基先后被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统治时，迦太基同母邦断绝政治联系，这时它已经发展为一个富庶的强大国家。迦太基不断向外围和海外拓殖，到公元前三世纪，已经占有北非西部沿海、西班牙南部沿海、西西里的大部、科西嘉、撒丁、巴利阿里群岛等地，成为罗马向海外扩张的劲敌。公元前 264 到 146 年，罗马同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因此这次战争称为布匿战争。

公元前 264 年，罗马同迦太基因争夺西西里发生冲突。这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在西西里岛上取得一些胜利，但是迦太基在海上居于优势地位。罗马以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舰为样板，利用希腊技师的协助，赶造船舰，第一批就造了一百多艘，其中有一百艘是当时第一流的战舰。罗马人又设计一种搭有尖钩的活动吊桥，将它从自己的船上钩到对方战舰的甲板上，士兵们从桥上冲上战舰，展开进攻，用肉搏战克服本身在航海技术上处于劣势的缺陷。罗马人取得几次胜利。公元前 241 年，迦太基不得不求和，交付大宗赔款，割让西西里。西西里成了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继续扩张，先后占领科西嘉岛、撒丁岛、波河流域到阿尔卑斯山以南之地。在那里设置了几个行省。罗马还借口清剿海盗，入侵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与此同时，迦太基也把势力伸入西班牙，在那里营建反击罗马的基地。

公元前 218 年，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年轻的将领汉尼拔率领步兵、骑兵，带着战象，经过艰苦的行军考验，出其不意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他在波河南北先后打败罗马军队，然后在北部过冬，于第二年春天长驱直入。他在意大利纵横驰骋了十几年，以巧妙的战术屡败罗马军队。面对危急局面，罗马统帅费比乌斯 采用消耗战术，避免同汉尼拔的军队决战，只进行局部袭击，逐渐削弱对方力量，消灭粮食储备，造成对方的补给困难。这种战术在历史上称为费边战术，曾引起当时罗马人的不满。罗马当局急于决战，公元前 216 年，在意大利的东海岸发生了著名的康奈战役。汉尼拔把精锐的骑兵和最强的步兵布置在两翼，包抄罗马军队，大获全胜。罗马统治下的各族纷纷叛离，一些旧希腊殖民地也想摆脱罗马控制，西西里的重要城邦叙拉古也投附迦太基。汉尼拔的最后胜利似乎在望了。罗马当局在此以后稳扎稳打，实际上还是采用了费边战术。罗马尽量把迦太基军队限制在意大利南部，毁坏南部的田地和物产，以断绝对方的给养；同时大力扩军，恢复实力，逐步收复南部城市。公元前 211 年，汉尼拔的军队冲向罗马城下，也没有能够将罗马军队引离他们所包围的卡普亚而保住这个城市。在此期间，罗马逐渐把战争中心转向西西里和西班牙，公元前 213 年，围困西西里的叙拉古城。叙拉古人利用阿基米德设计的作战器械奋力固守，两年以后，城市陷落。进入西班牙的罗马军队占领了迦太基在这里的基地。

第二次布匿战争

全名为克温图斯·费比乌斯·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费边（Fabian）是从费比乌斯一词变来的形容词。

汉尼拔一代军事将才，有勇有谋，但长期在国外作战，力量不断消耗。来自西班牙的增援又被罗马消灭了。公元前 204 年，罗马军队攻入非洲，汉尼拔被召回国。公元前 202 年，两军会战于迦太基西南的扎马。迦太基战败，第二年被迫求和。根据条约规定，迦太基交出全部战舰和战象，交纳大宗赔款，丧失全部海外属地，不经罗马同意，迦太基不得进行对外战争。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开始，罗马把侵略矛头指向东方。到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它已先后征服了马其顿、希腊、伊利里亚和小亚细亚西部。这时候，迦太基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罗马从称霸地中海的目的出发，决心彻底消灭迦太基。元老加图每次在元老院发言，不论讨论什么问题，最后一句话总是说：“迦太基必须被毁灭。”他的口头禅反映了罗马统治阶级同迦太基不共戴天的意志。公元前 149 年，罗马军队攻入北非。迦太基城遭到围困，全城居民动员起来，加固城防，置办武器，英勇地抵抗了三年。最后罗马人切断了农村与城市的联系，迦太基人断粮，罗马军队破城而入。大约有八万五千迦太基人奋战至死，余下约五万人都被卖为奴隶。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所属地区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

这样，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在地中海确立了霸权地位。

罗马征服的后果 为了控制被征服的地区，罗马向各行省派驻总督，加紧敛取财富，镇压人民。总督任期一年，独揽当地大权。

每个总督都在任内恣意搜括。行省居民要向国家交纳捐税，还要维持当地的行政和军费开支。罗马还在行省中实行包税制度，把行省的税收包给某些富商，这些包税人在征税时擅自加码，乘机中饱。

他们还靠承包意大利的公共工程、贩运奴隶、经营高利贷和钱币兑换牟取暴利。罗马对行省的压榨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

意大利本土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农业还以小农为主体。经过一连串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农村惨遭蹂躏，大批生命财产毁于战火。许多农民参加军队，弄得家破人亡。加上几次瘟疫，意大利人口减少，有的土地已经无人耕种，荒芜下来。另一方面，公有地的数量却在猛增，其中包括被弃置的耕地、被没收的曾经倒向汉尼拔的动摇者的土地、被征服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纷纷落到权贵们和靠经营军用物资等商品而发财的商人们的手里。在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而农业劳动人手已见减少的情况下，奴隶劳动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占地几百到几千犹格的大农庄大量涌现。由于大农庄的盛行，高利贷的发展，西西里和非洲廉价粮食的输入，小农经济受到排挤，难于立足。农民大量破产，他们只好流入城市。少数人转入手工业，或者做工糊口，但是这些行业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劳动人手，大多数人只得沦为无业游民。贫富分化加速发展着。

第二节 奴隶起义和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奴隶制度的发展 在长期战争中，大量奴隶流入罗马。罗马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罗马多次将占领地区的居民卖为奴隶。意大利南部的卡普亚城，因曾经倒向汉尼拔，全城居民悉数被卖为奴。公元前 176 年，罗马镇压了起来反抗罗马统治的撒丁人，接着就将八万撒丁居民卖为奴隶。公元前 167 年，罗马占领希腊西北部的伊皮鲁斯，又把十五万人卖为奴隶。迦太基陷落后，又有五万人沦为奴隶。奴隶贩子常常随军出发，就地收买战俘。另一种情况是债务奴隶。罗马虽然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但是意大利的许多居民和行省的居民不享受罗马公民权，不受债奴法的保护。他们不堪包税商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很多人成为债务奴隶。横行于地中海的海盗也常在各地拐骗人口，卖作奴隶。罗马各大中心城市差不多都有奴隶市场，提洛岛更是奴隶买卖的中心。据说有的时候岛上一天成交的奴隶就达到一万人。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

奴隶的境遇十分悲惨。奴隶主把奴隶看作是一种工具。他们认为：马车是哑巴工具，牛是半哑巴工具，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承担各种苦役，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奴隶白天带着脚镣干活，夜间被关在象牢房一样的板栏或地窖里。为了防止饥饿的奴隶在磨面粉时偷吃，奴隶主在奴隶的脖子上套上沉重的大木枷。奴隶主对奴隶任意拳打、鞭抽、铁烙，或者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奴隶已经被榨尽血汗，病弱衰老的时候，奴隶主就把他们象农庄上的老牛、废铁、破车一样抛弃，任其死亡。

矿山里的奴隶劳动条件尤其恶劣。他们终日采掘矿产，冶炼金属，劳动极度紧张，加上监工的无情鞭打，奴隶成批地死去。

很多奴隶在奴隶主家里充当仆役，为奴隶主看门，做饭，打扫，理发，等等。来自希腊和东方各地的有文化教养的奴隶给奴隶主充当歌手、乐工、医生、教师。还有一些强壮的奴隶被强行训练成角斗士，被迫在剧场上互相角斗，互相残杀，或者同饥饿的老虎、狮子等猛兽搏斗，供灭绝人性的奴隶主哄笑取乐。

西西里奴隶起义 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非常尖锐，奴隶多次起义。公元前 137 年，西西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西西里盛产谷物，有许多大农庄。奴隶主对奴隶非常苛刻，有一个奴隶主竟然不管衣食，让奴隶到外边去抢劫。叙利亚籍奴隶优努斯在恩纳城首先发动起义，奴隶们砸开锁链，冲开作坊，起先大约有四百人，后来迅速扩展，其他城市的奴隶群起响应。恩纳的起义奴隶同阿格利根坦的另一支起义奴隶汇合，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了好几个城市。起义者在恩纳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且开始自制武器，镇压凶残的奴隶主，破坏大农庄，保护小农庄和小农经济。公元前 132 年，罗马执政官率领军队到西西里镇压起义。起义者英勇保卫城市。由于各地起义队伍联系不够，又由于叛变者的破坏，恩纳经过奋战之后陷落。优努斯被擒后死在狱中，很多起义者被处死。这次起义影响很大，意大利半岛和希腊等地接着发生了好几起起义。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与奴隶起义同时，意大利的失地农民展开了争取土地的运动。这些被迫离开土地的劳动者本来已经难以谋生，西西里的起义又

—说公元前 135 或 134 年。

影响了粮食生产，造成粮价上涨，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失地农民反对土地兼并，要求恢复耕地，重建家园。房屋的墙壁上，碑石上，出现了许多要求分配土地的标语。罗马统治阶级惶恐不安。小农破产不仅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财产条件同服兵役有直接的关系，破产者越多，能够服兵役的人就越少，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越低。这样，国家势必走向没落。于是统治阶级当中一部分比较有远见的人主张改革。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二人。

格拉古兄弟出身贵族。提比略·格拉古认为保民官最便于提出土地改革方案。公元前134年，他竞选下一年度的保民官，获得成功。公元前133年，他提出土地法案：任何人占有公有地不得超过五百犹格，成年儿子每人可以占地二百五十犹格，但每家的占地总数不得超过一千犹格；凡超过者，其余的土地由国家收回，划分为每块三十犹格的份地，拨给无地农民；农民得到的土地不得出卖转让，防止新的土地兼并。他还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来执行法案。法案提出以后，受到广大平民的支持，农民从意大利各地来到罗马，参加投票。但是元老院的绝大多数贵族极力反对。这些贵族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不肯放弃既得利益。他们开始攻击提比略，并且串通另一名保民官屋大维在平民会议上否决这项提案。于是提比略向平民会议提出，既然屋大维不能履行保护平民利益的职责，应该罢免他的职务。提议被通过了。屋大维去职后，新任的保民官支持提比略的法案，表决获得通过。提比略和他的弟弟、他的岳父被选入三人委员会。元老院大为震怒，故意扣委员会的费用，加以阻挠。委员会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又缺乏必要的基金来进行调查和安置农民。为了使法案得以贯彻，提比略提出连任下一届的保民官。于是贵族抓住这件事诬蔑提比略有政治野心。在选举的那天他们发起暴动，打死了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名拥护者，尸体投入台伯河中。第二年，元老院又授权执政官主持审理所谓提比略的“阴谋”，又处死、流放了许多人。

贵族们虽然杀害了提比略，但是土地问题依旧存在。几年以后，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又趋活跃。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竞选下一届的保民官成功，第二年又当选。他在两年任期之内恢复了提比略的法案，又实行了一些其他法案。一项重要法案是粮食法，规定国家每月按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罗马城的居民一定数量的粮食。他还提议从意大利向迦太基移民六千人，每人可以获得二百犹格的土地。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者，他提出给过去被征服的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法案。对于这个法案，罗马商业金融贵族担心意大利商人的竞争，平民唯恐意大利人分享土地，都不赞成。盖约的力量削弱了，他竞选公元前121年的保民官失败。事后反对派向盖约和他的拥护者挑战，双方发生战斗。盖约在反对者的追迫下，为了免于被擒，让一个仆人把他刺死了。大约有三千名他的拥护者被杀害。

一个向城市走去的民农见图版(10)

格拉古兄弟力图解决农民的土地，但在当时奴隶制度、货币经济和高利贷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小农的经济分化和破产已经不可避免。格拉古兄弟遇害以后，他们的法案也被取消了。

民主派同贵族派的斗争 从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时候起，罗马社会进入一个大约一百年的政治动乱时期。改革失败以后，奴隶主内部的夺权斗争日益严重。斗争在以元老为首的贵族派和以商业金融贵族为首、以贫民为主力的民主派之间进行。商业金融贵族是后起的社会上层集团，经济力量雄厚，

但是没有实权。他们不满意元老院大权在握，要求掌握实际权力，取消元老特权，并且也主张扩大公民权，进行海外掠夺。由于海盗骚扰，边境不宁，行省叛乱，军事频繁，一些对外用兵和镇压动乱的军人成为有势力的人物。两派都寻求他们的支持来增加自己的力量。军人出身的马略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公元前107—100年间，马略六次当选为执政官。他在执政期间进行了军事改革。

由于小农破产而造成的军力衰落，使罗马无法顺利地进行战争，而且军队已经十分腐败，受贿现象严重。马略放弃过去按财产条件征召公民编入军队的办法，改为募兵制，凡适合服役条件而自愿入伍者均可应募；入伍后必须服役十六年，由国家发饷并提供武器，士兵要经过严格训练，服从军纪，退伍后由国家拨给土地，这样，流入城市的广大游民都能入伍，从而解决了兵源问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职业化的军队长期追随统帅，抱有政治野心的统帅可以利用部下的常备军来为自己争权夺势，这为后来罗马奴隶主的军事独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苏拉是贵族派的支持者，站在马略的对立面。公元前88年，元老院提名苏拉为执政官。苏拉宣布元老院为最高权力机关，扩大元老名额，把自己的支持者三百人补充进元老院，规定一切法案必须取得元老院的批准，取消保民官的否决权。平民长期斗争所争得的许多权利在他统治期间都丧失了。民主派不甘心失败，继续同贵族派斗争，两派兵戎相见，经过反复斗争，贵族派又取得胜利，公元前82年，苏拉以独裁者统治罗马，直到公元前79年。这段期间，两派互相杀戮，一派上台，就残杀另一派的支持者，取消另一派的改革措施。意大利土地上血流成河，动荡不安。只是在斯巴达克起义大规模爆发之后，两派的斗争才暂时有所缓和。

斯巴达克起义 奴隶制发展的结果，不但奴隶增加，破产的自由民也越来越多。他们对奴隶主的愤恨与日俱增，奴隶的反抗斗争也不断高涨。公元前73年，爆发了罗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原是色雷斯人，同罗马作战时被俘，被卖为奴，并且被送到卡普亚一所专门训练角斗士的学校受训。角斗士的境遇十分悲惨，经常遭受拷打，而且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惨死在角斗场上。他们对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忍无可忍。公元前73年，有二百人密谋逃亡，由于密谋泄露，结果只有七十八名奴隶及时拿了菜刀和铁叉等武器潜逃成功，来到维苏威火山上造反。他们推出三名领袖，斯巴达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起义奴隶从这里不断袭击附近的大农庄，一再打击从卡普亚城里出来的队伍，夺到很多武器。附近的奴隶和破产农民纷纷投奔前来，队伍很快壮大到一万人。罗马元老院派遣精锐部队包围维苏威火山，占据了通往山顶的唯一小路。起义者用野葡萄藤编成绳梯，在夜间缒下悬崖，把武器抛到山下，迂回到敌后，将敌人击溃。接着，斯巴达克又打垮了另一支罗马军队。

在起义者的胜利鼓舞下，意大利南部遍地燃起了起义的烽火。斯巴达克整编了队伍，组织了骑兵队和步兵队，加强了队伍的纪律，规定所有的战利品一律平分，共同享用，禁止起义者占有金银，不许触犯小农，骚扰人民，征集军需品必须按值偿付。起义军的纪律严明，越战越强，公元前72年已经扩大到十二万人。

正当起义军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斯巴达克代表外籍奴隶，主张冲过阿尔卑斯山，摆脱罗马奴隶主的奴役，分别返回自己的家乡。参加起义的破产农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乡土，他们拥护另一个领袖克里克斯，要求进攻罗马。意见分歧导致起义队伍的分裂。克里克斯带领一万人独立行动，不久被罗马军队击溃，克里克斯战死。斯巴达克带领主力部队向北挺进，所向披靡，一路上击败了罗马军队的前堵后追，到达波河流域。起义者受到胜利的鼓舞，但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却有不少困难。斯巴达克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挥师南下。面对这支驰骋于意大利的起义队伍，罗马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没有人敢竞选执政官。元老院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最后选任大奴隶主克拉苏（公元前115？—53年）为狄克推多，统率大军，镇压起义。克拉苏在军中恢复了残酷的什一法，逃亡士兵每十人中用抽签方法抽出一人处死，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阻止斯巴达克的南下。斯巴达克认为进攻罗马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带领起义队伍直下意大利南端的海峡。他决定从那里渡海去西西里岛，希望得到岛上奴隶的响应，壮大斗争声势。由于没有船只，渡海计划成为泡影。克拉苏尾随着斯巴达克南下。他在意大利半岛最狭窄的部分构筑了横贯半岛的壕沟和土垒，企图把起义者围困在半岛南端，用饥饿制服他们。斯巴达克激励部下突围。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起义军突破防线，向东海岸挺进。斯巴达克打算带领部队由东岸渡海，经伊利里亚到达色雷斯。这时起义军中旧有的分裂再度爆发，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意大利，他们脱离了主力，被克拉苏消灭。公元前71年，在布林底西港附近发生了决定性的会战。起义军在数量上比罗马军队少得多，他们仍然英勇战斗。斯巴达克身先士卒，骑在马上左冲右突，杀死两名罗马军官，他决心杀死克拉苏，但是由于大腿受了重伤，他只好在地上屈着一条腿继续战斗。在罗马军队的疯狂围攻下，六万名起义者战死，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克拉苏把六千名被俘的起义者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沿途的十字架上。但是起义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残存的起义者继续斗争了十年之久。

斯巴达克起义是古代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一次最光辉的斗争。斯巴达克在起义中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列宁称颂他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

前三头同盟 斯巴达克起义以后，民主派同贵族派的斗争又趋剧烈。民主派的声势强大，原来拥护苏拉的克拉苏和另一个年轻将领、曾经参与镇压上述六千名起义者的庞培（公元前106—48年）也投向民主派一边。庞培并且表明准备恢复被苏拉剥夺的民主派的权利，以换取他们的支持。结果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他们执政期间，恢复了苏拉以前的制度，清洗了元老院中苏拉的拥护者，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庞培卸任以后，又接受了许多重要任命。他以三个月的时间平定了地中海上的海盗，又接受东征的任务，镇压了小亚细亚的反抗，接着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建立新的行省。庞培把东方的税款交给包税商去征收，并且答应分给退伍战士份地。他返回意大利时，罗马情况混乱，有人以为他会利用已经取得的声势，凭借军队的力量成为另一个苏拉，但是他按照惯例，到了意大利就解散部队。元老院对庞培怀有戒心，拒不批准他在东方所采取的措施。庞培十分不满。

这时民主派中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人物恺撒（公元前 101—44 年），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同马略有亲属关系。恺撒能言善辩，具有军事才能，又抱有政治野心。公元前 60 年，庞培、克拉苏和恺撒达成秘密协议，组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前三头同盟”。他们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要互相利用，形成一股势力，以便左右局面，达到分据要职的目的。结果恺撒当上了公元前 59 年的执政官。他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措施，把土地分给退伍军人。恺撒任满以后，出任高卢总督，为期五年。公元前 56 年，三人又达成新的协议：庞培和克拉苏将出任下一届执政官，任满之后，庞培为西班牙总督，克拉苏为叙利亚总督，恺撒在高卢的权力延长五年。那些年，三头同盟实际上支配着罗马政府。

恺撒之所以期望在高卢延长任期，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有募集军队和建立军威的广阔地盘。恺撒统治高卢期间，权势不断增长，大大地充实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资本。他初任总督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范围除今天意大利北部的内高卢之外，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只包括从它的西麓直到比利牛斯山的东段一带，即今天法国南部的一片土地。他以此为基地，从公元前 58 到 51 年，征服了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之间的全部高卢土地，严厉地镇压了当地部落的反抗，并且在公元前 55、54 年两次侵入不列颠。恺撒经过多年经营，训练出一支听命于他的军队。他不但军权在握，而且财力雄厚。在高卢搜括的财富大量流入罗马，又提高了他在统治阶级中的声望。就在那几年里，叙利亚总督克拉苏于公元前 53 年在东征帕提亚的战争中阵亡，而庞培并没有到西班牙就任总督，只派副将前往，自己却留在罗马控制政局。三头本来各有所图，同床异梦，现在一人已死，只剩两人。随着各自权力的增长，庞培和恺撒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了。恺撒作为民主派的首领，作为有实力的统帅，深遭元老院的猜忌。庞培和元老贵族出于共同嫉视、反对恺撒而趋向于一致。元老院授予庞培镇压民主派的大极，同时命令恺撒

恺撒

必须于公元前 49 年 3 月任满时解散军队，返回罗马。这对恺撒来说，正是关键时刻。他拒绝服从命令，决定先发制人，于公元前 49 年 1 月，挥师来到卢比康河边。在那里，他碰上元老院派来的信使。信使告诉他，如果他带兵渡河，就要宣布他为叛逆。恺撒犹豫了片刻，决心带着军队渡河，直驱罗马。沿途城市开门归附。罗马城中的反对派纷纷弃城而逃。庞培逃亡希腊。恺撒占领罗马，取得政权，随后进军西班牙，先使那里的庞培部队投降，然后进军希腊，打败庞培。庞培逃亡埃及，刚到那里，就被埃及国王派人杀死。到公元前 45 年，恺撒完全消灭了庞培在西方、东方和非洲的势力，回到罗马。

恺撒的独裁 恺撒攫取了罗马的政权，从公元前 48 年起多次被选为执政官，并且被宣布为狄克推多，公元前 44 年，更成为终身狄克推多，又兼任监察官和终身保民官，集大权于一身，成为没有君主名义的君主。恺撒利用平民的支持当上了独裁者，但是掌权之后并没有给平民带来多少利益。平民

古代高卢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北部，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瑞士的各一部分。其中意大利北部自阿尔卑斯山以南到卢比康河，称为内高卢。莱茵河、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西段之间的地带，称为外高卢。13

在欧洲，从这里产生了“波过卢比康河”的成语，即“破釜沉舟”或“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

最关心土地和债务问题，但是士兵的土地分配进行缓慢，债务只免除了四分之一。原来罗马有许多无业游民依靠国家免费供应粮食，恺撒把他们的数目由原来的三十二万人减少到十五万人，把一部分人移置到各个行省中去。另一方面，恺撒把元老院的名额扩充为九百人，把自己的许多亲信、军官、意大利的商业金融贵族和行省中的支持者都安插进去。他给行省中的上层人物以公民权，提高了意大利城市的自治权，扩大了奴隶主的统治基础。元老院变成咨询机关。

恺撒还改进了行省管理制度，修筑了贯通意大利全境的大道。过去罗马用太阴历，恺撒下令采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天文学家在埃及历法的基础上所制订的太阳历，每年 365 天，四年一闰，闰年为 366 天。这个历法称为儒略历，它是现今大多数国家所通用的历法的前身。

恺撒虽然没有消灭元老贵族，却把自己凌驾于元老院之上。元老贵族不甘于失败。他们以“恢复共和”为号召，暗中密谋消灭恺撒。公元前 44 年 3 月，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被反对派刺死。

后三头同盟 贵族派曾想以谋刺恺撒来恢复自己的政治优势。但是情况不如所料，他们没有博得社会上的支持。恺撒在民主派中还有广泛的影响。等待分配土地的老兵、多年跟随他的军队，都对恺撒表示同情。贫民当中虽然对恺撒有不满情绪，但是元老贵族却早已更为群众所憎恨。恺撒被刺之后，他那派的力量仍旧控制着局面。继之而起的是曾与恺撒共任执政官的安东尼、恺撒的甥孙屋大维（公元前 63—公元 14 年，他被恺撒收为义子）和恺撒部下的骑兵长官雷比达。他们经过一番纷争之后，在公元前 43 年结成“后三头同盟”。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意大利搜杀政敌，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一则为了翦除对手，二则为了把他们的土地钱财分给士兵。公元前 40 年，他们划分势力范围。安东尼管辖东方行省，屋大维管辖西方行省，雷比达管辖非洲。但是他们也和前三头的情况一样，都各有打算，因而很快就发生了矛盾，特别是屋大维和安东尼两人，势力比较强大，权力之争也更激烈。他们在各自管辖的势力范围之内蓄积力量，准备争夺最高权力。屋大维先联合雷比达于公元前 36 年消灭了庞培的儿子在西西里一带的势力，随后就剥夺了雷比达的军权，接收他的军队，并且同元老贵族和解。这时候屋大维的实力和声势大为增长，他独揽西部的大权，接着就把目标转移到安东尼所管辖的东方。

安东尼在富庶的东方经过一番经营之后，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勾结起来。公元前 36 年，他进攻帕提亚失败，损失重大，然后转入埃及去建立他的势力。他把罗马在东方侵略的土地以及并未征服的帕提亚分赠给克里奥帕特拉及其子女。屋大维以这些事情为借口，对安东尼大肆攻击，并向克里奥帕特拉宣战。安东尼的舰队向西出动。公元前 31 年，屋大维和安东尼会战于希腊西北部的阿克兴海角。安东尼兵败逃往埃及，第二年屋大维追踪而至。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先后自尽。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

恺撒的拉丁文名称为 Iulius Caesar。Iulius（英文 Julius）曾译为儒略，历法由此得名。按照儒略历，一年平均比回归年长 11 分 14 秒。到 1582 年，已出现十天的误差。当时的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令人在儒略历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成为现在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

第三节 罗马帝国

屋大维的元首政治 屋大维战胜安东尼，结束了罗马的长期内战，也结束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元老院接二连三地授予他荣誉和特权。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确立了绝对专制的元首制度。元老院授给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要求全国象敬神一样地敬奉他。他一身兼任元首、元帅，多年连任执政官，又被赋予终身保民官的职权，有了这项权力，他就可以提出或者否决提案。他总揽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罗马高级官职的任选和重要政策的制订权力完全归他掌握。经过清洗的元老院添进许多被提拔的新贵，变成屋大维的御用工具。行省的实际控制权也集中到他的手里。屋大维继续扩大统治基础。从事商业、高利贷、承包地方税收而发财的奴隶主，大量充任重要的官职和军职。行省的上层人物更加广泛地取得罗马公民权，参与国家政治。屋大维依靠奴隶主阶级加强对奴隶的统治。元首制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奴隶制共和国历史的结束。

屋大维

罗马行省人民向收税官纳税见图版（11）

罗马共和政体是在城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罗马的疆域大幅度地扩充，海外领地大量增加，奴隶制度广泛发展，阶级矛盾加剧的时候，共和政体已经不能适应整个国家奴隶主集团的阶级利益。代表罗马城邦奴隶主利益的机构必然要被代表整个地中海区域奴隶主利益的机构所取代。罗马历史进入奴隶制帝国时期，屋大维实际上是这个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屋大维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罗马帝国的疆界进一步扩大了。它东起幼发拉底河上游，西临大西洋，南抵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北达莱茵河和多瑙河。它的疆域这时已经大体奠定。

“罗马的和平” 从屋大维开始的大约二百年里，罗马帝国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统治，经历了它的极盛时期，这在历史上称为“罗马的和平”。这一时期罗马继续扩张，疆域达到它的最大规模；它在亚洲包括小亚细亚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直到西奈半岛一带；在非洲直抵北非西部；在欧洲伸入不列颠和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等地。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

这一时期也是帝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带轮的犁、割谷器械、水磨得到应用。埃及和北非一带改进了灌溉系统，开辟了新的耕地，农产丰饶，成为帝国的谷仓。高卢和西班牙盛产葡萄、橄榄。帝国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意大利的玻璃、金属制品，陶器，腓尼基的玻璃制品、紫红染料，小亚细亚的纺织品，埃及的纸草、精细麻纱，西班牙的金、银、铁、铅矿产，都是著名产品。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繁荣起来，成为仅次于罗马的重要城市。高卢和西班牙等地兴起了许多新城镇。帝国境内修起了纵横的道路，增辟了渠道和港口。许多地方修建了高架引水桥，把远处的泉水引入城市。海盗已被肃清，水陆交通便利，运输比较安全。大小商人往来贩销各地物产，许多精美制品运往莱茵河、多瑙河彼岸。帝国初期驶往印度的商船每年就大约有一百二十艘。中

“奥古斯都”是至尊至圣的意思。

此后的罗马统治者都保有“元帅”（imperator）这称号。从此，imperator—词演变为“皇帝”的意思。北非西部部分地区这时尚未包括在内。

国丝绸辗转运到罗马，在共和国末期就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珍品。据《后汉书》记载，罗马使节曾在 166 年来到中国洛阳，赠送给汉桓帝象牙、犀角和玳瑁等珍贵物品。这里所说的使节实际上可能是远涉重洋的商人。

高架引水桥

劳动人民的创造，工农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税收，为罗马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意大利本土和各行省，展开了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罗马城内兴建了许多豪华的大理石皇宫、神殿、别墅、会议厅、公共浴场、剧场、竞技场和宽阔的广场。罗马圆形大

罗马圆形大剧场

罗马万神殿

剧场可以容纳约五万名观众。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些娱乐场所观看各种节目。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开始修建的万神殿，规模宏伟，先后用了一百五十多年方才建成。罗马的建筑物继承了希腊的格式，加上高大的拱门，显得更加庄严美观。一条条宽阔的驰道把许多城市同罗马联系起来。

罗马帝国时代，上层社会生活日趋腐化。暴戾愚昧的奴隶主把体力劳动和文化教育工作都交给奴隶去做，自己尽情享受，竞尚豪华。富裕的罗马男子下午常把时光消磨在公共浴场里，先做健身运动，然后沐浴，这是一种舒适的享受，也是奴隶主的时尚。浴毕涂上香脂，躺在榻上闲谈消遣，直到晚餐时光方才回去。他们以美酒佳肴来显示阔绰，有时候甚至吃孔雀舌头。在奴隶主的宅院里，厅堂壁画，庭园池水，无不齐备。但是在大城市那些高楼大厦之间，就有整片的贫民区。贫民区的房子狭小、简陋，时刻有倒塌的危险。曲折狭窄的街面上，终年不见阳光。在屋大维统治时代，罗马城里约有二十万无业贫民依靠赈济度日。奴隶主的奢侈生活，建筑在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的痛苦上。

庞贝城遗址（另一幅见图版 12）

（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该城被毁。）

隶农制 农业中除了奴隶劳动外，这时候越来越多地利用隶农耕种土地。隶农原来是指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或移民，后来又把佃耕小块土地的人，其中包括贫穷农民和奴隶，也称为隶农。这种隶农制在公元前后就已萌芽。那时候奴隶制已经出现危机。奴隶不堪虐待，仇视强迫性的劳动，一次次大规模的起义给予奴隶主沉重的打击。奴隶制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随着奴隶逃亡、怠工、破坏工具、袭击农庄、杀死奴隶主等现象的日趋严重，大农庄更加难以维持；而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停止，海盗肃清，奴隶来源减少，奴隶价格昂贵的情况下，补充奴隶又很困难。奴隶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意大利的农业显得衰落，南部许多农庄改为牧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奴隶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隶或破产的农民耕种，并向他们收租。实行这种办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劳动兴趣，增加生产，保持奴隶主的剥削收

罗马公共浴场多半是复杂而华丽的建筑，兼作体育厅、图书馆和朋友的聚会场所。里面常有乐队演奏乐曲，有时候还有诗人或戏剧家朗诵作品。

入。隶农制越来越发展，在二世纪流行起来。

隶农租种奴隶主的小块土地。起初他们常用货币交租，后来改交实物，数量大约占收获物的三分之一，此外还要为奴隶主服一定的劳役。奴隶主经常违反规定，任意增加地租和劳役。很多隶农缺乏种子、农具或耕畜，被迫向奴隶主告贷。隶农本来有权在租期届满后退种土地，但是如果到期不能还债，就丧失了退种权利，被迫继续耕种那块土地。为了保证劳动人手，奴隶主实际上使隶农越来越固着在土地上。在转让土地时，隶农随同土地一起转让出去。隶农虽然不是奴隶，他们用自己微薄的经济，但是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恩格斯称隶农为“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除隶农制以外，奴隶主还常把一部分其他产业，如店铺，作坊等交给奴隶经营，向他们收取一部分收入。这种措施也是为了提高奴隶的劳动积极性。释放奴隶的现象在增加。这一切都说明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

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初兴起于巴勒斯坦，它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道上的巴勒斯坦，长期以来是强邻争夺的地方。埃及曾经征服巴勒斯坦。后来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又先后据有过这块地方。犹太人长期处在外族的统治下，饱经残杀、俘掳、放逐之苦。人们在绝望中盼望有一位“救世主”能够降临人间，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一些“先知”开始在民间宣传“救世主”的降临。关于“救世主”的思想成为犹太教的中心信仰。

公元前63年，巴勒斯坦在庞培东征时沦为罗马属国。当时耶路撒冷有一万二千名犹太人遭到屠杀，又有大批犹太人被掳到罗马。罗马利用傀儡国王和祭司长进行统治。罗马上层人物在巴勒斯坦掠取金银财富，放高利贷，夺走犹太农民的土地。十年之后，犹太人起义反抗暴政，结果失败，三万名起义者被卖为奴隶。公元前4年和公元66年。犹太人又掀起大起义，都被镇压，许多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卖作奴隶。广大奴隶、隶农、手工业者、破产商人都仇恨罗马统治者，也反对祭司长。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的降临上。一世纪时候，在巴勒斯坦和散居小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传道者，宣传这种信念。他们说，上帝之子耶稣在巴勒斯坦传道，教人忍受苦难，受苦的人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可是富人进入天堂却非常困难。传道者还说，耶稣后来被巴勒斯坦犹太贵族勾结罗马总督逮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他又复活，然后升天，以后还要降临人间，在世上建立“千年王国”。关于他的传说起初只在信徒中间口头流传，公元二世纪时才被记录下来。耶稣虽然是个宗教传说中的人物，但是这种说教反映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摆脱困境的愿望，使人们求得幻想中的精神安慰，因此它在奴隶、被释奴隶、劳苦人民当中获得许多信徒。信徒们组成小宗教团体，一起讲道祈祷，互相帮助救济。只要信奉耶稣，遵守教规的人，都可入教，因此这种信仰很快就由西亚传入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希腊语称“救世主”为基督，这种宗教因而被称为基督教。宗教团体逐渐联合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基督教会。

早期基督教带有朴素的性质。信徒们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仇视富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6页。

《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恩格斯说“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罗马统治者把教徒看作叛逆，加以逮捕残杀，没收教会的财产。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衰落，奴隶起义的不断爆发，奴隶主的统治发生动摇。一些感到前途渺茫的剥削者也向宗教寻求安慰，成为信徒。他们捐献财产，自己又具有文化知识，逐渐把持了教会的领导职务。这样，教会在成分上、组织上、性质上都渐渐发生了变化。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衰落，面临重重危机。奴隶制经济走向末路，大农庄和矿山以至一般作坊，更加难以维持，帝国的财政收入严重地受到影响。但是统治阶级却过惯了寄生享乐生活，大量消耗财富；为了维持帝国的统治，又不得不一再扩充军队；加上官吏贪污，节日庆典繁多，国家必须负担豪华的宫廷、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的开支。这些负担沉重地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这时候，居住在帝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又不时越境到农村进行抢劫，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国家经济衰退，城市衰落，民生困苦，人口下降，不堪捐税负担的贫民到处流亡，盗匪横行，这都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军队纪律松弛，一天天丧失战斗力。越来越多的军人出身的人到官僚机构里任职。军官拥有实力，权势日重，高级将领为了争夺帝位互相混战。近卫军和外省兵团出于多分粮饷和其他的利益要求，往往自立皇帝，而贪图帝位的将领也往往以多发粮饷作为拉拢军队的手段。从 235 年起，五十年间，先后登位者有二十余人，大多数是将领，有时一年之内要换四个皇帝。一个人被某些军团拥立，另一部分军团往往另立他人，因此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死于非命，局面一片混乱，更增加了工商业的凋敝和经济的衰退。

帝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动乱使得劳动人民难以度日，人民起义连续爆发。三世纪时，在非洲发生了奴隶、隶农起义，牧人起义；在高卢发生了巴高达运动，参加者主要是奴隶、隶农、贫民。他们有良好的军队，农民当步兵，牧人当骑兵。他们杀死豪门贵族，分掉其土地和财物，占领广大地区，并且选出自己的领袖，宣布脱离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统治 284 年，近卫军首领戴克里先当了皇帝，他暂时巩固了边防，镇压了高卢和非洲的起义，因而受到大土地所有者和贵族的支持。他建立起专制极力，把元首的称号正式改为君主。为了加强统治，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把整个帝国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个统治者分别管理。他进一步增加军团数目，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分别用于防御外族入侵和镇压人民起义。他实行新的税制，农村居民要交人头税和土地税，城市居民要交人头税。为了保证税源，他禁止农业劳动人手脱离本业，奴隶、隶农、自由农民不得离开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禁止手工业者离职改行。官吏也不能离开其职务。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帝国表面上暂时相对稳定，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挽救垂死的奴隶制度。305 年戴克里先因病退位，将领们经过一番争夺，最后君士坦丁当了皇帝（306—337 年）。

君士坦丁废除了四个统治者分别管理的制度，扩充了官僚机构。当时帝国西部历经战乱，日益走向衰落，东部比较富裕，文化比较发达，又便于对东方领土进行控制，他在希腊旧城拜占廷建立新都，定名为君士坦丁堡，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25 页。

巴高达是高卢语“战士”的意思。

都于此。他极力维护奴隶制度，重申主人有权处死奴隶，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着在土地上，逃亡隶农必须加镣送回原主。他把隶农下降到类似奴隶的地位。

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徒信仰自由，发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教会有权接受赠产，教士免交赋税，免服劳役。君士坦丁采取承认基督教的政策，这是因为当时奴隶主的政权摇摇欲坠，需要利用基督教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关于消极忍受苦难、充当顺民的教义，正好迎合统治者的利益。而二、三百年来，基督教也在发生变化。富有的人以至皇族成员不断有人信教，有些基督教徒担任了一定的官职。教会上层逐渐成为权势集团。教会拥有巨额的财产，有自己的组织，它需要得到帝国的支持来谋求发展，因此它和奴隶主政权的结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从此以后，基督教会财富急剧增加，它继续接受了大量自皇帝到贵族以至其他信徒的赠产，成为拥有大片土地、财物、奴隶、隶农的社会力量。在政治上，基督教会也越来越取得更大的权势。

人民运动和外族入侵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并没有使帝国摆脱危机。从四世纪中期起，奴隶、隶农、贫民起义和日耳曼人的入侵以更加猛烈的声势从内部和外部冲击着帝国的统治，奴隶主的政权风雨飘摇。

帝国的专制统治和繁重赋税使广大劳动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不列颠、西班牙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在高卢，曾经遭到镇压的巴高达运动余焰复炽，规模更大，遍及整个高卢；在北非，兴起了阿哥尼斯特运动，参加者有农民、隶农、奴隶。他们洗劫大农庄，烧毁奴隶名单和债券。四十年代，运动达到高潮，绵延不绝。罗马统治者几次镇压，都不能加以扑灭。帝国经济凋敝，饥馑严重，烽火遍地。在人民运动的冲击下，它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

正当罗马帝国日益衰落的时候，散布在它北部疆界外的日耳曼人——罗马人轻蔑地称他们为“蛮族”——不断地侵犯罗马边境，成为对罗马帝国的强大威胁。

日耳曼人很早就散布在多瑙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他们分成几个部分，主要有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萨克森人，伦巴德人等。他们长期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公元一世纪末，日耳曼人已经相对定居下来，除了畜牧业以外，他们还从事农业，耕地定期分给各个家族使用。这时候，氏族公社制度已在开始解体。

此后，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来到罗马帝国境内，有的前来经商，有的作为战俘被安置在大农庄里劳动。

三世纪时候，日耳曼人已经形成许多部落联盟，其中比较强大的，有莱茵河流域的法兰克部落联盟、黑海北岸的东哥特部落联盟和西北岸的西哥特部落联盟。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他们经常侵袭罗马边境，来势迅猛，使正在衰落下去的罗马帝国陷入困境，而奴隶和隶农却把这些“蛮族”看成是自己摆脱奴役的解放者，群起欢迎，他们有的参加“蛮族”队伍，有的充当向导，配合日耳曼人并肩战斗。

四世纪后半期，亚洲的匈奴人进入欧洲，占领黑海北岸地区。东哥特人被匈奴人打败，被迫归附。西哥特人受到匈奴人的挤压进攻，就向罗马皇帝

“阿哥尼斯特”出自希腊语，是“战士”“斗士”的意思。

请求前来避难。罗马皇帝以西哥特人充当雇佣军为条件，答应拨给土地，供应粮食，允许他们入境。376年，一群群的西哥特人乘着船只、木筏、挖空的树干，连日连夜地南渡多瑙河，徙居到黑海以西一带。但是罗马方面没有实现诺言，一些贪官污吏非但没有供应粮食，反而乘机拐卖西哥特人充当奴隶，强迫他们为罗马人种地，许多西哥特人只好出卖子女来换取少量的食物。罗马人甚至想谋杀西哥特人的首领。西哥特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当地的奴隶和隶农纷纷投奔起义队伍，他们给西哥特人带路，同西哥特人并肩战斗。378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在阿德里亚堡展开决战，罗马军队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后来，罗马答应让西哥特人定居在色雷斯、马其顿等地，保证供给粮食和牲口，分给土地，这样，起义才暂时平息下去。

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西哥特人起义平息不久，罗马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帝国在395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仍然以罗马为都城，东罗马帝国建，删都在君士坦丁堡。这时候，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十分薄弱，主要依靠日耳曼人的雇佣军队来维持统治，军官也往往由日耳曼人的首领充任。

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分裂以后，西罗马帝国面临着规模空前的内忧外患。人民运动遍及各地，此伏彼起，日耳曼人象潮水一般地汹涌而来，两者汇合成为最后冲击西罗马帝国的洪流。五世纪初，西哥特人再度发动攻势，先洗劫了希腊，然后向西攻入意大利，奴隶和雇佣军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410年，西哥特人围攻罗马，城里的奴隶在夜间打开城门。这个被罗马人夸耀为“永恒城”的罗马就这样陷入“蛮族”之手。西哥特人洗劫罗马三天三夜，接着折向意大利南部，后来北上转入高卢南部和西班牙，419年，建立起西哥特王国。

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

就在西哥特人进攻意大利的时候，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也突破了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汪达尔人穿过高卢和西班牙，渡过海峡，攻入北非。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同渡海而来的汪达尔人结合起来，扫除了罗马的统治。439年，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在高卢，“巴高达”运动再度高涨，起义者到处攻占大农庄。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利用这个形势，顺利地进入高卢。457年，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部建立勃艮第王国。

到五世纪中期，西罗马帝国的行省已经大部丧失，先后被日耳曼人占有。在意大利，西罗马的中央政权操纵在日耳曼雇佣军将领手里，皇帝也由他们随意废立。476年，日耳曼雇佣军的将领奥多亚克废除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西罗马帝国在奴隶起义和日耳曼人的打击下灭亡了，西欧的奴隶占有制度也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复灭而崩溃了。

西部帝国皇帝害怕西哥特人，五世纪初驻蹕于拉文纳，后因罗马残破不堪，迁都于此。

488年，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493年，奥多亚克被害，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一带建立东哥特王国。

第四节 罗马文化

罗马文化是在古代东方文化、伊达拉里亚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罗马文化进入兴盛时期，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

文学 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是著名诗人，代表作品为《伊尼特》，体裁模仿《荷马史诗》，叙述特洛伊的神话英雄伊尼斯在该城陷落后逃走，经过迦太基、西西里，漂流到意大利的经历。他把伊尼斯描写为牧羊人和女神所生，他的后裔就是罗马的建立者，以此歌颂恺撒和屋大维所出身的家族，颂扬屋大维是神的后代。诗人贺拉西(公元前65—8年)著有《颂歌》，歌颂农村优美舒适的生活，美化屋大维的统治。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的代表作品是以各种神话为主题的《变形记》。

史学 古代罗马留下比较多的史学著作。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120年)，著有《通史》四十卷，综述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146年希腊、罗马和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历史，但保留下来的主要只有前五卷。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著有《罗马史》一百四十二卷，叙述罗马城的建立、罗马的对外侵略直到公元前9年的历史，现仅存三十五卷。恺撒著有《高卢战记》七卷，除记载军事行动外，还描述了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塔西佗(约55—120年)，著有《年代记》，记公元14—68年的历史，另著《历史》，记公元69—96年的历史，这两部著作都已残缺；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描述日耳曼人的晚期氏族公社生活，和恺撒的《高卢战记》都是有关日耳曼人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普鲁塔克(约46—120年)著有《传记集》，列入希腊、罗马的著名人物，收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阿庇安(公元二世纪)著有《罗马史》，记载自王政时代到二世纪初的罗马历史。该书也已残缺。

哲学 唯物论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55年)著有《论物性》，这是流传至今的系统阐述古代原子论的唯一著作。他认为，一切物体都是原子组成的，原子不能创造，不能消灭；它们具有一定的形式、重量，永恒地运动着，并且按一定的形式结合成万物。他还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其中有无数世界在形成、发展和消灭。

科学 罗马人留下了几部农业著作，主要有加图(公元前234—149年)的《农业志》、瓦罗(公元前116—27年)的《论农业》和科路美拉(公元一世纪)的《农业论》。这些著作既是农业技术和经验的综述，也是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的资料。

罗马科学承袭希腊人的成就。著名的数学、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约90—168年)出生于埃及的一个希腊化的城市。他在亚历山大城观察天象，将古代天文知识加以总结。他主张地心体系，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不动，日月星辰都环绕地球运转。他的主要著作有《天文学大成》，一直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学说成立之后，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论点才被推翻。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盖伦(约129—199年)是个著名医生，先后在小亚细亚和罗马行医，著有大量论文，现存的医学论文即有八十余篇之多。他认为研究和治疗疾病应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基础，曾经亲自解剖猴子等动物。他通过实地观察，丰富了关于动脉功能、大脑、脊髓、脉搏等方面的知识。他创立了医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的体系，为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

发展奠立了基础。他的著作长期被医学界视为权威。

科学家普林尼（23—79年）学识渊博，留下来的著作有《自然史》三十七卷，包括天文、地理、生物、矿物、冶金、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他相信地圆说。他在海边观察，看到船只驶近时总是先见桅尖，后见船身，他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地球表面呈圆弯形。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他前往救援和考察，中毒窒息而死。

中世纪篇

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一些国家走出了奴隶社会，踏上了高一级的阶段——封建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地通向封建社会的途径有各自的特点，各地的封建社会也有各自的面貌，但是在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共同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基础上，封建主奴役和剥削处于从属地位的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但是不能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除封建所有制以外，封建社会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中国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进入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闪耀着光辉。大约一千年以后，西欧才在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的丧钟声里揭开封建时代的序幕。在世界范围内封建社会形成和上升时期，中国一直走在前列。在西欧，法兰克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封建化过程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西欧封建国家的形成

法兰克王国的建立 法兰克人原来住在莱茵河下游，分成几个部落，后来逐渐向南扩张。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他们已经散布到高卢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五世纪晚期，法兰克人的一个部落首领克洛维（481—511年在位）联合其他法兰克人部落首领，大举进攻，扩大占领地区，486年左右，他最后清除了西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势力。以后，他集中力量对付高卢的日耳曼人，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克洛维是一个有才能的部落首领，但是他凶狠、残暴，在战争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有一次，克洛维的军队抢到一批战利品，其中有属于教堂的一只珍贵的广口瓶。主教派人来向他要求收回这只瓶子，当战士们在苏瓦松分配战利品的时候，克洛维就要求战士们把瓶子让给他。但是按照部落习惯，军事首领只能用抽签的方法同普通战士分享战利品。这时，一个战士举起战斧，把瓶子打碎，说道：“除了你自己抽中的那份东西以外，这只瓶子你一点也拿不到手。”克洛维默不作声。第二年，在检阅军队的时候，克洛维走到那个战士面前，故意责备他武器保管得不好，随即举起战斧，猛然劈开他的头颅，说道：“你在苏瓦松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瓶子的。”在场的战士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吭声。这表明，克洛维掌握的已经不只是原来部落首领的权力，它已经大大地增强了。

那时候，基督教会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对人民实行着精神统治。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克洛维在496年率领三千亲兵皈依基督教。从此以后，他和教会联合起来，当时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教派已经流传到其他日耳曼人中间，它同罗马教会在教义上存在分歧，被教会视为“异端”，克洛维往往以此为借口去征讨他们。教会大力支持，称赞他的侵略行动是符合上帝意图的“可喜”行为。

六世纪初，法兰克人已经征服了大部分高卢。克洛维用阴狠的手段翦除其他法兰克部落首领，建立了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奠定了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统治。

克洛维的子孙继续扩张领土，勃艮第王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莱茵河以东的图林根等地区，都并入法兰克的版图。

法兰克王国走向封建化 征服高卢前夕，法兰克人生活在氏族公社里，还不知道土地私有。长期的出征，不断的迁移，使原来的氏族组织互相混合。定居在新征服土地上的法兰克人，不再按照血缘关系结合成氏族公社，他们按照居住地域组成农村公社。农村公社起初实行土地公有，耕地分给各家世代使用，但是不能自由转让。六世纪末，耕地逐渐成为可以转让的私产，只有牧场、树林和河塘归公社成员共同使用。那时候，自由农民的农村公社是法兰克社会的基层组织。

在新征服的土地上，除了建立起农村公社以外，原来属于西罗马皇室的巨大地产，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土地，都被法兰克国王占为私有。国王把一部分土地赏赐给自己的亲兵和官吏。这些人继承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大地产，沿

在巴黎东北。

亲兵是向军事首领或国王宣誓效忠，专门跟随他们从事作战和掠夺的人。

用原来那种剥削方式，他们在占有的地产上剥削隶农和残存的奴隶劳动。这样，在法兰克人中间出现了大土地私有制。

法兰克国王还把土地赏赐给基督教会。原来在高卢的不少罗马大地所有者也保留了下来。他们和法兰克上层人物逐渐合流。这些新兴的法兰克贵族和旧有的高卢—罗马贵族共同成为法兰克王国的统治阶级。

克洛维以后，法兰克王国的土地所有制继续发生变化。克洛维的子孙连年混战，捐税繁多。农民负担兵役长期出征，贻误农时。军队沿途焚烧抢劫，弄得土地荒芜，长年歉收，威胁着农村公社里广大农民的生存。既然这时土地已经可以转让，大土地所有者就乘人之危，把贫苦农民的土地兼并到自己的手里。教会也利用宗教迷信或伪造文件等欺骗手段，把农民的土地攫取过来。许多农民不堪官吏和豪强的勒索压迫，不得不把土地“献给”附近的贵族或教会，请求给予“庇护”，并且以交地租和服劳役为条件，再请求把那块土地“发给”自己耕种。这种做法叫做“委身式”，从此，农民变成教俗贵族的“人”，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依附于主人、固着在土地上、受主人剥削奴役的农奴。同时，原来的隶农和残存下来的奴隶也逐渐转化成农奴。

法兰克的自由农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随着大地产的不断增长，自由农民却一天天减少，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八世纪中期，法兰克国家推行一种采邑制度。国王不再无条件地赏赐土地，而是把土地作为采邑，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分封给亲近的贵族。受封的贵族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打仗的时候，他要率领部下，骑着自备的战马，带着自备的武器，听候调遣。采邑不得世袭，受封者如果不履行兵役，即须归还采邑。由于农民是随同土地一起被分封的，因此随着采邑制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推向农奴的境地。

查理曼帝国 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被他的四个儿子瓜分。以后，他的子孙分据各地为王，能作全王国国王的并不多。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沉溺安乐，无所作为，大权逐渐落到宫相手里。751年宫相丕平（即矮子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加洛林王朝取代了墨洛温王朝。继承丕平的查理是法兰克国家最著名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768—814年），国势空前强盛。他在位四十六年，发动了五十多次战争。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奴役更多的农民，即位不久，他就进攻住在莱茵河下游和易北河之间的一支日耳曼人——萨克森人。萨克森人英勇抵抗，顽强地保卫自己的自由。查理虽然几次打败萨克森人，但是法兰克部队刚一撤走，那里就又爆发新的起义。为了粉碎萨克森人的反抗，查理兼用暴力镇压和宗教的手段，一面残酷烧杀，实行严刑峻法，一面强行推行基督教，对拒不接受基督教，闯入教堂抢劫或行窃者，处以死刑。这样断断续续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772—804年），查理才征服萨克森人。

查理铜像

萨克森人被迫接受洗礼见图版(14)

在萨克森战争期间，查理还征服伦巴德王国，把意大利北部并入版图。

后来这项规定逐渐松弛，九世纪后半期，采邑事实上变成了世袭领地。

伦巴德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555年，东哥特王国被东罗马所灭，568年，伦巴德人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伦

他又两次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军西班牙，夺取了西班牙东北部的一片土地。向东，他的势力扩张到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经过一连串战争，法兰克王国的版图西南达到西班牙的厄布罗河，北邻北海，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的大片土地，幅员广阔，盛极一时。800年，罗马教皇授予查理“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借以象征他继承了西欧的罗马帝国。历史上因此称查理为查理曼，意思是查理大帝。他统治的国家被称为查理曼帝国或查理大帝帝国，首都亚琛。

教皇为查理加冕见图版(15)

查理把战争中所夺取的土地大部分分给亲兵和臣属，采邑制度也在日渐推广，加上豪强贵族和教会的掠夺，到九世纪，组成法兰克农村公社的自由农民几乎已经消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查理曼帝国是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不具备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各地区缺乏经济联系，庄园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城市和商业不发达，都成了帝国分裂的因素。查理死后，帝位由儿子路易(814—840年)继承。这时大封建主势力强大，不再服从统治。路易的儿子们彼此争权夺地，对父亲发动了战争，随后他们相互间又挑起混战。路易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于843年在凡尔登缔结条约，把帝国分割为三部分，大体说来，查理(绰号秃头查理)得到些耳德河、索恩河和罗讷河以西的土地，这就是西法兰克王国；路易(绰号日耳曼人路易)得到莱茵河以东的土地，这就是东法兰克王国；长子罗退耳得到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的地带和在意大利的领土，并且承袭皇帝称号。这三部分是后来西欧的三个主要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雏形。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加洛林王朝的政权在十世纪初即已丧失；在法兰西保持到了十世纪末。当时，欧洲封建割据盛极一时，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公在各地称王称霸。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英吉利王国的形成 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不列颠岛上，很早就有人在那里生活。公元一世纪中期，罗马军队侵入不列颠。罗马在这里派驻军团，修筑碉堡，统治当地人民。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年在位)亲自到过不列颠，在英格兰北部修筑起一道横贯全岛的防御长城，它的遗迹今天依然可见。罗马所控制的地方包括不列颠岛的南部和中部，它的势力一直维持到五世纪初。到那时候，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罗马为了保卫帝国边境，只好逐渐撤回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五世纪中期，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萨克逊、朱特等部落渡海来到不列颠，但是他们遇到当地居民的猛烈反抗。经过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他们才征服了不列颠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盎格鲁·萨克逊人等来到不列颠后，建立起许多小王国，各王国不断战争，互相兼并，七世纪初，合并为七个小王国，历史上称为“七国时代”。大约在这同时，罗马基督教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等日耳曼人中间扎下了根。

罗马在不列颠所筑的长城遗址

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盎格鲁·萨克逊人等在征服和国家形成

巴德王国。

合称盎格鲁·萨克逊人。

的过程中，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农村公社代之而起。封建制度在各个王国逐渐形成起来。

八世纪末，诺曼人的一支丹麦人入侵不列颠岛，在抵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七国中的威塞克斯在九世纪早期把各王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英吉利王国。在后来抵抗丹麦人的斗争中，英王阿尔弗烈德（871—899年）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诺曼人的入侵 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今天的丹麦一带，居住着诺曼人。八、九世纪时，他们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主要过着捕鱼和打猎的生活。诺曼人善于造船和航海，他们常常乘着船头饰有木龙的大木船，在军事首领的率领下，成群结队地扬帆出航，有时飘洋过海，有时溯流而上，到其他地方去从事贸易活动，用本地出产的干鱼和毛皮换取粮食、葡萄酒和武器，或者去进行海盗式的掠夺。他们经常侵袭不列颠、爱尔兰、法兰西等地方，甚至到伦敦和巴黎骚扰抢劫。886年，他们围困巴黎达八个月之久。

诺曼人的船

诺曼人迁入西欧的一些地区，逐渐在那里定居下来。九世纪初，诺曼人在英格兰东北部建立丹麦区。十世纪初，西法兰克国王迫不得已把西北部的一片地方让给了诺曼人，诺曼人的首领作为国王的臣属，以公爵的身分领有其地。这块地方因此得名为诺曼底，这就是诺曼底公国的由来。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英国王位，带兵渡过海峡，侵入英国。哈斯丁斯附近一战，威廉击败了英王哈罗德的军队，随后进入伦敦，于同年12月登上了英国王位。他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征服者威廉。此后，诺曼人大量涌入，成为英国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世纪初，诺曼人由海路进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十二世纪在这里建立两西西里王国。诺曼人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之后，逐渐地与当地居民融合。

意即北方人。

到十世纪初，诺曼人丧失了对丹麦区的控制。

第二节 西欧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开始确立 由于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九世纪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开始在西欧确立。国王、贵族、教会上层人物掌握了土地所有权，也掌握了政治权力，他们构成封建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成为农奴，受封建主的剥削和奴役，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的被统治阶级。

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是农奴毕竟不同于奴隶，他们虽然没有人身自由，却有自己的简单的生产工具，有自己微薄的家业，因此他们对劳动有一些兴趣。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创造财富。

封建庄园和自然经济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建立起来，布满西欧各地，代替了原来的农村公社，成为社会的细胞。

庄园的全部土地属于封建主。田地通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封建主的自用地，由封建主的管家监督农奴在上面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封建主所有；一部分是农奴的份地，由封建主派给各个农奴家庭使用。两种田地各不相连成片，都分成许多小条，分别作为领主自用地和农奴份地，互相错开。因此一个农奴的份地分散在庄园的不同地段，农奴往返耕种要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耕地一般实行三区轮耕制，那就是将耕地分为三大部分，每年轮流用于春播、秋播和休闲。农奴在土地上播种什么，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变动。除了耕地以外，还有树林，用来提供木料和柴薪；有池塘，用来养鱼；有草地，用来放牧牲畜。庄稼收割以后的土地或休耕地，也可以用来放牧。

西欧典型的封建庄园

庄园里还设有制造武器、农具、马鞍、织物等的各种作坊，在里面劳动的都是农奴。

庄园里需要的一切，从封建主的生活享用到农奴家庭的粮食、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几乎都由本庄园的农奴生产。只有本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从东方国家运来供给封建主的少数精良武器，香料、丝绸和珠宝一类的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那里购买。那时候，农业生产的效率很低。手工业同农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也很不发展，因此农奴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可以向外面出卖。这种自给自足，很少商品交换的经济叫做自然经济，它使封建庄园成为各自孤立的、闭塞的小圈子。

封建主的堡垒

封建主和农奴 大封建主拥有好多个庄园。庄园里矗立着封建主的宅邸。大封建主的庄园往往建有堡垒。堡垒通常修筑在天然的山岩或人工堆成的土岗上，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墙外面环绕着宽阔的壕沟，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入堡垒。堡垒的高处是堡楼，这是利于防御的建筑物，封建主和家属就住在堡楼或其他精美舒适的住所里。堡垒里有仓库，里面堆着粮食和武器；也有阴森森的地牢，里面关着敢于反抗的农奴。封建主混战时抓到的俘虏，也扣押在那里，等待别人来赎。封建主借深沟高垒保卫自己，也从那里出来抢劫。

封建主的庄园往往散处各地，当时交通运输非常不便，封建主就带着家

属和随从人员经常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就地享用庄园里的产品。

骑士比武见图版(16)

封建主大都是文盲，他们粗野无知，鄙视生产劳动，认为做一个骑马的武士——骑士是莫大的光荣。骑士非常爱好比武和打猎，常常身披铠甲，头戴重盔，颈挂盾牌，手持长矛或剑，耀武扬威，在观众的面前骑在马上比武，优胜者获得奖赏。封建主还到田野里打猎，放肆地践踏庄稼。遇到真正的战争，他们却往往乱不成军。

骑士出去打猎

农奴住在矮小、黑暗、烟尘扑面的茅屋里。这些茅屋一般是用木条和烂泥修成的，屋顶上覆盖着茅草。屋里陈设简陋，一家人都挤在一张床上，甚至牲畜也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农奴劳动

封建主和农民的生活对比见图版(17)

农民在封建主的城堡外劳动见图版(18)

法律禁止农奴自由离开所耕种的土地。农奴每星期要抽出大约三天的时间，用自备的农具和耕畜，在封建主管家的监视下，无代价地替封建主耕种或收割。农忙季节，还要增加服劳役的天数。他们还必须替封建主砍伐树木，建造城堡，修桥，筑路，磨面，酿酒，或者服其他的劳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把自己份地上或者家庭里的一部分产品，例如谷物、家禽、蛋、葡萄酒、蜂蜜、鱼、织物等交给封建主。农奴磨麦，榨油，烤面包，榨葡萄，规定必须使用庄园里的水磨、榨油器、烘炉和榨酒器，因此又要向封建主交税。农奴结婚，继承遗产，摆渡，过桥也要交税。甚至过去属于全公社所有的牧场、树林、池塘，也被封建主所占有，农奴交税才能使用。封建主还有权在农奴的份地上打猎，不许农奴捕杀伤害他们的庄稼的猎物，违者处以重刑。对教会，农奴另外要拿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左右交纳，叫做什一税。这样，农民终年操劳，可是一年到头只能以粥、黑面包、干酪和品种不多的蔬菜为主要食物，很少能吃到肉。他们日子穷苦，生活单调，长年被禁闭在狭隘的小天地里。

封建主用暴力保证经济剥削，他们掌握着武器和法庭。封建主如果认为农奴没有为他好好种地，或者违反了庄园的规矩，就有权在庄园法庭里审判他。法庭由封建主本人或是他的管事主持。封建主对农奴可以课以罚金，可以没收财产，这笔钱照例归封建主所有。因此封建主的法庭不仅是压制农奴的工具，也是增加收入的手段。

从封建制度形成的时候起，农奴就不断反抗封建主的压迫。农奴逃亡是经常的事情。有的农奴出没在森林里，伺机袭击封建主。英吉利民歌中深受人们喜爱的豪侠罗宾汉，就是传说中的敢于反抗权贵、专门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绿林英雄。有时候，农奴反抗封建主的斗争爆发为武装起义。

封建金字塔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封建主的内部形成了一套等级制度。国王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较小的封建主，较小的封建主又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下面的封建主。国王和每一个封建主又各自分封一批骑士，作为自己的战斗队伍。这样层层受封，形成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不同等级的封建主，等级越低，人数越多，

骑士为数最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别领有大小不等的封地，拥有数量不等的庄园、农奴和武装，他们组成一座以国王为首的金字塔，它沉重地压在广大农奴的身上。

在封建金字塔内部，每一层的上下级之间都是领主（封主）和附庸（封臣）的关系，彼此负有义务。领主要负责保护附庸，附庸要向领主宣誓效忠，他要自备武器和战马，随同领主临阵作战。遇到领主被俘需要赎金，或是遇到领主把自己的长子封为骑士，领主的长女婚嫁等情况，附庸都要为领主提供款项。这样，领主能够保持一支为自己作战的武装力量，附庸则得到领主的保护。但是每个领主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辖附庸的附庸，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西欧大陆封建社会的一条常规。而实际上，每一个封建主等于是一个小国君，他们往往依仗自己的武装力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冲突，只要有一定的力量，附庸也常常反对自己的领主。广大的土地上长期混战不休，战火迷漫，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危害。因此西欧封建社会早期，政治混乱，文化落后，有人称之为“黑暗时代”。

基督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支柱 基督教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组织，它把自己势力所达到的地区划分成许多主教管区，四、五世纪，罗马主教逐渐加强地位，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他成为西欧教会的首脑，后来更自称为教皇。教会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拥有不少土地，加上法兰克诸王的大量施赠、虔信者的捐献和教会本身的巧取豪夺，它的土地迅速地扩大到西欧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成为一个大土地占有者。

教会派遣传教士到各地去传教，他们深入日耳曼各族。由于人们带有迷信思想，再加上国王们的支持，基督教信仰广泛地传播开来。

八世纪中期，法兰克国王进军意大利，把意大利中部包括罗马在内的地区交给教皇，这块地方成为教皇领地。从此在西欧出现了一个以教皇为首的封建国家——教皇国。

教会创设了许多修道院，借以扩大它的宗教影响。一批修道士在里面闭居隐修。他们从事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劳动，读经祈祷，抄录《圣经》和古代作家的著作，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有些古代作品因此保存下来，但是也有许多作品反而从羊皮纸（当时的书写材料）上被刮去，或是因为要在上面抄写《圣经》和适应教会需要的其他内容，或是因为某些内容不合教义，以致使一些著作被毁。

修道士在抄书

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土地。查理曼在位时，巴黎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地产广布四周，上面住着二千七百多户人家，德意志的一所修道院拥有一万五千处地产。此外，修道士的生产劳动，如开垦、耕种、经营葡萄园等，又给修道院带来巨大收益。修道院筑起大城堡，深沟高垒，十分森严。

教会财富迅速增加，教会也越来越腐化。上层人物大都过着穷奢极欲的

主教为该管区的首脑，掌握宗教事务，包括宗教审判和教会财政。

当时法兰克国王是丕平（751—768年在位），即查理的父亲。他由教皇加冕为国王，取代了克洛维的后裔。为了酬答教皇，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向伦巴德人作战，并把夺取到的包括拉文纳和罗马在内的地区交给教皇。

生活，他们酗酒、荒淫、赌博、打猎，从事投机买卖。有人看到担任神职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地谋求教会职务，甚至出高价购买。为了抢夺位置，他们彼此排挤，互相攻击，甚至斗殴，造成伤亡。

教会模仿封建等级制度，也逐渐建立起一套教阶制度。教皇之下有大主教、主教、神父（神甫）等。他们各有辖区，分别管辖城乡居民。教会通过它的各级组织和神职人员的活动，对人们维持着精神统治。当时人们大都不识字，教会垄断了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只有教会有权解释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教士通过读经讲道，向人们灌输迷信思想，宣传虔诚、禁欲、恭顺、服从，这样死后就能升入天堂。凡一切背离教会的说教，不合乎罗马教廷正统教义的思想，都被教会斥为“异端”，而在教会看来，一切罪恶莫过于此。十三世纪，教会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严刑秘密审讯“异端”论者。被审问者一经判罪，就被处以罚款、监禁，或者在火刑柱上烧死。

这样，基督教会成为欧洲强大的封建势力。它和封建国家勾结起来，共同维护封建制度。

第三节 东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堡 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在历史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这部分最富庶和文明的地区归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首都君士坦丁堡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原来的拜占廷扩建而成的城市，因此东罗马帝国在欧洲历史上通称拜占廷帝国。它的版图主要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上游、叙利亚、巴勒斯坦、爱琴海诸岛、北非东部一带。在东罗马的农业生产中，隶农制比较普遍，奴隶劳动不占主要地位，国内还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因此东罗马并没有经受象西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危机。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当西方的城市走向没落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却比较稳定，一些大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都很繁荣。

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海，形势险要，便于据守。城市周围建有城墙，西面城防坚固，墙上堡垒林立，墙外护以深沟，形成一道牢固的屏障。它又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因此它不但是东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心，又是工商业的中心，在东西方经济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它的港口里，商船密集。帝国境内的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呢绒刺绣等远销海外。丝绸、香料、象牙、地毯及其他奢侈品也源源从中国、东南亚、印度、波斯等地运到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堡以丝织品、玻璃制品、武器等产品著称，被称为“奢侈品的大作坊”。帝国的其他城市里也有许多作坊。

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两旁，矗立着华丽的宫殿、教堂，还有图书馆、学校、戏院、公共浴场等建筑物。在巨大的竞技场里上演精彩的节目，观众非常欣赏套着四匹马的车子竞赛。

皇帝和劳动人民 东罗马皇帝掌握着专制权力，除享有世俗权力外，还控制东部的教会。皇帝住在奢侈豪华的皇宫里，仆役簇拥侍候。大臣朝见皇帝必须下跪。宫廷里实行一套繁琐的仪节，以显示皇帝的威风。

帝国维持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拥有大批的雇佣军，用来保卫边境，进行对外侵略，镇压人民起义。

东罗马帝国浩繁的宫廷费用，巨额的行政、军费开支以及修建用款，都落在居民身上。繁荣的工商业给帝国带来大量的税收，政府又独占粮食买卖，经营武器制造，开采矿藏，聚敛了大笔财富。除工商业税收以外，土地税是一笔巨大收入。五世纪前后，东罗马的奴隶占有制度没有达到西罗马那样的规模，奴隶也分得一些农具和一小块份地，有自己的家室，其地位和隶农很接近。隶农制却比西罗马普遍。隶农使用土地，必须交纳收获物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把实物运到国家仓库，这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为了把粮食转运到帝国的港口，隶农长途跋涉，疲劳不堪，许多妇女儿童死在路上。

东罗马农村里还有许多自由的小农。他们以连环保的方式结成公社，向国家纳税和提供劳役。由于捐税和劳役的负担沉重，有的农民不得不把土地转让给有势力的人物以求庇护，自己丧失人身自由，成为处于依附地位的佃农。

查士丁尼的统治 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时期，东罗马帝国一度呈现强盛的景象。为了巩固对奴隶和隶农的统治，他即位不久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编纂历代皇帝的诏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删除其中业已失效或互相矛盾的部分。529年编纂工作完成，产生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

共十卷。以后编成《法理汇要》，包括历代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法学总纲》，简要说明法学原理；《法令新编》，汇集 534 年以后查士丁尼颁布的法令；这四部分合称《民法大全》。法典保护奴隶主的利益，大肆美化君权神授，宣扬皇帝直接得到“天惠”，“没有东西比皇帝陛下更高贵和更神圣”，不服从皇帝者应受严惩；君主的首要任务则是“确立信仰，使全体人民敬拜唯一的天主”。法典强调奴隶和隶农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人，服从“命运”，对逃亡的奴隶、隶农严加惩治。由于奴隶制度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法令新编》又允许释放奴隶，而隶农却必须固着在土地上。《查士丁尼法典》是历代罗马法的总结，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对以后欧洲的立法有很大影响。

查士丁尼总在梦想恢复统一的罗马帝国，他一面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一面扩充军备，准备消灭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日耳曼人的国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向西方进军，查士丁尼向多年与之交战的波斯国王交纳了大量的黄金，双方媾和。533 年，他派大将贝利撒留率领步兵一万人、骑兵六千人远征北非，利用汪达尔王国统治阶级的内讧和当地居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于 534 年消灭了汪达尔王国。汪达尔国王被押解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举行凯旋式，为贝利撒留庆功。535 年，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登陆，占领该岛之后，第二年进军意大利，年底占领罗马。540 年，东罗马军队占领东哥特王国首都拉文纳。东哥特人继续抵抗，经过反复争夺，直到 555 年，东哥特才被东罗马大将纳尔塞斯所破，国家灭亡。东哥特国王也被押解到君士坦丁堡。

查士丁尼的对外侵略

意大利战事进行期间，东罗马军队又侵入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由于遇到坚决抵抗，只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另外还占领了科西嘉、撒丁等岛屿。这样，东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上游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差不多变成了它的内湖。查士丁尼统治末年，东罗马帝国一时似乎“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声势。

在侵略战争中，东罗马军队到处烧杀抢掠，北非和意大利长年战火不熄，满目荒凉，蔓延着饥馑和瘟疫。罗马城被反复争夺五次，许多建筑物化为废墟，居民减少了十分之九。查士丁尼到处复辟奴隶制度，他在 554 年颁布“国务诏书”，恢复旧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恢复罗马贵族的财产和特权；凡已擅自离开原来土地的隶农要追回，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仍旧归属原主。查士丁尼无情搜括意大利的珍宝财富，重税盘剥居民，更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苦难。

查士丁尼所取得的这些战果表面上虽然威震一时，却给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也消耗了东罗马的人力物力。查士丁尼不但未能完全恢复原来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在所占领的地区，也不能维持巩固的统治。尤其是当查士丁尼全力注视着西方的时候，却忽略了东方的边防。东罗马军队西征期间，波斯方面撕毁和约，入侵叙利亚和亚美尼亚，造成很大破坏。565 年，查士丁尼在内外交困中死去。568 年，伦巴德人侵入意大利北部，在这里建立伦巴德王国。接着，西哥特人又陆续恢复了被东罗马所占领的西班牙南部的土地。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奴隶、隶农和农民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原来住在多瑙河以北的斯拉夫人又大量地南下进入巴尔干半岛，逐渐散布到广大的地区，定居下来。奴隶、隶农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以及斯拉夫人的

入侵沉重地打击了东罗马帝国。许多奴隶制庄园被摧毁，奴隶主贵族有的被杀，有的逃走，剩下的也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形式，采用出租土地的方式来经营大地产。斯拉夫人建立起自由农民公社。这一切使东罗马的社会发生变化，为封建制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七世纪开始，封建制度逐渐发展，到十一世纪末确立起来。查士丁尼所梦想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一去不返。

东罗马文化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东罗马帝国没有遭到破坏，它的商业和手工业保持繁荣不衰，文化也远远超过当时西欧的水平。东罗马有许多文化发达的古代城市，如雅典、亚历山大、安条克等。在这些城市里，许多珍贵的古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保存下来。除了古代希腊、罗马色彩以外，东罗马文化的宗教色彩也很浓厚。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见图版(19)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花了五年时间修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今天依然矗立在伊斯坦布尔，它是建筑艺术的结晶。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穹顶，直径约三十一米，高出地面约五十六米，支架在

少年和驴（宫廷地面镶嵌画）四座大型拱门之上，穹顶底部是四十个大玻璃窗。教堂内部宽敞明亮，旁边是上下双层大理石圆柱，壁面上装饰着用精美的细大理石和彩色玻璃制成的镶嵌画面，图景逼真，宏伟壮观，使访问者赞美不止。它的建筑风格对以后欧洲的教堂建筑有很大的影响。整个教堂以及公共场所的大量雕像，用金属和宝石制成的杯、瓶和精美的装饰品，使东罗马艺术工匠们的精工巧技驰名于世。

在东罗马的学校里学习古代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著作。学者们认真地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科学、文学、哲学知识。历史学家普洛科比曾以秘书身分随同贝利撒留出征，著有《战争史》和《秘史》等书，前者记述查士丁尼对波斯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的战争，后者主要描写宫廷见闻，并且反映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批评查士丁尼政府的政策。这些著作是东罗马历史的珍贵资料。

东西教会的分裂 基督教兴起于罗马帝国的东部，当初的经文用希腊文写成，信徒用希腊语举行宗教仪式。后来基督教传播到欧洲，被罗马皇帝定为国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帝国两大部分在政治上各自为政，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在宗教上也反映出分歧。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长期争权夺利。九至十世纪，罗马教会向西北欧和中欧扩张势力，君士坦丁堡教会也向东南欧和基辅公国扩充力量，它的传教活动遭到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的罗马教皇的反对。九世纪中，双方为了信仰原则问题发生争执，而在它的背后，却是政治势力之争。六十年代，在君士坦丁堡出现了两派争夺大主教席位的问题。863年，教皇尼古拉一世出面干涉，宣布将新上台的大主教革除神职，后者置之不理。同时，由于教皇利用德意志传教士向保加利亚扩张势力，更激起后者的不满。867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宣布将尼古拉一世

革除教籍，谴责他对东方教会事务进行干涉为不合法。这些事件扩大了双方之间的裂痕。后来东西方的教会虽然表面上恢复了和平关系，但是矛盾却在不断加深。

十一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迈克尔·凯鲁拉里和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又因争夺意大利南部的教会权力发生矛盾。1054年，双方互相革除教籍。从此以后，东西部教会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正教”（即东正教），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称为“公教”（即天主教）。

第四节 西欧城市的重新兴起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里，西欧的生产和文化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在城市里还有商业活动，地中海沿岸的地方如马赛和意大利等地仍旧与海外维持着贸易关系，但是一般说来，罗马帝国旧有的城市一天天地没落下去。到了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西班牙以后，他们逐渐控制了地中海，垄断商业，使高卢的贸易活动受到阻碍。随着封建制度在西欧的形成，自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在西欧一个个闭塞的庄园里，农奴同时生产粮食和日用必需品，很少人专门从事手工业，也很少把产品拿到庄园外去交易。城市主要作为设防地点，或者作为封建主或主教的驻地而存在。除了高卢北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和南部的一些地方与海外保持着贸易活动，阿拉伯统治下的西班牙有繁荣的城市以外，西欧城市已经不是工商业活动的中心了。

西欧城市的重新兴起 农奴以艰苦的劳动缓慢地推动了西欧的农业生产。十到十一世纪，西欧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圃制，特别是三圃制，已经代替烧荒和歇荒休耕的原始耕作方法。人们逐渐懂得施用粪肥提高地力，广泛使用铁犁深耕土地，起先用公牛拉犁，后来用马拉犁，而且给马钉上铁掌，使它便于在夹有石块的泥土上行走。由于人口增加，需要增多，人们砍倒树木，排干沼泽，筑起堤坝，把林地和沼泽开辟为良田或果园。封建主往往驱使农奴去开垦属于自己的荒地。这样，耕地的面积扩大了，谷物和鲜果增产了，庄园里积聚起剩余的农产品。各地、各庄园之间的交换不仅需要，而且可能。

农奴也逐渐改善了手工业技术。采矿，熔炼、金属和木料加工等技术不断改进。随着农产品的增多，庄园里开始有一些农奴专门从事手工业，成为有熟练手艺的铁匠、木匠、武器匠、皮革匠、织呢匠、陶工等等。他们的身份还是农奴，他们不得不用手工业品向封建主交租。后来他们接受了外来的定货，定货多了，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希望摆脱封建庄园对他们的限制，独立经营生产。他们逃出庄园，在废弃了的罗马城市的旧址，在城堡或者教堂附近，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点，筑起围墙或者栅档，聚居起来进行生产。这些地方大多是设防的，比较安全，定居或往来的人口也比较多，容易销售制品。他们把手工业品卖给农村，买进农村的粮食和原料。手工业从庄园农业分离出来了。结果，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渐渐形成集市。世俗或教会封建主热衷于举办每周一、二次的集市，以便增加税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不断成长起来。

封建主看到城市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商品，又自认为有权向在自己的土地上兴起的城市征收货币租税，因此许多封建主招引从其他庄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到自己的土地上来操业。贪婪的封建主把城市看成自己的财源，但是他们对城市的热衷却有利于农奴脱离庄园，有利于城市的成长。

九到十一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首先活跃起来，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些城市对内对外贸易都很发达。十一、十二世纪，欧洲各地普遍重新兴起城市。法国的马赛和巴黎、英国的伦敦、德意志的科伦、捷克的布拉格都很著名。不少新的工商业中心是在罗马城市的旧址上成

二圃制把田地划分为两部分，轮流进行耕作和休闲。三圃制把农田划分为三部分，轮流进行春播、秋播和休闲。

长起来的，也有许多新兴城市。

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城市纽伦堡

城市的外貌 当时的城市规模都不大。多数城市不过几千人民有两万人的就算大城市。十四世纪的伦敦约有四万人口，巴黎约有六万人口，在当时都是很大的城市。城市都有城墙，城墙上高耸着守望塔。城墙以内街道交错。由于地面有限，街道都很狭窄，房屋的上层尽量向外延伸，街道两旁的房屋的房檐几乎相碰。只有一线阳光投到街上。但是城市里也有些巨大的公共建筑，如教堂、市政厅、行会会所等等。城市的街道布满商店和一个个小作坊。同行业的作坊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铜匠街、皮革匠街、首饰匠街等等。城中央是集市的场地，市场附近有教堂。很多手工业者兼顾农业，饲养家畜家禽。他们在城外或城内有自己的土地、菜园。每天早晨，城上吹起号角，城门打开，人们把猪、羊、奶牛、鹅等放到街上或者赶到城外去放牧。作坊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每逢集市，市场上摆开货摊，农村来的货车向那里集中，市声嘈杂喧嚷。傍晚，作坊里停止了劳动，市场寂静下来，各家把家畜家禽赶回去。城门紧闭，街口还锁上栅栏。夜间没有街灯，满城漆黑，没有什么人在门外走动。

行会 经济独立的手工业匠师置备工具，购买原料，开设作坊。作坊主亲自同家属和几个学徒、帮工一起劳动。学徒向作坊主交纳一定的款项，从师期间，由作坊主供给衣食住宿，一面学艺，一面为作坊主做家务。帮工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工作艰苦，也受作坊主的剥削。狭小的作坊和简单的手工工具长期很少变动，作坊主把这些财产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

行会会长鉴定学徒或帮工的技术

同一个城里不同行业的作坊主分别组成行会。行会禁止会员以外的手工业者在本城开设作坊或出售产品。行会规定作坊主可以留用的学徒和帮工的人数，规定学徒必须经过一定年限才可升为帮工，帮工必须工作几年，直到有了一定积蓄，并证明手艺纯熟时才可以独立开设作坊。行会对作坊设备、劳动时间、帮工收入、生产工序、产品规格等等都有规定，由选举产生的会长加以监督，处罚违反规定的会员。例如，巴黎的锁匠行会曾经把质量低劣的箱锁毁掉，面包师行会曾经把偷工减料的面包挂在告示牌上让同业嘲笑。行会的种种措施，目的在于防止外来的或者会员之间的竞争，保证本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行会征收会费，募集款项，用公积金接济困难的会员和会员家属。行会会员还组织自卫队，协力担任城市的防卫。

随着技术的发展，手工业的行业区分越来越细。在有些城市里，皮革制造部门的皮鞋匠、皮带匠、皮包匠各有各的行会；刀剑制造部门也有刀刃匠行会和刀柄匠行会。普通城市里的行会有几十个，十四世纪初，巴黎的行会多到三百个以上。

城市贵族 起初，手工业者自己销售产品，后来，商业成为独立的职业。商人在市场上活动，往往依靠投机发财。由于各国甚至各城市都铸造货币，货币十分庞杂，这样就产生了经管兑换货币的钱商。为了减少商人携带大宗金钱的麻烦和危险，钱商办起汇兑，接着又增加了存款和贷款业务，放高利贷成为钱商致富的重要手段。钱商里产生了银行家。他们在意大利各城市最早取得巨大的势力。

城市里还出现了依靠房地产收入过寄生生活的富人。一些骑士也住进了城市。富商、高利贷者、房地产主、骑士等不从事生产，但是有钱有势。这些上层分子构成城市贵族。

城市自治运动和城市内部的斗争 封建主认为城市居民是自己的农奴，不断地向城市居民勒索租税和徭役。城市越富庶，勒索也越苛重。他们甚至冲进城市，抢劫店铺。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欧洲城市展开了反抗封建主、争取自治的运动。

法国北部的琅城是一个富庶的城市，统治它的封建主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主教。琅城人民募集了金钱，赎买了自治权，建立了叫做公社的自治机构。主教很快就耗光了赎金，于是背弃诺言，取消琅城的自治权。1112年，琅城人民群众在“公社！公社！”的呼喊声里，冲进主教住宅，把他杀死，尸体扔到街上。法国国王和琅城附近的封建主派军队洗劫了城市，在城里恢复了封建统治，琅城人民继续斗争了十几年，终于赢得了自治。

通过同样的斗争，法国的康布雷、博韦、亚眠等不少城市建立了自治公社。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城市还控制了城郊的农村，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另外一些欧洲城市靠赎买获得了自治。城市居民也从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一个常例逐渐得到公认：农奴逃进城市住上一年零一天，就摆脱农奴身分。

城市争取自治的斗争依靠人民群众，首先依靠手工业者取得胜利，但是胜利以后，城市贵族利用财势独占了城市政权，反过来向手工业者征收重税。手工业者以行会为斗争组织，起来夺取城市政权。十三到十五世纪，行会斗争的浪潮冲击了欧洲各地的城市。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权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行会夺取政权以后，从各行会，主要是大行会的代表中选出了市议会，颁布了法规，规定凡未加入行会者，无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在德意志的科伦，行会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也掌握了政权。全城的行会结成二十二个团体，由它们选举市议会和议长来管理城市。行会斗争在不少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手工业不发达的城市遭到了失败。

手工业者的贫富分化扩大了。一些作坊主富裕起来，他们把持了行会，制订出种种规章，借以加强对学徒、帮工的剥削。他们随意延长学徒学艺的年限，在英国，学艺年限长达七年。他们加重帮工的劳动，压低帮工工资，特别阻挠帮工独立生产。帮工必须制造一件花钱多、难度大的“杰作”，证明手艺熟练，然后必须设盛宴招待行会会员，才能独立开设作坊，加入行会。许多帮工无法达到要求，因而成为长期雇佣工人，受大作坊主的剥削。十四、十五世纪，帮工结成兄弟会，实行互助，向大作坊主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他们常常罢工，在斗争中总是同城市里的短工、杂工和无业的流浪贫民联合起来。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在欧洲形成了中世纪的市民阶层。但是市民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已经看到，从市民中间，一方面分化出有钱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另一方面形成了大批的城市平民阶层，包括帮工、学徒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城市贫民。那些有钱的商人和银行家后来发展

市民 (Bürger) 一词由德文城市 (Burg) 一字而来，法语的中世纪市民、资产者 (Bourgeois) 也由此而来。随着市民的分化，不再把一般市民都称作 Bürger，而仅用来称呼富有的市民。“资产阶级”一词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为资产阶级。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又导致了新的剥削方式即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五节 十字军东侵

十字军东侵前夕的西欧社会 十一世纪末，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主向地中海东岸各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许多社会阶层都被卷入。战争断断续续历时约两个世纪，历史上叫做十字军东侵。

那时候，随着西欧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封建主对城市商品，特别是东方奢侈品的欲望越来越大，他们日益感到领地上的收入不能满足需要，那些小封建主尤其如此。当时西欧盛行长子继承制，封建主的遗产全部传给长子。在那些没有领地的封建主的子弟中，一代接着一代，产生了许多小骑士。他们无权继承地产，却继承了封建主愚昧、贪婪的习性。他们靠服军役和打劫商旅为生，有很多人又债务累累。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希望到东方去寻找新的富源，而东方的富庶正是成群结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和商人所目睹的。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支柱。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和基督教会分裂以后，罗马教皇时时梦想恢复大一统的宗教权威。九到十一世纪，他们积极参与或者赞助意大利城市和法国南部沿海地区抵制阿拉伯势力骚扰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然后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东方，等待时机控制东方的东正教，并且迫使那里的穆斯林改宗。

西欧城市，特别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比萨等，商业发达，势力日盛。它们在地中海西部在与阿拉伯人斗争占了一定优势之后，商人们就希望到地中海东部夺取港口，建立商站，排挤东罗马和阿拉伯商人的商业势力，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当时，西欧农民的处境在继续恶化。十一世纪，农民大部分已经沦为农奴。苛捐杂税繁重，封建混战仍在无休止地进行，伴随着饥荒和瘟疫。天灾人祸双重袭击下的农民渴望获得土地，摆脱贫困。

就在西欧封建社会出现这些矛盾的时候，教会找到了东侵的机会和借口。

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的兴起 七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穆斯林占有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他们同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信仰不同，如果后者纳税并且服从规定，仍旧可以住在巴勒斯坦，可以信自己的宗教。基督教徒朝拜他们的圣地很少遇到干涉。欧洲的商人一般仍能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

全盛时期的塞尔柱土耳其帝国

十一世纪，亚洲西部兴起了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塞尔柱土耳其人是突厥人的一支，原来住在中亚北部，过着游牧生活。1000年前后向西迁徙，接受伊斯兰教。几十年内，他们先后打败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和东罗马，占领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大部分小亚细亚。基督教的“圣地”、保存着据称是耶稣“圣墓”的耶路撒冷也落到他们的手里。一个从兴都库什山到地中海东岸的封建帝国建立起来。面对这支突起的对手，东罗马帝国节节失利，君士坦丁堡面临威胁，朝圣者也抱怨战争给旅行带来困难。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塞尔柱土耳其帝国恰好在1092年以后因内讧而分裂。东罗马皇帝趁机向

塞尔柱土耳其人即塞尔柱突厥人。英语土耳其（Turkey）的名称即由突厥一词音译转来。这支人在向锡尔河下游一带西迁时的首领叫塞尔柱，因此得名。

教皇求援，甚至表示愿意将东正教重新归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下，这正中教皇的下怀。

第一次十字军东侵 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召开宗教会议。教士、封建主、广大群众大批地聚集在城郊，听教皇的演说。教皇大肆渲染天主教的“东方兄弟”在“异教徒”手下所受到的迫害，用基督的名义号召发动战争，解放“圣墓”。他向可能战死的人许诺升入“天国”，同时赤裸裸地煽动听众去谋求现实的利益，他说东方国家“遍地是蜜和乳”，愁苦穷困的人到那里就能当富翁。顿时，封建主们如醉如狂，蠢蠢欲动，农民也信以为真地发动起来。人们把红色十字架缝在衣服上。就这样，不同阶层的人在宗教信念和不同动机的驱使下开始组织起十字军。

许多渴望改变贫困命运的农民匆匆集成“穷人十字军”，1096年春从法国和德意志动身，沿着莱茵河、多瑙河向东方蜿蜒前进。壮年男子带着妻儿老小，有的步行，有的坐着牛车；有的带着棍棒、镰刀、钉耙，有的赤手空拳。许多人不知道征途有多远。每到一个城市，就有人问：“这是不是耶路撒冷？”队伍没有给养，靠抢劫和乞讨得到粮食，受到沿路人民的反击。许多人没有走出欧洲就被打死。到达小亚细亚以后，塞尔柱土耳其人一战歼灭了他们的大多数，其余的人侥幸逃回欧洲。“穷人十字军”悲惨地当了第一批牺牲者。这是封建主出征的前奏。

1096年秋，开始了封建主的第一次十字军行动。队伍分别从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出发，一面抢劫，一面东进。在小亚细亚，十字军攻下尼西亚。塞尔柱土耳其人用轻骑兵迎击，又实行坚壁清野，十字军得不到粮食和水，受不了酷暑的炎热，不断有人马倒毙在路上。有人只好徒步前进，改用羊和狗来驮运行李。直到1098年，十字军才好不容易陆续占领两河流域上游的埃德萨和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

那时候，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商人，为了利用十字军的武力奠定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商业独占地位，开始插手十字军的侵略活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给十字军运去了制造攻城器需用的木材。1099年7月，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城市受到血洗。单在一所伊斯兰教寺院里，就有约一万名避难者惨遭屠戮。十字军一个头目写给教皇的信里说，他骑马走过尸体狼籍的地方，血染马腿到膝。寺院、宫殿和民间的金银财物被抢劫一空。这场屠杀以后，十字军到“圣墓”前去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又投入了新的烧杀虏掠。

西亚的十字军国家

十字军国家 在富饶的西亚土地上，出现了几个十字军国家，其中最大的是耶路撒冷王国，此外还有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和埃德萨伯国。十字军首领们把西欧的封建制度移植过来。封建主逐级分封土地。封臣服兵役，向封主效忠。当地农民沦为庄园里的农奴。在沿海的几个商业繁荣的城市，意大利商人占有特区，控制着这里的行政权，操纵着东西方贸易。

在十字军国家里，西欧统治者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惴惴不安地生活在满怀仇恨的人民的包围之中。除了集中在沿海城市，他们只得蜷缩在各地的堡垒里。十字军国家又经常受到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威胁，始终处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

1098年，开罗哈里发国家从塞尔柱土耳其人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

十字军的堡垒

第四次十字军东侵 1144年，埃德萨伯国被塞尔柱土耳其人灭掉，其余的十字军国家也都告急。1147年，法王和德皇亲自统率第二次十字军东侵，结果彻底失败。七十年代，从埃及到两河流域上游一带兴起了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它的统治者萨拉丁向十字军宣战，夺取了地中海东岸的不少城市，1187年进占耶路撒冷。两年以后，英、法、德的帝王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侵，但他们同床异梦。德意志皇帝在小亚细亚淹死了，德意志的十字军大部分折回了。英、法国王彼此争吵，后来法王也把法国的十字军领回法国，乘机强占英国在法国的领地。最后，英王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第三次十字军也以失败告终。

萨拉丁国家

教皇英诺森三世积极推动新的十字军侵略。1202年，法、意、德封建主组织的第四次十字军在威尼斯集合，打算乘坐威尼斯船只进攻埃及，先摧毁萨拉丁的基地，再夺回耶路撒冷。但是伊斯兰教的埃及同威尼斯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基督教的东罗马却是威尼斯的商业劲敌。威尼斯商人决定借十字军的侵略达到扩张商业的目的。他们为十字军提供船只，却利用十字军付不清巨额船费的窘迫，驱使十字军去进攻同一宗教信仰的东罗马帝国。十字军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1204年4月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骑士、天主教教士和威尼斯商人，争先恐后地拥进君士坦丁堡，佩戴十字架的侵略者冲进教堂，抢劫“圣器”和艺术珍品，剥下镶嵌在祭坛和门窗上的金银，牵进骡马去载运。他们在酗酒之余放肆毁坏古代艺术品，为了分赃方便，就把金属雕塑熔铸成块件。城中大火延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许多古建筑化为灰烬，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浩劫。

拉丁帝国

十字军完全放弃了恢复“圣地”的计划，在巴尔干半岛东南和马尔马拉海边，建立起十字军国家——拉丁帝国。由于它的皇帝没有实权，它实际上分成四个拉丁国家。西欧封建主在那里加强了农奴制剥削，威尼斯据有了君士坦丁堡的大约三分之一地区、重要的海港和岛屿，罗马教皇控制了教会。后来，东罗马的残余统治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逐渐收复失地，1261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恢复帝国。但是经过这番蹂躏，东罗马帝国已经失去了从前的光辉，繁华和强盛成了历史的陈迹。

第四次东征以后，十字军侵略的火焰逐渐熄灭。十三世纪，虽然西欧又发动过四次十字军，但是都失败了。到1291年，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所侵占的土地已经丧失殆尽。

十字军东侵的影响 十字军东侵是西欧教俗封建主阶级在宗教掩饰下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殖民战争。它严重地破坏了西亚和东罗马的社会生产和文化，牺牲了亚洲和欧洲无数人的生命。它对西欧社会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1171年，萨拉丁废黜开罗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告终。萨拉丁的全名是萨拉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他所建立的王朝称为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

十字军在东方只保有塞浦路斯岛。

农奴往往借出征的机会挣脱封建主的束缚，一些人住进了城市。封建主急于筹措出征费用，有的就让农奴赎买人身自由，有的卖掉产业然后出征；有的在战争中阵亡；封建主的力量有所消损。另外，侵略者接触了东方文明，模仿东方封建主的豪华生活成了西欧封建主阶级的风尚。豪华生活需要大量开支，因此封建主就加重地租剥削，同时大力推行货币地租。这一切加快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成长，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演变。十字军侵略加强了东西方的贸易，特别是确立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商业优势，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第二章 十一至十四世纪的欧洲主要国家

第一节 法国

法国经济的发展 法兰西王国是由西法兰克王国演变来的。987年，法兰西公爵卡佩取代了加洛林王朝。这个国家以后通称法兰两王国。到十一世纪，法兰西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但是卡佩王朝最初几代国王的权力有限，各地大封建主实行割据，王国四分五裂。从十一世纪末开始，法国的城市发展得很快。许多城市里有发达的手工业。十字军侵略扩大了东西方的贸易，使法国南部的经济加速活跃起来。通过南部的马赛等港口，法国织造的各色呢绒和麻布等运向东方。东方的香料、染料、糖和各种奢侈品输入法国。十二、十三世纪，东北部的香巴尼地区兴起了当时欧洲最大的集市，西欧商人到那里会聚，各种各样的商品源源运到那里交流。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大大地加强起来。

封建剥削方式随着发生变化。为了增加货币收入，封建主向农奴索取赎金，答应他们取得人身自由，并且要他们用货币交纳地租。赎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只有境况比较好的农奴才能够在短期内交付。而且农民虽然赎得人身自由，还必须为租种的土地交付货币地租。为了把实物换成货币，他们必须出售产品，因此要受商人一层中间剥削。富裕农民余粮较多，可以待价而沽，贫穷农民往往被迫低价卖粮。农民身上还压着许多封建义务。他们的处境仍旧很艰苦。但是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多少有了提高。十四世纪，这样的农民在不断增加，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也增多了。

王权开始加强 十二世纪以前，法国只在名义上是统一的王国，实际上分割成许多经济上没有多少联系，政治上各自独立的大封建主辖区。这些封建贵族在各自的领域内随意制定法律，铸造钱币，控制贸易，征收税款，而且经常混战，弄得道路不宁，民不聊生。国王所管辖的，主要是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中游、以巴黎和奥尔良为中心的狭窄地区，它的面积甚至比大封建主的领地还小。就是在王室领地内，放荡不羁的封建主也时常以城堡为据点进行骚扰抢劫，甚至以杀人为儿戏。从巴黎旅行到奥尔良，一路上不知要经受多少风险，就是国王本人，也非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卫护不可。

面对这种局面，法国国王极力争取加强王权。国王所管辖的狭窄地区是南北贸易的必经之地，国王通过征收货物过境税得到很大好处。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国王也增加了货币收入，扩大了本身的经济力量。十二世纪早期，国王开始向封建混乱现象作斗争。在斗争中，国王得到市民和中小封建主的支持。市民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消灭大封建主的割据，消除他们的横征暴敛和抢劫，统一货币制度，统一法律，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他们用金钱和武装力量支持国王。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国王也往往给某些城市自治权。中小封建主不堪大封建主的欺凌，为了加强统治地位，也成为王权的同盟者。国王依靠这些支持，首先消灭王室领地内的独立的封建主势力，然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封建主。

在加强王权和统一国家的道路上，由于英国国王在法国拥有许多领地，

香巴尼地区在巴黎以东，是一个伯爵辖区。在境内的四个城市里每年相继举行集市贸易，一共六次，每次历时数周。这就是著名的香巴尼集市。

英王成了法王最大的劲敌。

十二世纪晚期的法国和英国

法国走向统一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入侵英国，取得胜利，登上英国王位。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法王的附庸，仍旧保持着诺曼底这块领地。1154年，威廉的外曾孙、法国大封建主安茹伯爵亨利即英国王位，史称亨利二世。他的妻子是法国阿奎丹公爵的女儿和继承人。通过王位继承和联姻，他领有法国的诺曼底、曼恩、安茹、都兰、普瓦图、阿奎丹等地区，后来又取得布列塔尼。因此英国王室占有法国西部从北到南的一整片土地，比法王的领地大五倍，挡住了法国的出海口，形成对法国的严重威胁。

十四世纪初的法国

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利用英王约翰和他在法国的附庸之间的纠纷，以领主的身分要约翰来巴黎受审，约翰加以拒绝。于是腓力二世宣布剥夺约翰在法国的全部封土，并且发动进攻。1204年，腓力相继占领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曼恩、都兰和普瓦图的一部分。后来又经过长期斗争，到十四世纪初，英国主要只保持了法国西南沿海一块地方。在与英王斗争期间，法王也向国内其他地方扩展势力，腓力三世（1270—1285年在位）和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先后合并了图卢兹、香槟两块伯爵领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王室领地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其他封建主的领地。巴黎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都给法国形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法王腓力四世为了加强统治地位，在1302年召开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第一等级是高级教士，第二等级是世俗贵族，第三等级是富裕市民。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都被排除在外。会议主要讨论征税等重大问题，各等级分别讨论，各有一票表决权。三级会议对于王权没有多少限制作用，多数情况是同意国王的决定。它的召开反映了新兴的富裕市民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通过三级会议，法国国王把封建统治阶级和新兴市民的上层联合起来，加强封建统治。这样，在法国形成了等级代表制的封建君主政体。

第二节 英国

英国封建制度的发展 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大批没收盎格鲁·萨克森封建贵族的土地，分赠给自己的亲属、随从和同来的教会人士，同时委派他们接管行政和教会的要职。只有骑士保存了原来的小块领地。征服者在这里推行在欧洲大陆上已经十分盛行的封建剥削方式。农民遭到更沉重的奴役，许多自由农民很快地沦为农奴。

在英国，国王直接领有的土地大于任何一个封建主的领地，而且新的大封建主都直接从国王手里接受土地，必须为国王服军役，向他纳税。无论是威廉直属的附庸，或他的臣属的附庸，都必须向威廉宣誓效忠。因此威廉掌握着强大的王权。一、二百年之内，国王们战胜了大封建主的叛乱，王权也在不断地增长着。

十一世纪晚期，英国大约有一百个城市，十三世纪中期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英国城市一面开辟国内地方市场，一面同欧洲大陆发展贸易，成为促进英国经济上升的强大杠杆。十二世纪，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在集市贸易中，羊毛占首要地位。英国商人深入农村收购羊毛，在集市上卖给外国商人。粮食和皮革也输出海外。商品经济在农村发展的结果，货币地租从十三世纪起开始流行，农奴制度随着走向没落。多数封建主，尤其是统称为骑士的小封建主，插手羊毛和粮食的产销，成为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经营农牧业的地主。他们同富裕农民和上层市民消除了严格的等级界线，都关心市场的发展，要求加强中央政权，减轻捐税。

约翰在大宪章上美国印见图版(21)

大宪章 英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利用王权施行暴政。他任意没收附庸的土地，随意逮捕显贵人物，干涉教会的选举事务；为了在法国进行战争，他更是漫无止境地征收捐税，激起了各阶层的反对，他在战争中节节失利，在法国的土地大半沦丧，更招致了普遍的不满。反对王权过于强大的封建贵族乘机联合教士、骑士、市民举行武装反抗。约翰众叛亲离，据一位作者的描述，最后他竟发现只有七个骑士站在自己一边，因此只好在1215年6月在封建贵族拟定的“大宪章”上盖上印鉴。大宪章的主要条文是：国王承认教会选举自由；不得违反惯例向封建主征收额外捐税；不得任意逮捕、监禁或放逐自由人，或没收其财产；承认伦敦等城市已经享有的自由，统一度量衡等。大宪章主要保障封建主和教会的利益，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它使王权受到封建法律的约束，使国王的独断专行受到限制，给自由人以一定的法律保障，给市民以一定的权利，因此它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在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议会开始建立 无论是约翰还是他以后的国王，都不甘心于权利的削弱，他们拒绝遵守大宪章。内战又在国王和封建主之间爆发。结果国王战败，西门·德·孟福尔伯爵依靠骑士、市民、自由农民和主张改革的封建主的支持取得胜利，成为英国的统治者。1265年他召集会议。出席者除封建贵族外，还从每个郡邀请两名骑士，从每个大城市邀请两名市民。这次会议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议会逐渐定型为上下两院：上议院议员是教会和世俗贵族的代表下议院议员是骑士和市民的代表。国王通过议会规定赋税，制订法律。

孟福尔于1265年8月战败阵亡，王权又恢复起来。但是等级代表制度一直延续下来。

这样，等级代表制的封建君主政体在英国确立起来了。

第三节 百年战争和英、法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英法百年战争的开始 强大起来的英法两个封建国家互相敌对。法国力求从境内完全赶走英国势力；英国不但不甘心退出大陆，还企图恢复十二世纪后半期一度占有的广大地盘，并且加以扩大。佛兰德尔 尤其是两国的争执之地。那里有发达的呢绒业，是英国羊毛最重要的销售地区。法王长期以来就想控制这块地方，终于在十四世纪早期把势力扩充到那里。英王垂涎欲滴。佛兰德尔城市同英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支持英国。

卡佩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查理四世没有男系继承人。1328年他死后，由他的堂兄华洛瓦家族的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继位。英王爱德华三世以腓力四世的外孙身分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他以此为借口，向法国发动了战争。战争从1337年开始，断断续续拖延到1453年，历史上叫做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中英国弓箭手在射击见图版(20)

英国凭借军事优势，取得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1346年在克勒西，英国的弓箭手采取近距离射击，英军以三名骑士和大约四十名步兵的损失，打死一千五百名法国骑士。次年英军占领重要港口加来。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英军把法国国王和许多贵族都俘虏过去，然后向法国索取大宗赎金。

克勒西战役

法国农民起义 法国在战争初期的失败引起工商业凋敝，城市里的帮工开始失业。战时捐税不断增加。巴黎市民发动起义，要求改革政治。更大的灾难降临到农村。许多村庄被战火摧毁，耕地一片荒芜，牧场上看不见牛羊。双方的雇佣军都肆意抢劫骚扰。法国封建主又不断加重剥削。他们说：“乡下佬有结实的背脊，能经受沉重的担子。”普瓦提埃战役以后，法国为被俘的国王和贵族凑集赎金，又准备向人民加征捐税。1348年和1349年，鼠疫在欧洲蔓延，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法国农村更显得满目凄凉。

1358年5月，巴黎以北博韦地方的农民举行起义。他们高呼：“杀死全国贵族，直到最后一个。”起义马上席卷北部大部分地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投入斗争。起义者攻打堡垒，杀死贵族，焚烧登记封建义务的簿册。他们所到之处，贵族望风而逃。富有军事经验的吉约姆·卡尔领导斗争。但是广大地区的起义队伍没有完全统一起来，也没有提出斗争纲领。卡尔要求正在斗争的巴黎市民配合农民起义。巴黎市民在富裕上层的影响下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

一个绰号恶人的大贵族查理率军逼近起义军主力所在的村庄。卡尔准备避开不利地形，挺进巴黎。但是农民要求立即决战。卡尔于是在高地上布置阵地，决定迎击。查理看到农民有准备，假意要求卡尔前去谈判。卡尔一走进敌人的军营，立刻就被套上枷锁。于是查理下令进攻农民。两个星期里，两万起义者被屠杀。卡尔受到酷刑拷问以后惨遭处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震惊了法国封建主，迫使封建主很久不敢加重地租剥削。

英国农民起 十四世纪，由于货币地租的盛行，英国农民加速走向贫富

佛兰德尔在些耳德河和加来海峡之间，当时是一个伯爵辖区，今天归入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境内。

法国贵族轻蔑地把农民叫做“呆扎克”，意思是“乡下佬”。1358年的法国农民起义历史上惯称为“扎克雷”起义。

分化。许多贫苦农民到富裕农民和封建主的土地上当雇工，雇佣劳动制在农业中发展起来。但是在东南部的领地上，劳役制还相当普遍地保存着。

1348 和 1349 年的鼠疫从大陆蔓延到英国。英国人口从大约四百万下降到二百五十万，劳动人手骤然减少，粮价和工资随着上涨。有些地方，封建主恢复了已经废除的农奴制劳役剥削。为了保证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国王和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强迫劳动制度。1349 年，爱德华三世的敕令规定，凡是没有地产或其他收入的人，不分男女，从十二岁到六十岁，必须受人雇用，工资不得超过瘟疫流行前的水平；拒绝在规定条件下受雇或在雇用期间离开雇主的，判处监禁；抬高工资的判处罚金。1351 年的一个法案宣布，违犯雇佣法的人应该带枷下狱。十年以后的另一个法案又宣布，劳工擅离雇主，将受热铁烙印的刑罚。

天主教会顽固地保留着农奴制度和劳役剥削，一些下层教士也受教会首脑的剥削，生活贫困，因此要求改革教会。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因此进一步要求改造封建社会。他们漫游各地，在人民面前指摘社会的不平等。在他们中间，约翰·保尔影响最大。保尔常常在教堂门口向人发表演讲，激烈地控诉贵族的压迫。他指出，贵族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些我们称为领主的人，……为什么奴役我们？如果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怎么能说，又怎么能证明比我们身分高？”他把贵族和贫民的生活作了对比；一方面是不事劳动，锦衣玉食，一方面是饱经风雨，敝衣粗食。他反问道：“当亚当耕种，夏娃纺织时，谁是绅士？”保尔还向各地散发韵文传单，号召人民采取行动。为此，他几次被投入监狱。

百年战争开始以后，英国的封建主、雇佣军首领、银行家和投机商人都发了财，人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后来战局变化，英国从胜利转为败退。1377 年，英国议会决定靠征收人头税填补庞大的军费开支，规定年在十四岁以上者，每人要交一枚银币的人头税。1379 和 1380 年，一再加征，1380 年的税额提高到原来的三倍，规定年在十五岁以上者，每人要交三枚银币的人头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雇工三天的收入。官吏催征税款急如星火，贪污舞弊普遍成风。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1381 年 5 月底，东南部埃塞克斯郡的农民抗交人头税，发动起义。几天之内，起义在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全面爆发，6 月间扩展到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袭击庄园和修道院，销毁规定封建义务的文书。肯特郡的农村泥瓦匠瓦特·泰勒被当地农民推举为领袖。被坎特伯雷大主教监禁着的保尔也被农民释放出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上述两郡的起义者分两路向伦敦进发。伦敦的贫民为农民打开城门。

约翰·保尔和起义农民

农民包围国王查理二世的城堡，杀死几个民愤很大的大臣。国王被迫在伦敦近郊迈尔恩德村口场地上会见起义农民。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度和劳役剥削，以低额的货币地租代替一切封建剥削，在全国实行自由贸易，大赦起义人民，这些温和的要求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国王假意表示接受。一部

基督教《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造出一男一女，男的叫亚当，女的叫夏娃，人类就是他们的子孙。

在肯特郡。

分农民轻信国王的诺言，分头返回农村。许多贫苦农民随着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留在伦敦，继续斗争。

在伦敦城边的斯密斯菲尔德地方，国王再一次被迫会见农民。瓦特·泰勒代表贫苦农民提出要求：废除农奴制度，取消封建主的一切特权，没收教会土地分给农民，收回封建主霸占的农村公社土地，废除强迫劳动的法案。在会见时，伦敦市长猛刺泰勒。泰勒身受致命伤，遇害身死。国王命令清查伦敦居民，捕杀了保尔等起义者。国王再次诱骗农民回乡，随即派骑士去追击农民队伍。杀害农民的绞刑架在各地树立起来。

瓦特·泰勒被刺见图版(22)

1381年的起义对英国农奴制度的消灭起了重要作用。封建主阶级受到起义的震撼，同时由于劳动人手十分缺乏，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十四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农民争得了人身自由，改纳货币地租。

贞德进入奥尔良见图版(23)

百年战争的结束 1415年，英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几年之内英军占领法国北部，包括巴黎在内，1428年包围奥尔良。奥尔良是军事重镇，据有该地，英军就可以长驱南下。法国北部人民建立了抗英游击队，展开拯救祖国的战斗。在东北边境一个村庄里，农家姑娘贞德挺身而出。她经过重重困难，见到了在南方执政的王太子查理，说服了他，得到一支军队。贞德身披戎装，手执军旗，带着军队向奥尔良猛进。法军士气大振。1429年5月，法国军民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击退了包围奥尔良的英军，乘胜克复许多城市。贞德成了人民爱国热情的象征，被称为奥尔良姑娘。但是法国封建主对她的声望和影响感到不安，蓄意谋害这位英雄。在巴黎东北贡比涅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封建主故意关闭城门，截断她的

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和英国

归路。贞德最后落入英军手里，备受酷刑，最后被教会以“异端”的罪名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贞德的牺牲更加激发了法国军民的爱国热情。他们连续得胜。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除北端的加来港以外，法国领土全部收复。

贞德遇害

法英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百年战争末期，法王查理七世实行了两项重大措施：国王不经过三级会议批准直接征税，建立国王直属的常备雇佣军。王权进一步加强了。战争胜利以后，法国进入经济复兴时期。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最后消灭了封建割据，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路易十一充分估计到商业和手工业对充实国库的重要性，采取保护政策。他鼓励工业品输出，取消一部分内地关税。他依靠中小封建主和上层市民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国王在宫廷官吏和顾问的辅助下统治国家，政事越来越少让三级会议过问。等级代表制的封建君主政体演变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法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

百年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封建主向法国扩张的出路堵塞了，封建主内部的冲突加剧起来。百年战争结束不过二年，约克公爵的家族同当政的兰开斯

查理从1422年执政，1429年即位，称查理七世，统治到1461年。

特王朝争夺王位。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纹章，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纹章，因此他们挑起的战争叫做红白玫瑰战争。英国许多封建贵族跟随他们卷入战争。从1455年起，双方反复争夺了三十年。兰开斯特家族在1471年战败，它的旁支、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亨利·都铎逃到法国的布列塔尼。他在这里聚集力量，准备有朝一日回国取得王位。1485年8月初，他带着几千名支持者在英国的威尔士登陆，向东推进。当时的英王、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率领队伍前去迎战。8月22日，两军在波斯沃思原野交锋，双方箭飞如雨。在紧要关头，理查三世手下两名贵族率众投向亨利一方。理查力量削弱，最后被杀，不多时候，他的队伍随之溃散。战场上发现了理查三世失落的王冠，它被加在亨利的头上。就在这一年，亨利正式加冕，称为亨利七世，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经过三十年的反复争夺，双方两败俱伤，大部分旧贵族消灭了。亨利七世进一步摧毁了旧贵族的实力，巩固了王权。英国也形成了中央集权国家。

第四节 德意志和意大利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 从查理曼帝国分裂出来的东法兰克，逐渐发展为德意志王国。封建制度在这里发展得比较缓慢。罗马影响很少的边区，特别是萨克森地区，尤其如此。到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德意志才基本封建化。

从十世纪初起，德意志的国王积极推行扩张政策，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时期，领土已向东越过易北河，部分地方延伸到奥得河。但是奥托最垂涎的目标是意大利。这里有富庶的城市，可以提供财富；这里有教皇的统治中心罗马，控制教皇，就能使国内的教士俯首听命；这里的封建主争权夺势，造成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这正是进兵的有利条件。951年，他首次出征意大利，占领伦巴底，取得伦巴底国王的称号。十年以后，教皇邀请奥托帮助平定封建主的叛乱，奥托打败了教皇的敌人，巩固了教皇的权力。教皇为了寻求支持，962年在罗马为奥托举行皇帝加冕，把他作为查理帝业的继承者。这个新的帝国历史上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无论从疆域或皇帝权力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同查理曼帝国相比都相形逊色。皇帝不但必须制服德意志封建主，而且必须使意大利的封建主就范，还必须使教皇保持友好态度。因此历代皇帝一次又一次地由阿尔卑斯山南下，或去加冕，或去平定叛乱，或去支持与自己友好的教皇，或去废黜不听命的教皇。这一切消耗了统治力量，反而使德意志封建主乘机加强割据，中央政权衰落。

卡诺沙事件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掌握着主教授职权，他们自己挑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凭授职权接受贿赂，安插亲信；他们赐给主教领地，扩大他们的统治权，以此换取支持；他们甚至自行任命教皇。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教皇下面所属的主教要由皇帝授职，教皇要由皇帝认可，而国王又是由教皇加冕为皇帝的。究竟谁高于谁？双方都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授职权变成了争执的一个中心问题。皇帝对宗教事务的干涉已经引起罗马教会的不满。意大利城市也反对皇帝干预本地事务。矛盾终于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冲突。

1073年，野心勃勃的格雷戈里七世当了教皇，当时罗马的天主教会已经把自己的影响扩张到整个西欧。格雷戈里七世宣称教皇权力来自上帝，高于一切，教皇不但有权任免主教，而且可以废黜君主。皇帝亨利四世针锋相对，于1076年1月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叫他从教座上“滚下来”。一个月后，教皇也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开除亨利的教籍，取消他的帝位。德意志的大封建主（诸侯）乘机发起动乱，他们要挟亨利，只要在一年零一天之内亨利还不能恢复教籍，他们就要另立国王。于是亨利不得不在1077年1月忍辱到意大利的卡诺沙城堡去向教皇忏悔。亨利冒着大雪，光着双足，穿着粗服，在城堡外候了三天方得进见。教皇恢复了他的教籍。表面上似乎是教皇占了上风。但是双方互不服气，政教冲突并未停止。直到1122年沃姆斯宗教会议决定由教皇或他的代表授予主教神职，而由皇帝授予封地，双方才算达成妥协。

德意志的政治分裂 十二、十三世纪，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

这个帝国到十二世纪时称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通称“神圣罗马帝国”。962年即作为其始创之年。

就，许多城市相继发展起来。靠近边境、海岸和河流的城市如科伦、沃姆斯、奥格斯堡、纽伦堡等尤其著名。这些城市的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都很发达，产品主要运销国外。它们与国内市场的联系不大，没有一个城市发展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很薄弱。因此城市的发展对于政治统一没有多少作用。诸侯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趁皇帝南行之机扩展势力。在皇帝与教皇争夺授职权期间，一部分诸侯掀起了几乎二十年的内乱。他们收罗附庸，扩大实力，一座座的堡垒从地面上矗立起来，严重地加深了政治分裂局面。从十二世纪早期起，德意志诸侯废弃了皇位世袭办法，改为由诸侯选举产生。为了确保权势，他们往往选出一个不太强大的诸侯来充数。皇帝徒有虚名，其地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大诸侯。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承认诸侯在领地内有权审判，征税，铸币，经营矿山；并规定皇帝由固定的七个诸侯选举产生。这七个诸侯称为选侯，其中有三个是大主教。《黄金诏书》事实上把德意志的分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结果弄得境内关卡林立，交通不便，封建混战频频发生。在很长的时期里，德意志没有发展为象英法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

十五世纪晚期的神圣罗马帝国

四分五裂的意大利 查理曼帝国分裂以后，意大利长期陷在政治纷争之中，一直没有统一，甚至没有产生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北部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中部有教皇的辖区，南部和西西里在十二世纪是诺曼人建立的两西西里王国，十三世纪末，南部成为那不勒斯王国。各个部分之间常有利害冲突，即使在它们内部，北部城市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部城市对于教皇，都是各行其是。意大利城市和德意志城市一样，主要是依靠对外贸易兴旺起来的，彼此很少联系，而且互相竞争，互相敌视，根本不关心政治统一。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

北部城市工商业很发达。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亚得里亚海岸的威尼斯继续保持着与沿海一带和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从十世纪前后起，许多城市相继成长起来。它们纷纷向封建主展开斗争，逐渐控制了周围的广大地区，有的形成城市国家，最著名的有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以手工业生产为主。威尼斯、热那亚以商业活动为主。它们的商业活动随着十字军侵略的进展而取得更大的优势。它们的商船穿行于地中海和黑海，并且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欧洲海岸航行到英国和佛兰德尔。威尼斯拥有商船三千艘，大商船约有三百名船员。它们的商人往来于欧亚非三大洲。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玛窦·波罗在十三世纪时远道来到中国。后来，马可·波罗又随着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启程，经过几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元朝朝廷。

马可·波罗见图版(24)

盖有黄金印章，故名。

这七个选侯是美因兹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伦大主教、波希米亚王、莱茵区的巴拉丁伯爵、萨克森—维登堡公爵、勃兰登堡侯爵。

1442—1458年，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又一度合并。

马可·波罗父子等三人启程东来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十四世纪，在意大利北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刺激手工业作坊主展开激烈的竞争。行会章程对产销竞争的限制被突破了，行会制度趋于瓦解。商业资本家打入了生产领域，成为包买商人。他们包买原料供应手工业者，有时还供给他们工具；又包买手工业产品，把产品贩卖到外地。那些手工业者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受包买商人支配，实际上成为雇佣工人。资本家以此为起点，逐渐地建立起手工工场。他们雇用许多工人，使工人有分工地生产一种商品。在原来只有行会手工业的城市里，兴起了新的手工业生产形式——工场手工业。

在盛产呢绒的佛罗伦萨，工场手工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呢绒生产过程分成二十多个工序。先把羊毛煮过，漂净，梳理整齐。担任这些劳动的粗工统称为梳毛工，他们原先大都是摆脱了农奴身分而又失去土地的农民。梳理好的羊毛通常发给城里或者近郊的贫苦妇女，由她们在家里用纺锤或手摇纺车纺成毛纱。毛纱再发给织工，由他们在家里织成呢绒。此外的染色、缩绒、碾平等工序，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在中心手工工场完成。许多失去独立经营能力的城市手工业者就在这里操纵织机、缩绒机和染色。十四世纪中期，在佛罗伦萨城里和近郊，呢绒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大约有三万人。企业主大约有二百家。

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有的集中在工场里，有的分散在家里劳动，他们同是受雇用的工人，同样受企业主的剥削。企业主强迫工人每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付给的工资却很低；又利用工人生活困难，预付一点工资，强迫工人用沉重的劳动清偿，否则不许离开工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特征。雇佣工人同企业主的斗争也开始了。1378年7月，佛罗伦萨的梳毛工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工人起义。他们联合小手工业者和流入城市的农民，起来夺取政权，选出了以梳毛工工头兰多为首的新的政权机关。新政权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对贫民分配粮食，让城市里所有的人都能到手工工场里工作，剥夺富豪的参政权等。但是大企业主用同盟歇业的手段来对付起义者，使工人失业和挨饿；他们并且收买兰多，分散了起义的力量。起义群众向统治阶级的军队展开英勇搏斗，最后失败。残酷的镇压开始了，起义领袖遭到杀害。兰多曾经帮助镇压起义，后来也被流放出去。

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萌生了最初的幼芽。开设手工工场的企业主同富商、银行家等一起，开始形成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只出现在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少数地区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里，而且只限于纺织等少数部门，好似封建生产关系茫茫海洋里的零星小岛。但是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这种新因素的成长，有力地冲击着陈旧的封建制度。

第五节 俄罗斯

基辅国 六到九世纪，从今天苏联的基辅一带到伊尔门湖一带，分布着东部斯拉夫人。九世纪，东部斯拉夫人的氏族公社过渡到农村公社，他们的部落发展成一些小国，各以一个设防的城市为中心，由王公统治，因此叫做公国。

八、九世纪，当诺曼人不断地进行着对外掠夺和贸易活动时，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由芬兰湾溯流南下，来到东欧。根据俄国古代编年史的记载，862年，诺曼人的首领留里克当了诺夫哥罗德的王公。他的两名部下顺着第聂伯河来到基辅，也成为那里的王公。诺夫哥罗德和基辅是当时较大的两个公国。诺曼人来到后，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

88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率兵南下，征服了基辅和第聂伯河两岸的几个公国。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公国，国家的统治者开始称为大公。基辅大公统治下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他们把这个国家叫做罗斯。

九世纪，在农村公社里，私有土地和封建剥削关系萌芽了，但是还没有发展起来。大公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是征收贡品。当冬天来临时，大公带着武士出去巡行，强迫人民把毛皮、蜂蜜等物产作为贡品交出。春天，大公的船队载运着征收来的贡品开进黑海，渡海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换回贵重的纺织品、酒、水果等。一部分贡品分赠给大公的部下。

基辅罗斯邻近东罗马帝国，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十世纪末，罗斯从东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在文化上，它也深受东罗马帝国的熏陶。十一世纪早期，基辅强盛起来，大公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1019—1054年）达于顶点。但是这时阶级分化也在加深。农村公社里出现了占有大块土地的富人，许多贫穷农民负了债，沦为债主的农奴。王公贵族也开始霸占农村公社的土地。大公还把土地赐给王公、武士和教会。统治阶级在地产上剥削农奴劳动。

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各地封建主的割据势力发展起来。十一世纪后半期，国家已经不能维持统一。十二世纪，罗斯分裂成十几个公国。此后罗斯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强大的外敌接踵而来。十三世纪，蒙古军队侵入罗斯，占领梁赞、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基辅等地，罗斯广大的土地沦陷了。罗斯西部随之受到波兰和立陶宛封建主等外来势力的侵略。十四世纪，波兰占领罗斯西南端的土地，立陶宛也逐步向南推进，占领整个第聂伯河流域，包括基辅和斯摩棱斯克在内。这样，罗斯西南部的整片地区分别为它们所据有。东北罗斯则陷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那里的王公们被迫向蒙古贵族所建立的钦察汗国纳贡。大敌当前，罗斯的王公们非但没有停止内江，有时反而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来进行内部的争夺。罗斯衰落下去。

莫斯科公国 莫斯科原来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十二世纪中期建城。以它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莫斯科公国。莫斯科位于商道要冲，城里有手工业，周围是农业地区。它又远离罗斯东西边疆，不易受到外敌的侵犯。依靠这些有利条件，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它陆续合并了周围几个公国，到十四世纪初已经十分强盛。

基辅大公定东正教为国教。

钦察汗的帐殿为金色，俄罗斯人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

蒙古人起先自己派税官征收贡物，后来改由本地的封建王公征收。钦察汗从各国的王公中选出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由他代征全部贡赋上交给钦察汗。这个特殊地位成为王公们瞩目的目标。1325年，野心勃勃的伊凡一世当了莫斯科公国的王公。他以谄媚逢迎、馈赠金银财宝的手段博得钦察汗和他的妻妾及近臣的欢心，受到册封。伊凡乘机东兼西并，扩充势力，而且把一部分贡赋留归自己充实财力。莫斯科公国发展为全俄罗斯最强的公国。与此同时，钦察汗国从十四世纪起却处在衰落和分裂的过程中。十五世纪，它的南部和东部分裂为克里米亚、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几个小汗国。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利用钦察汗国的分裂，开始扩大领域，把诺夫哥罗德等公国都收并到自己的统治下，同时停止交纳贡赋。1480年，钦察汗征讨莫斯科。伊凡三世避免速战速决。两军在奥卡河的支流乌格拉河隔岸对峙。钦察汗得不到策应，面临寒冷和缺粮的威胁，后方又不稳定，不得不退却。这样，伊凡三世终于摆脱了蒙古的压迫。

伊凡三世死时，东北罗斯几乎完全统一。十六世纪早期，最后两个公国普斯科夫和梁赞先后并入，立陶宛占领的斯摩棱斯克也收复了。这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了。

伊凡三世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伊凡三世着手加强中央集权，他掌握全国的军队和税收，消除不服从的封建主，为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的孙子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即位时年纪只有三岁。大贵族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们趾高气扬，甚至闯到他的寝室里去乱吵乱嚷。他们为了控制实权而不断地互相争夺。俄国又是一片混乱状态。1547年伊凡已经成年，举行加冕仪式，此后他自称沙皇，表明自己要象罗马皇帝那样地行使权力。伊凡富于谋略，然而反复无常，性格狂暴，手段狠毒。他时而暴跳如雷，时而随心所欲地折磨他人，或用尖棒刺，或用沸酒烫，或用热锅烙。他残酷地翦除许多贵族及其亲属。因此在历史上他以“恐怖的伊凡”的名称留传下来。

伊凡四世

伊凡四世无情地镇压了大贵族的叛乱，随即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设立了一个“重臣会议”来帮助推行这项工作。他下令统一全国法律，在各地设立司法机关，起用中小贵族担任法官和地方官。他颁布兵役法，封建主每一百五十俄亩土地，必须出全副武装的骑兵一名，从而增加军事力量。他把全国土地划分为沙皇特辖区和由杜马管辖的普通区两部分。富饶和繁荣的地方都划入前一类，由国王分封给中小贵族；大贵族丧失了这部分里面的领地，另从偏远的普通区得到补偿。这些措施大大地削弱了大贵族的政治经济力量，打击了他们的气焰，确立了沙皇专制政体。

伊凡四世一面巩固权力，一面把注意力转向境外。他亲率大军十五万人和几十门大炮打进喀山汗国。1552年喀山城陷落，城内男子惨遭屠戮，妇孺

“沙”是恺撒的俄文音译
贵族组成的咨议机构。

财物横遭抢劫。四年以后，又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俄国的疆域延伸到里海西北岸。向南扩张取得进展以后，伊凡接着就把矛头向西指向波罗的海沿岸，向东指向西伯利亚。夺取波罗的海的企图没有成功，占领西伯利亚则在伊凡四世时期开端。

第三章 阿拉伯、蒙古和奥斯曼帝国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

六到七世纪的阿拉伯社会 在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阿拉伯半岛上，很早就有阿拉伯人生活着。半岛西南角的也门地区，雨水充足，可供灌溉。古代阿拉伯人在这里创造了农业文化。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这里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其他地方气候干燥，大部分是沙漠和草原，其中夹带着一些绿洲。除了绿洲上的居民从事农业以外，大部分阿拉伯部落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称为贝杜因人。在阿拉伯语中，贝杜因人就是沙漠居民的意思。骆驼和羊是他们的重要财富，羊毛和骆驼毛织成的帐篷是他们的住处，椰枣、畜乳是他们的主要食品。“沙漠之船”骆驼载着阿拉伯人，驮着他们的财物，从一个地方游牧到另一个地方。比较富裕的人还饲养品种优良的马。阿拉伯人常常骑着马或骆驼去进行部落之间的抢劫。各部落为了争夺水草，经常发生战斗；他们也时常结下血仇，互相报复。

六、七世纪之交，在也门以外的居民中间，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出现贫富分化，氏族贵族占有肥沃的绿洲和草地，使用奴隶，也剥削牧民和农民。阶级分化最剧烈的是半岛西部的城市。

半岛西部有一条商道从也门出发，延伸在红海东岸。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非洲的黄金和奴隶等，都从海上运到也门，由骆驼队驮载起来，沿着商道向北运到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半岛上出产的椰枣、葡萄干、皮革和金银矿产等也通过这条商道同境外进行交易。商道上兴起了城市，最著名的有麦加和麦地那。在那些城市里，奴隶制正在发展着，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

麦加是个繁荣的城市，它是商道上的重要枢纽，水陆贸易路线四通八达。城里住着古莱氏部落。氏族部落贵族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贩卖奴隶，每年还要组织几次商队到地中海一带去做买卖，同时在畜牧业和农业中役使许多奴隶。麦加城中央有一座克尔伯神庙，庙里面的墙上嵌着一块黑色的陨石，阿拉伯人相传那是一件“神赐”。阿拉伯各部落崇拜各自的神，麦加人的主神安拉和许多其他神像都供奉在神庙里面。阿拉伯人每年定期源源不断来到麦加朝圣。大规模的集市也在那里举行，人们赶着牲畜到这里来换取织物、武器和手工业品。麦加贵族利用这座神庙，保持着对阿拉伯各部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联系，又从集市贸易的税收中获得优厚的利益。他们有很大的势力。

克尔伯神庙见图版(25)

六世纪，阿拉伯成为波斯和东罗马两大邻国的争夺目标。大约在570年波斯侵占也门，另外开辟一条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的商路。红海东岸的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从前为商队充当驼夫和搬运货物的阿拉伯人由于失业贫困下来。麦加贵族的商业也一落千丈。贵族把金钱转用于高利盘剥，利息往往达到百分之百。许多部落欠下他们的债。下层人民在债务奴役下，

麦地那原名叶什里卜，穆罕默德来后，改称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

克尔伯意思是立方体。中国伊斯兰教典籍中译为天房。

古代波斯帝国在公元前四世纪被马其顿所灭。公元前250年，今天伊朗的东北部一带兴起了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里称为安息。大约一百年内，安息从伊朗高原扩张到两河流域。公元226年，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继之兴起。

生活不断恶化，反抗有增无已。整个半岛动荡不安。贵族为了加强统治，夺取新的土地，开辟新的商业活动途径，需要政治统一，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构。普通人民也希望打破部落的局限，获得牧场和肥沃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它是阿拉伯的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伊斯兰教的产生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出生在麦加的古莱氏部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他出世以前即已丧父，幼年丧母，先后由祖父和伯父抚养。青年时代他放过羊，做过买卖，跟着商队到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来他和一个富商的寡妇结婚，从此富裕起来。穆罕默德在叙利亚一带接触过基督教徒，听说过关于“上帝”的故事。结婚以后，他摆脱了生活的重担，常到麦加郊外的山洞里去沉思生活。他结合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教义，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宣称这是神的启示。

大约610年他开始在麦加传教，说宇宙间只有一个“真主”安拉，此外别无他神；“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信徒的先知。他反对多神教和偶像崇拜，号召信仰并且绝对顺从“真主”，宣称凡是信仰“真主”，遵行天命建立善行的人，将要升入天堂，否则坠入火狱。他的传教取得妻子、几个亲族、一些穷人和奴隶的相信；然而另一方面却引起麦加贵族的严重不安。他们深恐关于一神教的宣传会影响人们去朝圣，从而损害自己的特权和财富，因此以嘲笑和攻击来回答他，甚至殴打、欺侮他的信徒。穆罕默德的处境十分困难，很难继续留在那里。恰恰当时麦地那有两个部落互有仇恨，争执不休。麦地那人邀请穆罕默德到他们那里去帮助解决纠纷。622年，穆罕默德及其信徒从麦加出走，迁移到麦地那。这件事阿拉伯语叫作“希吉拉”，那一年后来被定为回历元年。

从麦地那到麦加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继续传教。除了宣传宗教信仰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比较结合现实的主张，号召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不分部落，都是兄弟，使各部落的人超越血缘的狭隘界限，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联合起来。这对于消除他们的敌视有积极的作用。他号召各部落停止冲突，如有纠纷，应由“真主”和他本人裁决。为了取得支持，他反对高利贷，主张济贫，主张释放奴隶。苦于麦加贵族高利贷剥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不少人接受伊斯兰教，信徒日渐增多。他不断扩大影响，渐渐由原来的宗教领袖进而兼为政治领袖。他在麦地那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并组织起一支武装力量，一面无情地镇压反对自己或者站在麦加贵族一边的人，一面采取军事行动对付麦加。穆罕默德多次对麦加商队和敌对部落发起武装冲突，有时率军亲征，有时出动部众，取得不少胜利，势力日盛。630年，穆罕默德率领一万人兵临麦加城下。麦加贵族无力抵抗，只好妥协。结果麦加贵族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是阿拉伯的政治领袖。穆罕默德承认麦加在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麦加神庙改成伊斯兰教寺院，其他偶像都被拆除，只有黑色陨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保存下来，规定穆斯林要到麦加去朝圣。这样，麦加贵族仍旧享有宗教和商业利益。从此伊斯兰教奠定了在阿拉伯的统治地位。

伊斯兰教对信教的穆斯林定了五条义务，也是五条基本信条：（1）念诵“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每日必须按规定仪

“伊斯兰”一词出自阿拉伯语“顺从”。伊斯兰教徒称为穆斯林，意即信仰“真主”安拉的人。

式祈祷；（3）每年在规定的月份斋戒；（4）缴纳天课即施舍财物；（5）到麦加朝拜。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记录了穆罕默德作为“真主启示”所传达的话，据传是由他的门徒笔录下来的。《古兰经》在七世纪五十年代汇集定稿。

阿拉伯的统一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 伊斯兰教迅速传播，阿拉伯各部落迅速统一起来。穆罕默德生前，阿拉伯半岛已大体统一。他的继承人称为哈里发，集宗教、军事、政治大权于一身，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首领。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时期（632—634年），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

阿拉伯的扩张

“圣战”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宗教义务。阿拉伯半岛统一以后，哈里发就以“圣战”为号召，发动对外战争。阿拉伯贵族和一般部落成员为争夺沃土和分配战利品所吸引，纷纷参加出征。从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时期（634—644年）起，阿拉伯开始大规模地向半岛以外扩张。阿拉伯军队几乎同时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出击。手执长矛、骑着快马和骆驼的骑兵踏遍了西亚和北非。他们行动迅速，善于奇袭，不到二十年，西亚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波斯、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都并入阿拉伯的版图。接着，阿拉伯军队在北非打到大西洋沿岸，又渡过海峡占领大部分西班牙；在亚洲征服了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使东方国界的南段推到印度河以东，北段与中国唐朝的边境连接。八世纪中期，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阿拉伯人在各地设立了军事据点，有的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城市，例如两河流域的巴士拉，尼罗河畔的弗斯塔特等。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商业活动传播到半岛以外的广大地区。阿拉伯哈里发还和中国通好。651年，哈里发的使节来到中国唐高宗的朝廷。在中国史书中，留下了两国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

对外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哈里发要求不分上下过简朴的生活。战利品按规定办法分配，五分之一归“先知”和他的家属以及孤寡之人，五分之四归骑兵和步兵。土地属于国家，个人不能占有。随着西亚和北非的征服，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当地上层社会的优裕生活，严格的限制被破坏了。除了以国家名义占有的土地以外，贵族也占有大量土地，建立庄园。哈里发还把土地拨给伊斯兰教寺院，赐给军官。以哈里发为首的阿拉伯统治阶级在一些被征服地区承袭了当地的封建剥削制度，残酷剥削被占领地区的人民。税额高达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非伊斯兰教徒成年男子还要交人头税。他们责令农民在颈上锁一块铅牌，标明住址，防止农民因抗交租税而逃亡。在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制度下还有许多奴隶，有的是被奴役的战俘，有的是被掠卖的非洲人。几万奴隶集中在两河流域的出海口一带，用沉重的劳动为哈里发清除盐碱，开辟农田。

阿拔斯王朝的统治 帝国统治下的人民受到越来越深重的剥削，普遍存在反抗情绪。各地原来的封建主也反对阿拉伯人的统治。阿拉伯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地争夺政权。几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社会动乱不安。747年，在里海东南呼罗珊地区，奴隶出身的波斯人阿布·穆苏里姆以减轻赋税为号

后来紧靠着弗斯塔特兴建了开罗。

召，发动起义。战斗进行了三年，哈里发的军队彻底失败。同时在帝国的中部、西部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哈里发逃走了。贵族阿布·阿拔斯利用人民斗争，夺取胜利果实，自己当了哈里发（750—754年），建立起阿拔斯王朝。我国史称黑衣大食。阿拔斯反过来镇压起义，又把前朝哈里发的家族几乎满门杀灭。前朝后裔阿布德·拉赫曼侥幸逃脱。756年据西班牙独立，929年宣布为哈里发国家，建都科尔多瓦。我国史称白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加强了专制统治。在最初的一百年左右，它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这时扩张停止，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是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762年，新首都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开工兴建。这是一座圆城，围有城墙三道。城中央矗立着豪华的哈里发皇宫，金色宫门，绿色圆顶。哈里发向每个城市征调第一流的工匠约十万人，修了四年才告完成。宫内铺着华贵的地毯，挂着数万幅精美的帐幔，摆着金银器皿和宝石镶嵌的用具，装饰着精细的金银手工艺品。哈里发为了确保安全，只让达官贵人住在城内。普通老百姓都住在城外。

王朝初期，农业和手工业都取得显著的发展。农业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受到哈里发的重视。他们鼓励全国各地整修农田，恢复生产，特别是在帝国中心地带两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新开了许多运河和干渠。肥沃的两河流域下游、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等地，水道纵横交错，灌溉便利，谷物水产丰饶，都成为鱼米之乡。手工业如丝绸棉毛纺织、刺绣、玻璃制造、宝石工艺、造纸等，都很著名。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商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巴格达很快就扩展到河流以东，发展为国际性的都市。在漫长的码头旁边，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阿拉伯商人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麝香，印度的香料、染料和宝石，非洲的黄金、象牙和奴隶等等，川流不断地运到巴格达。巴格达还专门设有中国货的市场。不少商人常来中国。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和长安，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商人。

哈里发还延揽人才，奖励学术文艺。各地办起许多图书馆和学校，有的附设于清真寺，有的由国家或私人开办。文化兴旺发达。

工商业的繁荣为哈里发积聚了惊人的财富。他们渐渐不理政事，越来越迷醉在奢侈的宫廷生活里，在宴会、歌舞和游乐中消磨时日。他们挥金如土。九世纪初，一个哈里发和宰相女儿结婚时，据说把金盘里面托着的一千颗大珍珠撒在他们身上。许多麝香丸抛向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丸内附有礼券，写着田地一份，或者奴隶一名，等等。哈里发完全变成了深居皇宫的专制君主。

阿拉伯帝国的分裂 阿拉伯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汗上面的。在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背后，农民和奴隶的处境十分困苦。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激化。816年，阿塞拜疆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在巴贝克领导下举行三十万人的大起义，要求取消捐税，实行土地公有，坚持斗争达二十一年之久。869—883年，在两河流域东南部开垦土地、备受饥饿和劳役之苦的黑人掀起了震动帝国的黑人奴隶大起义。不久，又一次人民起义席卷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周围地区。

无数次人民起义打击了哈里发的统治。与此同时，各地的封建主逐渐扩

大权力，不服从中央的管辖。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从北非到中亚细亚，纷纷出现独立的封建政权。909年，在突尼斯一带建立了法蒂玛王朝，统治者自称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后裔。法蒂玛王朝很快就占领整个北非，969年占领埃及以后，立即兴建开罗城作为首都，我国史称绿衣大食。它继续扩张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西岸一带，一度成为北非和西亚的一个强国。阿拔斯王朝只剩下巴格达周围的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1055年，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巴格达，哈里发只保有宗教首领的地位，名存实亡。1258年，蒙古军队攻下巴格达，杀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告终。

穆斯林学者在钻研学问

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帝国的辽阔土地包括不少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又同中国、印度、东罗马等文化昌盛的大国接壤。在继承和交流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阿拉伯文明超过当时西欧若干世纪。

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们保存并传播了古代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长期动乱中，许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毁坏流失，一部分通过东罗马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的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还把许多古代作品例如希腊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西欧在封建社会初期文化十分落后，西欧人后来是通过阿拉伯文译本才又重新认识这些学术成就的。

阿拉伯人足迹遍于亚、非、欧三大洲，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媒介。他们吸收了印度十个数字的记数法，把它介绍到欧洲，推动了欧洲数学的发展。由此产生“阿拉伯数字”的名称。他们把中国古代的技术传到西方。八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利用中国工匠的技术，在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建立造纸作坊。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为阿拉伯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罗盘针、印刷术、火药和火器，以及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知识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介绍给欧洲的。阿拉伯人把中国制造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石叫做“中国雪”，用于医疗和冶炼金银等方面。频繁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不但带来了伊斯兰教，也带来了阿拉伯的数学和天文等知识。

阿拉伯人不但善于吸收其他文化，还在钻研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穆罕默德·伊本·穆萨（约780—850年）是一位大数学家，编有《积分和方程算法》，它是最早的关于代数学的著作，后来传到欧洲，直到十六世纪一直是欧洲的大学教材。巴格达等不少城市建筑了天文台，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阿拉伯的天文学家制造了相当精密的测天仪。他们还假定大地为球形，测量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推算地球的体积和圆周。阿拉伯的医学也很发达。阿拉伯人开办了药剂学校和药剂工厂，编制了药方集，设立了医院。拉齐（拉齐斯，约850—925年）是著名的化学家和医生，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著有許多关于炼丹术和医学的著作。前者当中最著名的是《秘典》，里面有丰富的化学知识；后者当中最著名的是《医学集成》，吸取了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医学知识，并增加了新的内容，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他又写了一篇《天花和麻疹》，其中记有关于天花的最早的临床记录。他的外科医术很有成就，串线法被认为是他发明的。根据阿拉伯文献的记载，他曾经把二世纪时的医

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在1171年被萨拉丁（见“十字军东侵”章）所废，法蒂玛王朝告终。

学家盖伦的一部医学著作用阿拉伯语口述给一位住在阿拉伯帝国的中国学者，由后者翻译成中文。大医学家阿维森纳（伊本·西那，980—1037年）学识渊博，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一百多部，涉及哲学、科学和艺术等许多方面，他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典》采撷了各国的医药成就，探讨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被欧洲各大学用为医学教材，在世界上长期被视为著名医学权威。

阿拉伯人研究自然科学注重实验，从中积累事实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现代欧洲语言中的一些科学名词，如英文的代数（algebra）、炼丹术（alchemy）、碱（alkali）等，都渊源于阿拉伯语。

阿拉伯学者留下了一些历史作品，有的是编年体，有的是纪传体，或记载阿拉伯人的战事，或叙述各地的历史。阿拉伯商人和旅行家写下了各地的见闻，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知识，给人们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资料。他们关于非洲和亚洲的记录尤其可贵。早在九世纪，阿拉伯人就写了关于中国的游记。有关非洲的早期历史，许多资料来自阿拉伯人的作品。

阿拉伯的文学园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译《天方夜谭》）以波斯、埃及、印度的民间传说为素材，经过许多人的辗转复述，在十二世纪加工成书，十六世纪最后定型。它透过一个美丽、机智的女子向横暴的国王叙述的娓娓动听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阿拉伯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各地的人情风貌，使人仿佛看到当时巴格达和开罗等城市的生活情景，看到阿拉伯人勇敢的航海生活。故事引人入胜，一直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第二节 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蒙古族早先居住在额尔古纳河的东部,后来逐渐向西扩展,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广大土地上。少数部落在北部和西部森林里以狩猎为生,多数部落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牛、羊、马和骆驼。牲畜公有,同部落的人共同游牧。每转换一处牧场,牧民们就支起毡帐。部落首领的毡帐居中,普通牧民的毡帐在四周围成圆圈。游牧部落自己修造车辆和帐篷,也用牲畜向邻近民族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他们从汉族输入铁器、布匹和茶叶等产品。蒙古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曾先后处在唐朝和辽、金的管辖之下。

大约十二世纪,牲畜开始转为私有,富裕的家族开始单独放牧,形成游牧贵族阶级。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建立起亲兵队伍,互相混战。他们夺取牲畜,霸占牧场,奴役被征服的部落和俘虏,强迫他们照管畜群,修剪羊毛,挤牛羊奶。那时候,蒙古各个部落互不相属,也没有巩固的部落联盟。

在部落的混战中,居住在斡难河上游一带的一个部落,在首领铁木真(1162—1227年)的统率下联合一些部落攻打另一些部落,接着重新集结力量攻打原来的同盟者。他按十进制组织军队,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军职,挑选忠于他的亲信担任千夫长和百夫长。铁木真特别吸收贵族子弟建立一支护卫军,作为自己的近卫和主力队伍。铁木真加强了力量,降服了蒙古各个主要部落。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召集各部落的贵族大会。贵族们推戴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国家宣告成立。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把军事和行政组织结合起来。他推行“领户分封”制,能够抽出十人当兵的居民编成十户,上面逐级成立百户、千户和万户。大汗分封贵族亲信为万户长、千户长和百户长。他们领有封户,成为封建领主,有权在各级组织里统治牧民,支配牧场。法令禁止牧民从一个十户擅自迁入另一个十户。平时,牧民向大汗和贵族纳税,服役。捐税以牲畜为单位计征。战时,适龄男子都自备战马和武器,编入军队。成吉思汗实行军事独裁。他把护卫军扩充到一万人,作为独裁统治的有力保证。

蒙古帝国的建立 统一的蒙古国家的建立,制止了蒙古的部落混战,展开了蒙古社会发展的前景。但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利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把蒙古人民的力量投向侵略战争。蒙古骑兵踏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蒙古骑兵

1211到1216年,成吉思汗进攻衰朽的金国,1215年洗劫了金的首都中都。成吉思汗在出征中看到金兵使用的火炮和石弩。他掳走汉族工匠,强迫他们以奴隶身分制造攻城武器。

1219年,成吉思汗发兵西侵中亚细亚。当时中亚细亚最大的王国花刺子

斡难河即今石勒喀河和它的上游鄂嫩河。

“成吉思”的意思,有人解释为海洋,有人解释为强盛。“汗”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中都,今北京。由于蒙古军队的南下,金国已在1214年把首都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

模，辖有里海、咸海、帕米尔、波斯湾之间的地区，疆域广大，但是政权很不稳定。面临蒙古的入侵，花刺子模不能组织全国性的抗战。首都玉龙杰赤的人民在围困中苦战半年，城破以后，还继续进行了七昼夜的巷战。蒙古军队在屠城以后，又掘开附近的堤防，放水淹城。其他地方的人民，尤其是工匠和城市贫民，也奋勇保卫自己的家乡，但是一城一地孤立的抵抗都失败了。蒙古贵族野蛮地屠杀人民，摧毁农田灌溉渠道和城市文明。他们把工匠掳走，单在撒马尔罕，就掳走了三万人之多。蒙古军队灭了花刺子模，追击花刺子模王族直到印度西北境内。

一支蒙古军队绕过里海南岸，越过高加索山，闯进南部罗斯草原。蒙古军队打败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又打败了一些罗斯公国的联军。

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蒙古，第二年，他又率兵南下，计划征服西夏和金。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病死在六盘山。

二十年间，在东起海边，西到里海的土地上，成吉思汗乘各国的分裂和衰弱，凭借军事力量，建立了空前的军事封建大帝国。他把帝国分封给四个儿子。儿子越是年长，封地离蒙古本土越远。长子术赤得到咸海、里海以北之地，次子察合台得到天山地区和阿姆河以东之地，三子窝阔台得到鄂毕河上游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之地，四子拖雷按照习惯守护祖业，得到蒙古本部。

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分裂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大汗位（1229—1241年）。不久，蒙古继续发动侵略，征服了高丽，灭了金。1236年，术赤的儿子拔都统率大军远征欧洲。罗斯各公国顽强地抗击蒙古的侵略。梁赞、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基辅等许多城市被战火毁坏，人民经受了惨重的牺牲。拔都从罗斯分兵两路西进，一路攻到波兰西境，一路冲过匈牙利，把战火烧到亚得里亚海滨。整个欧洲都震惊了。但是罗斯和东欧其他各族人民的抵抗给予蒙古军队很大打击。1242年，窝阔台去世的消息传到军中。拔都停止了军事行动。在东起额尔齐斯河，南到高加索，西抵德涅斯特河，北至罗斯境内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他在伏尔加河下游建萨莱城，定都于此。

拖雷的儿子蒙哥做大汗的时候（1251—1259年），他的弟弟忽必烈进军云南、四川一带，攻占大理，并且进攻印度支那半岛的北部。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征服了波斯全境，侵入两河流域，1258年攻下巴格达，结束了哈里发的统治。城中一连七天遭到抢劫，数十万居民被屠杀，许多艺术品和宏伟建筑都被破坏。1260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被埃及素丹所败，停止西进。从此阿姆河、印度河以西包括两河流域一带，成为旭烈兀的封地，叫做伊儿汗国。

这样，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十分强大。在这个大国里，中央和地方政权都由蒙古贵族掌握。窝阔台在位时候，把贵族派到各地任地方长官，实行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蒙古贵族无情地剥削农民；把工匠或者掳到蒙古，或者编在各地的作坊里充当奴隶。历次远征中的俘虏大量沦为奴隶，被迫服最艰苦的劳役，参加最危险的战斗。各地人民不能容忍异族压迫和苛重的剥削，反抗斗争连年不断。许多农民离乡逃亡。十三到十四

花刺子模曾先后被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十二世纪晚期独立。

又译作兀笼格赤、乌尔鞬赤等。

大理统治云南全境和四川的西南部。

素丹是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常使用的称号。1250年，阿尤布王朝告终，埃及进入马木路克素丹统治时期。

世纪，中亚细亚、波斯、阿塞拜疆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打击蒙古统治者和当地大封建主。

在蒙古帝国，商业受到特殊的重视。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推广了中国的驿站制度，用大量汉族工人开山辟路，修桥梁，筑驿站。他还派人保护道路，颁布保护行商的法令，使东西交通出现畅通的局面。许多蒙古贵族都向商队投资，牟取厚利。在各地，尤其在中亚细亚，不少富商被选任官吏。但是蒙古帝国的商业大都是过境贸易，很少促进商路两侧的生产，因此也很少巩固帝国各部分的经济联系。

蒙哥以后，忽必烈称大汗（1260—1294年），在中都东北郊营建新城，建都于此（1272年改称大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他受到南宋军民的长期抵抗，1279年才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就在忽必烈统治初年，蒙古帝国结束了短短几十年的统一。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的封地这时已经扩大，分别成为实际上独立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不再受大汗的节制；各汗国内部也四分五裂了。蒙古侵略者以少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各地，往往处身于比蒙古社会发达得多的封建社会，逐渐为多数被征服者同化了。

中国文化的西传 蒙古帝国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的交通。元朝同二十多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在元朝的军队和朝廷里，都有来自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人。欧洲基督教士衔着罗马教皇的使命，来到中国试图传教。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朝得到忽必烈的任用。他游历过中国的许多省份，又在往返途中分别经过中亚细亚、南洋、印度等地。回国以后，他口述东方见闻，请人笔录成书，那就是《马可波罗行记》。他介绍了亚洲国家的风土人情，着重描绘了中国城市的繁华，叙述了元朝的朝政、宫廷生活和历史掌故。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兴趣，很快被译成几种文字，广泛传抄流行，引起了好多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元朝大量印造纸币。十三世纪末，伊儿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仿效中国办法发行纸币，从此中国的刻版印刷术在波斯一带开始应用。后来，活字印刷术也从元朝向西方传播。关于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西传。十三世纪，蒙古军队进攻阿拉伯帝国时用过火器。1260年，埃及素丹打败蒙古军队，许多蒙古士兵投降，为埃及素丹提供了制造火器的工匠。后来火器制造方法传入伊斯兰教各国，一直传到欧洲。

窝阔台汗国在十四世纪初并入察合台汗国。

第三节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是突厥人的一支，原来是中亚的游牧部落。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向外扩张的时候，他们也从中亚的呼罗珊地区西迁。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分裂，这时候在小亚细亚兴起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罗姆素丹国。奥斯曼土耳其部落就投附于这个国家，部落首领埃尔托格鲁尔从罗姆素丹手里得到一块封地。这块封地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部，与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相邻。蒙古军队西侵以后，罗姆素丹国家解体。埃尔托格鲁尔的儿子奥斯曼在位时(约 1282—1326 年)乘机扩张势力，取得独立。这个国家由于他而得名奥斯曼土耳其。

土耳其骑兵

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实行军事采邑制度，领主向农民和牧民征税，实际上就是征收封建地租。军事封建贵族掠夺成性，为了夺取新的土地和战利品，他们不断率领部众发动对外侵略。奥斯曼土耳其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扩张的道路。

奥斯曼土耳其不断合并原来罗姆素丹国的土地，又蚕食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在他死后不久，小亚细亚的东罗马残余领土全部并入版图。接着，奥斯曼土耳其就把矛头指向海峡对岸的欧洲。首当其冲的是东罗马帝国。

十世纪的保加利亚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六世纪时盛极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几百年来日益走向衰落。在长期动乱中，国力逐渐削弱下去。境外强邻先后兴起，形成对帝国的严重威胁，帝国的领土一块块地沦于邻国之手。七世纪初，西哥特人收复东罗马占领的西班牙南部的土地，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又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方，一直深入到小亚细亚。东罗马虽然在 627—628 年打败波斯军队，随即收复这些地方，但是不久之后阿拉伯人大举出征，上述这些地方以及北非其他地区又先后落到阿拉伯人手里。七世纪晚期，巴尔干半岛上形成了保加利亚国家。它的疆域起先不大，只限于多瑙河下游靠近黑海一带地方，后来逐渐向西南扩展，到十世纪初期已经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大国，并曾几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虽然在十一世纪初保加利亚被东罗马征服，但是一度称盛的塞尔柱土耳其帝国接着又兴起于西亚，东罗马所属的小亚细亚大都为它所夺。十二世纪晚期，保加利亚复兴，塞尔维亚摆脱东罗马而独立。东罗马处在腹背受敌的地位。1204 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未被十字军占领的东罗马的领土分裂为几个小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帝国。尼西亚帝国虽然在 1261 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灭掉了拉丁帝国，但是东罗马帝国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过去的繁荣，在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侵略面前，完全无力应付，很快就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起一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进行骚扰抢劫。十四世纪下半期，他们开始侵入欧洲大陆，1362 年占

领阿德里亚堡，不久以后迁都于此。君士坦丁堡处于包围之中，与巴尔干半岛隔断，只有海路相通。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接着占领色雷斯的东部，掳获大批战俘，把他们运往小亚细亚充当奴隶。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

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打败巴尔干各国的联军，征服塞尔维亚，然后继续进军，四年之后征服保加利亚，使整个西欧都感到震惊。匈牙利的处境尤其岌岌可危，国王西吉斯蒙德呼吁组织力量抵御土耳其的进攻，他取得教皇的支持和

尼科堡战役后土耳其要求战败的基督教徒交赎身税

欧洲几个国家的骑士的响应。1396年，他亲自率领欧洲封建主的联军在多瑙河边的尼科堡附近与土耳其军队会战，结果大败。巴尔干大部分土地沦陷。东罗马主要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城一隅之地和部分伯罗奔尼撒半岛，加以政治腐败，统治集团长期内江，国力更加衰落。1422年，土军围困君士坦丁堡，第二年侵入伯罗奔尼撒，大肆蹂躏。东罗马皇帝只好同奥斯曼土耳其素丹在1424年订立条约，同意交纳贡赋，帝国才得以苟延残喘下来。

1453年，土耳其素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统率大军约十五万人，船只约三百艘，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勉强凑集了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希腊人组成的队伍约八千人同土耳其的大军抗衡。4月6日，土耳其军队的重型铜炮开始从西面攻城，一枚枚约半吨重的石弹射向城墙。由于城防坚固，城市北面的金角湾又有铁链封锁，土耳其人一时未能取胜。后来土耳其人与金角湾对岸加拉太区的热那亚商人串通，土耳其人答应保留热那亚人在加拉太区的商业特权，以此换取对方同意让土耳其战船过境进入海湾。土军在加拉太用木板铺了一条路，上涂油脂，使它滑润，然后把七、八十艘船拉过涂油滑板，运进金角湾。土军很快就在金角湾上架起一道浮桥，使君士坦丁堡面临来自海陆两方面的炮火。土耳其军队在5月29日发起总攻，打破城墙，涌入城内。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1449—1453年在位）在战乱中身亡。经过七、八个星期的苦战之后，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入城土军连续三天屠杀掳掠，抢劫皇宫、教堂、修道院和居民住宅，破坏大量艺术品和手稿，残杀无数老幼妇孺，掳走大批居民去当奴隶。往日名城顿时一片萧条。穆罕默德二世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然后从小亚细亚和希腊某些地方迁来居民，加以重修，随即迁都于此，改称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改为清真寺。这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将近一千年，东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扩张 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扩张。十五世纪后半期，土耳其已经几乎占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还攻占了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汗国。截至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土耳其军队在亚洲占领外高加索、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麦加、麦地那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沿海地带；在非洲占领由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大片地区；在欧洲，土耳其攻下贝尔格莱德，几次进兵匈牙利，匈牙利大部分土地沦陷。1547年，匈牙利被迫同意向土耳其素丹交纳年贡。奥斯曼土耳其国家

原来建都于小亚细亚的布鲁萨。

1930年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改名。

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苏里曼一世在位时（1520—1566年）是土耳其帝国的全盛时期。帝国疆域辽阔，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首都已经重现繁荣。苏里曼一世奖励文学，提倡学术。他本人就擅长写诗，还写了一本历史日记，这本日记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苏里曼还组织编纂法典，建造寺院。清真寺里设有学校，传播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

土耳其是军事封建专制国家。素丹掌握军事、政治、宗教大权，又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素丹自己拥有大面积的肥沃土地，其余土地一小部分赐给功臣，大部分以服军役为条件，封给封建贵族。农民领有小块土地，可以世袭使用，但是不经领主许可，不能离开。穆斯林农民要交纳各种收获物的十分之一，非穆斯林农民负担更重，有时要交纳一半收成，另外还要交人头税。除纳税外，农民还必须服各种劳役。

土耳其军队在战争中掳到很多奴隶，有的用于农业劳动，有的用于采矿，有的用作桨手，有的用作宫廷奴仆，或者充当太监、姬妾，处境悲惨。还有许多十几岁的青年战俘和基督教家庭的子弟被挑选去补充战斗队伍，称为“雅内萨里”，意思是新军。他们必须接受伊斯兰教，过集体的生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战士，一小部分接受特殊培训以后，被录用为军事、行政官吏。“雅内萨里”待遇优厚，但是一旦被认为失职或不忠诚，就随时有被革除的危险，甚至丧失生命。

土耳其征服的后果和帝国的衰落 土耳其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后果。它控制了东地中海，特别是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在那些地方设立重重关卡，征收货物过境税。土耳其舰队时常出没于地中海和黑海，侵袭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岸。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西欧国家因此急切地去探寻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土耳其对被征服的地区实行残酷掠夺，当地的大部分财富流入君士坦丁堡，给人民带来了贫困和死亡。例如希腊海岛上的居民，三分之二被迁往君士坦丁堡去补充那里的人口，相当一部分被掳去作为奴隶，只有体力衰弱的人才留在原来的地方种地。手工业生产首先是为了供应宫廷和军队的需要，价格都由政府规定。劳动人民处在外族统治者和本地封建主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困苦。土耳其的统治延缓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它们长期处在落后状态。

从十六世纪后半期起，土耳其帝国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人民所负担的捐税繁重，而且随着军事和行政开支的增加，名目越来越多。税吏营私舞弊，从中渔利，封建贵族兼并土地，弄得民不聊生，反抗情绪越来越大。十五、十六世纪小亚细亚多次爆发人民起义，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归还封建主霸占的土地。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到十六世纪末已经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激烈。争取摆脱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此伏彼起。1608年，叙利亚一带燃起了独立斗争的火焰，宣布脱离帝国，结果被素丹残酷地镇压下去，据说被屠杀者达十万人。统治集团内部时常为了继承问题造成宫廷流血事件，新素丹即位时，往往要翦除自己的兄弟，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封建贵族一方面把封地作为私有财产，一方面却逃避军役，成为一支离心力量。官场腐朽，贪污盛行，买卖官职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雅内萨里”原来只从非穆斯林当中征调，由于待遇优裕，后来穆斯林也可以入伍，甚至政府官吏也把自己的子弟塞进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世袭职务。他们享受既得利益，成为一个特权集团，而且人数众多，掌握实力，因此常常不听中央命令，制造骚乱，参与政治斗争，甚至推翻一个素丹，拥立另一个素丹。作为战斗队伍来说，它的力量已

经削弱；但是作为加剧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却起着很大作用。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土耳其帝国衰落下去。从十六世纪后半期起，土耳其在对外战争中已是多次失败。到十七世纪末，它的军事强国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国家不再担心土耳其扩张的威胁。随着它们本身的强大，反而把拥有广袤土地的土耳其看作能够从中捞取利益的逐鹿之地了。

第四章 亚洲东部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印度

印度封建社会的形成 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后，贵霜帝国衰落，印度又是小国分立的局面。公元320年摩揭陀国国王旃陀罗笈多一世兴起，建立了笈多王朝。笈多王朝采用征服和联姻的办法统一了北印，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时期（380—414年）势力臻于极盛。五世纪中期以后，笈多王朝由盛转衰，一些省区宣布独立，白匈奴人又从西北入侵，中央权力更加削弱。到57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终于结束。北印度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此后只有七世纪初由坦尼沙邦的戒日王（606—647年）再度统一北印。但在他死后，帝国又迅速解体。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朝的三百多年中就是印度封建社会从形成到最后确立的时期。我国东晋和尚法显在笈多帝国极盛时期游历了印度（399—413年），唐朝和尚玄奘则在戒日帝国时到印度游学（627—645年）。法显和玄奘回国以后分别写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们的见闻。《大唐西域记》还描述了戒日王早期统治下北印度的情景，说那里人民守法，赋税轻薄，教育发达，生活水平较高。这两本书是研究印度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珍贵史料。

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中，印度的经济已有相当高的发展。耕作技术有了改进，实行轮作和施肥，农产品的种类和产量都增加了。养蚕、冶金、棉织等手工业也都较前进步。商业和对外贸易也比较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对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奴隶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一需要。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传说贵霜名王迦腻色伽就是在一次人民起义中被杀的。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必然为封建的剥削关系所取代。奴隶已很少使用于生产劳动，他们的解放条件和解放仪式在法典上都有明文规定。

取代奴隶的劳动者是雇工、佃农和依附农民。法典中规定了对雇工的工作要求和待遇。法显的《佛国记》提到“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这里提到的农民只纳地租，来去自由，显然指的是雇工或佃农。法显还提到一种“民户”，他们常被看成是和田宅、牛犊一样的财物，赠送别人作为礼品。这种民户不能随意离开主人和田地。这就是依附农民。

另一方面，封建食邑制和封建主阶级也得到发展。国王将土地封赐给贵族、大臣和寺院，赐地文书刻写在铜牌或布块上，载明封地位置、赠地人与受地人的姓名，最后有封地可与日月同久，传之子孙后世，不得剥夺或削减的誓言。这种赐地就成为封建主世袭的领地。其次，还有禄田。如法显所说，“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供禄就是禄田，也就是食邑。到戒日王时期，如《大唐西域记》中所说“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封建食邑制得到普遍的实施。食邑最初是终身享有，田地收入作为任职俸禄，后来也逐渐转化为封建主的世袭领地。

这时，农村公社的组织依然存在，但也有了分化。村长和文书这类公社头目一般占有较多的世袭分地，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剥削穷苦的公社成员。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小封建主。

农民对封建主要交纳地租，租额约为收成的六分之一，另外还有各种附加的苛捐杂税，如建房、结婚、举行宗教祭典等均须缴纳捐款。有的地方这

种杂税项目竟达到十八种之多。农民还须应政府的征召，无偿地服各种劳役，如兴修灌溉工程、建造寺庙等。封建剥削十分沉重。

印度在封建社会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都得到促进。笈多王朝和戒日王朝都是印度史上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以文化成就为例，除了印度古代最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以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亚利雅巴达。他已经使用现今通行的数字十进制，精确地算出了圆周率的数值。他还断定地球是绕着自己的轴旋转的球体。最负盛名的阿旃陀石窟壁画也主要是这个时期的成品。

阿旃陀石窟壁画见图版(26)

种姓制度的发展 古代的瓦尔那制度在进入封建社会时仍然保留下来，但也有了变化和发展。这时的婆罗门和刹帝利还是居统治地位的瓦尔那，但他们已是封建主而不是奴隶主了。吠舍瓦尔那中只留下了商人、高利贷者和富裕的手工业者，原来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吠舍已沦于封建依附地位，和首陀罗接近了。首陀罗瓦尔那主要就是玄奘所说的“肆力畴陇，勤身稼穡”的农人，也就是封建社会的依附农民。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由从事劳动的吠舍与首陀罗中又产生了一些不同职业的集团，叫做阇提。每一个阇提有着固定不变的世袭职业，并只能在集团内部通婚。阇提制就是瓦尔那制的发展，我国统称这两种制度为种姓制度。种姓数目很多，其中最下级的种姓从事当时认为最不洁净、最低贱的职业，如搬运死尸、屠户、刽子手等。他们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法律规定他们须穿死人的衣服，用别人不要的破容器吃饭，还有种种歧视他们的条例。法显的记载中也说这种人“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搪突。”

种姓制度在劳动人民间造成种种隔阂，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因而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统治。历代统治阶级竭力维护这一制度，直到现代还有保留。

德里素丹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各地封建领主的势力日益增强，割据一方。社会内部阶级压迫和种姓划分，矛盾重重。这一切都削弱了北印封建国家自身防卫的力量。七世纪中期戒日帝国崩溃后，政局混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开始从西北入侵，占领印度河下游信德，几达半个世纪。十世纪末又有突厥族伊斯兰教徒征服印度西北部，所到之处，劫掠一空，严重损害了印度北部的生产。他们用武力传布伊斯兰教，一些印度封建主为了保持既得利益，改信伊斯兰教，与侵略者合流。约一百五十年后，另一批阿富汗伊斯兰教徒继续向朱木拿河和恒河一带扩张。公元1206年，一个名叫库特布-乌得一丁·艾巴克的地方首领，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新的王朝，由于艾巴克是奴隶出身，故称奴隶王朝。此后三百余年(1206—1526年)更换了五个王朝，都以德里为首都，历史上称为德里素丹国。

这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封建主，他们与被统治的印度人民不仅有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他们依靠外族雇佣军作为政权支柱。地方是伊斯兰教军人封建贵族掌权。印度教徒受歧视，只能充当乡村小吏和税吏。素丹以土地分封贵族，由他们担负军职，他们可以终身享有封地上的租

在笈多王朝时期，佛教已经在印度衰落了。包含多种婆罗门教因素和佛教因素的宗教逐渐兴起，开始排挤佛教。印度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

税，死后封地归还素丹。这就是军事采邑，按伊斯兰习惯称为“伊克塔”，即份地的意思。十四世纪后期，这种采邑逐渐成为贵族的世袭领地。此外，另有伊斯兰教首领和寺院的世袭领地。这是他们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

印度农民应交的租税，旱地高达收获量的一半，水田甚至到三分之二。国家往往采取包税制，承包人向政府交纳税款后，即肆意勒索农民。此外，农民还须无偿地服各种劳役。非伊斯兰教徒的成年男子还要纳人头税。封建压迫和剥削十分沉重。城乡人民不断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有1266年恒河和朱木拿河流域的农民起义，威胁了德里的统治，但后来被素丹的雇佣军残酷镇压。

帖木儿

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矛盾，素丹与地方封建主以及各地封建主之间不时爆发封建混战，素丹宫廷也常有政变，政局极不稳定。

巴布尔

在此期间又有外族继续入侵。十三世纪前期，蒙古人曾三次侵入印度西北部，一度逼近德里。素丹虽然击退了蒙古人，但国力受到一定的损耗。1398年，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1336—1405年）率领大军十二万人由中亚侵入印度。印度军民奋起抗击，牺牲近十万人。德里仍被攻陷，全城居民几乎都遭杀害，财富被洗劫净尽。德里素丹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的王朝只能保持德里附近狭小的地区苟延残喘，德里素丹已经名存实亡，北印度再次分裂。

莫卧儿帝国 1525年，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以喀布尔为基地，乘印度分裂，南下入侵印度。次年，经过帕尼帕特大战，攻占德里，他宣布为印度斯坦大帝。后又经过康努亚和戈格拉两次战斗，击溃印度诸侯联军及德里素丹残部，统一了印度北部，建立了印度史上著称的莫卧儿帝国。这一帝国的统治时间为公元1526年到1857年。

莫卧儿帝国继续发展了德里素丹的军事采邑制。皇帝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除直辖一部分土地外，把大片土地封赐给来自中亚和阿富汗的有军功的伊斯兰教封建主，作为他们的军事采邑，称为“扎吉尔”（意思是赏赐取得的土地）。受封人即扎吉达尔，终身享有征收封地田赋的权利，但不能世袭，对封地也没有所有权。他们须向皇帝提供军事服役。年收入一百万卢比的，提供五千骑兵，大的扎吉达尔还须供应战象和部分军费。战时应召出征，平时提供无偿的劳动力，修建宫殿、陵墓、清真寺、花园、桥梁、运河、公路以及水利等工程。在帝国的边远地区和山地，印度教的王公或部落首领还保留着世袭的土地占有权。这种土地占有者称“柴明达尔”（意思是拥有土地的人），每年须向皇帝进贡一次，必要时也得出兵支援帝王的军队。此外，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寺院也世袭占有的一部分土地。帝国初期，扎吉尔制是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主要形式。十七世纪后，随着帝国的衰落，地方势力的增强，柴明达尔制也就是世袭的土地占有制才逐渐占统治地位。

印度农民仍过着农村公社的生活。他们通过公社向国家或封建主缴纳大约相当于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地租。但杂税项目很多，如人头税、收割税、家

莫卧儿是“蒙古”一词的变音。

畜税、捕鱼税、果树税、打柴税、盐税、朝圣税以及各种市场税等，十分之九的捐税都来自农村。农民还须无偿地服各种劳役。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同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公社内部开始分化，部分农民失去份地，沦为佃农和雇工；另一部分富有者则上升为地主和高利贷者。

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不堪压榨，经常掀起反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采取教派运动的形式。救世主派就是一种，他们认为救世主开始统治时，人们才能有平等和正义。这个教派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劳动人民和商人中流行，建立了公共财库和武装。十六世纪时，他们在旁遮普等地多次发动起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

巴布尔父子在位时，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还很不巩固。到了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即位后，帝国才逐渐增强。他在统治初期四出征讨，到1576年，一个北起中亚，南达文迪亚山脉，东和西都抵于海的北印大帝国就形成了。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整顿财政。他下令丈量土地，按产量分别等级，作为征收地租的标准。租额仍为收获物的三分之一，按农产品最近十年的平均价格折成货币缴纳，十年不变。他又取消了包税制，另设财务官征收。这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在行政上，他极力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将全国分成十五省，省设省督，另设财政、军务、宗教、情报等官，都直属中央，以分散地方权力。他曾试图废除军事采邑制，改用货币饷金酬报军官，遭到扎吉达尔反对未能实行。他对印度教徒和本地封建主，采取宽容和协调的政策。他娶印度教封建主的女儿为后；选用文武官员时，不歧视印度教徒，吸收印度教封建主担任重要职务；又废除对非伊斯兰教徒征课的人头税。这些改革对巩固帝国的统一，促进文化的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阿克巴死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封建主间的斗争再次爆发。到奥兰则布（1659—1707年）统治时，又恢复对印度教徒的迫害，使矛盾更加激化。封建战乱与灾荒、瘟疫接连发生，下层人民困苦不堪。旁遮普的锡克教派起义，锡克的意思是弟子。锡克教主张一神，反对印度教繁冗的仪式和种姓差别。这一教派早在十六世纪时就在旁遮普出现，初期代表商人和部分高利贷者的利益，曾接受阿克巴的赐地，和封建统治者妥协。到十七世纪后，由于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参加，才开始走向反封建的武装斗争。这时还有马拉提人、阿富汗人等的起义和战斗，沉重地打击了莫卧儿王朝。帝国日益衰落，后来沦为英国的附庸，到1857年就连名义也都废除了。

泰姬·玛哈尔陵

从公元八世纪起，随着伊斯兰教外族的入侵及其在印度的统治，伊斯兰教的文学、艺术也传入印度，与印度原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新的特色。举世闻名的玛哈尔陵墓就是一个代表。现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也是印地语与波斯语、阿拉伯语混合的产物。

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文化交流早在印度处于奴隶制社会时就已经开

巴布尔，1526年到1530年在位。其子穆罕默德·胡曼云，1530年到1556年在位。

玛哈尔陵是沙查汗（1628—1658年）为他自己和他的宠后玛哈尔建造的。陵墓高三十多米，每日有二万二千工匠劳动，费时二十二年建成。

始，到了印度进入封建社会，这种交往更趋频繁。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佛教僧侣的求法传道，其次是政府使节和商人的往来。这方面有贡献的中印两国人士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法显、玄奘、义净、王玄策、郑和等。交流的内容主要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有佛教经典，其中除宗教哲理外还有印度古典文学、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其他专门学术；这对中国的儒家哲学、传奇小说、音韵、历数、医药等均有不少的影响。又随同佛教而来的佛像的雕画、寺庙的建筑、音乐舞蹈等也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起了作用，如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等的石窟雕画都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此外，如胡椒、干姜、琉璃、珠宝以及蔗糖榨制的方法也都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中国传到印度的，如宋云介绍儒道二家学说，玄奘译《老子》一书为梵文，道家学说对印度秘宗有一定影响。又医药、数学、天文等学科，“秦王破阵乐”、叶子牌等乐舞游戏，大黄、樟脑等药物，养蚕、制纸等技术，这一些对印度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日本

日本国家和日本封建化的开始 距今数万年前，日本列岛上始有人类居住。那时，日本列岛尚未与亚洲大陆最后分离。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大概主要是从亚洲大陆移来的。

绳纹式陶器

距今约九千年前，日本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又称绳文时代，因大量发现带有绳形花纹的黑色陶器而得名。绳文时代人使用磨制石器，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生活。公元前二至三世纪，水稻和铁器从中国或经朝鲜传入日本。生产力的进步导致贫富分化，原始社会渐渐解体。这个时期特有的褐色陶器，最初发现于东京弥生町，因此命名为弥生时代。

弥生式陶器

二世纪末，九州北部形成早期奴隶制国家。《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邪马台国，已出现“大人”（贵族）、“下户”（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分化，国家机器也初具规模。女王卑弥呼拥有上千名奴隶，服属 20 几个部落，并从中国魏皇帝得到“亲魏倭王”的封号。奴隶主国家间不断发生战争，争夺土地和奴隶。在本州中部兴起的大和（奈良县）国家，逐渐征服其他奴隶主国家，五世纪统一日本。

大和国家是奴隶主贵族联合专政。最高统治者称大王，世袭大贵族拥有极大权势。他们占有大量屯仓（王室土地）、田庄（贵族私有地）和部民、奴隶。部民的来源，除移入或被俘的朝鲜和中国劳动人民以外，主要是贵族强制氏族成员转化而成的。他们为贵族所迫进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是主要生产者。他们受氏族首领统辖，不得脱离氏族，没有人身自由；主人虽不能任意加以杀害，但可赠送。他们有家室，用自己的劳动工具，耕种分与的土地，向主人纳贡赋，服徭役。大王和大贵族役使部民修筑高达七、八米、前方后圆的巨大坟墓，显示权威，足见徭役之重。部民无异于集团奴隶。

五世纪古坟

六世纪，部民制陷入危机。部民以各种形式反抗贵族的统治：或逃亡，或抗拒贡赋徭役，或袭击屯仓田庄。《日本书纪》记载，当时，“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527 年九州北部的地方豪族盘井叛乱，反对中央贵族。中央大贵族物部氏与大伴氏争权夺利。继而苏我氏又与物部氏互相火并，苏我氏消灭物部氏，势力凌驾于大王之上。奴隶主贵族统治动荡不安，岌岌可危。当时，日本近邻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和国家在统一过程中，曾不断向三国鼎立的朝鲜半岛扩张，占领了半岛南端的一些地方。这时，新罗强大起来，将大和侵略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六世纪晚期到七世纪早期，中国隋唐帝国相继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中国进入封建文化绚丽灿烂的发展时期。

三世纪末至七世纪，前方后圆坟盛行，称古坟时代。

《日本书纪》，日本最早的史书，用汉文编写，成书于八世纪初。

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日本统治阶级中的革新派立志学习中国隋唐的封建制度，进行改革。593年，圣德太子任摄政，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并改称大王为天皇。这些措施旨在削弱贵族世袭制，实行中央集权。但他没有触动部民制，幻想与苏我氏妥协，结果以失败告终。

改革派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吸取了圣德太子改革失败的教训，645年，他们经过周密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消灭了旧贵族势力的代表苏我氏，夺取了政权。接着，他们凭借政权的力量，在高向玄理等留唐学生谋划下，仿照唐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制。贵族的屯仓田庄收归国有（公田），部民转为国家公民，但奴婢和手工业部民地位不变。每六年按人口颁给口分田，死后归还。受田者负担租庸调。这样，仿效唐朝的均田制，确立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按才能选拔官吏，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施行征兵制，中央直接掌握军队。这些改革是在大化年间实行的，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是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标志。旧奴隶主贵族坚持反抗改革，672年皇室内部发生了“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取胜，继位为天武天皇。他推进改新措施，新制度才巩固下来。701年，日本修成《大宝律令》，大化改新的成果最后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日本终于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幕府政权的建立 班田制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但班田农民身负租庸调的重担，生活依然困苦不堪。八世纪，班田农民规避赋税、徭役，逃离他乡，公田荒废。743年，政府奖励开荒，规定垦田永作私产。封建贵族和地方豪族乘机招募逃亡农民，围地造田，又兼并农民的口分地，建立庄园。公田日益减少，十世纪班田完全中止。

庄园是封建贵族和地方豪族的私有地。庄园的直接生产者庄民主要是从公民转化而来的依附农民。庄民须向庄园主交纳实物地租（年贡）和劳役地租（公事）。九世纪后，贵族庄园获得不输（免纳赋税）和不入（不受政府干涉）的特权。地方豪族纷纷将自己的庄园寄进更有势力的庄园主以至中央权贵，以取得这种特权，从而形成庄司（庄园管理人）、领家（寄进庄园受领者）和本所（最高受领者）的庄园等级系统。大贵族拥有许多庄园，交错散布于全国各地。十二世纪，庄园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以上。公田（公领）也被贵族分割，采取类似庄园的管理方式。这样，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了封建土地国有制。

公地公民制瓦解了，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征兵制也随之瓦解。皇室势力日益衰落，中央政府完全丧失控制地方豪族的力量。地方豪族纷纷组成自己的私人武装，保卫庄园，扩大实力，形成新的武士阶层。武士间以同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主从关系。从者对主人呈献名簿，宣誓效忠，随从出征。主人保护武士的土地所有权，或重新颁赐土地并给其他恩赏。武士团层层相属，结成更大的武士集团。

租，田租，每段稻二束二把，一束可舂米五升。庸，力役，每年十天。调，征收地方土特产。

当时在位的是孝德天皇。他在位头五年，年号“大化”。

“寄进”是奉献的意思。

十二世纪，关四平氏和关东源氏两大武士集团互相厮杀，争夺中央政权。1167年，平氏首领平清盛掌握中央政权，但不到二十年就被源氏首领源赖朝消灭。1192年，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建立称为幕府的新政权。天皇成为政治傀儡，仅仅保持精神权威。镰仓幕府末年，后醍醐天皇企图复辟天皇政权。1333年，他纠集不满幕府的武士，举兵推翻幕府，不久即被幕府将领足利尊氏所粉碎。1336年，足利尊氏自任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建立新的幕府。后醍醐天皇逃到京都以南的吉野，另立朝廷，出现南北朝对峙的局面。1392年南朝终于统一于北朝。

幕府政权不同于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贵族专政。它是大小领主独立统治领地、领民的封建领主专政。幕府设有简单机构，统辖和监督武士，管理将军家财政、处理诉讼特别是领地诉讼等事务。1232年，镰仓幕府制订的《御成败式目》，是幕府统治的根本大法。其内容主要也是有关武士身分、任务，领地继承、转让和处分等的规定。

幕府统治以庄园制为基础，但又不断侵蚀着庄园制。镰仓幕府向各“国”派守护，掌握地方军事权和警察权；向各庄园派地头，警卫庄园，管理土地，包收年贡。室町幕府赋予守护更大权力：管理庄园和公领，包收年贡并分取其一半，征收土地税以及裁判权等。守护与地头等武士结成主从关系，成为拥有许多家臣、割据一“国”或数“国”的地方封建主守护大名。

1467年，守护大名间爆发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内战。此后，室町幕府名存实亡，全国分裂，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年）。战国时代群雄并起，有力家臣谋杀主家，取而代之，上升为新大名的事例，屡见不鲜。他们互相攻伐，扩张势力，竞争雄长，在所控制的疆域内，一扫庄园、公领、小领主等交错的多层统治，实行统一的直接统治。经过近百年大名混战，庄园制彻底崩溃，形成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在幕府统治下，农民遭受幕府、庄园主、守护、地头等层层榨取。室町幕府后期，大名割据混战，烧杀抢掠，饥荒瘟疫流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自卫反抗。十五世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在商业发达、高利贷资本渗入农村、农民分化的近畿地区最为激烈。1428年，近江“国”（滋贺县）农民暴动，席卷京都、奈良及邻近诸“国”。起义者袭击当铺，夺回典当物品，烧毁契券。1485年，山城“国”（京都府西部）起义者赶走守护的军队，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坚持七年之久。农民还利用宗教形式，与封建主搏斗。1487年，加贺“国”（石川县西部）一向宗起义军十三万人，进攻大名富樫政亲，迫使他自杀。一向宗教徒掌握加贺“国”达一个世纪。十六世纪后，农民斗争仍有发展，严重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促进了日本的统一。

德川幕府和“锁国”政策 战国时代，工商业繁荣，城市兴起，全国经济联系加强。大城市挣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取得自治。如对外贸易中心堺市，势力强大，三十六家豪商组成市政权，拥有一支雇佣军和自己的法庭，拒绝向封建领主交纳年贡。商人们反对割据混战，要求统一。当时，对外贸

国为日本古代、中世纪的地方行政单位。

名指田地，大名意为拥有大片田地者。

近畿地区包括：京都、大阪、奈良、兵库、和歌山、滋贺、三重等府县。

一向宗是佛教净土宗的支派，认为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便能超生极乐世界，在农民中广为流传。

易也很发达，商船远航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大多掌握在大名手中。十六世纪中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开始到日本活动，他们供应大名枪炮，谋求扩大殖民势力。有些封建领主利用西洋枪炮，依靠商人的支持，逐渐在兼并战争中形成了足以统一全国的力量。

1573年，尾张国（爱知县）封建领主织田信长占领京都，推翻室町幕府，开始统一事业。织田信长镇压了一向宗农民起义，控制了六十八“国”中的三十多“国”。1582年，他遭部下袭击，自杀身死。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他前后不到八年统一了全国。丰臣秀吉致力于重建和巩固对农民的封建统治。从1582年起，在全国进行土地丈量（检地），按土地肥瘠划定等级，确定标准收获量（石高）和年贡征收率以及负担人。通过检地，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正式确立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1588年发布“刀狩”令，没收民间武器，禁止人民佩刀；携带武器成为武士特权。武士聚居在大名的城堡，禁止转为农民和工商业者。从此，兵农分离。但是丰臣秀吉未能建立有效制度，统制大名。1598年，丰臣秀吉死，其子秀赖年仅六岁，织田信长的另一部将德川家康乘机取而代之。德川家康逐步翦除敌对的大名，经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称德川幕府。

德川幕府规定“天子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把天皇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幕府集中了全国的一切权力。将军直辖领地（天领）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包括江户、京都、大阪、长崎等重要城市和金银矿山。其他土地分赐大小封建领主。拥有产米一万石以上领地的称大名，共约二百几十家。大名的领地称藩。最大的藩主前田氏领有一百余万石。大名须效忠将军，遵从幕府法令，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在藩内则是全权统治者，一般不受幕府干预。这种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统治制度，称为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吸取丰臣氏灭亡的教训，建立严格制度，统制大名。幕府按亲疏分大名为三类：亲藩，将军的同族；谱代，德川氏早期的家臣；外样，关原战后臣服德川氏的大名。亲藩、谱代是幕府政权的支柱，多封于富庶之区和形胜要地，并参予幕政。幕府对外样大名存有戒心，多封于西南或东北边远地区，他们对幕政没有发言权。幕府不断剥夺、削减、调换或重新分配大名领地，使天领、亲藩、谱代、外样交错分布，互相监视，互相牵制。1635年，幕府制定《武家诸法度》，它规定：大名不许新建城堡和超越藩境活动，不得私自联姻和与朝廷相通，不得私争和隐匿违法者。其中关于“参勤交代”的规定，要求大名隔年须到江户觐见、侍奉将军一年，妻子留作人质，常住江户。这项规定成为削弱和控制大名的手段。幕府凭它的优势力量和一些严厉规定，制服了放荡不羁、反复无常的大名，保持了二百六十多年比较稳定的统治。

德川幕府沿袭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建立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全国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各等级世袭，互不通婚；日常生活各有严格规定，不得逾越。士即武士，包括将军、大名和他们的家臣，完全脱离生产劳动。修文练武，担任各级官吏，统治和镇压人民，是他们唯一的职责。武士享有佩刀称姓的特权，即使最低级的武士，对他认为无礼的平民，也有资格杀勿论。武士连同家属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他们是典型的寄生阶级。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地位虽仅次于武士，但他们不过是领主榨取年贡的对象。1649年的乡村告示（《庆安触书》）说：“只须交清年贡，舒适安泰

莫如农民”。而年贡征收的原则则是“让农民无所余，又无不足”。幕府剥夺农民迁徙、变更职业、买卖土地等一切自由，实行村请制（以村为单位征收年贡）和五人组制（五家联环保），以保证年贡的榨取。在幕藩体制下，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又动弹不得。幕府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被排在四民之末。他们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实力日益加强。大名武士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他们，以至有“大阪商人一怒，则天下大名为之战栗”的说法。但商人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幕府大名可以一纸命令，取消其债权，剥夺其财产。幕府为了替这种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尊崇宋儒朱熹创立的朱子学为官学，排斥一切异端。朱子学宣扬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安分知足”等儒家思想，也成为幕府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成为“武士道”的精神支柱。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以传教士为先导的欧洲殖民势力迅速向日本渗透。全国天主教徒从三十万人猛增到七十万人。长崎变成了外国教会的领地。丰臣秀吉统一九州，收回教会领地，开始禁止天主教。德川幕府继续丰臣秀吉的政策，三令五申，严加取缔。驱逐外国传教士，破坏教堂，强迫信徒改宗，对拒不改宗者施以酷刑。并规定所有日本人都要归属一个佛教寺院，证明宗教身分。1637年，岛原、天草地方农民因不堪幕府新派领主的苛政，发动起义。失去主家、不满幕府的当地天主教武士领导起义者据守岛原的原城。幕府调动十八家大名，出兵十二万，围城四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震动了幕藩统治者，使幕府决心“锁国”。1639年发布最后一道“锁国”令，规定除中国、荷兰外，禁止日本人与外国通商。幕府“锁国”着眼于禁止天主教和垄断贸易，以巩固幕藩体制，维护日本的统一和独立。但“锁国”是消极办法，它没有把防止殖民势力入侵同保持正常国家交往和吸收外国技术区别开来。闭关自守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使日本面临西方列强逼迫开国时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

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历史的黎明时期，中日两国就有文化交流。日本和中国出土的旧石器制作技法相似，如出自同一匠人之手，就是明证。公元一世纪，日本列岛上的部族国家开始与中国汉朝建立外交关系。57年，倭国遣使朝贡，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这颗金印1784年发现于博多湾志贺岛，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汉字传入，日本始有文字。五世纪时，日本人用汉字表意记音，后来借用汉字创造了称为“假名”的日本字母。日本最早的文字，留传至今的有《宋书》记载的478年倭王武所上表文，这是纯粹的汉文。还有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隅田八幡神社所藏的画像镜铭文、以及近年发现的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这三件铭文已是夹杂着汉字表音和日本语法的汉文。

金印

从630年日本派遣第一次遣唐使到894年遣唐使中止，这二百六十四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在这期间，日本政府向中国唐朝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每次遣唐使都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著名的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最澄等。他们在中国学习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医药科学等，在沟通两国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753年，唐代高僧鉴真年逾六十，双

目失明，虽几经失败仍毅然东渡日本，传播佛教。鉴真亲自参与规划兴建的唐招提寺，至今屹立在日本古都奈良，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奈良博物馆正仓院保存了许多唐朝传入的工艺品，如铜镜、刀、尺、毛笔、砚台、乐器、屏风以及鞋、玉等等，这些珍贵文物说明两国文化交流丰富多采。

唐招提寺金堂

鉴真

遣唐使停派后两国外交关系时断时续，经济文化交流则始终不绝。平氏政权和镰仓幕府积极推进两国的贸易。室町幕府对到中国贸易的商船颁发“勘合符”（特许证），以防倭寇骚扰。十三世纪，日本陶工藤四郎到中国天目山学习烧磁技术，回国后在濑户村（在爱知县）建窑烧制，发展为日本有名的“濑户烧”。弥左右卫门从中国带回称为“博多织”的纺织方法，才使日本纺织生产迅速发达。十四世纪，福建刻版工五十余人移居日本，对日本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国铜钱大量流入，作为日本的国内货币长期流通。德川幕府“锁国”后仍允许中国商人在长崎贸易，长崎成为当时日本对外联系的唯一窗口。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两国间发生过几次战争。例如，663年唐朝与新罗联合大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1274年和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兵入侵日本，因遭暴风雨和日本人民的抵抗，惨败而回；明代时，日本武士、商人结成海盗集团“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十年，1565年为戚继光等所平定；1592年丰臣秀吉发兵三十万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叫嚣“日本刀剑锐利之国”征服“大明长袖之国”不在话下，但为中朝联军彻底粉碎。两国统治阶级以兵戎相见的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占短暂的一瞬间，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毕竟是历史的主流。

第三节 朝鲜

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国家 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古时候就有居民在那里生活和劳动。朝鲜北部发现过打制的旧石器。大约四、五千年以前，朝鲜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的遗址遍布朝鲜各地。在江边、海岸和岛屿上，还发现了许多贝冢，说明朝鲜居民很早就过着定居生活。他们不但从事渔猎和畜牧业，也发展了农业。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朝鲜出现了青铜器，稍后又有了铁器。发现的金属器有铜剑、铜镜、铜钱、铜手镯以及铁刀、铁犁、铁锄等，有中国出产的，也有朝鲜本地制造的。

公元前五到四世纪，朝鲜北部一带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习惯上称为古朝鲜。

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不断有人移居朝鲜半岛。在战国末年和秦汉之交，由于中国时局动荡，战争频繁，不少北部居民前往那里定居。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徙居朝鲜半岛，得到古朝鲜王的允许，定居在半岛的西北部。卫满逐渐扩大势力，公元前 194 年推翻古朝鲜政权，自立为王。

公元前 108 年，中国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最后的两个郡不久撤销。玄菟郡治后来迁到辽东。乐浪郡以平壤为中心。公元二世纪末，从它的南部又分出一个带方郡。

半岛南部居住着韩族。公元前后，这里形成了几个部落联盟。马韩部落联盟在半岛的西南部，辰韩部落联盟在半岛的东南部，弁韩部落联盟介乎二者之间。

从三国时代到新罗统一 公元前后，朝鲜半岛北部兴起了高句丽奴隶制国家。此后，南部原马韩地区兴起了百济奴隶制国家，原辰韩地区兴起了新罗奴隶制国家。半岛上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史称“三国时代”。高句丽不断扩张势力，四世纪攻占了乐浪郡，同时百济攻占了带方郡。两国因此接壤，时常发生冲突。新罗在六世纪中期从百济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又占领洛东江流域，大大地便利了新罗的对外交通。新罗通过汉江的出海口直接与中国往来。新罗与中国唐朝联合，在 660 年灭百济，668 年灭高句丽。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朝鲜半岛北部，在百济扶植傀儡政权。新罗开展收复百济、高句丽旧地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朝鲜人民的抗击下，676 年，唐朝不得不把安东都护府内迁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新罗统一了大部分朝鲜半岛。735 年，唐朝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之地属于新罗。

新罗封建制度的发展 三国时代，朝鲜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大的发展。金属制造和纺织等技术有了显著改进。新罗十分重视灌溉事业，大力兴修水利，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利用耕牛，农业生产大大提高，物产丰富。随着生产的发展，半岛上的封建关系逐渐发展起来。统治阶级常常赐给功臣土地，叫做食邑，作为他们战功的赏酬。新罗在统一过程中，军事贵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新罗国王向功勋卓著的将领赏赐大量土地。随着军事行动的进展，国家获得的土地越来越多，这种赏赐也越来越增加。新罗统一百济和高句丽以后，食邑有很大的发展。功臣、贵族、佛教寺院都得到优厚的土地赠赐。这些土地后来都变成僧俗封建主的私有财产。687 年开始实行禄邑制，

国家对一般的文武官僚给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地租收入就作为他们的俸禄，以代替由国家发给粮谷。722年，对国家管辖的土地实行丁田制和租庸调制。男子年满十六岁为丁，国家派给耕地，到受田人六十岁时收回。结合这种授田办法，又实施了租庸调制：农民交纳谷物，叫做租；服劳役，劳役可以用产品代替，叫做庸；交纳家庭手工业品或者地方土特产，叫做调。丁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这样既有利于防止土地流入封建主的手里，又可以保证国家的剥削收入。新罗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统治机构，确定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秩序。

统一后的新罗经历了一段政治稳定的时期，国家强盛，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组织兴修大规模的水利设施，荒年减轻赋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高。与此同时，采矿、冶金、制陶、造船、武器制造、丝绸纺织等手工业都很发达。兴旺的农业和手工业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新罗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许多地方特产都在这里集散。新罗商船往来于新罗、中国、日本之间。日本商人、留学生和僧人常常搭乘新罗船只前来中国。中国和新罗出产的绸缎、药材和工艺品互相输出，其他特产也经常在两国之间交流。中国沿海或江河沿岸的某些城市，如登州的牟平、文登（在今山东省），扬州的江都（今江苏扬州）、楚州的山阳（今江苏淮安）等地，形成了往来贸易的新罗商人的居留地，他们住的旅舍叫新罗馆，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

高丽王朝的兴亡 八世纪晚期起，新罗的政治和经济开始衰落。权力之争代替了政治稳定，土地兼并破坏了丁田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朝政腐败，贿赂公行，宫廷政变不断发生。政治动乱把农民拖进了无穷的战祸和徭役。饥荒接踵而来，到处出现流浪的农民。农民往往等不到六十岁就被迫出卖用的土地，变成大地主的依附农民。地主乘机侵吞农民的丁田，扩大庄园，加强实力，违抗中央。地主的土地越多，由国家收租的土地越少。国家于是向所属的农民身上加重负担。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九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农民起义到九世纪晚期席卷全国。896年，兴起于西海岸地区的农民军直指庆州，首都受到威胁，中央政权衰落。这时候，一些地方封建主以恢复高句丽、百济为号召，有的起来作乱，有的为了利用农民斗争而归附了起义军。新罗西海岸的一个将领甄萱在900年建立后百济。贵族出身、后来加入起义队伍的弓裔在901年称王，不久定国号摩震，又称后高丽。新罗退居东南一隅。半岛上又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推翻弓裔自立，改国号为高丽，建都松岳（今开城），并于935、936年先后灭新罗和百济。高丽王朝把统治扩大到整个半岛。朝鲜半岛重新出现统一局面。

完成了统一事业的高丽，集中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制度。976年，高丽颁布“田柴科”法令，规定全国耕地和可供樵伐的山林由国家登记，其中一部分按照等级分配给文武官吏和士兵。接受这种所谓田柴的人在土地上收取租税，但是对土地没有私有权，也不准世袭土地。只有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在第二年另外得到世袭的“功荫田柴”。其余的土地不属于田柴科分配之列，租税全归国家。由于田柴科制度的施行，国家基本上掌握了全国的土地和农民，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高丽经过一个兴盛时期。到十二世纪，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田柴科制度被破坏，庄园又纷纷兴起，人民起义频繁，国家又衰弱下去。

高丽王朝时期，朝鲜人民抵抗过多次外族入侵。十世纪末到十二世纪，

多次抗击契丹和女真的进攻。从 1231 年开始，蒙古军队几次侵入高丽，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严重。高丽迁都江华岛。统治集团避居海岛，始终没有组织强有力的抵抗。但是各地人民却组织起义兵奋勇抗战。1258 年，高丽国王投降。1270 年，国王下令将王室由江华岛迁回开城，拆毁岛上城墙，解散守城主力部队三别抄军（即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但是三别抄军拒绝投降，他们先后据守珍岛和济州岛，坚持战斗达三年之久。元朝以高丽为侵略日本的根据地，征兵征粮，给朝鲜人民带来了灾难。

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给高丽提供了摆脱蒙古控制的有利条件。1388 年，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掌握实权，1392 年，废国王自立，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

李朝封建制度的发展 李成桂在 1388 年掌权后，就着手实行田制改革，重新丈量登记土地，烧毁原来的公私田籍。1391 年实行科田法，将京畿一带的土地按照等级授给文武官僚，称为科田，这样做有利于国家对他们就近加以监视。国家又以服军役为条件，将一定数量的土地授予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所谓“闲良官吏”，叫做军田。科田和军田都作为私田，可以世袭。其余的土地为公田，由国家管辖和收租。实行科田法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制止封建割据势力。但是实际演变情况仍同过去一样。李朝初期，经济文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是赐田增多，私田扩大，公田减少，农民负担更重，起义频起。到十五世纪末，科田法已经无法实行，只好废弃。这时候李朝的政治已经十分腐败，官僚营私舞弊，特别严重的是十五世纪末开始了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一派是世袭的官僚贵族，称为勋旧派，一派是地方中小地主出身的受过书院教育的新官僚，称为士林派。两派各自结党争权，互相倾轧，一派得势，就打击另一派，就有一批人被杀戮流放。随后士林派内部一再发生分裂，矛盾越来越复杂，政变越来越多，弄得民不聊生，武备松弛，国力大衰。正当朝鲜内忧重重之际，外患乘机而来。这时候，日本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丰臣秀吉初步完成统一事业。他适应日本封建武士的利益，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企图征服朝鲜，进一步侵略中国。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卫国战争 1592 年，丰臣秀吉率水陆两军约二十万人，侵略朝鲜。日军在釜山登陆后，分兵三路向北进发。有些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国王惊慌失措，仓惶放弃首都，先奔平壤，继而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由于统治阶级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汉城、开城、平壤先后失陷，两三个月之内朝鲜国土大部分沦丧。日军到处烧杀抢劫，只在晋州一地，就屠杀军民六万人。朝鲜人民和爱国的文官武将奋起保卫祖国，人民自动组织义兵抗战，阻挡了侵略者的进军。这个期间，朝鲜武装力量经过整顿，提高了战斗力，夺回一些城池。水军将领李舜臣在南部海面抗击日军。他设计了一种龟船，船面盖着铁板，插着锥刀，从船中可以发射炮火，敌人却不能登船。龟船行动敏捷，可以穿行于敌人的炮火之下。朝鲜水军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先后击沉日舰三百多艘，打败了日军水陆并进的计划。同时，明朝政府应朝鲜的请求，在 1592 年底派大将李如松率领军队援朝。1593 年，朝中军队收复平壤、开城、汉城，乘胜追击，日军退守南部沿海一带。

龟船

日军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就以和平谈判为幌子，重新准备力量，等待时

机卷土重来。在谈判中日本坚持无理要求，态度傲慢，谈判拖延三年，终于破裂。1597年，日本水陆军又大举进犯。第二年，明朝增派援军。朝中军队多次获胜，日军全线溃退。不久，丰臣秀吉在忧急中病死，遗嘱从朝鲜撤兵。1598年11月，朝中水军在露梁海面（庆尚南道南海郡西北）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击沉日舰四百五十艘，歼灭日军一万多人。日军彻底战败。在这次海战中，李舜臣击毙日军大将，打退包围明军统率陈璘的日舰。明军七十岁的老将邓子龙的战舰起火，李舜臣在前往援救时身中流弹。李、邓两位名将都在这次海战中牺牲，为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朝鲜的古代文化和中朝文化交流 朝鲜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在科学和文艺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三国时代就很注意观测天象。七世纪新罗修建的瞻星台，现在还保存着遗迹。三国时代还开始了史书编纂工作，但是许多书籍未能流传下来。现存的史学著作中，有十二世纪中期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这是保存下来的朝鲜最早的正史；有十三世纪老僧一然的《三国遗事》；有十五世纪郑麟趾等编成的《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这些书分别是三国时代和高丽王朝时期的重要史料。

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两国人民互相往来。佛教、儒教、道教都从中国传入朝鲜。朝鲜的典章制度、学术文化、风俗习惯都受到中国的影响。朝鲜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两国的音乐舞蹈艺术互有交流。在南北朝时期，朝廷里就有高句丽和百济的乐舞。隋唐时代流行高丽音乐。朝鲜原来使用汉字。唐朝白居易的诗和张鷟的文章很受朝鲜人的欢迎。许多朝鲜学者的汉文造诣很深，他们的诗词和文章达到很高的水平。十五世纪，朝鲜创制了拼音文字，但汉文继续使用了一个时期。朝鲜人也很喜爱中国画。在他们的瓷器和扇面上，常常画着山水竹石等中国画面的构图。十二世纪早期朝鲜画家李宁来到宋朝，他的作品得到宋徽宗的赞赏。朝鲜留学生和僧人陆续来到中国。单是840年一次从中国回去的就有一百零五人。有些人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并且在中国任职。而前往朝鲜的中国人也有人在朝鲜担任职务，有的僧人到朝鲜去传授佛法。

两国在科学上同样互相学习。中国医学知识在新罗时代就传入朝鲜。宋朝时候，中国又送去大批的医生、医药、医书，进一步密切了学术往来。朝鲜著名学者许浚等经过长期刻苦研究，参考朝鲜和中国的医书，在十七世纪初著成《东医宝鉴》，包括内、外、针灸诸科和药材的应用，影响很大。该书深受中、日医学界的重视。

朝鲜的印刷术也很发达。十世纪末，中国刻成的汉译大藏经印本传入朝鲜。十一世纪，朝鲜用了六十多年时间雕印了全部汉译大藏经。后来该书雕版被蒙古军队烧毁。十三世纪，朝鲜再次用精细的工艺将大藏经刻成，这部大藏经共有雕版八万六千六百张，一直保存下来，是佛教典籍中的珍贵版本。也就是在这个世纪，朝鲜继中国的胶泥活字印刷之后，已经用铜活字刊印书籍。十五世纪又开始使用铅活字。中国则在十三世纪发明锡活字和木活字，锡字难于着墨，未能推广，木活字广泛流行。铜活字和木活字分别流传到中国 and 朝鲜，促进了两国的印刷术的发展。

中朝人民的悠久往来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结下了友好关系。

第五章 十五世纪末以前的非洲

古代非洲概况 非洲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点三,是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洲。浩瀚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红海,把非洲分割为两部分。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包括今日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统称为北非。这儿曾是古埃及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希腊和罗马,阿拉伯和奥斯曼这些大帝国驰骋的舞台。到十五世纪以后,除摩洛哥以外,名义上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北非各国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曾被认为是“洪荒僻壤,物鬼为崇之地”。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否定了这种历史的偏见。在苏丹、肯尼亚、乌干达、西非、刚果、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地发现了不少远古人类的遗骸和大量的新旧石器时代物质文化遗存。在公元前几千年,这里的居民完成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农作物。刚果盆地的卢帕班文化,就是公元前 7000 年的产物。苏丹的麦罗埃和尼日尔河的诺克文化遗址证明,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代,非洲黑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断的迁徙,几个具有不同体质特征和语言的族系,到十五世纪已大体上定居在各自的地域。埃塞俄比亚人,皮肤呈深棕色,讲塞-哈语(Hamito-Semitic);马尔加什人,属蒙古人种,操马来语,定居在马达加斯加岛。非洲黑人为该地区主要居民,他们又可分为:苏丹族,肤色纯黑,分布在撒哈拉以南,赤道以北,从几内亚湾到埃塞俄比亚以西的地带;班图族,肤色浅黑,已南迁到几乎整个中非和东非,并在继续南徙;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操科伊桑语,居住在南非。除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外,这些族系都建立过强盛的国家,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自古以来就同外界有着程度不同的贸易和文化联系。联系的渠道有三,即尼罗河通道、撒哈拉商路和印度洋航道。

古埃及通过尼罗河同苏丹(古代的努比亚)接触。埃及统治阶级曾从苏丹掠夺大量的木材、香料和奴隶;埃及商人曾循尼罗河上溯而后绕红海南下,远达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这条通道又是后来统治埃及的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人同南方接触的要道。

撒哈拉沙漠在古时还没有变得象现在这样干旱。那时牧民常在一个个绿洲之间迁徙放牧,撒哈拉商道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沙漠中刻有战车的岩画说明,大约在公元前后北非和西非之间已有两条“车行道路”存在。一条北起摩洛哥,经过毛里塔尼亚伸展到尼日尔河中游,另一条从利比亚出发,经艾哈加尔高原,直达尼日尔河。直到欧洲殖民者入侵以前,撒哈拉商道始终进行着以黄金、柯拉果(西非产品)交换食盐(撒哈拉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北非或转运的亚欧产品)的频繁贸易。

在印度洋上,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盛行东北季风,5 月至 10 月又刮起西南季风。阿拉伯人很早就知道利用印度洋信风,航行到东非和印度。公元 45 年罗马的一个水手希帕努斯也掌握了信风用于航海的秘密。从此以后,不仅阿拉伯人、印度人,而且埃及人、欧洲人都航行到东非,购买香料、黄金和象牙。我国从汉朝开始,就通过中介人同东非进行贸易。到了宋代,中国商船已直接航行东非了。十四世纪,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曾经搭乘商船,到

过桑给巴尔。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四次到达非洲，访问了索马里、肯尼亚的许多地方。与此同时，东非一些国家也派使节访问中国。源远流长的中非友好关系，在殖民者侵入东非后遭到了破坏。

库施和阿克苏姆 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很早就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库施和阿克苏姆。

在公元前四千年代，苏丹东北部居住着努比亚人。埃及法老为了掠夺黄金、象牙和奴隶，经常侵入苏丹。大约从公元前 2600 年起，埃及人就在努比亚建立了固定的居留地，沿尼罗河建立泥砖结构的要塞，派遣总督和各种官吏统治努比亚。努比亚人不断起来反对异族统治。中王国时代第十二王朝的国王塞努斯特莱，率领大军镇压努比亚起义，抓到了一长串俘虏，其中有一个就是代表“库施”领地的。当中王国衰落时，努比亚人又掀起反抗埃及法老统治的怒涛，捣毁交易据点，赶走埃及人，宣布独立。但这次独立为时短暂。新王国的国王们大举南攻，深入努比亚腹地，占领了尼罗河大河湾的大部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努比亚最终摆脱了埃及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名为库施，定都那帕塔。公元前八世纪库施国王们征服了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也叫努比亚王朝，迁都底比斯。不久，库施国王在埃及的统治受到亚述人的挑战。公元前七世纪中期，使用青铜武器的库施军队，被使用铁矛和利剑的亚述人打得大败，撤出埃及，退回那帕塔。

公元前 530 年左右，库施国王南迁，定都麦罗埃。它是非洲内陆的冶铁中心，也是一个内河港口城市。已经发掘的麦罗埃遗址至今还有两堆高达十余米的铁渣，以及铸造工具和武器的熔炉遗存。城内建有宫殿、金字塔和寺院，城东南耸立着一座刻有麦罗埃象形文字的太阳寺。这种文字至今还不能为人们所识读。麦罗埃同非洲内陆、埃及和西亚，可能还有印度都有贸易往来。

麦罗埃遗址

公元四世纪，库施在阿克苏姆的侵袭下衰落了。

古代非洲

阿克苏姆是埃塞俄比亚的古国。埃塞俄比亚人在公元三千年前已经开始农耕，创造了很高的文化。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南阿拉伯人越过红海，移居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沿着肥沃的丘陵和坡地，修建房屋、梯田和蓄水池。他们迁徙缓慢，持续时间很长。起初，移民臣服于“母国”。但是，年深日久，他们逐渐被埃塞俄比亚土著居民同化，削弱了同“母国”的联系。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提格雷高地陆续兴起一些城邦，后来阿克苏姆王国异军突起，统一各部，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它向东渡红海，征服也门；向西南沿尼罗河推进，与库施迎面相撞，刀兵相见。公元 350 年 埃扎纳国王派军侵占麦罗埃，把这座繁华的古城变成了废墟。埃扎纳夸耀说：“朕追逐他们二十三天，杀死一批，俘虏一批”，“烧毁城镇上一切砖房和草屋，朕之军队掳走食物、铜铁，……毁坏庙宇中的神像，粮仓和棉花树。”经过这次洗劫，

关于库施立国的年代，有公元前 750 年说、800 年说、950 年说和 1100 年说。

另说 330 年。

麦罗埃文明，包括它的文字从此湮没无闻了。

公元四世纪，阿克苏姆的奴隶制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农业和畜牧业是生产的主要部门，都使用奴隶劳动。它向邻近国家掠取大量奴隶，用于建筑和各种生产部门。

阿克苏姆同欧、亚、非三洲均有贸易往来。它的商队深入尼罗河流域和邻近各地收购象牙、香料和黄金。《环航纪》说：阿克苏姆的“所有象牙都是从尼罗河以外的国家弄来的。”它经由阿杜利斯港同西亚、埃及和印度通商，同罗马以及拜占廷帝国保持联系，输出非洲的产品。

333年，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皈依了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钱币和埃扎纳的铭文上出现了“万能的天主执掌天地间一切权力”

的基督教祷词，在钱币的一面压印了十字架。他的继承者在全国修建了许多壮丽的教堂和修道院。五世纪时许多受到迫害的叙利亚单性教派神职人员，纷纷逃到阿克苏姆，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盛极一时。

六到七世纪，由于奴隶制内部的矛盾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兴起，阿克苏姆开始走向衰落。

埃塞俄比亚和东非沿海城邦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对非洲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七世纪到十五世纪期间，伊斯兰教在北非和东非沿海广为传播，并渗透到西非内陆。阿拉伯人在640年占领埃及后，不断向马格里布和苏丹扩张势力。阿拉伯移民一股股地涌向东非沿海。

从七世纪末开始，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同阿克苏姆交战，公元710年夷平阿杜利斯，使阿克苏姆丧失了海上贸易门户，割断了它与亚、欧的经济联系。八世纪初，越过红海的阿拉伯移民，一方面在沿海定居，垄断印度洋上的贸易；另一方面他们深入内地，在阿特拉巴河和青尼罗河定居，建立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丰吉王国，割断了阿克苏姆同努比亚各地的联系。阿克苏姆局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长期衰败不振。1270年埃塞俄比亚人建立了所罗门王朝。所罗门王朝统治时，埃塞俄比亚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土地属于领主和教会，耕种土地的农民必须服徭役和交纳实物地租。自然，奴隶制的残余仍然保存着，战争中的俘虏还被卖为奴隶。

东非奴隶市场

向东非沿海地带移居的阿拉伯人，先后建立了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公元1100年左右已经远达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和科摩罗群岛。这些地方当时统称为“僧祇”国。但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却始终未能渗透到内陆。

东非沿海的阿拉伯移民从事商业，从东非输出象牙、奴隶、黄金、铜和香料，输入亚洲和欧洲的产品，其中包括名贵的中国瓷器和丝绸。他们传入了香蕉和亚洲薯类作物。

东非沿海的城镇是中世纪的商业城邦，其中基尔瓦最为强大。相传阿里·本·哈桑（约1150—1225）在基尔瓦创立了“设拉子王朝”，也叫基尔

亦译“唯一真神派”，也叫柯普特派（Coptic），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圣本性。阿克苏姆皈依的就是这一派的基督教。

中国史籍中作“木骨都束”。

中国史籍中叫“麻林”、“麻林地”等。

瓦王朝。它征服了东非海岸的一部分以及奔巴岛、桑给巴尔岛、马菲亚岛和莫桑比克岛，控制了索法拉的黄金贸易。统治者称素丹，信伊斯兰教，“遵大食教度”。素丹对所征服的沿海城镇的统治者，征收税款，可能还有册封之权。在各城邦居民中，富人多为商贾，城邦附近居民从事农牧业。那里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战俘常“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有时也送往基尔瓦的种植园从事奴隶劳动。

沿海城邦同内陆班图人有贸易往来，收购内陆出产的象牙、香料和黄金。无疑津巴布韦是一个黄金和铜的主要产地，而索法拉是黄金贸易的转运口。在津巴布韦发现的中国瓷器和钱币，说明东非沿海城邦起着内陆古国中转站的作用。沿海城邦的阿拉伯人同内陆的班图族人通婚，互相融合，逐步形成了斯瓦希利语和斯瓦希利文化。

北非的阿拉伯化 阿拉伯人侵占埃及后，不断向西进攻马格里布，先后占领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710年攻占丹吉尔，整个马格里布都并入了哈里发的版图。

阿拉伯人由于受到柏柏尔人的顽强抗击，起初没有大规模移民。来到马格里布的官吏、传教士和士兵，向柏柏尔人传播伊斯兰教，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则建立各级统治机构，同时他们也与当地居民通婚。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大规模向马格里布移民。同阿拉伯人杂居的柏柏尔人不仅改信了伊斯兰教，而且接受了阿拉伯语。远离城市的山区和游牧区，柏柏尔人则较长时期地保持着柏柏尔的文化传统。

当阿拉伯侵入前，马格里布各国内部的封建因素已经萌生。阿拉伯征服后，封建化的过程加速了。马格里布各国都属于封建神权的哈里发国家，由哈里发任命的总督直接治理，向居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农牧民交纳的租税，有的达到全部产量的一半。

被压迫的农牧民，往往在纯洁伊斯兰教的口号下发动起义，反对阿拉伯贵族的统治。八世纪中叶的普遍起义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在北非的统治，马格里布先后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封建国家。摩洛哥首先脱离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建立了伊德里斯王朝。公元800年，凯鲁万的阿拉伯总督拒绝向哈里发交纳贡税，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组成了独立的阿格拉布王朝。十世纪初，什叶派信徒推翻阿格拉布的统治，建立了法蒂玛王朝。

在封建统治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宗教外衣下的农牧民起义往往反复发生。不过，从十一世纪开始，领导纯洁和改革伊斯兰教的先知（马赫迪）大都出身于柏柏尔族了。穆拉比特教派就是从毛里塔尼亚的桑哈贾游牧部落发源的。它的创始人伊本·雅辛（？—1057）及其继承者向北征服马格里布，定都马拉喀什，建立了穆拉比特王朝。它一度侵占西非古国加纳，把伊斯兰教传入了黑人地区。

十二世纪，居住在非斯·丹吉尔和休达附近的柏柏尔人部落，兴起了穆瓦希德教派运动。1147年攻占马拉喀什，推翻了穆拉比特王朝。十三世纪

波斯文桑给巴尔（Zanjbar）的音译。“Zanji”意为“黑人”，“bar”意为土地。在中国史籍中又转译成“层期”、“层拔”、“层摇罗”。

马格里布（Maghrib），阿拉伯语意为“西方”，指北非西部，包括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穆拉比特（AL-Murabit），西班牙语为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

穆瓦希德（Al-Muwahid）西班牙语为阿尔穆哈德（Almuhad）。

穆瓦希德王朝衰落后，马格里布再度分裂为三个独立的国家，即统治摩洛哥的马林王朝，统治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和统治阿尔及利亚的阿卜德瓦德王朝。

加纳、马里和桑海 正象尼罗河哺育了古代埃及文化一样，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是古代西非文明的发祥地。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在尼日尔河上游、在加奥地区、都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汇合处的连绵几百里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诺克祭祀小像”。精致的陶器头像，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肖像。“诺克”文化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500年，“诺克祭祀小像”可能是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间的产物。西非各族人民很早就从事农业，种植稻、黍，豆和块根植物。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开始使用铁器。在原始公社制瓦解的基础上，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国家。

加纳是已知的西非最古老的奴隶制国家。约在公元300年左右建立。八世纪时，索宁凯族统治者征服邻近各族，版图西达海边，东至尼日尔河，南抵塞内加尔河和包累河，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阿拉伯作家把加纳称为“黄金之国”，说“加纳国王是非常强大的。在他的国土上有金矿。在他的统治下还有别的王国。……在这些地区到处有黄金。”国王的头上、衣服上都有黄金装饰，他的马鞍、拴马桩、狗项圈都用黄金做成。按照规定，人民采到的全部金块，都由国王强行征收。加纳还实行人殉制度，国王死后，将奴婢们关在陵墓里殉葬。

加纳的首都也叫加纳，位于今毛里塔里亚的昆比—萨拉赫村。它由两个市镇组成。一个叫“穆斯林”镇，是一个商业区，有十二座清真寺。另一个叫“加巴”，意思是“丛林”，离穆斯林镇约十公里。这里是宫廷所在地，街道整齐美观，王宫建筑壮丽豪华，由一座宫殿和一些圆拱顶的府邸组成，四周环绕着一道围墙。

昆比—萨拉赫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贸易往来。阿拉伯商队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加纳，用盐、布匹、马和杂货，交换黄金、象牙、柯拉果和奴隶。阿拉伯商人或者加纳的中间商常到边境地区从事“哑巴”交易。阿拉伯作家写道：“商人们一到这条分界线，便把货物和布匹放在那儿，然后离开；于是，苏丹人带着黄金来了，把黄金放在商品旁边，然后也离去。这时，商品的主人又回来了，如果对他们所看到的认为满意，他们就取走。如果不满意，他们再一次离开，于是，苏丹人又回来提高价钱，直到这个买卖成交为止。”加纳国王对输出和输入的货物课税，获得巨额财富。

加纳王国分为若干领地，设总督协助国王治理；还有一些附属国，由当地酋长治理。国王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藉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公元990年，加纳征服了撒哈拉沙漠中的重要商业和军事要地奥达果斯特。在伊本·亚辛的领导下，阿尔摩拉维德人在1054年夺回该地，1062年一度占领加纳。

阿尔摩拉维德人破坏首都，掳掠各地，割断了连接昆比—撒拉赫与各地的经济纽带。1087年复国后的加纳王国已经衰败不振。1203年从索宁凯人分裂出去的苏苏人占领加纳。不久，马里王国又打败了苏苏人，灭掉了加纳。

马里原来附属于加纳。十一世纪在尼日尔河上游、巴科伊河上游和贝莱杜古地区，马林凯族建立了马里国家，信奉伊斯兰教。松迪亚塔(?—1255)，

是马里王国的真正创始人。他组建了一支精悍的军队，兼并尼日尔河上游各个部族。1235年在基里纳打败苏苏人的军队，吞并加纳。他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设置总督统治各地；垄断原来由加纳控制的黄金贸易，发展农业。

曼萨·谟萨（？—1337）统治时期，马里疆域西起塞内加尔河河口，东至尼日尔河大河湾，北接撒哈拉大沙漠，南界沃尔特河地区，繁荣富庶，盛极一时。谟萨依靠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在1324—1326年作了一次到麦加的豪华朝圣。前面由五百名各执一根六磅重的金棍的奴隶开道，后面跟着驮载黄金的一百头（一说八十头）骆驼。他沿途挥金如土，致使开罗金价下跌百分之十二。他回国后，聘请阿拉伯建筑师，在加奥和廷巴克图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和图书馆。

迭内大清真寺

十五世纪，桑海取代马里成为西非最强大的国家。桑海人起源于达荷美北部，七世纪左右沿尼日尔河，向上游迁移。约公元890年建立了加奥城。随着加奥在经济、政治上重要性的增长，桑海人力图摆脱马里的控制。他们乘曼萨·谟萨去麦加朝圣之机起事，但未成功。到索尼·阿里（？—1492）时，终于实现了脱离马里自立的任务。他毕生东征西讨，占领了廷巴克图和重要商业城市迭内，并一度侵占马里王国首都。

1493年，穆罕默德·杜尔推翻了索尼王朝，开创了阿斯吉亚王朝。阿斯吉亚·穆罕默德（1493—1528年在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有所改革，开始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军事上，他建立常备军，代替加纳、马里王国实行的战时征集制度，并在尼日尔上建立了一支小舰队。他继续索尼·阿里的扩张，使桑海王国的疆土超过了马里，西起塞内加尔河下游，东至艾尔高原，南起塞古，北达中央撒哈拉。在政治上，他把全国划分成四个小王国和许多行政区，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他推崇伊斯兰教，鼓励文化事业，吸引了不少阿拉伯神学家、科学家、医生和建筑师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使廷巴克图变成了西非的伊斯兰教和文化中心。廷巴克图建于十三世纪，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它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市内仅裁缝作坊就有二十六所，每所约有五十名学徒。设在这里的桑科尔大学有几千名学生，他们除学习《古兰经》外，还研习法律、文学、历史、地理、天文、数学和外科学。

桑海盛行奴隶制度。奴隶来源于战俘和买卖，奴隶也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和转让。阿斯吉亚·达乌德曾“得到五百名奴隶”。奴隶大量使用在农业、手工业劳动上。奴隶的劳动由专门的监工（“凡发”）管理。每个监工管理的奴隶数目自一百个至二十个不等。在西非奴隶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以后，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许多奴隶开始变为“隶农”。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缴纳实物地租。

阿斯吉亚·穆罕默德顺应社会的发展，在经济上作了许多重大改革。他除了统一度量衡，改良农业生产外，还厘定了实物地租标准。经过这次改革，虽然奴隶的后裔仍旧是奴隶，但他们可以得到一定的权利，他们的社会地位日益接近于农奴。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是著名的南非古代文化中心。它以雄伟的花岗石建筑闻名于世。津巴布韦古城遗址位于今津巴布韦共和国维多利亚镇东南十七英里处。其主要建筑有“卫城”和“围场”。“卫城”建在山坡上；“围场”

建在山谷里，长约九十余米，宽约六十七米，围墙高达九米多。古城遗址还有高塔、神庙、各种住宅、库房、水井和排水沟等。遗址内还发现了中国十三到十五世纪的瓷器和铜钱。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还有许多类似的石头建筑遗址。

大津巴布韦遗址

津巴布韦城大约建于公元 500 年左右，最初可能是古鲁乌斯瓦王国的宗教中心，后来可能一度成为莫诺莫塔帕王国的首都。

莫诺莫塔帕王国（或称姆瓦纳·莫塔帕）在十四到十五世纪达于全盛，统治着津巴布韦以及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的一部分。境内有发达的农业和冶金业。山坡梯田绵延很广，开采金和铜的矿场有六、七万处之多。王国同东非沿海进行频繁的贸易，用铜、金、象牙交换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地的丝绸、棉布、瓷器、玻璃器皿。

莫诺莫塔帕国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一切，名义上都归国王所有，臣民用公牛交纳赋税。国王对臣民有生杀之权，他出巡时，臣民必须回避。首相、鼓队长、巫医生，辅佐国王治理国家。全国分为若干地区，各地酋长和藩臣的权力由国王赋予。王位继承人由王族选举产生。

16 世纪以后，莫诺莫塔帕王国象东、西非许多沿海国家一样，遭到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干涉和侵袭，日益陷于遭受欧洲殖民者压榨的悲惨境遇。

第六章 十五世纪末以前的美洲

印第安人 美洲的印第安人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别处迁移而来，他们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究竟经历了怎样一个历史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完全合乎科学的解答。这是因为印第安人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历史学家主要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殖民者的耳闻目睹的记载作出种种判断和推测的。

印第安人这个名字本身就不够科学，因为哥伦布把他所发现的美洲误认为是印度，因而把那里的土著部落也称为印第安人（意即印度人或印度的居民）。关于印第安人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来自非洲，也有人说来自大洋洲或欧洲北部，甚或把他们说成是犹太人的一支；还有一些人则坚持印第安人历来就生活在美洲的说法。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印第安人并不发源于美洲，因为在美洲还未发现早期人类遗骸的化石。他们属于蒙古利亚种，本来居住在亚洲东北部。大约从公元前四、五万年开始，他们穿过现在的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然后再慢慢由北而南，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从自然条件来讲，当时白令海峡不过九十六公里宽，中间还有小岛，无论经海面或冰上都是可以通行的。而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研究结果认为，白令海峡是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才成为海峡的。

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据说印第安人已有八百万到三千万左右（一说是一千四百万到四千万）。这些数字当然很不精确。但是当时印第安人的农业水平确实很高，他们种植的粮食作物就在二十种以上，特别是玉米的变种很多。有这样多品种的粮食作物，说明当时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一定数量相当可观。

印第安人分布广泛，种族复杂，难以确计。举他们中间最重要的说，大体上在极北有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境内有阿塔巴斯干人和阿尔贡根人；在美国境内有易洛魁人和达科他人；在拉丁美洲则有阿斯特克人、托尔蒂克人、玛雅人、加勒比人、印加人、阿拉瓦人、瓜尼拉人和阿拉乌干人等。

印第安人从事采集、渔猎、游牧和农业，他们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在北美洲，只有西南部和东南部一带的印第安人懂得农耕。在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印第安人不仅从事农业，而且还经商和建造城市，形成非常繁荣的文明中心。

美洲印第安文明的三大中心

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也非常复杂，大体上说还处于部落公社的阶段，不过在某些地区似乎也出现了阶级社会的萌芽。通常每个部落都聚住在同一村落里，有些大的部落则往往包括几个村落，甚至还出现了部落联盟。在部落里没有分配土地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议事会。耕种是集体的，劳动成果平均分配。部落里的成员都是平等的，酋长和首领由议事会选出，他们并不享有特殊的权利。

早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以前，印第安人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在农业、建筑、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上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玛雅人、阿斯特克人和印加人居住的地区形成印第安人的三大文化中心。它们散布在从北美到南美的广大地区，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一个组成部

分。

玛雅文化 玛雅文化的策源地在墨西哥的东南部和危地马拉的中部。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玛雅人就在这个地区生息和劳动。他们最初活动的中心是在这个地区的南部，四世纪到十世纪，那里的文明达到极盛时期。但是九世纪末和十世纪初，原来在那里的大城市忽然消失了，那里的玛雅人向北迁移到了尤卡坦。为什么进行这样一次大迁移，至今还是个谜。看来很可能是刀耕火种的办法造成了地力的贫瘠，随之而来的饥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迁往他处谋生；也很有可能是异族的入侵造成的。玛雅人在尤卡坦创造的文明在十三世纪中达到了最高峰。它经过两百多年的昌盛时期。后来，玛雅文化渐趋没落。西班牙殖民者在 1511 年到达尤卡坦时，玛雅文化的第二个阶段已告结束。

玛雅人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新世界的希腊人”。

在农业上除玉米外，玛雅人还种植蕃茄、南瓜、甜薯等作物，此外他们还培植各种果树和种植棉花。玛雅人长于建筑和艺术，留下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宇、陵墓和丰富多彩的雕刻、壁画。其中博南帕克的壁画已成为世界艺术的宝藏之一。公元八世纪中，玛雅人已筑有一百多个大小城市，形成了广大的商业网，不仅在内部广泛进行贸易来往，而且还和南美的印第安族建立了商业上的联系。

在数学上他们采用的是二十进位，而且早于欧洲人好几百年知道了“零”的概念。最令人惊讶的成就是在天文学上取得的。玛雅人把一年分成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另加五天，共计为三百六十五天，这已经非常类似现代的历法了。他们还有自己的纪元，它是和神话中的一个年代联系在一起。玛雅人依靠肉眼的观察，知道月亮和行星运转的周期。

玛雅神庙

玛雅人已经有了近乎古埃及、中国、巴比伦文字体系的象形文字。他们每隔二十年就树立一块石碑，并用象形文字在上面刻述各种历史事件。玛雅人还用树皮制成的纸和鞣制过的鹿皮写书。他们曾留下大量的手抄本，可惜除三本外都被西方殖民者销毁了。到目前为止，玛雅人的文字还没有被学者全部释读出来。

根据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所作的种种记载来看，玛雅人在社会发展上比其他印第安人处于更高的阶段。社会的上层是贵族和祭司，下层则是公社成员和奴隶。贵族已有权占有世袭领地和剥削奴隶劳动。当时占有奴隶的现象已很普遍，战俘则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在农村中公社依然存在，保留了许多氏族制度的残余。但公社成员已经要承担从耕地到纳税的许多义务，战时还要供应军队。

印第安人城市特奥迪华堪遗址（今墨西哥城以北）

阿斯特克文化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在现在的墨西哥中部已有较为发达的文明。那里的印第安人兴建城市、神庙和金字塔。公元八世纪左右，托尔蒂克人统治了那个地区，继他们而起的是阿斯特克人。阿斯特克人开始进入墨西哥谷地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最早始于十一世纪，有的说在十三世纪初。可以肯定的是大约在十四世纪初，他们已进入墨西哥谷地的特斯科科

湖。他们定居在特斯科科湖畔，并且于 1325 年开始建立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之墨西哥城）。他们征服了那里的各个部落，建立起庞大的部落联盟。

在文化上，阿斯特克人是在托尔蒂克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受玛雅人的影响。他们在农业、建筑、艺术上并无多大的特色，但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阿斯特克人能种植玉米、豆类、西红柿等多种作物。他们还是很精巧的手工匠人，能制作金、银、铜器和进行纺织。他们花了几百年时间修建起来的金字塔高达四十五米多，覆盖面积约八千四百平方米。环绕在它的周围还有七十八座较小的建筑物。墨西哥城就是以这一巨大的建筑群为中心的，在西班牙入侵时城市的居民约为二十到三十万，超过了同时期伦敦的人口。他们的建筑艺术还体现在特斯科科湖中的大堤上。大堤长达十六公里，装有复杂的水闸，既可以控制湖的水位，也可以在干旱时作为周围居民的水源，工程浩大。

阿斯特克人仅能用图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但已能制作书籍；在历法上主要还是沿袭玛雅人计算时间的方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医学上的创造。他们已能使用各种药草，如用奎宁治疟疾，用洋地黄治心脏病，还知道一种名叫“亚乌特利”的麻药，并用土法进行麻醉，这方面的知识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人。另外从遗留下来的图画来看，他们对人体的构造以及各种器官的作用也已有了十分确切的知识。

阿斯特克人有两个最高的统治者，一个叫特拉卡特库赫特利主管军事和宗教，另一个叫西华夸特尔主管行政，而后者又是服从前者的。这两个最高统治者都依靠各部落产生的议事会协助进行统治。

阿斯特克人社会的基础仍旧是氏族。土地还是公有的。但是也出现了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即在新征服的地区，有功的战士可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并且世代承袭下去。由于阿斯特克人连年征战，这种私人占有的土地就越来越多。另外战俘成为奴隶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社会内部的分化变得明显起来。再加上贸易的发展，财产上的差别也日益显著。在西班牙人入侵时，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线已经很清楚了。

印加文化早在玛雅文化和阿斯特克文化形成前很久，印第安人的奇楚阿族、艾马拉族和莫提卡族就散居在安第斯山的各个谷地了。他们在那里活动，并且创造了各种文化。大致在公元前 1500 年到 1000 年左右，便出现了查文文化。公元五至七世纪又出现了莫契卡文化，那时印第安人已经发明了银和铜的合金。十至十三世纪是提奥纳科文化，到十四世纪又形成奇穆文化。印加人的文明就是在这一系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印加人本是生活在智利北部和哥伦比亚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大概在公元十三世纪才进入库斯科地区。在这以后的三个世纪里，印加人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领地，到了十六世纪初他们控制的地区已从哥伦比亚的南端延伸到智利的中部，甚至深入巴西荒原和阿根廷北部，据信在这一广大地区居住的印第安人就可能有一百万到六百万。印加人能攻善守，以显赫的

查文位于秘鲁中部的河谷，由河谷得名。

莫契卡文化的发源地在秘鲁北部海岸的许多小河谷内。

提奥纳科文化发源于的喀喀湖地区，最近在那里发现了公元前一千年建造的天文台。

奇穆文化起源于秘鲁北部海岸。

武功获得了“新世界罗马人”的称号。

印加人的农业很发达，他们会修筑梯田，还懂得在田里施肥，并建造了包括沟渠和导水管在内的良好灌溉系统。印加人能培育四十多种农作物，其中主要的是玉米和马铃薯。在建筑上，印加人充分利用了山中多石的条件，他们的房子全是用修得很好的四边形石块一层一层很巧妙地搭起来的。他们在库斯科建造的太阳庙美丽壮观，至今仍闻名于世。

印加人在制作金、银、铜器方面具有十分高超的技巧，在库斯科印加“王”花园中用金、银制作的花朵看上去美丽鲜艳，和自然界的鲜花没有什么两样。

印加银羊驼和骆马雕像

印加城市遗址

印加人的才能突出地体现在筑路和交通管理方面。两条主要的道路由北而南，纵贯印加人控制的地区，长达二千四百到三千二百公里。其中的一条沿海岸而下，另一条则平行越高原而过。从这两条干道又分出许多小道把首都和境内最偏远的地区都加以连接。道路宽达四至五米，路面平坦坚固，两旁还往往种有果树。在道路穿过沙漠、沼泽地带或越过峻岭时都需要很高的筑路技术。印加人能建造很坚固的吊桥，使他们的道路能穿过急流险滩，深入到境内的每一个角落。沿路还设有传递消息的驿站，在关口和险要地带则建有要塞和烽火台，遇有战争或紧急事件，各地都可闻风而动。

印加人既没有象形文字，也没有画图文字，他们是用绳记事的。最近曾发现印加人的长达七十多米的记事绳。

印加社会的最顶端是印加“王”，他是宗教、军事和行政的首领。印加人的贵族分大贵族和小贵族：大贵族产生于印加部落本身，小贵族都选自被征服部落的酋长。所有的僧侣、官员、军事长官都要从贵族中选拔。贵族和人民之间的界线就非常清楚。所有二十到五十岁的男人都必须义务劳动，并缴纳各种赋税。税收并不轻，不过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还不太明显。

印加人民都按十个等级，严密进行组织。最低一级的单位叫“昌卡”，由十户人家组成，较高的一级叫“皮查”，由五十户人家组成。再上去是百户人家的“帕查卡”，如此依次上去直到最高级的万户的“乌努”或四万户的“图库伊里库克”。全境又划为四个行政区，由仅次于印加“王”的高级行政官吏“阿普——库纳”进行管理。从各种迹象看，印加人已处于比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印第安人长期处于与东半球隔绝的状态。但是印第安人取得的某些杰出成就却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光辉篇章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印第安文明的发展进程，可以断言印第安文明必然会在广阔的美洲土地上开出更绚丽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第七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

第一节 新航路的开辟

从十五世纪起，西欧的航海家进行了好多次涉渡重洋的远航，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的新航路，发现了欧洲人所不曾到过或不曾听说过的许多地方。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发展科学技术和积累地理知识的结果，也是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开辟新航路的背景 西欧很早就从东方——中国、南洋群岛、印度等地——得到贵重商品。十字军侵略以后，东西方的贸易有了进展。意大利城市，首先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西方贸易中操纵了地中海商路，因而空前繁荣起来，引起西欧其他国家的嫉羨。但是传统的东西方贸易不掌握在其他西欧商人手里。东方商品由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东罗马人运到地中海东部，再由意大利人转运到西欧。商品一再转手，运到西欧的时候，价格提得很高。十五世纪，土耳其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对于通过那里的商队和商船肆意勒索，抢劫。东西方贸易遇到了新的阻碍。运到西欧的东方商品十分稀罕，价格更加昂贵。西欧上层社会渴望能够开辟一条通向中国、印度的新航路。

西欧上层社会对东方的憧憬，特别由于对黄金的追逐而加深。十五世纪后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商人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扩充资本来更多地榨取财富，剥削雇佣工人，上层社会需要增加收入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满足更高的生活欲望。但是西欧黄金的开采量不大，在对东方的贸易中，西欧长期入超，黄金不断流向东方，十五、十六世纪黄金严重缺乏。各国的国王、贵族、高级教士和市民，都沉醉在“寻金热”之中。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说：“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那时候，旅行家关于东方的记述在西欧已经广泛流传，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行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元朝朝廷以后，很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他们在元朝供职十七年。回国以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他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的一个名叫罗思蒂谦的人记录下来，成为《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大大地开阔了西欧人的眼界，加深了他们的幻想。在西欧人的想象里，中国和印度仿佛是神话里的国度，黄金遍地，宝石、香料、丝绸和各种珍异物品琳琅满目。占有通向这些国家的商路，无疑地意味着发财致富。

直到十五世纪早期，西欧对非洲的直接交通只限于埃及等北非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还是陌生的地方。但是那里的黄金和象牙常同奴隶一起，通过沙漠间的商道，被贩运到北非，落到西欧人手里。寻找便捷的航路，到达那些富饶的地区，也是西欧上层社会的愿望。

西欧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远洋航行准备了条件。适于大海航行的轻快多桅帆船在十五世纪制造成功了。中国的罗盘针也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十四、十五世纪在海船上普遍使用，对确定船只的航向有重要的作用。旅行家的报导和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增进了欧洲人的地理学知识。十五世纪，有关地理学的理论和绘制的地图都比较接近于真实。人们开始相信地圆学说，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亚洲。

亚洲各国人民很早就开辟了沟通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和中国海面的航路，把古代的文明国家联系起来。1405 到 1433 年，中国明朝皇帝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七次远航，遍历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到达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海岸。他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高和装备之精良是空前的。1405 年第一次出航，就包括六十二艘大船和二万七千多人。郑和的远航是航海事业上的壮举。随后，西欧人的远洋航行活动发展起来。首先从事探索新航路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十五世纪晚期的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建立 711 年，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不久就占领了除北部山区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这里建立起统治。756 年，从阿拔斯的屠杀下侥幸逃脱的阿拉伯贵族阿布德·拉赫曼据西班牙独立，脱离了阿拔斯朝的管辖。失去了故土的当地居民反对外族侵占，从八世纪起就展开延续达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运动由北向南逐渐发展，在斗争中，先后形成了几个国家。1143 年，半岛西部形成了葡萄牙王国。1479 年，半岛上的其他两个王国卡斯提尔和阿拉冈合并为西班牙王国。1492 年，西班牙收复了阿拉伯人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1512 年征服北部的那瓦尔王国，统一了除葡萄牙以外的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人的探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事业都很发达，但是迟迟没有向南探航，因为非洲西北的海面上常年刮东北风，又有从东北向西南流动的强大的洋流，船只南下以后难以北返。1415 年，葡萄牙占领了非洲西北角的要港休达。亲王亨利（1394—1460 年）预料到征服非洲的新土地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于是大力赞助对非洲的探险。他创办了一所航海学校，组织力量培训海员，绘制海图，研究克服航行上的困难。葡萄牙人制成一种牢固的轻快帆船，便于逆风迂回行驶。这一切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亨利一年又一年地组织南下探航活动，因此得到“航海者”的称号。葡萄牙人先后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并且继续沿着西非洲大陆海岸航行。大约 1486 年，葡萄牙人已经南抵南回归线附近。

1487 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约 1450—1500 年）进行了更远的南航。当航行者接近非洲大陆南头的时候，暴风把他们的船只吹离海岸，绕过非洲南端。等到他们又见到陆地时，忽然发现太阳在他们的右边升起。这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印度洋。迪亚士一行在印度洋上航行了一小段距离，这时他的船员由于疲惫不堪，不愿继续前行，迪亚士不得不返航，途中意外地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尖角。航行给热衷于抢占土地和财富的葡萄牙统治者带来了美好的前景，葡萄牙国王把非洲南端的尖角地带命名为好望角。

1497 年 7 月，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约 1469—1524 年）率领由四只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他依靠阿拉伯航海家领航，从非洲东海岸航向印度，1498 年 5 月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里库特。他首先实现了西欧人的梦想，找到了通向神话般的国家的新航路。达·伽马的船队满载香料、宝石、丝绸等东方产品回

也称比利牛斯半岛。

迪亚士绕行好望角的时间，有 1487、1488 之说。

到葡萄牙，获得相当航行费用六十倍的暴利。同时他带回了从非洲到印度一路的航行资料。

哥伦布到达美洲 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探索通向亚洲的航路的时候，西班牙在另一个方向寻找着同一个目标。

达·伽马

哥伦布出发前向西班牙国王、王后告别

意大利热那亚一个织工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哥伦布出发前向西班牙国王、王后告别自幼喜欢航海。根据地圆学说，他认为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可以开辟联结欧亚两大洲的捷径。他先向葡萄牙国王游说。当时葡萄牙正在大力开辟绕过非洲的新航路，没有给予支持。他又去找西班牙国王。当时西班牙还没有结束对阿拉伯人的战争，没有给予答复。六年之后，西班牙完成了领土统一。就在这年，西班牙王室支持他的远航计划，为他配备了三只帆船和大约九十名船员。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小小的船队，离开巴洛斯港，横渡茫茫的大西洋。船队克服了海上的艰险，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举着西班牙王旗登陆，宣布占领那个小岛。他以为来到了他叫做印度的东方土地，把遇见的土著居民叫做印第安人——印度居民，迫不及待地向他们追问黄金产地。他从土著居民那里知道南边有富庶的地方，随即穿过巴哈马群岛，来到风光秀丽的古巴，以为那就是日本。从古巴他又到了海地。所到各岛，他都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宣布占领，并在海地建筑了第一个殖民据点。

从1493年到1504年，哥伦布又三次出航，往来于欧美两大洲之间，到达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南美大陆北岸的奥里诺科河口和中美洲的东岸。他一直以为发现的是印度，却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黄金产地。那时候，葡萄牙人真的到了印度，开始了对亚洲富源的掠夺，哥伦布的航行没有立刻给两班牙王室带来预期的利益。他受到了冷落，在失意中死去。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考察了南美洲海岸，断定那里不是亚洲，而是一个“新世界”，一处“新大陆”。这块大陆后来就因他得名为亚美利加。但是哥伦布最先到达的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一直叫做西印度群岛。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1613年，西班牙人巴尔波亚从北向南穿越巴拿马地峡，在山顶上望见辽阔无涯的太平洋水面，巴尔波亚称它为南海。人们开始相信美洲和亚洲隔着一片水域；如果找到一条横贯美洲的海峡，从西欧出发的船只可以直接航行到亚洲，哥伦布提出的计划终究可以实现。为了从葡萄牙不能控制的方向着手争夺亚洲，西班牙积极寻找横贯美洲的海峡。

贵族家庭出身的葡萄牙人费尔南多·麦哲伦（约1480—1521年），由于在本国得不到重用，投效于西班牙国王。1519年9月20日，他率领一支西班牙船队——五只帆船和二百六十五名海员——出航，到了南美东部海岸，沿岸向南，第二年10月发现一条海峡。西出海峡以后，船队在浩瀚的大洋上航行了三个月又二十天。大洋上没有险恶的风浪，船员们就称它为太平洋。

哥伦布称之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救世主”，可能就是今天的华特林岛。

这条海峡后来称为麦哲伦海峡。

但是饥渴和疾病袭击着船员。船上缺乏新鲜食物，许多人得了坏血病，陆续死亡。1521年3月，船队在菲律宾群岛碇泊。

麦哲伦的航行见图版(27)

菲律宾群岛上有许多部落。麦哲伦企图利用部落首领间的冲突，征服各个岛屿。他为一个首领向另一个首领挑战。结果，他自己被杀死在海滩上。船员们逃出菲律宾，在摩鹿加群岛装了一船香料。剩下越来越少的人通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回去。1522年9月，十八个形容枯槁的船员驾着仅剩的这只帆船回到西班牙。

这样，人类第一次的环球航行宣告成功，大地是球形的科学真理得到了确证。

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建立 开辟新航路成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疯狂地展开殖民掠夺活动。从十五世纪起，葡萄牙殖民者就在非洲西海岸建立许多据点。葡萄牙帆船从非洲绕到亚洲，它的殖民势力跟着就从非洲伸展到亚洲。达·伽马回国刚刚半年，葡萄牙就派遣舰队远征印度。舰队被赤道洋流远远冲向西方，飘到南美巴西海岸，这块土地随即被宣布为葡萄牙所有。后来舰队来到印度，满载东方物产而归。1502年，达·伽马又亲率舰队再次出征东方，来到印度以后，炮轰卡里库特，对印度人和当地的阿拉伯人大肆屠杀抢劫。殖民者在印度西南海岸建立要塞。从此葡萄牙海盗出没在印度洋上。继达·伽马来东方的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于1509年在印度西北的第乌港外击溃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的联合舰队，1510年占领果阿，作为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的首府。第二年，葡萄牙殖民者攻陷马来半岛上当时国际香料贸易中心马六甲，闯入太平洋，很快闯到欧洲人向往的“香料之国”摩鹿加群岛。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中国，后来又到了日本。1553年，葡萄牙商人借口遇风，要求在我国广东上岸曝晒货物，以此欺骗明朝政府，乘机住进澳门，1557年竟私自筑城设官，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

在葡萄牙侵入亚洲期间，它又占据了非洲东海岸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一些据点，并且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向地广人稀的巴西殖民。

这样，十六世纪早期，葡萄牙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殖民者依仗在非洲和亚洲的据点和要塞，以赤裸裸的海盗姿态横行海外。天主教教士乘着海盗船远涉重洋，以传教为名掩护血腥掠夺。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大量劫运奴隶、黄金、象牙和乌檀木，获利累累。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的大约一百年间，从非洲掳走的黄金就有二十七万六千公斤。濒临几内亚湾一带，这种抢运活动非常严重，殖民者竟把这一带称为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奴隶海岸。在印度洋上，他们的海盗船一发现别国的船只就追击，拦截。他们依靠直接抢劫、强制征收，有时也用欺骗性贸易的方法，从印度运走香料、宝石、鸦片、布匹；从锡兰运走珍珠；从印度尼西亚运走胡椒等香料和大米；从中国和日本运走茶叶、瓷器等等。每年春天，葡萄牙王家船队离开首都里斯本，到东方装运掠夺所得。十六世纪的里斯本成了欧洲的东方商品仓库。在那里，东方商品按垄断价格卖给欧洲各国商人。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建立 哥伦布一踏上美洲土地，就代表西班牙殖民者迈出了掠夺美洲的第一步，加勒比海各岛首先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随着地理探测的进展，西班牙的殖民规模迅速扩大到美洲。

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

1519年，西班牙贵族、冒险家费尔南多·科尔蒂斯率领一小支军队在墨西哥东海岸登陆。印第安人聚集起来，用投枪和弓箭迎击。印第安人没有见过马和炮火，以为那些都是神怪，因而惊慌失措。科尔蒂斯利用部落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入阿斯特克人建立的特诺奇蒂特兰，在那里掳获数量惊人的黄金和宝石。半年以后，阿斯特克人发动起义，围困这个城市。城市位于湖中的岛上，殖民者在黑夜里奔逃，在大堤上遭到攻击。许多人紧抱着沉重的掳获物，溺死在水里。后来殖民者把这一夜叫做“悲惨之夜”。1521年，科尔蒂斯最后战胜阿斯特克人。孕育过古文化的墨西哥土地，成了冒险家的殖民地。

另一个西班牙冒险家法兰西斯科·皮萨罗在1531年带兵前往今天的秘鲁，1532年逮捕印加的统治者。为了赎取人身自由，印加统治者用黄金高高堆在他被拘留的房间里，再用白银填塞两个房间。皮萨罗拿到金银以后，又背信地把他处死，自己统治了秘鲁。

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向北推进到今天美国南部，向南吞并整个中美洲；同时从秘鲁出发，侵占了今天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并进一步侵入阿根廷、巴拉圭等地。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帝国形成了。最后，除了巴西以外，整个南美大陆都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在亚洲，麦哲伦航行后四十多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占领菲律宾的土地，到十六世纪末，除巴拉望岛、棉兰老岛等南部诸岛外，都被征服。

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形成的过程里，天主教会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会大力参与殖民掠夺中的一切暴行，并且为它辩护。在“消灭异教”的叫喊下，教士们点起熊熊的火堆，烧死敢于反抗的印第安人，烧毁他们的象形文字书籍。

印第安人被迫在甘蔗园劳动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大土地占有制。贵族、商人和冒险家纷纷成为大地产的主人。天主教会也占有大片土地。随着土地的被瓜分，土地原来的主人也被瓜分，被迫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殖民者在金银矿、甘蔗种植园和其他场所推行强迫劳动制。苦役和虐杀吞噬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矿坑里掘出了矿砂，堆起了印第安人的白骨。印第安人给被强征入矿山的亲人送行的时候，就预先举行送葬仪式。

屠杀、强迫劳动、饥饿、殖民者从欧洲带到美洲的许多传染病，使印第安人人口急剧减少。半个世纪里，古巴、海地等西印度群岛上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十六世纪初，殖民者开始从非洲掠卖黑人到美洲，补充被消灭的印第安人。从此，黑人奴隶的血泪又浇灌了美洲的土地。

在劫运黑人的船上

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化作殖民者的财富。每年春夏两季，船队从西班牙开往美洲。船队满载黄金、白银、蔗糖、可可等美洲产品，集结在古巴的哈瓦那，由军舰护航回到西班牙。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每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黄金有五千五百公斤，白银二十四万六千公斤。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将近百分之八十三归西班牙所有。西班牙也变成了欧洲的金银储藏库。

开辟新航路的后果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它们没有把抢来的财富用于发展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宫廷开支或填补对外贸易的亏空,掠夺来的金银转手流入工业发达的英、法、荷诸国。十六世纪,西欧金银数量猛增,引起金银价格下跌,造成物价高涨。资产阶级乘机谋取暴利,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英、法、荷继葡、西之后很快就展开了掠夺殖民地的竞争。资产阶级把掠夺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扩大工场手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西欧的工场手工业产品、殖民地的物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这一切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征服、屠杀、奴役和剥削之中,透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西欧国家超越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

新航路的开辟也改变了欧洲各国相互间的形势。主要的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意大利的商业城市丧失了独占东方贸易的地位,陷入衰落。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葡萄牙的里斯本、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成为十六世纪新的贸易中心。进入十七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繁荣起来。

第二节 文艺复兴

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欧国家先后发生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原意是“再生”，也就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实际上文艺复兴包含着远为丰富的内容。

文艺复兴的兴起 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这首先是由于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那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大商人、企业主、银行家为了增加财富，就需要扩大业务，改进经营，提高效率，因而也就需要具有文化知识、熟悉经营管理、擅长办理交涉、掌握生产技术、能读善算、通晓法律的各种人才。他们要求物质享受和优美的艺术欣赏，这就需要为他们服务的教师、医生、建筑师、艺术家等来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增添乐趣。客观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这一资产阶级文化运动源于意大利，十五世纪下半期扩及欧洲许多国家，到十六世纪达到高潮。

意大利本来就是罗马古典文化的发源地。西罗马灭亡后，西欧文化处于落后状态。东罗马继承并发扬了希腊、罗马文化。后来阿拉伯人翻译了许多古典作品，这些译本又流传到西欧，使西欧人重新接触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当时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一度由阿拉伯人占领的西西里岛是向西欧传播阿拉伯文化的媒介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一些希腊学者带着手稿或手抄本逃到意大利，在这里讲授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这种学习热潮发展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它仿佛是古代文化的再现，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抄袭旧文化，而是一种创新，它有着伟大的划时代的发展。

正在兴起的新文化具有反对封建神学的性质。在封建社会里，教会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一切以神学为中心。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操纵在教会手里，连皇帝也要由教皇加冕。《圣经》被教会说成是最高权威。死后升入“天堂”被教会宣扬为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们眼界狭小，思想受到禁锢。当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冲击封建经济基础时，与它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必然要冲击到封建上层建筑。资产阶级考虑的是发财致富，追求幸福。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起了变化，因而对教会的神学教条产生疑问。许多知识分子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武器，向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多年尘封的古代稿本从修道院和教堂里被取出来。他们一面研究，一面从中汲取营养，犹如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开始以人为中心来观察问题，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世间的财富、艺术、爱情享受代替禁欲主义；他们相信自己的创造力，不相信神赐的力量；他们强调人生不应该消极遁世，而应该积极进取；他们主张人应该以丰富的知识和健强的体魄去从事创造，人的高贵不决定于家世门第，而决定于自己的“业绩”。这种新的思潮叫做人文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用灿烂的诗篇、图画和雕塑来表达时代精神。就以绘画说，十三世纪画的人物显得呆板，景物也是象征性的，缺乏生活气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从生活中汲取题材，画面给人以现实感，即使是装饰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以宗教为主题的画面，例如圣母和耶稣，也具有现实世界

阿拉伯人从九世纪起陆续占领西西里岛，维持统治到十一世纪。

基督教传说中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的人物形象。

但丁

但丁 佛罗伦萨诗人但丁（1265—1321年）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的著名长诗《神曲》展示了当时的社会概貌。《神曲》包括《地狱》《炼狱》《天堂》三个部分。但丁描写自己顺次漫游其境，见到各种人物。但丁不是根据教会的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正义观念和政治立场，来区分人们的善恶，加以褒贬。他描写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罪人，例如高利贷者，放荡淫佚、阿谀奉承、盗窃之徒，贪心的教皇和官吏在地狱里受严酷的刑罚，他在地狱的火窟里为当时还活着的教皇保留了一个位置，认为这个教皇死后一定会下地狱。他又把他所崇敬的许多历史人物如查理大帝等，安置在“天堂”里享受永恒的幸福。但丁通过《神曲》流露出对教会的蔑视和谴责，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宣告新的历史纪元的到来。

彼特拉克 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年）生于佛罗伦萨附近，他是文艺复兴思想基础的奠基者，开创了一时的新风。他精通拉丁文，并努力学习希腊文。他遍游意大利搜集古代稿本，请人加以抄录，聚精会神、不知饥寒地阅读着。彼特拉克写了许多瑰丽的抒情诗，歌唱自己的爱情，同时猛烈抨击罗马教皇的统治。在一篇题为《致罗马教廷》的诗里，他控诉罗马是“痛苦的巨流，凶残的庙堂”，是“万端诡计的熔炉，阴暗的牢房；善良在那里凋谢，邪恶在那里滋长”。彼特拉克倡导用“人的学问”来对抗“神的学问”，建立以人而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获得很高的声望和许多追随者。

彼特拉克

薄伽丘 彼特拉克的学生和友人、佛罗伦萨人薄伽丘（1313—1375年）是散文作家兼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故事集《十日谈》。故事以1348年欧洲的黑死病为背景，描写十个青年男女从佛罗伦萨城逃到一座乡间别墅里去躲避这场瘟疫。他们聚在一起讲故事，每人每天各讲一个，十天共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一些民间传说。薄伽丘以诙谐的笔调刻画出天主教会的黑暗，教士的不学无术和腐败，揭露封建贵族的贪婪和商人的欺诈行为。它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状况，故事写得轻松幽默，引人入胜。

继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后，人文主义者纷纷出现在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等许多城市，影响广布于意大利全境。许多城市的统治者争相延聘他们，赏给他们荣誉和官职。佛罗伦萨尤其显得突出。十五世纪，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拨出了大量资财，罗致了许多知名的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兴建了豪华的宫殿和教堂，设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柏拉图的学园，收藏了古代作家的大量珍贵稿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以及其他许多有才能的人士都曾得到过他们的资助鼓励。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把佛罗伦萨装饰得十分壮观。意大利的一些有财有势的人也兴致勃勃地学习知识，只要条件许可，人们纷纷让自己的子女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文化空气一时称盛。

达·芬奇 十五世纪后半期和十六世纪前半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达到高潮。有成就的文化人物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达·芬奇（1452—1519年）生于佛罗伦萨附近，是一位杰出的大师，他的成就几乎深入人类知识的一切方面。他是伟大的画家、雕刻家，又是音乐家和诗人。为了提炼绘画和雕塑

的艺术法则，他深入研究了解剖学、光学和力学。他不倦地探求征服自然的道路，通晓生理学、物理学、数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他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摒弃宗教的武断和臆测。为了了解人体的构造，他不顾教会禁例，解剖了人的尸体。达·芬奇还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他设计了飞行机械、潜水机械和机枪等许多器械。他终生勤奋，前后积累的手稿大约有七千页。

作为一个画家，达·芬奇不屑于临摹别人的作品，他立足于实地观察，把欧洲绘画艺术提高到成熟的阶段，留下不少不朽的作品。他根据基督教题材创作了壁画《最后的晚餐》，描画耶稣在遇难前夕同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耶稣指出十二个人里有人要出卖他，顿时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内心活动，有的愤慨，有的悲叹，有的表示心地清白。唯独叛徒犹大脸色灰暗，流露出惊愕的神态，他的右臂支在桌上，手中握着钱袋，使人一看便能辨别出叛徒的面目。达·芬奇一反流行已久的内容神秘的宗教画，画出了活生生的形象和情节。为了创造叛徒犹大的典型形象，他每天早晚到无赖汉群集的场所去观察，几乎继续了一年，后来又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这幅壁画。《蒙娜丽莎》画的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富有的女市民，两眼别具神采，口角含着微笑，体态端庄，显示出青春的活力，这幅画用了四年才画成，是艺术史上的又一杰作。

拉斐尔所画圣母像见图版(28)

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1483—1520年)出生在意大利东部的乌尔比诺城，后来前往佛罗伦萨，又到罗马。他融合了意大利的许多名画家的特长，把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有很多创作，其中有许多是宗教题材的壁画，装饰在梵蒂冈的教皇宫殿里。他笔下的圣母和耶稣温和可亲，栩栩如生，渗透着人文主义思想。拉斐尔还参加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生于佛罗伦萨附近，是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他画了许多教堂壁画，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他最喜爱雕刻，称之为“诸艺之首”，认为雕刻能使人物活龙活现，宛如赋有生命。代表作有《圣经》人物摩西和大卫的雕像，神情刚毅，气势雄伟，表现出坚强和力量。

摩西石雕像

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大文学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文坛的巨匠。莎士比亚青年时期刻苦自学，后来在伦敦的剧团里担任配角。舞台生涯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实践。他同时开始为剧团写剧，留下的剧本有三十七部，包括喜剧、悲剧、历史剧等。喜剧如《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悲剧如《李尔王》《哈姆雷特》(或译为《王子复仇记》)等，历史剧如《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剧本洋溢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充满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他歌颂自由的爱情、真挚的友谊、人类的才智，反对封建分裂，痛恨资产阶级的残忍和唯利是图。他的语言生动，描写深刻，塑造出不同人物的典型性格。喜剧《威尼斯商人》刻画了高利贷者的贪婪自私，《理查三世》展示出国王的凶残险恶。他的创作细致入微，扣人心弦，喜怒哀乐之情跃然纸上，既是

还有一个剧本作者尚不能最后确定，可能由莎士比亚与人合写。另外，近年一些英国学者认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书籍》也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见1981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社会生活的写照，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和诗篇。他在世界文学史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莎士比亚

自然科学 文艺复兴时期又是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发展的时期。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冶金、纺织、造船、航海等都有很大进步。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传播起了积极影响。生产经验的积累，技术能力的提高，为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近代自然科学勃然兴起。它冲破神学的束缚，在人类认识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近代自然科学首先在天文学领域里突破教会的禁例。长期以来，古代天文学家，特别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十分流行，人们认为宇宙以地球为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地球转动。这个观点符合教会关于天象的解释，教会把它奉为信条，不容异议，谁敢违犯，就是“异端”，就要遭到迫害。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首先向教会的教条宣战。他曾在意大利学习法律、医学和天文学，回国以后，在一所教堂里供职。他对天文很感兴趣，根据三十多年的观察和运算，发现阿拉伯人和希腊人制定的天文表不能完全说明天体运行现象，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之一，地球本身又以地轴为中心而转动。他写成《天体运行论》，由于害怕教会迫害，到1543年死前才发表。“太阳中心说”是天文学中的一次革命，它同教会关于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万物服务于人类，人所生存的地球是中心等说法相矛盾，因此教会拒绝接受哥白尼的观点。学者当中也有人一时不明白其中道理。然而这一伟大发现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几十年后，它终于证明是科学真理。

哥白尼

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早年当过修道士，这时候他接受哥白尼的观点，并且对罗马教会的统治表示不满。他被怀疑为“异端”，于1576年离开修道院，后来长期在西欧各地过流亡生活。1584年，他在伦敦出版《论无限宇宙和世界》。他认为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只是太阳系的中心，宇宙间有无数的星系，宇宙是无限的。这一思想彻底否定了教会的宇宙观念。1591年，他接受威尼斯一个贵族的邀请，返回威尼斯，但是这个贵族在第二年就向宗教裁判所告密。布鲁诺随即被解往罗马，入狱七年，受尽折磨。但他坚持真理，决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他被宗教裁判所宣判为“异端”，要被处死。他却昂然宣称：“你们宣读判决书时，要比我听宣判更感到害怕。”1600年，他在罗马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科学真理而勇敢献身。

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为自己的学说辩护

意大利比萨人伽利略（1564—1642年）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是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很注重实验，被认为是近代实验科

学的奠基者。据说十九岁时，他在比萨的一座教堂里观察一盏挂灯的摆动，从而发现了摆振动的等时性。几年之后，他建立了落体定律，否定了亚里斯多德关于物体坠落速度与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其重量成正比的学说。他制作了一台天文望远镜，通过观察，他发现月球表面有山谷，崎岖不平，金星绕着太阳运行，太阳上有黑点，木星有四个卫星，银河由无数星体组成，等等。1632年，他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结果被传到罗马去受审，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来威胁他，伽利略被迫宣称放弃他的学说。教会限定他囚居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直到去世。他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坚持科学著述，1638年出版了《关于力学和局部运动的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据》。

哈维

实验科学推动了医学的进展。学者们解剖尸体来研究人体和疾病。布鲁塞尔医生维塞留斯（1514—1564年）不满足于前人留下的书本知识，他先是解剖狗、猫、鼠等动物，继而到坟场或刑场去搜集尸骨，积累第一手的资料，并且通过解剖示范讲授有关知识，听者踊跃，座无虚席。在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的同一年，维塞留斯出版了《论人体的构造》，这是科学地阐述人体结构的第一部著作。正象前一部书开始改变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一样，后一部书哈维开始改变人们对自身结构的认识。维塞留斯被称为“近代解剖学之父”。西班牙医生塞尔维托（约1511—1553年）发现心脏和肺脏之间的血液循环。后来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通过多次对动物的活体解剖，查明了心脏的功能和动脉、静脉的不同作用，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为生理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采用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极其重要的技术成就。中国印刷术西传以后，推动了欧洲的印刷业的发展。1450年前后，德意志人谷腾堡（？—1468年）用铅、锡、锑的合金铸成活字，印了一部《圣经》。活字印刷接着就在西欧兴盛起来，它代替了人工抄写或雕版的繁重劳动。特别是这时候欧洲人已经能生产纸张，十六世纪，价廉物美的纸已经取代了多少年来一直使用的羊皮纸和埃及纸草，加上活字印刷术的应用，不但大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一本医书的价钱要相当于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大约三个月的生活费用，法学书籍则相当于一年多的生活费用。采用活字印刷之后，书籍大量刊行，源源流传各地，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品和思想输送到许多地方，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为文化的普及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为旗号反对以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的运动。人文主义者以“人权”代替“神权”，提倡发展人的个性，增进人的福利。他们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种新文化、新思想是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服务的。尽管如此，文艺复兴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它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正是由于冲破了封建神学的枷锁，因而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产生出许许多多的辉映史册的不朽作品，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文艺复兴孕育了西欧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在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第三节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腐败的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西欧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多少世纪以来，它的权势和财富在增长，它的腐败也在随着加深。十五世纪后半期，英、法、西班牙等西欧国家都走向中央集权，逐渐摆脱教皇的控制。罗马教廷的收入越来越减少，就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教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裙带关系有增无已，出售神职习以为常。它设立了许多挂名的或闲散的官职，专供出卖。据统计，单是在1520年，就有大约两千个官职是卖出去的。天主教会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官僚机构。教会各级上层人士都过着奢侈淫佚的糜烂生活。瑞士一个主教不但对教士

贩卖免罪符的放荡犯罪行为放任自流，而且向他们按私生子的数目收款，名为实行惩罚，实为中饱私囊，由此得了一大笔钱。在法国，有的教士竟然把自己的住处变成赌窟。在意大利，有的教士为了侵吞病人财产，竟与医生合谋毒死病人。教皇英诺森八世在位时（1484—1492年），有人问他的一个大臣：“为什么犯罪的人不受上帝惩罚？”这个大臣竟公然回答说：“上帝不愿罪人死去，愿意让他活着出钱。”教会还出卖“免罪符”——一纸空文，胡说只要买了它，就能免罪，死后就能升入天堂。教会的丑闻和聚敛行为不胜枚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愤慨。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教会十分猖獗，它一方面阻挠统一，一方面把德意志作为重要的搜括对象。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每年达三十万金币，人们称德意志为“教皇的奶牛”。

宗教改革前夕的德意志 十五、十六世纪，德意志的纺织、采矿、印刷、造纸等工业都有显著发展，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商业相当繁荣，从东方运到意大利再转往北欧的商品，需要从德意志过境。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城市经营对外贸易。但是，德意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和英国等欧洲其他地方。由于封建割据，德意志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一个城市成为德意志的工商业中心，对内贸易少于对外贸易。在政治上，德意志除了七大选侯之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的骑士，交通不便，关卡林立，币制庞杂，局面混乱。经济的分散性不利于政治统一，而政治不统一又影响经济发展。德意志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矛盾的集中点就是天主教会。

德意志农民在市场上卖产品

在德意志，教会和世俗诸侯掌握着最大的权力。他们的领地俨然是独立王国，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世俗诸侯不满德意志教会的横行无忌，他们不但反对财富流向罗马，还觊觎教会的巨大财产。骑士阶层已经日渐没落。随着火药和步兵作用的增大，他们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收入不多，甚至债台高筑。他们既反对诸侯的专横跋扈，也嫉视教会的富有。市民阶层，即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新兴的工场主，受教、俗诸侯的压迫，他们反对对发展经济的限制，不满意教会的特权，嫉妒它的财产，想把送给教会的钱用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他们当中的激进派要求用“廉价教会”来代替想尽办法压榨勒索的封建教会。城市中的平民群众，如破产的手工业者、帮工、日工、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境况尤其悲惨的是农民。农民遭受着教、俗封建

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肩负着什一税、地租、人头税、战争税、死亡费、结婚费、财产转移费和劳役的繁重负担，面临着挖眼、割鼻、截指、断手等刑罚的威胁。他们燃烧着对教、俗封建主的怒火。十五世纪末，秘密组织“鞋会”在南部一带的农民当中发展起来。农民在旗帜上画着一只鞋子，表示决心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一些地方性的起义已经在不断地爆发。教士集团内部情况也不一致。上层人物行为堕落，生活腐化，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低级教士出身平民，收入微薄，生活接近普通群众。他们对于上层人物同样心怀不满，自己也想分享教会产业。因此，德意志的一切社会矛盾都围绕着教会剧烈地发展着。教会统治集团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十六世纪初，马格德堡大主教又当上了美因兹大主教。由于兼任高级教职违反教规，他准备为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送给教皇利奥十世一笔款项，贿赂教皇不过问这件事。为此，他向经营银行业的富格尔家族借了债。事后他又与教皇密商，靠贩卖免罪符来凑集一笔钱，一半用来还债，一半交给教皇。于是教皇借口修缮圣彼得大教堂，让他在所辖的教区之内贩卖。富格尔家族的代表也随同贩子们出发。推销免罪符的老手、教皇的使者特兹尔一路兜售，还无耻地宣称：“只要买主的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他已死家属的灵魂马上就从炼狱飞升天堂。”他们骗到不少的钱，但同时却招来一片非难和愤懑。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特兹尔兜售到维登堡附近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阻挠。

马丁·路德

1517年10月31日，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在维登堡教堂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就免罪符问题提出异议，要求进行争辩。马丁·路德曾在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后来又在维登堡大学学习和任教，熟悉人文主义思想。他曾长期思索过“灵魂得救”的问题，对教会的说教越来越感到怀疑。他认为一个人应该通过虔诚的信仰来获得免罪，达到“灵魂得救”，而虔诚的信仰来自崇敬上帝和对于《圣经》的心领神会；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交往，不须通过教会和教士的媒介；否认需要履行种种“圣礼”，即教会规定的一套繁缛的礼拜仪式、朝拜圣地以及向教会输赠等“善行”，来实现自己的信仰。他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关于“廉价教会”的要求。他在论纲里说：教皇无权免罪，他只能宣示和确证上帝对罪愆的赦免；符券贩卖者们宣传教皇的免罪符能免除对人的一切处罚是错误的；当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贪婪和爱财的欲念就会增加；基督教徒凡诚心忏悔者，不用免罪符也可以赦罪免罚。他还指出，符券贩卖者们关于免罪之道所作的胡乱宣传，会使哪怕是有学问的人都难以回答世俗人士的流言蜚语和尖锐的质问，从而影响人们对教皇的尊敬，比如说，他们会问：既然教皇比当代最富有的人还富有，为什么他不拿自己的钱财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而要用贫苦的信徒们的钱财呢？等等。

路德提出论纲的时候，并没有要同教皇决裂，也没有想到要发动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是事出意料，论纲立即在德意志，接着在西欧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尖锐的社会矛盾使论纲成为燃起一场斗争的导火线，路德本人也成了这场斗争的发动者。

路德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拥护，他的态度逐渐坚决。但是教会方面不甘罢

休。1519年夏，双方在来比锡展开一场论战。维登堡大学的校长亲自护送路德前往，还有二百名学生执戟带盔充当卫队。会上，路德不但揭穿免罪符的欺骗性，还进一步否认教皇统治基督教徒的权力。从此路德举起了反对罗马教皇的旗帜。1520年6月，教皇发布敕令，宣布路德的论点是异端邪说，限令他在六十天内撤回他的主张。路德不予理睬。时限期满，维登堡城里点起了庆祝营火。路德当众把教皇的敕令扔进火里。1521年1至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要路德到会上承认错误。路德在4月18日作出答辩，他说：“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撤销任何事情，因为违背自己的良心而行动，是既不安全又不诚实的。”

路德在妖姆斯帝国议会上见图版(29)

路德反对教会的一系列举动，固然得到广泛拥护，但是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却是根据其不同的利益来支持宗教改革的。除了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掌权的城市贵族反对改革以外，在要求改革的势力当中很快就分裂为两个集团。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派倡议建立新的教会，主张用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基督教会来代替已经封建化和官僚化的教会；主张教会脱离罗马控制，取消复杂、森严的教阶制，取消繁缛的礼拜仪式，把教会土地收归国有。路德反对暴力，主张和平发展，消极抵抗。他的宗教改革主张，不包含社会改革的要求，它代表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工场主、小贵族和部分诸侯的利益。随着改革运动的进展，人民按照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形成另一派。他们的代言人是托马斯·闵采尔。

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年)是个神甫，曾经支持路德早期反教皇的言论，但很快就反对他的温和主张。闵采尔认为信仰的建立，既不依靠教会，也不依靠《圣经》，而是基于人的理性。他把权贵富豪和一切剥削者叫做不敬上帝的人，认为他们对人民的掠夺是人间的罪恶；扫净这种罪恶，“天国”就降临人间。闵采尔所描绘的天国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境界，而是现实世界的改造，是没有阶级对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认为，宗教改革的基本任务，不只是反对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还要消灭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他嘲笑马丁·路德是“坐在柔软垫子上”的“可怜改革家”。他预言，整个世界一定要忍受一次大震荡，那时候，权贵富豪和一切剥削者都要垮台，受压迫的都要翻身。闵采尔深入民间，传播革命思想，号召夺取封建社会的一切权力。

德意志农民战争 尽管马丁·路德坚持温和的主张，宗教改革开始以后，阶级斗争的狂澜已经无法遏制了。

从1518年到1523年，德意志每年都发生农民起义，1524年，起义更是接踵而起，最后形成了全德意志的农民战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了战斗。战争的基本地区有三个。

第一个地区在南部的士瓦本。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拒绝为贵族服劳役，发动起义。闵采尔和他的信徒走遍许多城镇，积极推动斗争。起义者提出自己的纲领——《书简》，号召推翻封建制度。士瓦本贵族慑于起义的威力，一面集结兵力，一面同农民谈判。第二年初，农民发现受了贵族欺骗，于是拒绝谈判。起义席卷了士瓦本全区。在战斗中形成六支起义队伍，人数多达三、四万人。3月，六支起义军的领袖在梅明根集会，制定了《十

二条款》，作为斗争纲领。

《十二条款》包括从农奴制压迫下恢复人身自由，限制地租和劳役，收回被贵族霸占的农村公社土地，把什一税用于支付教士的薪俸和公共事业，农民自己选举本地宗教事务的管理人。这个纲领带有温和性质，它只要求限制封建剥削，没有提出彻底打倒封建制度，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

德意志农民战争

起义队伍分散作战，没有组成统一的整体。反动将领特鲁赫泽斯利用这一弱点，采用假谈判和武装袭击的手法来对付农民。结果，有些起义队伍轻信敌人，同意休战，便利了反动军队的调动，使他们有可能进行各个击破。1525年4月，士瓦本的农民战争基本上失败了。

第二个地区在士瓦本以北的弗兰科尼亚。起义在1525年3月末爆发，4月迅速扩大。起义者烧毁了几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惩治了罪大恶极的封建贵族。封建主惶恐不安，有些惊慌失措的封建主只好拿出粮食、武器，假意表示支持农民，为保全自己的堡垒而参加起义的行列。许多骑士加入起义队伍，还有许多城市也倒向起义军一边。城市平民积极配合农民斗争，但是市民只想利用起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态度摇摆不定，不少人虽然参加了起义，但不久就被运动所吓倒，投向敌人方面，造成起义队伍涣散，力量削弱。起义军内部的成分比较复杂，队伍的领导人之一、贵族出身的希普勒主张争取贵族和市民的力量，并且任命骑士贝利辛根担任指挥，结果，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起义者分离出去，起义队伍进一步分裂了。

1525年5月，在海尔布隆城召开的农军代表会议，制定了由希普勒起草的《海尔布隆纲领》。纲领提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废除国内关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保证骑士从被没收的教产中分得土地；纲领规定农民可以用常年租税二十倍的赎金摆脱封建义务，这实际上只有少数富裕农民可以做到。纲领主要反映市民的利益，对封建主妥协，希望通过改革在德意志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没有真正表达农民的要求，因此引起农民的不满。这时候，反动军队已经从士瓦本赶来镇压。狡猾的特鲁赫泽斯仍旧采用各个击破和欺骗性谈判的手法，打败了几支起义军，进向海尔布隆。城里还在讨论纲领，城外敌人已经进逼。在这关键时刻，市民相继叛变，开门迎敌。希普勒匆匆向北逃去。起义军北撤到维尔茨堡，各路起义队伍又在这里集合起来，人数达到两万多人。但是经过几次分裂失败之后，他们未能一致对敌，加上市民的叛变，贝利辛根的通敌，给敌军造成可乘之机。特鲁赫泽斯的军队一路烧杀掳掠，把起义农民和稍觉可疑的人都吊死在树上。7月初，弗兰科尼亚的起义也失败了。在残酷地镇压了弗兰科尼亚的起义以后，特鲁赫泽斯转回士瓦本，扑灭了那里残余的斗争火焰。希普勒后来被捕，死在狱中。

第三个基本地区是图林根和萨克森。那里有发达的手工业和采矿业，农民以外还有许多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手工业者和矿工。1525年2月，闵采尔来到图林根，3月在缪尔豪森城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永久议会”。闵采尔被选为主席。从此缪尔豪森成为德意志中部的起义中心。在它周围，起义的烽火到处在燃烧。人民攻占城市、庄园、城堡和修道院，分掉贵族的土地和财物。农民信赖闵采尔的领导，纷纷向他请求对斗争的指示。闵采尔向人民宣传斗争的远大目标。消灭领主，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号召人民“向前，向前，到了象打狗一样地穷追猛打恶棍的时候

了。……不要让你的刀剑冷却，变钝。”

闵采尔得到士瓦本农民失败的消息，就呼吁弗兰科尼亚的起义力量同图林根、萨克森方面的起义力量联合起来，在德意志中部建立坚固的起义阵线，以便打败贵族军队。为了准备联合，图林根地区的农民队伍开始向弗兰肯豪森集中，闵采尔自己也赶到那里。这时候，马丁·路德已经被起义的浪潮所吓倒，他越来越站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他咒骂农民象“疯狗”，闵采尔是“大恶魔”，起义农民应当受到“肉体 and 灵魂的死刑”，要求“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都要在暗地里或公开地痛打，杀戮，刺死他们，……正如同一个人必须杀死疯狗一样。”他要求统治者惩治屠戮他们。同时，德意志中部的诸侯慌忙调集大军前来围攻。1525年5月中，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诸侯的兵力居于绝对优势，闵采尔毫不畏惧，亲自激励士气，率领农民军八千人奋勇迎敌。但是由于众寡悬殊，武器缺乏，训练不够，闵采尔本人也缺少指挥经验，农民在英勇的一战中失败了。闵采尔被俘后备受严刑，壮烈就义。

弗兰肯豪森战役以后，德意志的农民战争进入尾声，只有个别地区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封建主向农民反攻倒算，被杀害的农民超过十万人。在这次战争中，农民得不到坚强的领导，不能克服行动上的涣散性，这样，他们的战斗力量分散了。城市平民是农民的主要同盟军，由于他们力量薄弱，缺乏组织，未能有力地配合战斗。这次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当时德意志的市民还没有最后形成资产阶级，他们力量不强，态度不坚决，往往半途而废，甚至背叛，还不能担负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任务。

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后果 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震撼了德意志的广阔土地。这两年德意志历史上的英雄年代。在战争中，天主教会受到最猛烈的打击，许多教堂和修道院被烧毁，大量的财产被剥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权势都下降了。封建贵族的城堡也大量被毁，许多人在战争中被消灭，许多家族没落下来。他们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小贵族骑士本来已经处于没落之中，农民战争期间又多次被起义军击败，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市民的改革要求也随着农民战争的失败而未能实现。与上述情况相反，许多大诸侯却得到了很大好处，他们乘着教会上层集团和贵族的削弱，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北部的一批世俗诸侯乘机篡夺农民战争打击天主教会的成果，把教会的财产劫为己有，停止向罗马教廷的捐输，在各自的领域内建立路德倡导的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的首脑。这样，新教教会便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南部的诸侯认为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战争，他们仍旧在教皇的支持下固守旧的信仰。新旧教派的诸侯相持不下，互相混战，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1555年缔结的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有权确定以路德派新教或天主教作为其臣民的信仰，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新教主要流行于德意志北部和中部，而且向欧洲其他地方传播。

第四节 宗教改革的扩展

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时候，欧洲许多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同样反映到宗教改革的问题上，王权的加强也同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的势力发生矛盾。在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的瑞士、尼德兰、法国南部，宗教改革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在君主专制的英国和北欧国家，宗教改革采取由国王自上而下发动的方式。

天主教会在瑞典有很大的势力，拥有大量土地。路德派的新教很快传到北欧。1527年，瑞典国王开始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没收教会财产，限制主教们的政治权力，确定新教传教自由，1544年正式宣布瑞典是信奉新教的国家。丹麦国王（当时辖有挪威）也在1536年实行宗教改革，撤除了主教们在政府中的职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建立起路德派的教会。这两个国家的新教教会都受国家政权的管辖。

在西欧一些国家，在宗教改革中还产生了新教的其他支派。

瑞士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初，瑞士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州（六个乡村州，七个城市州）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另外还有一些附属于联邦的辖地。联邦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瑞士位于南欧和北欧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商路上的城市如苏黎世、日内瓦等，工商业很发达，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农民生活贫困，往往去给教皇、皇帝、法国国王当雇佣军。

慈温利

瑞士神甫慈温利（1484—1531年）受过人文主义教育，1516年开始宣传宗教改革思想，反对出售免罪符。在他的影响下，苏黎世市议会在1519年通过决议，禁止在该州出售免罪符。慈温利还反对悬挂圣像，反对斋戒和教士独身的规定，反对教皇从瑞士招募雇佣军。他在市议会的支持下进行宗教改革，简化仪式，封闭修道院，实行由本区的信徒选举教区牧师。他创立的新教流传到其他城市州，但是信奉旧教的乡村州加以反对。双方发生战争，苏黎世等州失败，慈温利阵亡。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转移到日内瓦。

卡尔文

1534年，法国的新教倡导者卡尔文（1509—1564年），由于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流亡瑞士。他的基本思想同路德的相似，主张“信仰得救”，反对繁缛的仪式和教阶制。但是他又断言“得救”与

卡尔文在日内瓦主持会议否是上帝命定的事情；上帝从来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发财或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这都是上帝预定的命运，人们只能顺受，不能更改。这种以宿命论掩盖阶级剥削、称颂追逐财富的宗教主张，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自私，适应他们的需要和利益。1536年，卡尔文来到日内瓦，先后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从1541年起，他掌握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把日内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国。卡尔文规定的教会组织

日内瓦原来是联邦的辖地，在1815年才作为州加入联邦。

新教中主持宗教仪式、管理教堂事务的人。

既不受教皇统治，也不归国家政权管辖，神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在教派内部实行严峻纪律，对其他的新兴教派同样斥为“异端”，加以无情镇压。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发现心肺之间血液循环的塞尔维托就因教义上的分歧被卡尔文下令处死。居民受教会纪律的严格约束，连娱乐也在禁止之列。当时人们把日内瓦叫做“新教的罗马”，把卡尔文叫做“日内瓦的教皇”。卡尔文在日内瓦创办学校，培训新教的传教士。他们把卡尔文教派推广到英、法、尼德兰等欧洲许多地方。

法国的宗教改革 路德教派和卡尔文教派先后传到法国。卡尔文教派的教义和教会的组织形式更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因此它在法国流传很广。十六世纪前半期，法国经济取得新的发展。呢绒、印刷、玻璃、制陶等工业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里昂的丝绸纺织业和马赛的对对外贸易都十分发达。临近大西洋海岸的波尔多、南特等城市成为重要港口。在南部的一些城市里，卡尔文教派开始流行，继而逐渐向北传播。一些贪图教会财产、想利用卡尔文教派来对抗王权的贵族也参加进来。那时候，天主教会已经成为专制王权的有力支柱。根据法国国王在 1516 年同教皇订立的宗教条约，国王取得任命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教士的权力，教会大部分收入归国王所有。新教兴起之后，新教贵族集团同国王和旧教贵族集团之间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从 1562 年到 1594 年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战争，双方都以宗教为旗帜，实际上是争夺政治权力。1598 年，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 年在位）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归还已没收的天主教会财产；新教徒取得信仰自由，可以举行宗教活动，可以担任政府官职和进各级学校。此后，新教在法国取得较快的发展。

英国的宗教改革 同欧洲大陆的情况一样，广大英国人民早已痛恨教会的剥削勒索和奢侈腐化，又厌恶远在罗马的教皇干涉英国宗教事务。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教会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在增长，他们要求夺取教会财产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不再容忍罗马教廷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当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之际，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借口教皇不批准他的离婚案而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原来经过教皇特准同他的寡嫂、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姨母结婚，后来要求离婚，硬要当时的教皇克利门特七世宣布原先那个教皇的处理不合法，并且让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代表、约克大主教兼国王枢密大臣乌尔西去同克利门特磋商解决这件离婚案。教皇不愿得罪当时兼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迟迟不予批准。亨利以此为借口，在 1529 年撤除了乌尔西的职务。他又利用议会揭露教会的种种黑暗，责令英国教会把交给教廷的岁贡上交国王。1534 年，议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任命神职人员，规定教义。亨利八世封闭了许多修道院，没收了它们的财产，把大部分土地赏给宠信，或廉价出售给官吏、商人、小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改革后的英国教会脱离了教皇的管辖，却保留了天主教的主要教义、主教制和宗教仪式，被称为“英

卡尔文教派在法国称为雨格诺（一译胡格诺）派。

国国教”。

十六世纪后半期，卡尔文教派很快地在英国传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英国教会摆脱国王的控制，清除其中的天主教影响。抱有这种主张的人被称为清教徒，他们组织起自己的教会，与支持专制王权的国教会相对抗。

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 在宗教改革和人民革命的浪潮中，天主教会丧失了 in 西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势力大为衰落。为了挽救面临的危机，夺回原来控制的地方，天主教会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一方面，它对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实行一些让步，承认他们在本国的宗教事务上有更大的权力，承认他们没收教会财产的既成事实，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同反对新教。另一方面，它极力树立本身的权威。1545 到 1563 年，它在意大利北部的特兰托连续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新的教派都是“异端”，重申教皇的权威不可侵犯，原有的教义、制度和仪式不得更改。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把一切有新思想倾向的人拘捕、监禁或者烧死在火刑柱上，把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书籍列为禁书。许多科学家，例如布鲁诺、伽利略，都受到残酷的迫害。

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创立耶稣会，它是天主教会反动活动最重要的工具，在罗马建立了训练会员的中心机构。会员经过严格挑选，必须服从严格的组织纪律，无条件地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他们被派到各国去传教，在那里开办学校，建立医院，用各种方式来扩大天主教会的政治势力和影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勾结国王、后妃、达官贵人；他们贿赂，讹诈，监视，暗杀，不择手段成了他们的行动准则。耶稣会也积极参与西欧殖民者对美洲的掠夺。中国明末清初时候，耶稣会会员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来到中国，在宫廷和士大夫中间展开活动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天主教会的势力暂时得到巩固。但是天主教会的反改革活动没有能够压制新教势力。旧教和新教各有自己控制的地域和信徒。

第五节 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经济的发展 尼德兰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1516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死后，他的外孙查理一世即位。

查理已经在1506年从他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子）方面继承了尼德兰，这时又以西班牙国王的身分领有这片土地。从此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属地。

尼德兰濒临北海，地势低平，些耳德河的深水便于大船出入，因此海外交通十分便利。尼德兰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快，外国商人纷纷来到这里经商。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尼德兰的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增长。十六世纪前半期，尼德兰已经有三百多个城市。南部城市安特卫普是欧洲贸易的一个中心。这里，每日往来的外商有五、六千人，港口同时可以停泊大小船只二千多艘。商人们运来美洲的金银、东方的香料等奢侈品，运走西欧、北欧的纺织品、金属制品、船舶用具，等等。安特卫普有发达的纺织、玻璃制造、制糖、印刷等业；银行、汇兑、信贷业务应运而生。北部农业发达，荷兰、西兰两省渔业、造船业、麻织业、毛织业都很兴旺。北部各省与英国、波罗的海诸国和俄罗斯都有贸易往来。阿姆斯特丹是北部各省的经济中心，是谷物贸易的重要市场。

十五世纪后半期的安特卫普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出现于尼德兰，十六世纪得到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北部荷兰、西兰两省经营纺织和造船业的手工工场，南部佛兰德尔、布拉奔两省经营纺织、冶金、制糖、印刷业的手工工场。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毛、麻纺织手工工场。但是南部毛织业的原料和产品销售主要依靠西班牙和英国市场。这里的大资产阶级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尼德兰农村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

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专制统治 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路德、慈温利、卡尔文等教派先后传入尼德兰。卡尔文教派的影响最为广泛，接受者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有劳动人民，它成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强大力量。旧贵族力图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各种既得利益。他们仿效德意志路德派诸侯的做法，没收教会的土地财产来扩大势力。

查理是君临经济发达、城市富庶、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迅速增长的尼德兰的专制统治者。他在这里派驻总督，设立财政、行政机构和宗教裁判所，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问题上推行专制政策。原来尼德兰的各个省和城市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和传统的权利。查理为了维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庞大的行政、军队、战争开支，到处征款。尼德兰最富庶，查理在这里的勒索也最疯狂。他还利用天主教会作为统治工具。1550年的敕令（被称为血腥敕令）规定，禁止传抄、保藏、散发、买卖路德或卡尔文等改革者的文集。凡散布“异端”学说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查理统治期间，有五万到十万尼德兰人死于宗教迫害。尼德兰爆发了几次起义反对查理的专制统治。

奥伦治亲王威廉

从1519年起，查理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

尼德兰意思是“低地”。

1556年，腓力二世继承了查理的西班牙王位，也继承了他的四百五十万铤的债务，对尼德兰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他排挤尼德兰贵族的势力，废除商人直接与西班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权，拒绝偿付国债，使尼德兰的银行家蒙受巨大损失；接着他又提高在西班牙收购羊毛的税额，使尼德兰的羊毛输入减少百分之四十。尼德兰的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打击，许多手工工场倒闭，工人失业。他无情地迫害新教徒，推行耶稣会的活动。他企图改组尼德兰教会，增设十四个主教区，由国王直接任命主教，从而加紧控制人民。他的政策激起教俗各阶层的反对。尼德兰各城市的卡尔文教派组织起数以千计的武装队伍，以传道集会的形式宣传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并且举行暴动。与资产阶级利益有联系的大贵族组成以奥伦治亲王威廉为首的“贵族同盟”。1565年，他们派代表到西班牙去面见腓力二世，要求改变专制政策。第二年，在威廉的赞许下，由大约二百名中小贵族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威廉的弟弟路易）到布鲁塞尔去向西班牙总督请愿，反对西班牙的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同时表示效忠国王。这些要求毫无结果。当贵族企图用温和方式取得和解的时候，群众却采取了积极行动。

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战争 1566年8月起，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海牙、乌特勒支等城市连续爆发大规模的破坏圣像运动。群众手持斧头、铁锤、木棍，涌向天主教堂和修道院，砸毁圣像和十字架，没收教会财产，焚烧教会债券和地契，捣毁教堂和修道院五千五百多所。起义很快就席卷了十七个省中的十二个省，参加者几万人。反对天主教会的群众性破坏圣像运动点燃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斗争开始了。

面对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西班牙当局不得不暂时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允许卡尔文派教徒在城外指定地点做礼拜。同时腓力二世拨款在尼德兰增加军队，决定派他的老将阿尔发公爵到尼德兰镇压革命。1567年，阿尔发率领军队约一万八千人到达，立即设立“除暴委员会”，用血腥的恐怖手段以叛国罪大肆搜捕残杀革命群众。一万多人被无辜地烧死，杀戮，处以绞刑。白色恐怖笼罩着尼德兰。

威廉在阿尔发到达之前，就流亡德意志。1568年，他带着雇佣军到尼德兰抗击西班牙的军队，遭到失败。这时候，劳动人民的游击队却在沉重打击敌军。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农民进入密林深处，时时出击小股敌军，惩办反动神甫和官吏。许多水手、渔夫、码头工人来到辽阔的海面上，袭击西班牙的船只和沿海据点；他们和威廉有联系。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占领了莱茵河口岛上的布里尔港埠，在城头飘起威廉的旗帜。这个新的胜利带来了革命的新高潮。海上游击队进一步袭击其他城市。许多城市一个接一个地举行起义，驱赶西班牙人。荷兰、西兰两省几乎全部解放。流亡者纷纷回到尼德兰，资产阶级组织革命军队，掌握城市政权，镇压亲西班牙的神甫和间谍。农民捣毁教堂、庄园，拒绝履行封建义务，停止交纳什一税。1572年7月，威廉被荷兰省议会推选为总督。到1573年底，北部各省已经先后宣布独立。阿尔发被撤换了。威廉在北方的势力在不断地扩大。

革命运动向南方发展，1576年，布鲁塞尔人民推翻西班牙政权。南方人民纷纷投入抵抗运动。形势发展要求南北双方联合起来，北部和南部的代表1576年在根特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西班牙士兵冲进安特卫普，狂杀滥抢，

男女老幼被杀者达七、八千人。三天之后，这个富庶城市一片荒凉。这次暴行更加激起尼德兰人民的反抗怒火。十七个省中有十六个省宣布反抗西班牙的统治。11月，会议发布《根特协定》，提出撤走西班牙军队，废除阿尔发的一切法令，重申各城市原有的权利，但是仍旧承认腓力二世的君主权。

1577年，南部许多城市爆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引起反动贵族和天主教会的恐惧。他们发动叛乱，同西班牙妥协。1579年1月初，他们成立“阿拉斯联盟”，宣布效忠腓力二世。十几天之后，北部各省组成“乌特勒支同盟”，宣布永不分裂，制定共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不久南部的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

尼德兰

等城市也参加进去。1581年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成立联省共和国。此后，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威廉被腓力二世的刺客所杀，南部城市先后被西班牙占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海上被英国击溃，国力从此一蹶不振，已经没有力量同尼德兰作战。1609年，国王腓力三世只好同联省共和国缔结十二年休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的南部仍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荷兰省最发达，联省共和国也称为荷兰共和国。

尼德兰革命是在卡尔文教派旗帜下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欧洲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荷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独立以后的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绸缎、呢绒、麻布、瓷器、钻石生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造船业更处于领先地位，荷兰商船吨数占欧洲总吨数的四分之三。对外贸易繁盛。阿姆斯特丹代替了安特卫普，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的中心。独立以前，它的居民大约是五万人，到1650年猛增到二十万人左右。港内停泊的商船经常有两千多艘，市场上陈列着日本和瑞典的铜、波罗的海诸国的粮食、意大利的丝绸、法国的酒、巴西的咖啡、墨西哥的白银、中国的瓷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等等。荷兰船只远航世界各地，往来贩运商品，被称为“海上马车”，荷兰商人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在迅速增长，沿海省份中的封建土地关系差不多完全消灭了。经济繁荣给荷兰带来巨大的财富，十七世纪是荷兰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马克思称荷兰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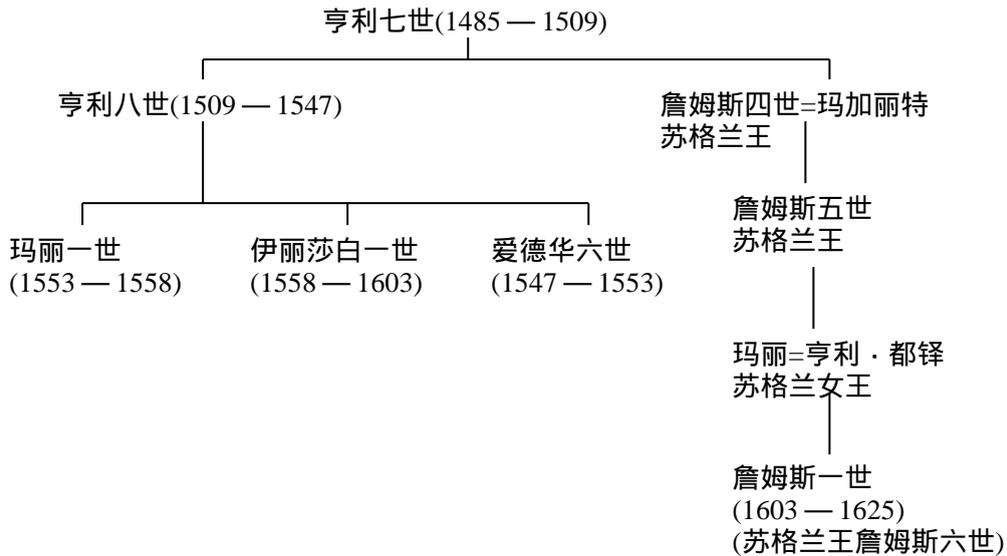
西班牙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正式承认荷兰独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第六节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

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 1485年开始的都铎王朝，一方面在英国建立起专制统治，一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和海外抢劫。亨利七世大力削减旧贵族的势力，禁止贵族蓄养家兵，加强国王的司法权力，成立“星室法庭”压制叛乱，惩治违抗国王的贵族。他用各种手段聚敛金钱，通过向违法的贵族大量征课罚金，向商人们征

都铎家族世系（1485—1603）



税，大大地充实了国库。从他开始，奖励造船成为都铎王朝的一项政策。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他由国家首脑兼而为教会首脑，他出卖没收的修道院的土地，得来的钱也流进了他的库存，这样做的结果既加强了专制王权，也有利于买进土地、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主。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1558—1603年），英国的海上抢劫和走私活动十分猖狂，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一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在都铎王朝时期被起用，某些靠着海盗行为起家的人甚至当了伊丽莎白的宠臣。与保护工商业的同时，都铎王朝加紧压迫劳动人民。这些政策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还比较弱小，需要在封建王权的保护下来发展力量。他们和新贵族共同支持国王，议会成了国王的御用工具。上议院对国王唯命是从，下议院顺从地通过国王的法令。

伊丽莎白国王也不重视议会。亨利七世很少召集议会。亨利八世把新封的贵族和英国国教的主教安置到上议院里，完全可以加以控制；他的高压政策也足以使议会慑服。伊丽莎白尽量地少征询议会意见。

英国经济的发展 到十五世纪末，英国工业还不发达，比起当时的发达地区如意大利、尼德兰、法国来说，英国落在后面。但是英国出产优质羊毛。从十四世纪起，由于国内外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英国羊毛和毛织品生产不

因法庭天花板上绘有星形图饰而得名。

断上升，成为大宗的出口货。原来，英国只能生产少量粗呢，羊毛大量输往佛兰德尔，到了十六世纪，毛织品的输出激增，羊毛输出减少下来。据估计，1354年，英国输出羊毛约三万二千袋，呢绒约五千匹；到1547年，输出羊毛减少到五千袋左右，呢绒却增加到十二万二千匹左右。这种变化是由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毛织业首先在农村中迅速发展起来，这里没有什么行会限制，便于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农村中首先兴起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包买商把原料发给家庭手工业者，收回成品或半成品。有时候，一个包买商同时剥削数以千计的家庭手工业者。后来，集中的手工工场一个接一个地创建起来。手工工场里的工人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待遇很低，劳动条件又差，终年苦干，还很难维持一家的温饱。

十六世纪的一首歌谣这样描写当时一家呢绒手工工场：

“机间宽又长，织机二百张。织工二百人，排列成长行。……旁有一大屋，女工共百人。……附近又一室，二百小姑娘。……姑娘多灵巧，纺毛太辛勤。……外面一间屋，童工一百五，并坐检细毛，不敢怨劳苦。都是穷苦人，终日不休息，清晨到深夜，各得一便士。工场备汤饭，饮食都在此。又有一大厅，五十修剪工，施展好手艺，天衣全无缝。又有八十人，洗呢更浆呢。染工又八十，呢绒着颜色。二十擀制匠，整呢折成匹。”

与增加生产的同时，英国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西班牙统治尼德兰以后，造成尼德兰的工业衰落，一批佛兰德尔技工移居英国，传来先进技术，对英国的毛织业起了积极作用。毛织业给国家带来可观的出口税，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因此国王对它实行鼓励政策。英国呢绒不但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排挤了进口货，而且在西欧市场上排挤了佛兰德尔产品，占居首位。毛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和“国家的一根支柱”，全国大约有半数人口从事这种生产，东部和西南部是毛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生产精细呢绒。东部诺福克郡的诺里季和西南部埃克塞特等地成为毛织业的中心。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则生产粗呢绒。

除毛织业以外，金属冶炼、采煤、造船、造纸、酿酒、玻璃、肥皂、火药、丝绸、小五金等工业也都发展起来，这些部门也都出现手工工场。英格兰东北沿海的纽卡斯尔成为采煤业的中心，沿海重要港口发展了造船业。

圈地运动 毛织业的发展刺激了养羊业。由于对羊毛需求的不断增加，羊毛价格不断上涨，而养羊所需要的劳动力又比种地为少，工资也低。许多贵族地主纷纷转向获利优厚的养羊业。起先，他们占用领地内共同使用的牧场，或者将自用地合并成片，辟为牧场；周围圈上篱笆，围以壕沟，用来养殖羊群。十五世纪后半期，这已经不能应付需要，于是他们完全不顾农民世代代有权租用土地的封建惯例，大规模地圈占农民用地，蛮横地将农民赶出他们世代在那里定居的家园。这在英国历史上称为“圈地运动”。英国宗教改革也加速了农民被剥夺的过程，得到土地的农场主、地主等人也加紧圈地和驱逐农民。圈地运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前半期。被圈占的土地，贵族地主或者雇用牧人在上面饲养绵羊，或者出租给农场主。他们靠圈地起家，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圈地运动大规模进行的结果，庄园从地面上消失，整村整村的人流离失所，一个个的村落房舍倒塌，荒无人烟。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哥尔斯密在《荒村》这篇诗里，形象地描绘出圈地运动前后一个村庄的景况对比，慨叹英国自耕农的消失。他写道：

“曾多少次，我在你那种迷人的景色前停留，

那荫蔽的茅屋，那耕过的田畴，
那忙碌的磨坊，那不息的川流，
那体面的教堂屹立在邻近的山头，

……
曾多少次，我祝盼着即将来临的那一天，
那时，劳动停止，轮到人们游玩，
全村老老少少都没有工作的负担，
群聚在枝条舒展的大树下消遣：

……
甜美微笑的村庄，草地上最可爱的村庄，
你的游乐消散，你的魅力褪光；
在你的茅屋之间看到暴君的手，
荒凉使你的翠绿罩上一片忧愁：

……
这片土地在遭厄运，它是来势迅猛的灾难下的牺牲，
财富在积累，人口在凋零：
事实是，只消吹灰之力，
就能够使王侯贵族兴盛或者衰微；
但是作为国家骄傲的勇敢的自耕农，
一旦消灭，却永远不能补充“。

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里把圈地运动比喻为羊要把人吃掉。从此，“羊吃人”这个词成为圈地运动的生动写照。

血腥立法 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扶老携幼，到处流浪，他们一无所有，只好乞食街头，甚至不得不去偷盗。这不但有损政府的税收，而且影响社会秩序。从十五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府几次颁布法令限制圈地，都是流于形式。后来，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法令迫害破产农民。1530年，亨利八世所颁法令规定除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给予乞食许可证以外，凡身强力壮的流浪乞食者，一律逮捕，系在马车后部，鞭打直至流血为止；然后要他发誓愿意从事劳动，将他遣送回籍；1536年又重申前令，并规定凡第二次违令被捕者，鞭打之外，还要割去半只耳朵，三次违法者处死。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之后，就颁布更为严峻的法令，规定凡拒绝劳动者，一经别人告发，就判为告发者的奴隶；要是奴隶逃亡达十四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且在额上或脸上打上“S”烙印，主人可以任意将他出卖，转让；三次逃亡的以叛逆罪处死。如果一个流浪者在某地三天没有工作，就要遣回原籍，在胸前打上“V”字烙印，系上锁链强迫服役。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可以留到二十四岁，女的可以留到二十岁。1572年，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规定，十四岁以上没有领到乞食许可证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到毒打，左耳打上烙印；如果再度行乞而且年过十八，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应处死刑；第三次重犯的以叛逆罪处死无赦。许多流浪农民做了

“S”是英文 slave（奴隶）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V”是英文 vagabond（流浪者）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这些“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的牺牲品。根据记载，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共处死七万二千人，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每年都要绞死三、四百人。许多流浪农民被雇用到正在日益发展的手工工场里去廉价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样，农民挣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束缚，却又被暴力剥夺了土地，接着又被暴力驱使去出卖劳动力。他们变成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变成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剥削的雇佣工人。

罗伯特·凯特起义 圈地运动把农民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农民反对圈地的运动风起云涌。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诺福克郡的起义。1549年6月，该郡一个小镇的农民拆毁地主圈地的栅栏，起义随着爆发。小贵族罗伯特·凯特兄弟二人成为起义者的首领。起义很快就发展到全郡，群众向诺福克郡的首府诺里季进发，7月初，来到城外的一片丛林中驻扎。城里的失业工人、破产手工业者和流浪者参加进来，使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他们在丛林中草拟了二十九条纲领，要求停止圈地，恢复农民使用公有地的权利，减租，废除庄园法庭，消灭农奴制的残余，等等。贫苦农民不满足于这份温和纲领，他们在另一份文件里，要求拆除栅栏，填平沟渠；要求自由、平等和同样使用一切物品。

英国政府派兵进攻起义军的营寨。7月22日，起义军占领诺里季。英国政府派一万五千名雇佣军前来镇压。起义军由于内部分裂，缺乏作战经验，经过两天奋战后在8月27日失败。三千五百农民英勇战死。凯特兄弟被俘，他们和三百多农民被处死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农民勇敢地捍卫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使诺福克一带保存了许多自耕农，成为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主力。

海外掠夺的开始 英国工场手工业繁荣起来的时候，世界新航路已经开辟成功。英国依靠它的经济力量，利用它所处的大西洋航路中心的优越地位，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掠夺。为此，英国政府颁布《航海条例》，鼓励本国商业，增强海上力量。亨利七世即位的头一年就规定：法国西南地区出产的酒只能由英国船只输入；三年后又规定船长和海员必须是英国臣民。另外他还规定凡建造一百吨以上的船，每吨给予五先令的津贴。亨利八世重申亨利七世关于商品运载的法令。由于英国商人积极向海外活动，商业取得很大进展。过去，英国对东方国家和北欧各国的贸易大多由威尼斯和德意志商人垄断；十六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由本国商人经营。英国商人组织了一些经政府特许的贸易公司，如以俄国（后来又扩展到中亚、波斯）为目标的莫斯科公司（1555年），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目标的伊斯特兰公司（1579年），以地中海东岸一带为目标的勒凡特公司（1581年），以劫运非洲黑人、黄金为目标的几内亚公司（1588年）。规模最大和存在时间最长的是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它独占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垄断贸易，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伊丽莎白还经常向大臣、亲信、工商业者授予制造或者销售某些商品的独占权利，也就是专利权。

英国的海外贸易是与走私和赤裸裸的海盗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海上掠夺得到国王支持。在这些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冒险者。伊丽莎白时期飞黄腾达的豪金斯、德雷克、劳雷等人，就是靠着掠夺财富和开辟殖民地有“功”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9页。

由于这些规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伊丽莎白没有继续执行。

得到重用的。豪金斯几次到西非海岸劫掠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去卖给西班牙殖民者。德雷克也多次到西印度群岛从事走私、贩卖奴隶和抢劫的肮脏勾当，并且察看当地情况，为进一步进行殖民掠夺作准备，1572年，他向巴拿马地峡发动突然袭击，在那里抢占地盘，焚烧房舍，抢劫驮运白银的西班牙骡队，获得白银达三十吨。1577—1580年，他向西作环球航行，途中截击西班牙船只，抢劫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占领地，来到旧金山海岸，宣布该地为英国所有。三年航行，使他满载而归。西班牙驻英国大使要求赔偿德雷克的劫掠给西班牙带来的损失，伊丽莎白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去视察德雷克的舰队，参加庆祝胜利的宴会，封德雷克为贵族。德雷克还设想摧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势力，由英国取而代之。1586年，他袭击西印度行政中心圣多明各，烧掉守舰，抢去弹药，使这座兴旺的城市损失惨重。他接着窜到其他据点，大肆骚扰而去。1587年，德雷克又闯进西班牙本土的加的斯港，击毁了大约三十艘西班牙船舰。霍金斯和德雷克都把抢到的财物与伊丽莎白分赃，因而得到赏识，受任海军大将。另一个海盗式的航行者吉尔伯特得到伊丽莎白的特许，去探索北美洲，1583年到达纽芬兰，以英王的名义宣布领有其地。他的弟弟劳雷深得伊丽莎白宠幸，1584和1585年，劳雷派人到北美洲去建立殖民地，到达今天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一个小岛。由于当地缺乏深水碇泊地点，生活供应也有困难，不久，殖民者放弃了这个地方。

英国和西班牙的矛盾 英国经济向海外的扩张，必然同西班牙发生矛盾。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分沾它得自殖民地的利益。英国的海上抢劫以及插手对美洲的掠夺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引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仇视；而英国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德雷克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西班牙的金银运输要道巴拿马地峡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更使腓力二世忧心忡忡。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英国为了削弱西班牙，帮助革命力量，允许尼德兰海上游击队使用英国港口。这一切使西班牙同英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起先腓力二世不想诉诸武力。他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企图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英国王位。为此，他在英国组织颠覆活动。玛丽早在1568年就因苏格兰政变而逃到英国，被伊丽莎白所囚禁。当英国的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怂恿下谋刺伊丽莎白而另立玛丽时，伊丽莎白乘机处死了玛丽。腓力二世谋杀不成，就决心用武力征服英国。

加来东北海战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腓力二世耗费大量资财，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叫做“无敌舰队”。舰队包括大约一百三十艘船舰，满载陆军、海员，于1588年5月底从里斯本扬帆出航。7月下旬，驶抵英吉利海峡，计划前往佛兰德尔去运载那里的西班牙军队，然后渡过海峡，直捣伦敦。英国作了迎击的准备，豪金斯，德雷克都担负一定的指挥责任。8月6日，“无敌舰队”来到法国加来海面，想与驻佛兰德尔的西军联系；由于后者未能及时到达，会师计划落空，后面又有英舰尾追，无法等待，只得继续前进。第二天夜间，英国火船前来袭击，打散了“无敌舰队”的阵形。8日，两军在

1580—1640年，西班牙国王兼领葡萄牙。

英国于1752年才采用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所颁布的历法，根据原来的儒略历，8月6日和8日分别为7

加来东北的海上大战。西班牙的大型战舰高耸在水面上，外形壮观，但是周转不灵；而英国的战舰已经经过豪金斯的改进，炮位增加，体积较小，行动轻快，易于驾驭，容易躲开西班牙的射程不远的重型炮弹，而自己的炮火却可以远距离射击。在这次海战中，西班牙船舰被打得七零八落，直到两军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这时风向忽然由西北风转变为西南风。剩下的西班牙船舰乘着风势向北逃去，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但是船上船具残缺，饮食匮乏，疾病蔓延，死亡很大。有的船舰破沉，有人被风冲到爱尔兰西海岸，死于英军之手。大约有半数的船舰未能返回本国。英舰没有损失，阵亡只有百人左右。这次海战实质上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与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的一次大决战。英国大获全胜，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开始树立海上霸权，而西班牙从此衰落下去。

英国的早期殖民活动 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完全可以对西班牙采取攻势。十六世纪末，英国几次派舰队去侵掠西印度群岛。接着，英国开始组织向北美的殖民活动。1607年，三艘英国船航行到北美，在今天的弗吉尼亚沿海建立詹姆斯顿，这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巧取豪夺，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在北美的大西洋沿岸逐步拓殖，不久又开始从美洲掠夺黑人到北美，在这里靠奴隶劳动榨取财富。从黑人奴隶的贩卖中，英国也攫取了巨额的血腥利润。资产阶级又把所牟取的暴利转用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圈地运动、血腥立法、海外掠夺等一系列暴力行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和资本。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暴力掠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国势空前强盛，生产不断增长，经济走向繁荣。伦敦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的中心。1500年，伦敦大约有五万人口，过了一个世纪，它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左右，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泪上面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近代篇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夕的英国

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和社会阶级结构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处在急剧的变局中。新航路的发现，使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大西洋，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地位改变为国际贸易的要道。圈地运动一方面导致了农业生产者（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的脱离，迫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质；另一方面使英国原来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的农业转变，导致英国的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与此同时，那些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直接或间接投入工业。这不但有助于老的工业部门如毛纺织业、炼铁业、造船业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且使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丝织业、玻璃和肥皂制造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特别是采煤业发展更快。工业资本主义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还占主要地位，小手工业作坊和独立工匠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

工农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十六世纪，英国就已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后，英国逐渐称霸海洋，巩固了国际贸易要道的地位，促进了它的海外贸易。各种专卖公司把它们的活动扩展到世界各地，远到俄国、土耳其、印度和美洲。那些专卖公司在对外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如1607年东印度公司所得的利润就达百分之五百。

社会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十七世纪初，英国贵族已分化为旧的封建贵族和与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的新贵族。新贵族有的经营资本主义的牧场和农场；有的把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新贵族在大规模的土地转手中取得了大量土地。1561年到1640年间，国王的土地减少了四分之三，大封建贵族的土地减少了二分之一以上，而主要由中小贵族构成的新贵族的土地却增长了五分之一。新贵族逐渐站到封建统治的对立面去，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

资产阶级包括金融家、商业资本家和工场主。在农村有资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他们一方面用剥削农业工人的方式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把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交给地主。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加，羽毛日益丰满。

当时，农民仍然占居民的大多数，依其政治、法权地位和社会经济状况，可分为自由农、公簿持有农和茅舍人。自由农是英国封建时代未曾农奴化的农民的后代，自己拥有土地。其中较富裕的，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更加富有。公簿持有农是从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转化来的。随着十四世纪以来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却没有可供自由支配的土地，只能根据庄园法庭档案的公簿而租用土地，并向地主交租。他们负担的封建义务较重，社会地位较低。农民中最贫困的阶层是所谓的“茅舍农”。他们一般只有一间

茅舍和茅舍旁的小块土地，往往无以为生，只得去作雇农或者用一部分时间为分散的手工工场作工。

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做工的工人，是备受剥削的劳动者。分散的手工工场的工人，表面象是在家劳动的独立生产者，所以他们所受的剥削是以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通常保留着一小块土地作为生活的来源。小手工业作坊中的工匠和学徒也处在困苦的境遇。工匠一般还具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

英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先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比较和平而无震荡地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要突破封建社会的框子。这样，和平的发展就要让位于暴力的变革，进化就要让位于革命。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英国经济发展所决定的社会阶级关系将决定革命中斗争力量的配置。旧贵族把自己的命运同维护封建制度的君主专制政体联系起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新贵族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投入了革命营垒。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地位不满，积极反对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将依赖人民运动来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统治。

“清教”——反国教运动 革命前夕，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适应资产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思想也产生了。在当时的英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封建国家一样，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教育、书籍无不浸透着宗教的色彩。因此，社会各阶级在寻找思想武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就从现有的意识形态——宗教中去寻求，或给某种思想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就这样，在英国出现了反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宗教形式——清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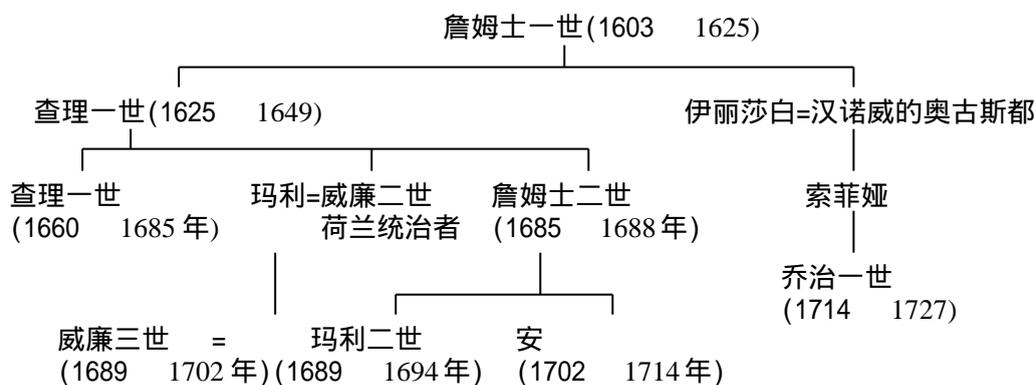
早在十六世纪中期，英国实行了宗教改革，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取消了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权，宣布英国国王为教会首脑；封闭了许多修道院，把它们的财产收归国有。但英国国教仍然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残余，例如各主教和教会机构的地产仍旧保存不受侵犯，农民仍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在社会上属于贵族的主教职位也沿袭下来等等。英国国教变成了国王的忠诚工具。由国王任命或经他批准的神职人员变成了他的官吏，教会讲坛成了国王命令的宣布场所，主教成了专制统治的支柱。

英国国教和国家融合了，其后果是人民对专制制度的仇视也扩展到国教身上，一切反对封建专制的人也就以“不信从国教”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十六世纪末，在“不信从国教者”中出现了一种要求，即彻底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因而称为“清教”。实际上，“清教”是一个广泛的、不确定的名称。它包括许多集团。这些集团的共同特征是：提出了和英国国教不同的新教义、仪式和组织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当时，清教各个集团的两个主要派别是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以教徒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来进行统治。独立派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完全独立自主。他们不仅否定主教的权力，而且也否定由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的权力，主张每一宗教团体都要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进行管理。这两个派别在未来的英国革命中执掌大权，因此有人把英国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称之为“清教徒革命”。

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和议会反对派的形成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逝

世，没有直系继承人。她的旁系亲属，玛利·斯图亚特 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英王位，在英国称詹姆斯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詹姆斯一世相信“君权神授”说，要在英国继续推行封建专制统治。他看不到他统治的时期，英国的情况同都铎王朝统治前期大不相同了。一个世纪以前，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薄弱，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有一个巩固强大的王权，对内能制止大封建贵族的分裂割据和破坏性的内战，对斯图亚特家族（1603—1714 年）



外能防御外敌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对英国事务的干涉。因此，他们同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还没有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到了十六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力量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感到不可忍受。加上詹姆斯一世无视他们自由经营企业的愿望，实行了垄断制度，由王室赋予个别人或个别公司以生产和贩卖某种商品的特权。这种垄断制度推广到许多生产部门、大部分国内贸易和几乎整个对外贸易。这不能不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损害很多资产者和新贵族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斯图亚特王朝的矛盾急剧发展，政治斗争激烈化了。

1647 年的威斯敏斯特

（左为议会，中为威斯敏斯特大厅，右为威斯敏斯特寺）

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各项政策不断进行指责，开始在议会形成与封建王权相对立的反对派。1628 年，他们在议会中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要求此后不经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任何人如未指出他的具体罪状，不能加以逮捕。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通过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这个请愿书，但是他以后又曲解其中的文意，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抗税时，他就在 1629 年解散了议会。

革命形势的成熟 1629 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到 1640 年重新召集议会，其间十一年称为无议会统治时期。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加强迫害反对派人士，他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积极推行反动政策。

查理一世政府的反动，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清教徒为逃避迫害纷纷流亡海外，从 1630 年到 1640 年，流亡海外的有六万多人。查理一世强行征

玛利原是苏格兰女王，被伊丽莎白处死。

税，1634 年恢复征收“船税”时，抗税发展为群众运动。新贵族约翰·汉普顿认为“船税”非法，因此被判有罪。

当国内人民群情鼎沸的时候，苏格兰人民起义了。在苏格兰，经过宗教改革，长老派的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国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共有一王，但苏格兰仍是一个独立王国，有自己的议会和宗教组织。1637 年，查理一世听从劳德大主教的建议，命令苏格兰采用英国国教的稍加修改的祈祷书，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愤慨。1638 年，苏格兰人签了“神圣的同盟和公约”，宣誓保护自己的信仰，还组织了一支军队。第二年，战争开始了。查理一世虽然召集军队去“讨伐”，但是他缺乏金钱，于是被迫在 1640 年 4 月召开议会，企图使议会通过议案，让他征收他需要的经费。新议会的成员很多属于国王的反对派。他们不但拒绝国王的要求，而且提出议会权利问题。查理一世在 5 月初又把议会解散。这届议会仅仅存在了三星期，英国历史上称它为“短期议会”。

苏格兰起义不断扩大，起义者越过边境，占领了英格兰北部的纽卡斯尔。当时，伦敦和其他城市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平民一再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农民运动也在英国东部爆发。各地人民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议会，仅伦敦一地就有一万多人签名。迫于形势，查理一世只好在 1640 年 11 月召开新议会。这届议会一直存在十三年，英国历史上称它为“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成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领导中心。在它存在期间，英国人民以武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它的召集，因此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标志。

“船税”是从前沿海地方为对付侵袭沿海海盗而一度实行的一种捐税，久已不征而被人们遗忘了。

第二节 两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革命的开始 长期议会是在全国群情激愤、城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环境下进行的。很多君主专制的反动派代表人物和一些原来短期国会的议员重新当选了。不过就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地位说，上议院全是贵族；下议院五百零七名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其中包括许多新贵族；约有七十名议员出身于资产阶级，其中有少数共和主义者如约翰·皮姆、汉普顿和亨利·马尔腾等。后一部分议员的反封建态度比较坚决，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有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真正力量在议会之外，首先是伦敦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

长期议会召开以后，就对查理一世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指控，通过了一些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那些法案规定，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国王不得议会同意不能解散议会；禁止征收某些苛捐杂税，宣布“船税”非法；废除了最为人民痛恨的反动统治机构，如大主教法庭、星室法庭等；宣告无罪释放从前被逮捕的政治犯如平等派的代表人物李尔本等。

以上这些成就不只是议会表决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城乡劳动人民广泛发动的强大压力下取得的。这一点，在斯特拉福的审判案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斯特拉福是反动首脑人物之一，向为人民所痛恨。皮姆等人在长期议会召开不久就提出议案，要求审判他。一些保守议员百般阻挠。1641年4月21日下议院审判斯特拉福时，五百多名议员，只有二百六十三名出席。由于群众不断到议会示威，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处死这个“臭名昭彰的罪犯”，下议院才得以通过《褫夺公权法》，同意处死斯特拉福。但是，上议院拒绝批准。群众再度出动，一连两天包围议会，上议院才勉强通过这个法案。同样在群众的强大威力面前，查理一世才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书。5月12日，斯特拉福被推上断头台，聚观的城乡群众山人海，数达二十万，出现了英国空前的壮观局面。

慑于人民群众的声势，特别慑于农民起义事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和西南部的扩展，1641年夏秋以后，议会许多议员惶恐不安，有的想转过头来同王党妥协。议会讨论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的法案时，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在讨论《大抗议书》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抗议书》全文二百零四条，列举了查理一世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了议会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工商业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讨论的时候，议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之间几乎武斗起来；表决的时候，它只以十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说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议会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越来越多的保守议员从反对派立场转到王党立场。到1641年冬，公开拥护国王的议员已达二百五十五人。但是，许多议员不能不看到，王党势力强大，他们自身安全难保，而且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都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还得更坚决地同封建专制统治斗争。

查理一世看到议会中一些议员的保守情绪在增长，另一些动摇不定，以为有机可趁，决定用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下令逮捕议会反对派的领导人物皮

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英国史——革命世纪（1603—1714年）》英文版第121页说，内战中不同程度地卷入国王一边的议员计二百三十六名。

姆和汉普顿等五人。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公然不顾不以武力侵犯议会的传统习惯，率领士兵到下议院逮捕皮姆等。皮姆等人早已闻讯，躲到城区，得到手工业者和平民的武装保护。抗议和声援书从全国雪片般飞来，伦敦市内和郊区的水手以及伦敦附近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结队开往伦敦。一周以后，皮姆等人在群众护送下，以胜利的姿态回到议会。劳动群众事实上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

约翰·皮姆

查理一世和他的党羽，在伦敦已经无路可走，于1月10日离开了“叛乱”的首都，到北方去集聚力量准备反扑。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冲突已经从议会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向全国扩展了。

第一次内战 查理一世在北方集结了王党力量，1642年8月，在诺定昂升起了王家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的“叛乱”分子。各地的民兵集合在议会的旗帜下，艾赛克斯伯爵受议会任命，统率议会军。英国内战开始了。

内战中的英国，从地区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王党盘踞的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它的社会支柱主要是旧的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依赖的是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从力量对比上看，交战双方，议会占绝对优势。它控制的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在军队数量上，内战开始时，议会军远远超过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舰只都在议会一边，控制了许多重要港口。议会又据有首都伦敦，不仅便于征收固定的赋税，而且可以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行政管理中心。

英国内战形势

但是，在第一次内战开始以后的头两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在埃吉山发生了内战中第一次大战役，胜负不分。随后，王党军队占领了牛津，威胁伦敦。1643年夏，议会军在北部和西南屡遭失败。秋天，王党军队计划围攻伦敦，由于伦敦民兵的英勇出击才度过这场危机。当时，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同盟，共同作战。1644年7月，苏格兰军队和议会军队在马斯顿荒原击败王党军队。但由于议会军的一些领导人贻误戎机，又缺乏统一指挥，这一胜利成果又化为乌有。

议会军开头失利，原因不在条件不利和力量薄弱，而在议会军领导阶层的妥协动摇的政治态度上。就对待内战的态度说，议会军领导阶层可分为三派：主和派，主战派和主战派中的右翼。后一派虽然主战，但不坚决，时刻准备着一旦国王承认议会的权利就同国王言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皮姆和汉普顿等，而他又掌握着议会的领导权。加上指挥议会军的艾赛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老朽昏庸，进退失据，造成了军事不利局面。严酷的现实使议会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克伦威尔就是具有这种认识的代表人物。

克伦威尔

他们先在牛津西北解除王军对乌斯特城的围攻，归途又在伦敦以南的纽伯立 打击了王军。

奥里佛·克伦威尔（1599—1658年）是亨廷顿郡的乡绅，他出身的家庭在英国宗教改革处理教会土地时发了财。他是典型的中等新贵族、虔诚的清教徒，在邻里中因捍卫贫穷人的权利而获得好名声。作为长期国会议员，他坚决反对专制王权，强烈要求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内战开始，他主要从农村的虔诚信仰清教的自耕农中招募了一支队伍，任命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为中下级军官。他那支队伍既勇敢又有纪律，连战皆捷，在马斯顿荒原那一战中起大作用，被人誉为“铁骑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军队同艾赛克斯、曼彻斯特统率下的军队的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很清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克伦威尔军队的式样改组军队，坚决作战。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害怕下层人民武装起来以后，会对他们产生威胁，不愿这样作。1644年11月，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曼彻斯特还说什么：“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都会被绞死，我们的后代都将变为奴隶。”克伦威尔反驳说：“果真如此，为什么我们当初举起武器？这简直是反对此后作战。”

就在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对待内战持勉强应付态度的时候，城乡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城市里各种要求信仰自由的独立教派运动雨后春笋般地勃兴，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八十多个不同的教派和圣会。各种不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小册子大量涌现，1645年英国的出版物达七百多种。著名诗人约翰·密尔顿对此热烈欢呼：“我好象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起来了。”在农村，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形式主要是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其中西南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最为突出。“棒民”大约有十万人，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议会的犹豫动摇。“棒民”运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它遏制了当地封建王党和贵族的气焰，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议会改变犹豫动摇的态度，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同王党斗争。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议会通过了彻底改组军队的计划，建立一支以自耕农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和工匠、学徒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1645年4月，议会通过《自抑法》，规定国会议员不能担任军事职务，这就解除艾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人的军职，克伦威尔因正在前线追击王党军队而例外。“新模范军”二万余人，包括五六千骑兵。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和清教徒的热忱，有纪律，有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在北方指挥议会军队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被任命为“新模范军”司令，克伦威尔为副司令。

“新模范军”在战场上的一往无前，1645年6月在纳西比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王党军队，以后所向披靡，克服了王党据有的城镇。后来，查理一世也作了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方面的胜利而结束。

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打败了王党，但是在革命阵营方面发生了政治斗争。这场斗争首先产生于长老派和独立派之间。

早在内战开始后不久，国会议员便形成了多数和少数派。多数派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代表人物，政治上保守，对战争主张防御，遇有机会就想同国王妥协讲和。少数派由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中、小乡绅所组成，当初比较激进，主张把反对王党的战争进行到底。这两个政治派别以清教徒中两个主要派别命名：多数派称长老派，少数派称独立派。军队改组以后，两派之间的矛盾更激化了。长老派掌握着议会的实权；独立派以“新模范军”

为力量中心，在地方机构也很有力量。

内战结束以后，英国经济一片残破景象。长老派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反而加强搜括，致使日用必需品和粮食价格猛涨。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长老派独吞了。例如在土地问题上，革命以来，从前属于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上层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之手。1646年，议会又颁布法令，废除了“骑士领有制”，把与王室有藩属依附关系的一切土地变为大地主的自由私有财产，不再对国王负有封建义务。而农民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长老派还利用他们在议会里的统治地位，把当时实际成了英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变为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把中、小资产阶级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权利之外。他们把长老派的信仰定为全国的宗教信仰，对要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人实行残酷迫害。

长老派看到“新模范军”已成为集结中、下层人民力量的强大组织，又怕它对他们的政策不满，于是以减轻人民赋税的负担为借口，在1647年2月让议会通过决议，解散军队，并且拒绝补发所欠士兵的薪饷。消息传来，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大哗，军队里发生了骚乱。但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态度暧昧，不敢大胆引导士兵同长老派作斗争。这样就从独立派中分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

平等派思想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已经广为流传。它认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源泉，由人民选举的下议院应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利，上议院和国王都应取消。它主张实行宗教自由，取消什一税，废除垄断专卖权。这种思想反映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新模范军”的士兵中得到热烈拥护。平等派领导人约翰·李尔本（1618—1657年）的著作在士兵中不胫而走。当时的人说：“士兵摘引李尔本小册子中的话，就好象摘引法律条文一样。”

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军队里的士兵在1647年4月底5月初选出了各团的鼓动员，日益把上层军官的领导权排挤掉。由鼓动员组成的委员会，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又成了联系军队以外的平等派的纽带。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受到鼓动员的警告，不得不改变动摇态度，转到士兵方面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全军大会，吸收鼓动员参加。大会通过了声明，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把反动的议员从议会里清除。在士兵的强烈要求和伦敦人民的广泛支持下，1647年8月6日，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的长老派议员。这一场政治斗争以长老派的失败而结束。

1647年8月6日以后，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在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士兵之间展开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未来国家制度的政治方案上。独立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平等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人民公约》中。它贯穿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议院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应当属于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下议院。10月底到11月初，在伦敦郊外普特尼举行全军大会，讨论两个方案，争论一周多，双方各不相让。克伦威尔悍然下令解散会议，命令士兵分别在三个地方集中，准备检阅，企图以武力镇压平等派。11月15日，军事检阅时，平等派想乘机起义，但事先未作充分准备。克伦威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一些士兵，把其中一名枪杀在队列之前，镇压了士兵起义的企图。平等派暂时遭到了失败。

第二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王党和长老派眼见军队内部分

裂，猖狂活动，伺机再起。1647年11月，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地方逃出，到了南边的怀特岛。他同长老派谈判，讨价还价，还秘密同苏格兰贵族的使者接触，企图利用苏格兰封建主的势力帮他复辟，后来达成了协议。

就克伦威尔说，他镇压了平等派，也想同国王勾结。但是查理一世宁愿同长老派或苏格兰人联合也不想同克伦威尔妥协。面对新的内战威胁，克伦威尔不得不转过头来同平等派合作。他宣布释放被捕的平等派官兵，吸收平等派军官和鼓动员参加军官会议。会议通过平等派的建议，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加以审判。

1648年2月，王党在西南部暴动，掀起了第二次内战。后来，他们又占领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在北部同苏格兰贵族率领的军队共同行动。有一部分舰队也投到王党方面。王党气焰猖狂一时。但是，在革命军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已经重新联合，加上社会上的中下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战局很快扭转过来。8月间，在北方的普雷斯顿附近的决定性战役中，王党军队被击败，他们在东南方面最后根据地被拔除。第二次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基本结束了。同年12月，查理一世再度落入革命者之手。

第二次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伦敦各地的人民和军队的士兵不断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民主改革要求，抗议某些长老派议员同国王勾结，要求清洗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时多达几万人。消灭了王党叛乱的军队在返回伦敦途中，发表了《军队抗议书》，重申了平等派的要求。这时，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平等派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如哈里逊、普莱德等倡议和决定的。

12月初，军队进入伦敦。几天以后，普莱德上校带领他们占领了议会，把一百四十三名反动的长老派议员清洗出去了。这就是英国史上有名的“普莱德清洗”。这件事，克伦威尔并不知道，事后不得不表示“对此感到高兴并将努力支持”。

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议会中独立派占了优势。在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政治情绪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议会成立了最高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敌人”定罪，判处查理一世死刑。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处死。

处死查理一世

处死了查理一世，议会又通过了废除上议院的决议。英国实际上成了既无国王又无上议院的共和国了。1649年5月19日，英国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顶点。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革命的进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使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是这个进程并未发展下去。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站稳脚跟，就转过头来镇压人民和抹煞革命的民主内容了。

第三节 从共和国到护国公的统治

平等派的新发动和掘地派运动 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统治下的共和国，中下层人民仍然处在经济困苦、政治无权的地位。这不能不导致新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具体表现为平等派的新发动和掘地派运动。

早在1649年2月、3月间，平等派的领导人物李尔本发表了他的新作《揭露英国的新枷锁》，指出独立派政权是套在人民头上的新枷锁，斥责某些有势力的人正在阴谋实行军事独裁以奴役人民。不久，平等派发表了新版本的《人民公约》。在平等派的宣传鼓动之下，军队里的士兵在许多地方起义，要求把《人民公约》的要求付之实施。克伦威尔一再镇压，1649年9月以后，平等派运动渐趋衰落。在同独立派斗争时，平等派没有彻底摆脱克伦威尔等人的控制，又未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

当平等派重新发动的时候，伦敦以南的塞利郡和肯特郡等地发生了自称为“真正平等派”即掘地派运动。掘地派占据公共土地或荒地，进行垦殖、播种。他们声称不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且相信“富有者的理智终将战胜他们的贪欲”。他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想，还把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政府身上。但克伦威尔却应土地所有者的请求，派军队驱散掘地派，破坏他们组织的公社，毁掉他们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到1650年初，掘地派运动瓦解了。

杰拉尔德·温斯坦莱是掘地派思想家。他在自己所写的小册子里表明，社会罪恶的主要根源是土地私有制，在人类原始时期，土地是公有的。自从产生了土地私有制，就产生了贫富悬殊现象。以后强者打弱者，从而开始了战争，王权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温斯坦莱认为，在新社会里，土地应该公有；人们都应该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不过他找不到实现他的理想的现实力量。他有时诉诸理智，有时又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能自上而下实现他的计划上。这种思想反映了英国城乡穷苦人的愿望，但是它却是不成熟的、空想的。

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地派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把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粉碎了。

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 克伦威尔镇压了本土的人民运动以后，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特别是士兵的不满情绪，又对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了军事行动。

英国封建主从十二世纪开始就侵占爱尔兰，几百年来一直遭到爱尔兰人的不断反抗。1641年11月，正当长期议会対国王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爱尔兰爆发民族起义。由于英国国内不久就爆发了内战，无暇对付爱尔兰。1649年10月，克伦威尔亲自率领军队一万多人在都柏林登陆，攻占东海岸的一些城市，屠杀和平居民。1650年，英军完全占领了爱尔兰沿海地带以后，克伦威尔才离开爱尔兰，把征服爱尔兰的事交给他的助手。1652年5月，英国军队基本上征服了爱尔兰。大批爱尔兰的土地被没收，克伦威尔和许多军官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士兵也得到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以此代替薪饷。大量土地落到了金融大亨手里。爱尔兰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原来作为革命工具的军队却由于侵略爱尔兰而变质了，以后就成了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的支柱。

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回来，继费尔法克斯出任军队总司令。他立即投入了对苏格兰的战争。第二次内战期间，苏格兰贵族已站到查理一世一边作战。英国独立派共和国建立后，不仅苏格兰贵族而且苏格兰的一切有产阶级都同英国疏远了。1650年6月，流亡荷兰的查理王子（查理一世之子）在苏格兰登陆，在爱丁堡宣布为王。克伦威尔率军北上，9月间一战击溃苏格兰人。第二年秋，苏格兰又组织了一支军队，由查理率领进入英国境内。克伦威尔率军从苏格兰回头追击，在英格兰西部的乌斯特附近追上他们，彻底击败了他们。从此苏格兰合并于英国。按1654年发布的合并命令，苏格兰议会取消，在英国议会里加进三十名苏格兰代表。

护国公的统 随着国内外斗争的进展，克伦威尔的权力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人民的不满情绪仍以神秘的宗教形式继续表现出来。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的“残缺议会”既不得人心，又同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争权。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一切不满的表现。权势地位空前强大的克伦威尔成为他们瞩目的人物。

克伦威尔驱散残缺议会议员

（克伦威尔手挥宝剑，嘴里叫着：“恶棍们滚开！”）

1653年4月，克伦威尔使用兵力驱散了不够驯服的“残缺议会”。7月间，经过克伦威尔特别挑选的一百四十名议员组成了“小议会”。这个小议会以其一位积极活跃的议员、皮革商人贝尔朋的名字，在社会上被讥称为“贝尔朋议会”。克伦威尔原来希望“小议会”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但议员中仍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克伦威尔对“小议会”施加压力，年底就“自行解散”了。共和国到此已经名存实亡了。

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了一个宪法草案，名为《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克伦威尔于1653年12月16日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护国公。文件规定，国家的立法权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行政权由护国公和他任命的国务会议掌握。护国公在行政司法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力，同时又是军队和国民军的总司令。很明显，护国公制实质上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军事专政。

1654年9月，按照《施政文件》规定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议员中有人企图借审查《施政文件》来限制护国公的权力。克伦威尔指斥说，规定护国公的权力不是议会的职权。很快，他又把这届议会解散了。以后，克伦威尔实行个人的军事独裁。他把全国分为十一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个少将领导，在本区享有民政和军事大权。

在实行护国公制的最后几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企图恢复君主制。1656年9月开幕的第二届议会，一方面废除了军区少将，另一方面又恭顺地提请克伦威尔接受王号。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势力的高级军官的压力，克伦威尔不得不拒绝王号。但是后来议会还决定，护国公的称号由克伦威尔的家人世袭。

第四节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 1688 年政变

1660 年复辟和查理二世的统治 1658 年克伦威尔死去，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公。理查懦弱无能，手下军官不服。第二年 5 月，理查被迫辞职，政权由一小撮高级军官操纵。军官集团争权夺利，而伦敦城的大资产阶级又拒绝服从这一小撮高级军官，拒绝经济上的支持。伦敦陷于极端混乱。外地又爆发了农民运动，特别是东部农民同圈地的地主斗争激烈，砍伐地主森林，夺取耕地。有产者惶惶不安，伦敦的大资产阶级和各地的乡绅地主更加害怕人民的新发动。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和军队不能保证有巩固的秩序，就得用其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而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权便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好办法。就在这种形势下，率军驻扎苏格兰的蒙克将军带领军队开回伦敦，同时同流亡法国的查理·斯图亚特暗中勾结。蒙克本来是君主主义者，迫于革命形势才转到议会军方面来。现在，恢复君权的时机来到了。他到达伦敦以后，召开了新国会，多数议员都是长老派和王党分子。议会决定政权“应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也就是主张恢复王权。由蒙克授意，查理·斯图亚特在荷兰布列达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内战期间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更动；停止宗教迫害；除直接处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其他反对过君主制度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蒙克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扫清了道路。1660 年 5 月，查理·斯图亚特带领一群亡命国外的保王党人返回伦敦，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1660—1685 年）。这就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

复辟之初，查理二世不得不表示恪守《权利请愿书》的规定，尊重国会的权利，任命一些长老派的首领为重要官员。但是不到一年，虚伪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保王党人占多数的议会通过法案，恢复英国国教教会，迫害其他教派，要求公职人员按国教仪式宣誓。查理二世政府又以恐怖手段迫害革命的参加者，把许多人包括在“弑君者”的范围以内加以杀害。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吊上绞架。

复辟时期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发展阶段，差不多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关系都有巨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但是查理二世执行的政策仍然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引起了他们的不满。1679 年议会选举，反查理二世的议会反对派在议会中占多数。当年，他们在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法案规定，对每个被逮捕的人，应该事先宣布其罪状；被捕者有权要求立刻进行审讯。虽然《人身保护法》有一些保留条件，而在当时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统治者独断专行的反动行为。

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英国政治斗争的尖锐条件下，形成了两个政党。托利党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国教教士的利益，主张加强王权。辉格党代表金融资本家、大商人、乡绅和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主张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利。

1688 年政变 1685 年查理二世死而无嗣，由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继位，称詹姆士二世（1685—1688 年）。

詹姆士二世是一个天主教徒，即位之前就受到辉格党的反对，即位以后又大力镇压反对派。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这不仅引起辉格党人而且也引起托利党人的反对。因为如果天主教在英国得到恢复，自英国宗教改革以来被没收的天主教会的土地就有被重新夺去的危险。而那些土地或是以廉价

落到新贵族之手，或是由国王赠给了许多旧贵族。英国国教教会的教士耽心国教教会统治地位的丧失，反对恢复天主教。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又怕詹姆士二世的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政策，会激起下层人民的骚动。恢复天主教会危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威胁国教和非国教的新教徒，这就导致了辉格党人和一部分托利党人的联合。1688年6月，他们发动了政变，迎来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当时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要求他登上王位。当年11月，威廉带兵在英国登陆，英国各地的资产阶级和乡绅相继投到威廉一方，伦敦市议会代表上层市民欢迎威廉到来。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逃往法国。12月，威廉进入伦敦，第二年初，议会决定威廉三世（1689—1702年）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1689—1694年）共同即位。这次事件就是资产阶级历史家所谓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实行的一次政变，是两个阶级妥协的结果。政变以后，政治上的职位仍保留在大贵族手里，其条件是这些大贵族必须推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这次政变结束了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法案列举了詹姆士二世破坏各种基本法律的错误行为以后，指出了国王的权力范围。规定以后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也不能决定使什么人免受法律的制裁。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任何赋税，也不能在和平时期征集和维持军队。法案宣布议会的言论自由，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全体人民都有请愿的权利等等。

1701年，议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了威廉三世以后继承王位的具体人选。这样，决定王位继承人的大权掌握在议会手里了。根据该法案关于王位继承人的规定，实际上杜绝了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可能。法案还规定，英国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英王必须参加英国国教；所有的政府法案必须由同意该法案的枢密会议成员的签署才能生效等。这些规定进一步限制了王权，提高了议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巩固地确立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王权和封建制度，是一次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欧洲建立的道路，成为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蓝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兴的资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参加了革命是这次革命的一大特色。虽然这次革命披上了宗教外衣，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毫不含糊的。城乡劳动群众担负了革命斗争的重担，在革命深入前进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兴起阶段，阶级分化正在剧烈进行。城乡劳动群众分化为许多利益不同的阶层，缺乏组织性，时代的条件也还不可能把他们推上革命领导地位。共和国建立以后，新当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把劳动群众为推进革命深入发展的运动一一镇压，以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先变成护国公政府，再演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政变已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或者说是资产阶级上层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合流。这就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未能贯彻到底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反复，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这种制度比封建专制制度进步，成为以后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效法的榜样。

威廉三世死后，由詹姆士二世次女安继位，安死无嗣，王位传给斯图亚特王室的旁系汉诺威家族的人。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的欧洲

第一节 十八世纪的英国

经济概况 1688年政变把荷兰的威廉三世和玛丽推上了英国的王位，同时确立了土地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地位。

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首屈一指，但是就经济构成的比重说，还是一个农业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农业。小麦有输出，输出量不断增加，从1697—1707年的一百一十多万夸特增加到1746—1765年的九百五十多万夸特。输出的农产品中还有麦芽和大麦。

十八世纪，英国农村里排挤中小农户的过程变本加厉，国家政权助长大地产吞并自耕农的土地。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越来越多，1717—1727年为十五件，1728—1760年为二百二十六件，1761—1796年为一千四百八十二件，1797—1820年为一千七百二十七件。

根据这些法令被圈的土地达四百万英亩以上。这些被圈的土地不象从前那样用作牧场，而是作为大农场。大地主或以高额地租出租土地，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他们有资本，能够雇用农业工人，使用改良的农业设备。他们对农业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刺激了农业的进步。“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集聚等等”。这时，开始实行了系统的谷类作物与根块植物的轮种法，制定了排水和施肥办法，采用新式的农业机器如条播机和改良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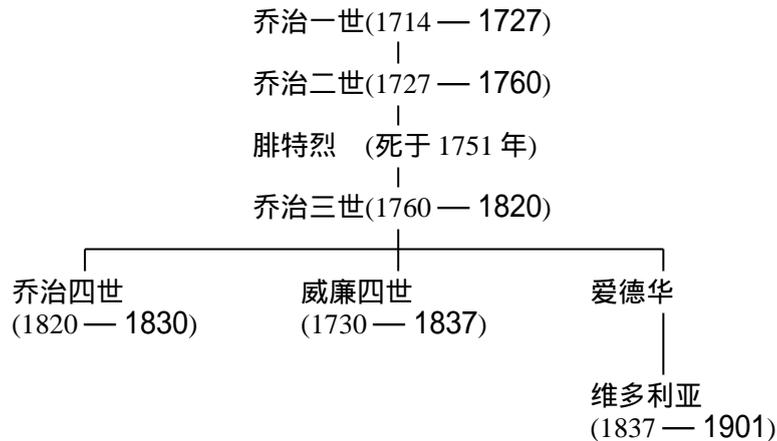
在工业方面，十八世纪上半期仍在迅速发展。毛纺织工业在一些地区陷于停滞，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进展。总的说它是稳步前进的，输出是上升的，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每年输出的呢绒的价值不大超过一百万镑，1764年已增到四百万镑。1700年，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此棉纺织工业以兰开夏为中心取得了长足进展。当时，工业商品的小型生产愈来愈多地被手工工场所代替。虽然手工工场还有分散的小工场，但它在毛、棉、丝等织造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至于集中的手工工场多从事制铁、造纸、玻璃制造等。集中的手工工场是手工劳动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专业化把生产分成许多细致的、简单的操作，为机器的发明和推广作好了准备。而且手工工场训练了许多熟练工人，为以后产生的工厂制度创造了另一个必要的前提。加上其他条件，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由手工工场阶段向工厂阶段过渡。英国经济起飞了，它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辉格党与内阁 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排斥詹姆士二世的子系继承英国王位。它规定，由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继承威廉三世，如果安死而无子女继承，应由斯图亚特王朝的远亲德国的汉诺威选侯继位。1702年安继承威廉三世为王。1714年，乔治一世继安为王，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从1714年到1783年先后七十年，辉格党一直当政，没有间断，也没有遭到致命的反对。

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之女，威廉三世之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0页。

汉诺威家族(1714 — 1837)



选举战：拉选票的场面

在驱逐詹姆士二世的政变中，辉格党起过积极作用；对威廉三世，它坚决支持。同辉格党对立的是托利党，因为它的成员有一部分支持詹姆士二世而削弱了力量。无论辉格党或托利党，都是高级贵族的掌上物。它们的区别在于：托利党以中等贵族即大乡绅为基础，牢牢地控制着地方上的权力。辉格党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和伦敦的银行家、大商人、大船主，从汉诺威王朝开始就牢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辉格党统治期间的最初代表人物是华尔波尔。

罗伯特·华尔波尔（1676—1745年）出生在诺福克郡的一个贵族地主家里，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了贵族教育。他继承的地产每年可以收入二千英镑。在女王安在位时代，他既接近女王，又接近权倾一时的马尔博罗公爵，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从1721年到1742年，他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首脑。华尔波尔象伦敦商人那样精于理财，又是一个十分重视现实的人。他尽量把赋税从商人和工场主身上转移到消费品上，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欢心；又为了不招乡绅们的敌视，大减土地的税率。经过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加上1689年《权利法案》的具体规定，英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议会的权力超过了国王的权力。而汉诺威王朝的头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不熟悉英语和英国国情，又把某些王权转归辉格党首领。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英国议会制度逐渐确立；就在华尔波尔当权时期，内阁制开始形成。

英国的内阁制综合地说须包括这几个因素：内阁必须在下议院里占有决定作用的多数，阁员须在议会中据有议席；一切阁员必须在大政方针上一致，必须联合起来集体负责；内阁必须有一个首脑（即后来的首相），他有控制内阁决定的发言权，又必须是下议院多数党的首领。华尔波尔当权的时候，这些因素正在萌芽，他竭力用干薪职位、营利事业、承办公物、授予爵号、施惠议员亲友等办法收买议员，牢牢地掌握着下议院的多数议席。1733年，他强迫反对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大臣辞职，这固然起于他想把持政权，不容阁员反对他的政策，但这一举却树立了一条重要原则，在关键问题上内阁必须意见一致。因此有的历史学家指出，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和首相为内阁和下议院首领之功，应归于华尔波尔。正式使用首相一词是以后的事，在英国政治制度演变史上，华尔波尔却是事实上的首相。内阁制的产生使英国立法机

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使后者减少效率，在立法和行政之间找到了调节。

华尔波尔在下议院同议长谈话

在当政的辉格党中，华尔波尔代表资产阶级中较为保守而和平的一派。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中代表资产阶级中侵略而好战的一派，势力抬头，在1742年把华尔波尔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四十年，英国通过殖民战争，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它虽然失掉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却牢牢地握有加拿大和印度。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经济力量的加强，英国靠着剥削殖民地和较弱国家的经济从属关系，日益上升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 十八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生活和社会。启蒙运动十七世纪在英国获得开端。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思想，有许多是在英国这个被资产阶级革命松开的土壤中萌芽的。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创始人就是英国的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新兴资产阶级英国的著名思想家，是启蒙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发展了自然权利的理论，认为人类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私有权。他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主义理论和专制主义理论，把人民政治主权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社会之前是自然状态，人们联合组成一个社会同盟，是由于自愿的契约而产生的。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破坏社会契约，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一个人的自由和财产，那就是政府领导人“把他们自己置于同人民的交战状态中”，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而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相信人性有善良的和理性的基础，认为任何社会的目的都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是洛克的自由思想的出发点。承认私有制是和自由、平等相等的人的自然权利，这又清楚地表明了洛克的政治理论的资产阶级的实质。洛克的政治学说对于欧美的社会思想，起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将会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献中具体看出来。

在启蒙运动的总轨道上，在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苏格兰的教授亚当·斯密（1723—1790年）。斯密把自由竞争看作仿佛是由自由本身所规定的秩序，相信随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也要增长。他认为各个人的自由活动是达到共同福利的最好的捷径，因此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即反对当时仍然盛行的“重商主义”。

所谓“重商主义”产生于新航路发现以后和西欧殖民者竞相争夺殖民地之时，一时在欧洲不胫而走。重商主义者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比如由国家安排对外贸易，鼓励商品出口，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生产发展。他们认为进口少，出口多，就能把尽可能多的金银集中到本国。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时代，人们把金银的多少作为国家富庶和繁荣的尺度。金银多了不仅可以向企业投资，而且可以用来扩充海陆军，使国家更加富强起来。在英国，直到工业革命以前，重商主义一直是政府和资产阶级所奉行的学说。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名著《国富论》，提倡“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他认为国家不必安排贸易和工业，因为这种干预是违反供求的“自然规律”的，而放任政策却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利益。他还特别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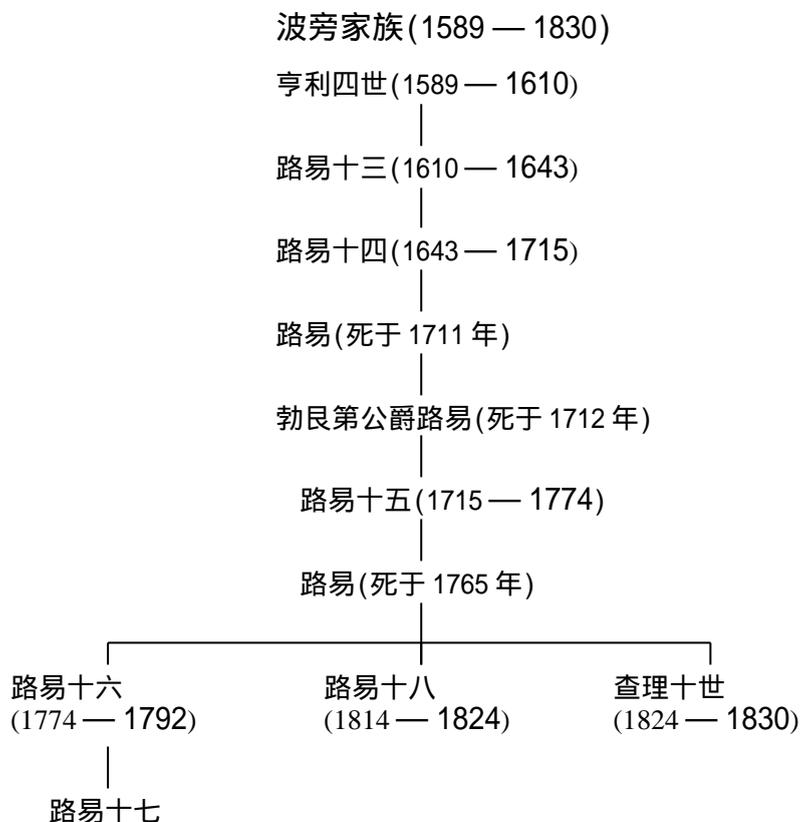
调，人们进行自由竞争为自己寻求财富就能使整个社会富庶起来；政府的职责在于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宁，而不是干预经济事务。亚当·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进一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指出，国家的财富出于生产，而生产主要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一切财富的本源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他又指出，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须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又一部分作为利润由资本家占有了。这里面包含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

亚当·斯密(1723—1790)

亚当·斯密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提倡的“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反映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经济优势，又为工业革命造了舆论。他的学说的科学部分日后又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吸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第二节 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盛衰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处在专制统治盛极一时的时期。



波旁王朝的统治开始于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当时的法国经过三十多年内战——宗教战争的创痛，得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亨利四世在长期的政治风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谨慎灵活，了解国情，力求维持国内外的和平局面，使法国进入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和君主专制统治大大巩固的时期。在他之后，王权一度削弱，封建贵族一再掀起叛乱，企图恢复自己的权力。但是在黎塞留和马扎尼相继担任首相和执政的三十多年里（1624—1661年），他们一面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另一方面无情打击反叛贵族，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1643年即位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年仅五岁，长期处在马扎尼的扶持下。他在青少年时期目击的动乱使他深信，只有国王拥有无可挑战的权力，法国才能免除内战和破坏。

路易十四

1661年马扎尼死去，路易十四亲自掌握了政权，而且是大权独揽。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迄今为止，我曾乐于把政府事务托付给已故的红衣主教。现在是我自己来管理它们的时候了。”他取消了首相的职位。他要求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认为国王是上帝选定的，君权是神授的。“朕即国家”，据认为是他杜撰出来的。他视自己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把对他的反对当

指马扎尼。他和黎塞留都曾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

作“褻瀆神聖”。黎塞留把十六世紀開始實行的由國王派遣監督官到各郡巡視的辦法定為制度。路易十四進一步把各地的財政、司法、警察和軍事的權力納入監督官之手。各城市徹底喪失了自治地位，市政機關已經由選舉機關變成了中央任命的行政機關。在中央機關，由國王任命的大臣分別管理軍事、財政、外交和內務。他們對主管事務雖然起主要作用，但是他們得經常向國王寫報告，而且直接向國王負責。類似國會性質的三級會議從1614年以後不再召開了。一向有權登記王家法令同時又有權以法令違反法律而拒絕登記的巴黎高等法院，在路易十四的威懾下，對路易十四的專制統治也起不了任何制約作用。

路易十四的權威因科爾伯（1619—1683年）長期出任財政總監而增長了。巴蒂斯特·科爾伯出身富商家庭，因忠於封建專制制度的利益而步步提升，1665年出任財政總監。由於財政問題是當時法国的首要問題，他就在政府中取得了首要地位。科爾伯是一個重商主義者，竭力鼓勵對外貿易的出超，積極採取了措施發展工業。他為了保護本國工業生產的發展，實行了關稅保護政策；為了促進國內市場的成長，取消了部分國內關稅，降低了稅率，改善了交通，又提倡開鑿運河，例如鑿通溝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朗格多克運河；為了擴大對外貿易，設立了許多享有特權的壟斷公司：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北方公司。科爾伯支持造船工業，促進了法国的商船隊的壯大，把法國變為世界上大商船國之一。在政府的監護和津貼下，法國創辦了許多手工工場，有的擁有貴重設備，僱用很多工人。科爾伯還努力健全國家財政，調整稅收制度，增加了國家收入。當時，法國在印度佔據了本地治里等地，作為擴大殖民勢力的據點；在非洲佔領了馬達加斯加；在北美，繼續加強在加拿大的殖民，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廣大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這一切都在客觀上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

科爾伯

但是科爾伯的財政經濟措施取得的良好後果沒有能夠維持下去。路易十四的無度揮霍，他的宗教迫害政策，他進行的長期戰爭都給法國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

從親政的時候起，路易十四就開始在巴黎西南郊凡爾賽大興土木，修造了富麗堂皇的宮殿，开辟了巨大的園林，包括許多優美的林蔭道、水池、噴泉和雕塑。為了建設和裝飾這座宮殿，建築家、畫家、雕刻家、園藝家和工藝家雲集凡爾賽。路易十四不惜揮金如土，以凡爾賽宮的壯麗來夸耀君主專制法國的榮華；以窮奢極欲來顯示他的無限權威。無盡無休的飲宴，豪華的舞會，場面壯觀的獵狩，隨心所欲的賞賜，把凡爾賽變成了一座銷金窟，吞噬了人民的大量脂膏。

路易十四和他的大隊扈從入凡爾賽宮（1688年）見圖版（30）

路易十四為了加強他的專制統治，不容法國人民有天主教以外的信仰。他認為天主教信仰能把法國人融為一體，法國的天主教會有助於王權的加強。他夢寐以求的是法國只有“一個國王，一個法律，一個上帝”。因此，他反對對法國的新教徒即胡格諾實行宗教寬容政策。法國胡格諾教徒在軍隊里、在政府部門一向努力奉公，在貴族的叛亂中從不附和，在工商業上又起着重要的作用。1685年，路易十四悍然下令取消胡格諾在一世紀前從宗教戰爭中爭得的信教自由，強迫他們改信天主教。並且以政治迫害來達到這一目

的。不堪政治迫害的胡格诺教徒几十万人，其中许多能工巧匠、富有商人和手工工场主只好逃离法国，迁往英国、荷兰、瑞士或北美，随身带走大量资金和技术秘诀，这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外战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路易十四野心勃勃，力图扩张领土。他的具体目标是：在法国的东北进行扩张，以便取得易于防守的天然疆界；把波旁王室的一个王公置于西班牙的王位，以扩大法国的力量并控制西班牙海外的广大殖民地。从十六世纪起，欧洲国家都力图阻止任何一国独霸欧洲。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国家之间不断地结成同盟。大体说来，在1648年以前，欧洲同盟国家主要是反对占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和西班牙王位的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以后，它们主要是反对法国的波旁王朝。四十多年间（1667—1714年），它们为遏制路易十四的扩张先后进行了四次战争。其中最后一次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法国是一次灾难性的破坏。

法国领土的扩张

（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

在前三次战争中，路易十四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取得了一些领土，其中有的曾经属于法国，但是他要达到的天然疆界的目的是落空了。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没有子嗣承继王位。按照亲属关系，既可以由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继承，也可以由波旁王朝的人继承，由于法国外交活动结果，查理二世的遗嘱要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安茹的腓力普。路易十四兴高采烈，据说他说过：“比利牛斯山脉不复存在了”。但是，英国、荷兰、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境内的普鲁士群起反对。它们结成同盟，对法作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了（1701—1713年）。法国屡遭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破产，民不聊生。1713年战争结束。根据和约，法国的腓力普保有西班牙王位，但以他和他的后代永不继承法国的王位为条件；西班牙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土全部归奥地利；英国在西班牙取得战略要地直布罗陀，又取得法国在北美的一部分殖民地。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十七世纪晚期盛极一时，称霸欧洲，但是很快就走下坡路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削弱了法国，事实上它丧失了在欧洲取得的霸权。被宫廷谄媚者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统治，外表上声势烜赫，而对人民说来却是灾难重重。因此在他统治时期人民起义的浪潮一再汹涌澎湃。路易十四迷信专制，喜欢弄权，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到他末年，统治的豪华外表已经掩盖不了封建专制的内在弱点和腐朽，遮不住衰败现象。1715年，路易十四临死之前，嘱咐他的王位继承人路易十五：“努力同邻邦保持和平。我过去太好战了，不要在这方面学我，也不要学我大花费。”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1715—1774年），法国专制制度更加明显地衰落下去。它所保护的已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维护的是贵族和教士的反动权力和特权。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法国政府不仅不能再象科尔伯当权时期那样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促进，而且日益成为发展的阻碍。它同英国争夺殖民地进行的战争彻底破坏了自己的财政，在殖民地方面又受到巨大损失。路易十五只图眼前行乐，不顾前途如何，曾经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事实上，冲决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巨浪已经不远了。

查理二世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旁系，而他又是路易十四的内弟。

法国启蒙运动 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法国人才辈出，影响巨大，为将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动员。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卢梭和百科全书派，有代表穷苦劳动人民利益的梅叶等。恩格斯讲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指出他们“都是非常革命的”，又概括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事实上，他们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

伏尔泰

弗朗斯瓦·马利·阿鲁埃以化名伏尔泰（1694—1778年）著名，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卓越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了大量的书信、戏剧、史诗、小说、论文和历史著作。他的作品清晰、机智，常带绝妙的讽刺，才华横溢，深受读者欢迎。由于批评法国政府，得罪了权势人物，年青的伏尔泰曾被关入巴士底监狱一年，流放英国三年。伏尔泰提出了“消灭丑行”

（Ecrasez l'infâme）的口号，直言不讳地反对愚昧无知、宗教迷信、伤天害理、宗教迫害以及十八世纪法国的种种弊病。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把它称作“迷信的恶魔和狂信的九头蛇”。他批评教士，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增加教会的权势，而不是人的品德。伏尔泰揭露教会的迷信和欺诈，认为罗马教皇同非洲人所顶礼膜拜的魔师是一样的骗子。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看待宗教，而是站在自然神论者的立场，相信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和立法者，是宇宙的最高的理性和创造本原，是伟大的宇宙创造主，但不是基督教的表演奇迹的天父。他还认为作为道德基础和对人民的约束，对神的信仰是必需的，因此主张：“如果没有上帝，应该臆造出一个上帝来。”伏尔泰要求改造法国社会，要求扫除特权阶层和贵族，削弱教士权力，改革税收制度。他要求人民有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并不赞成民主。他不相信普通老百姓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他写道：“一旦普通老百姓开始辩论起来，一切就都完蛋了。”他认为普通老百姓“愚蠢、野蛮”，需要聪明监护。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一位开明君主领导的君主国，由这样的君主实行必要的改革。在这样的社会里，勤恳的、明智的和可以信赖的中产阶级将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伏尔泰期待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国，而这同他对英国政治的赞赏是一致的。

孟德斯鸠

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沙尔·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年），出身地方贵族，在波尔多当过律师。他象伏尔泰一样地推重英国，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最符合他的政治信念。他反对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在他的富于哲理的小说《波斯人信札》中，他以访问过欧洲的波斯富人往来通信的形式，嘲笑法国宗教的偏执、教士的“独身”、贵族的骄纵、特权的压迫和政府的无能。《论法的精神》（旧译《法意》）是孟德斯鸠最有影响的著作。他以各国的气候、资源和传统的互相差异为前提，指出一种政治

制度不会适用于所有国家。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国、立宪君主国和专制帝国。他在理论上认为共和国最好，但他以英国政治为典范，更拥护立宪君主制。《论法的精神》反映的更为重要的政治观点，是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属彼此独立但互相监督的机关的学说。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同集于同一个人之手，或同集于同一官吏机构之手时，那就没有自由。”“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同样是没有自由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利的“制约与平衡”为核心。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目的的角度来衡量，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孟德斯鸠也同伏尔泰一样，认为人民群众是“极不宜于”实行统治的。

卢梭

在启蒙思想家中对十八世纪社会作更加严厉批判的要数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个钟表匠，年幼丧母。他早年曾在律师家为徒，从雕刻师学艺，终于出走成为流浪者。二十年里，他当过用人、家庭教师、音乐教师和雇佣文人。因为饱尝人生的辛酸，受过残酷的生活锻炼，所以他深刻了解人民的疾苦，理解社会的不平。1750年左右，他因出版了《论艺术和科学》一书而声名突起。相继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等。与卢梭同时许多思想家对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表示赞扬，而他则持怀疑态度。根据卢梭的意见，在原始状态和自然状态中，人们生活简朴，风俗淳朴，彼此平等，不贪求财富，因此也不亏待别人。随着文明的进展，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产生了不平等。

人们要恢复原有的真纯和善良，只有“返归自然”。卢梭知道，回复到原始人的简朴生活是不可能的。要使人生活得愉快美好，就要改造社会和政治。卢梭认为不平等起源于财产私有制，但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只要求进行比较平均的分配，排除极端的贫富悬殊。这就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政治观点上，卢梭也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因此他同样猛烈反对君权神授的谬论，否定封建专制王权；认为统治者如果违反民意，侵犯人权，撕毁大家都应遵守的社会契约，践踏公共意志，人民就有权推翻他。卢梭很重视“公共意志”，认为整个社会是同意公共意志的管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把人身和共同的权力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下”，假如个人坚持把私利驾凌于社会利益之上，他就应该受到强制去遵守公共意志。卢梭同伏尔泰不同，对普通老百姓抱有极大的信任，民主共和国是他理想的政体。他的学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了雅各宾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狄德罗

丹尼·狄德罗（1713—1784年）是启蒙思想家中另一位具有狄德罗深远影响的人物。他因为主编《百科全书》而被看作百科全书派的代表。在为《百科全书》撰稿的一百六十人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当时科技文艺等方面的名家，内容上反映了启蒙思想的特质：反迷信，反狂热，反宗教迫害，反专横，反社会不平。例如，它说狂热是“盲目的和冲动的热情，产生于迷信的信念”，是“付之实践的迷信”。它指摘专横，指出“没有人具有天赋的支配别人的权力”。它抨击奴隶制，说“人和自由

都不是交易对象；他们既不能卖又不能买，又不是任何代价可以偿付的”。《百科全书》反映了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它就是要借最新的科学知识来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的。这正如狄德罗指出的，《百科全书》要“收集散布在地球上的一切知识，为的是让过去岁月的成就有益于未来的岁月，我们的子孙得到更好的教养，就可以同时变得更有品德和更为愉快”。从 1751 年到 1772 年，《百科全书》出版了二十八卷，以后又出版了续编六卷。它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因此主办的人屡遭法国当局迫害，它的发行曾被禁止并且书遭焚毁。

1751 年百科全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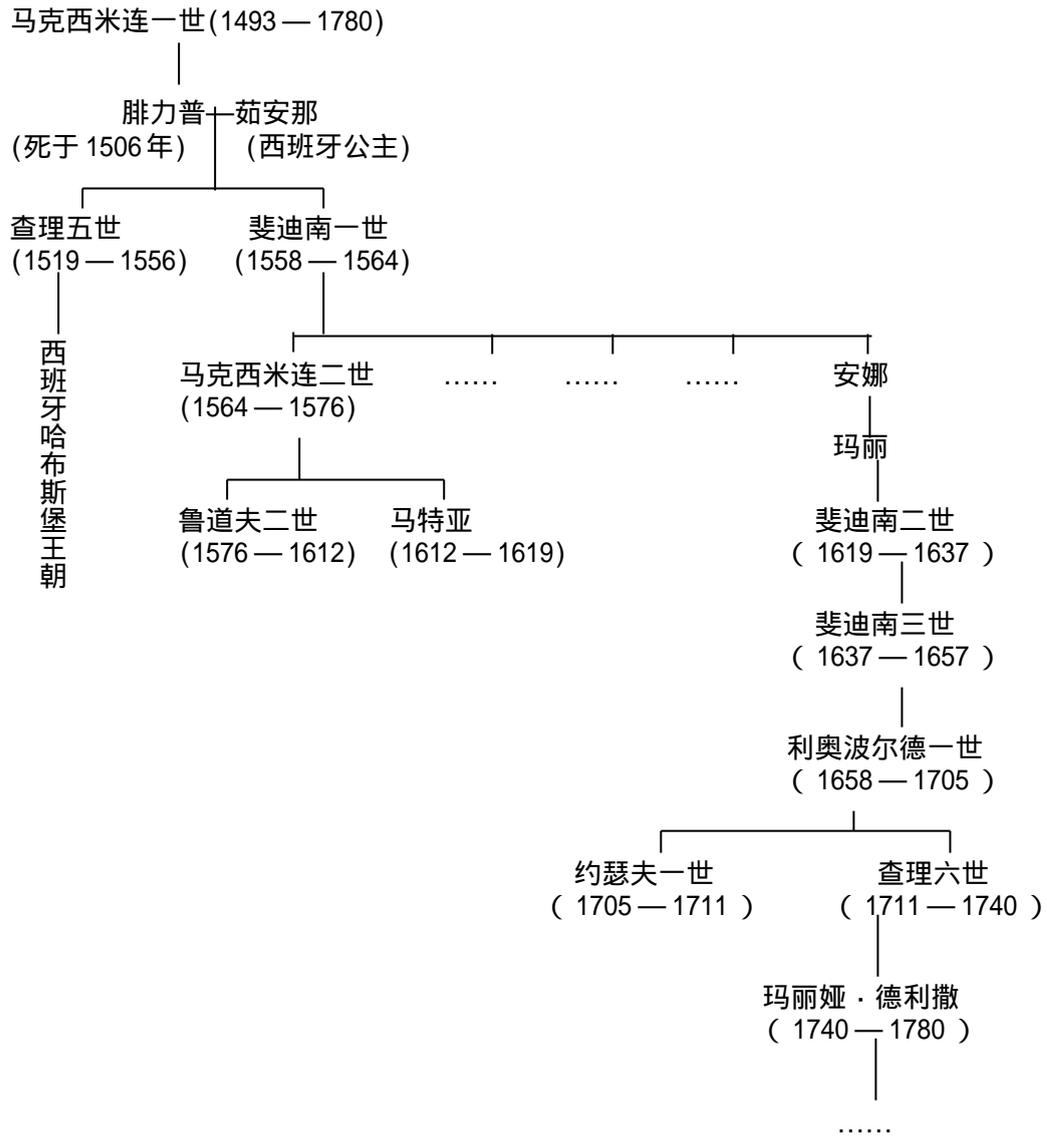
让·梅叶（1664—1729 年）早于上述启蒙思想家。他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占有特殊的地位。梅叶是一个乡村教士，深知受尽封建剥削的农民的疾苦。他想维护农民，但又不可能有所作为，为此感到痛苦。他揭露教士的伪善，指斥教会是支持封建专制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梅叶在他所著的《遗书》里，不仅尖锐批评封建法国的社会关系，而且触及了整个阶级社会的基础，即财产的私有制。他认为以私有制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到处都是暴虐无道和奴隶制度，有的人丰衣足食，有的人却贫苦不堪。”他认为必须建立那样一种社会制度：土地成为公有财产，社会不再有贫富之分；社会成员人人劳动，保证能得到生活必需品。梅叶的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但他仍不失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中一位左翼的杰出的先驱。

第三节 德意志

“神圣罗马帝国”长期以来就是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德意志诸侯国的联合，既不“神圣”，又非“罗马”，更不是具有中央统治权力的“帝国”。它虽然据有中欧的整片领土，但是由于分裂割据，诸侯国之间的联系极弱。十六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天主教会在德意志的势力，同时又使德意志诸侯国在宗教上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派。继宗教改革而起的农民战争，却因其失败而农奴制得以在一些地区加强起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起于宗教纠纷，战争在德意志领土上进行，人民受到巨大的物质损失，德意志加深了分裂的局面。但是，事情在变化，在那三百多个诸侯国中，除哈布斯堡王朝直接统治的奥地利外，在北部，强大的普鲁士开始崛起而与奥地利争雄，并且最终导致了德意志政治局面的改观。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奥地利是最大的诸侯国之一。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利用它是帝国最有势力的诸侯的地位，从十五世纪中期起一直能利用各种手段，使这个家族的人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十六世纪早期，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又以姻亲的关系继承了西班牙王位。这样，哈布斯堡王朝就成了庞然大物，统治了广大的欧洲土地和西班牙的广大殖民地。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体系中，奥地利不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这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奥地利经过不断的兼并，它的领土不仅包括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而且包括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地区，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德意志诸侯中的七个选举侯的推选产生。



“三十年战争”以前，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了欧洲霸权，是欧洲的众矢之的。经过“三十年战争”，霸权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由于诸侯国独立性的加强更加徒具虚名。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依旧是帝国内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

从十六世纪早期以来，在东欧，奥地利同在巴尔干扩张的土耳其争夺领土，为此屡起战争。到 1699 年，奥地利终于取得整个匈牙利，它的君主也成为匈牙利国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虽然失掉了西班牙的王冠，但奥地利却得到了领土补偿，取得了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和西属意大利土地——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萨丁岛。

在奥地利多民族国家中，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十七世纪末年，在捷克出现了使用自由雇佣劳动力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它们最早出现在纺织业和玻璃业中。1755 年，捷克总计有二百五十所手工工场，雇工十八万多人。但是从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经济发展还以奥地利本土占优势。集中

1720 年以撒丁岛换西西里岛。

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开始发展。农民经济日益同市场结合起来。农村家庭手工业同收购商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制品通过收购商一部分输出国外。政府为了财政利益并从军事经济需要出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奖励工业，改善交通，设立国家银行，让大商业资本家设立拥有工商业特权的贸易公司。经济有发展，但同英国、荷兰和法国比较，奥地利还是经济落后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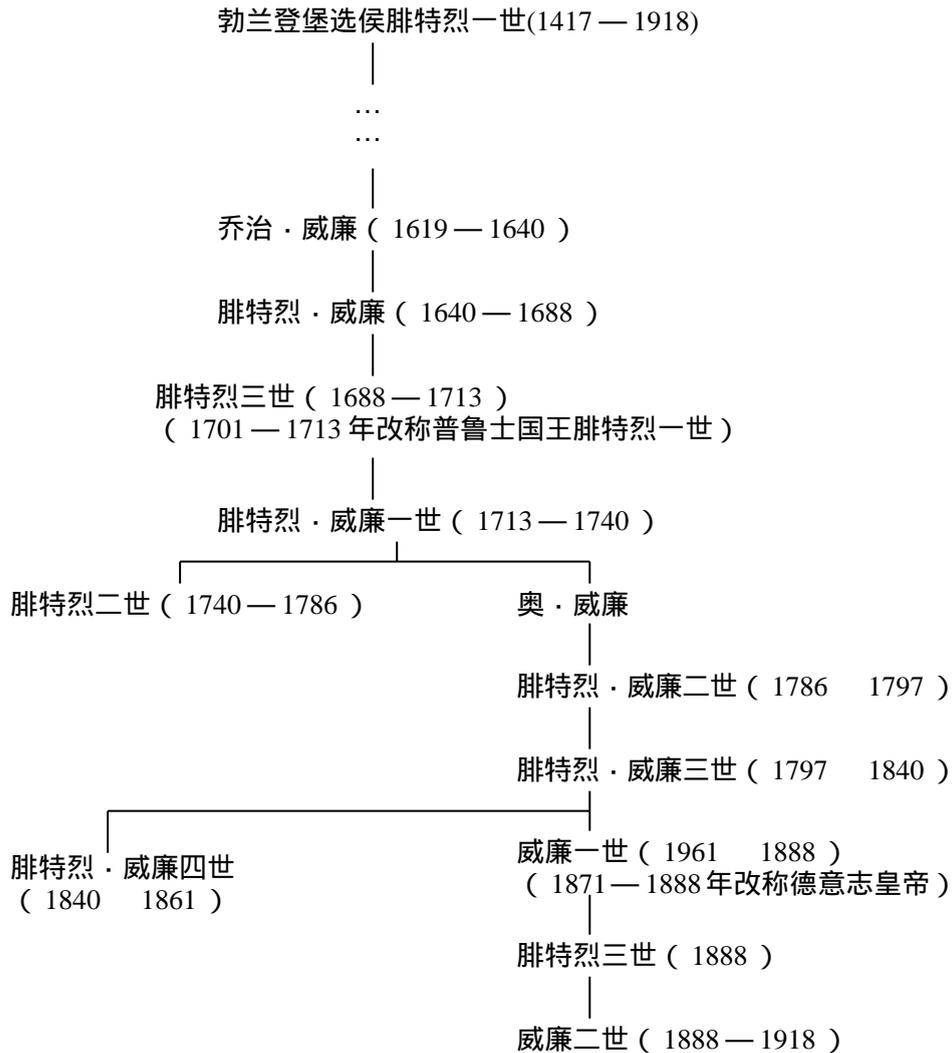
哈布斯堡王朝从十七世纪下半期起，力图加强中央集权，以求巩固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国家。查理六世统治时期（1711—1740年），财政日益空虚，军事力量削弱。查理六世无子，极力设法保证他的长女玛丽娅·德利撒得以安稳地继承王位，为此在1713年颁布了新的王位继承法即所谓的“国事诏书”。诏书规定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在国王逝世时传给长子，无子时传给长女。他花了很大的代价使国内的贵族同意这一规定，同时又取得了一些邻国的保证。1740年，查理六世死去，玛丽娅·德利撒继承王位，遭到挑战，产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首先起来同奥地利挑战的是新兴的普鲁士。

玛丽娅·德利撒

普鲁士的兴起 在德意志北部，有一个以柏林为中心的选侯国叫做勃兰登堡。从十五世纪早期起，霍亨索伦家族就开始统治这个选侯国。德意志宗教改革期间，这个家族的统治者成为新教徒，夺取了境内天主教会的许多土地。三十年战争之初，他们又掌握了波罗的海之滨的普鲁士。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们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从而得到报偿：勃兰登堡选侯国获得神圣罗马皇帝的同意成为普鲁士王国，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成为普鲁士国王。这个家族采用一切办法加强权势，扩大领土。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谁不知道那个姓霍亨索伦的下士家族是靠着在继承方面昧良心、搞阴谋、耍流氓而爬上去的。”

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1713—1740年），普鲁士更其成为军国主义的专制国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以贵族地主特别是东普鲁士的“容克”为支柱。它为贵族地主保证了农奴制的不可侵犯性，又为他们的利益继续积极地扩张领土。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民政上吝惜金钱，在军事上不惜巨款。他把普鲁士的常备军扩大了两倍以上，在他晚年达到近九万人。这支军队组织好，训练严格，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腓特烈·威廉一世注意纪律，为强调严格纪律到处使用体罚。因此，当时的人把普鲁士看作兵营，把普鲁士的军队贬作“庞大的劳役机构”。这个国王又是一个自信心强的专制君主，他宣称唯独他了解什么对人民有利。有一次他甚至说：“救世的事归主，其他的每件事都是我的事。”当他1740年死去由其子腓特烈二世即位的时候，普鲁士兵力强盛，国库充实，敢于向奥地利挑战了。

霍亨索伦家族（1417—1918）



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历史上或称腓特烈大帝，年轻的时候同他的父亲格格不入。他对军事生活不感兴趣，倒象一个自由的文人，把时间用在写诗、吹横笛、读哲学书籍上。这一些连同他对法国文学的爱好都成为他父亲尖刻嘲讽的对象。他不单单是附庸风雅，的确也吸收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某些思想，比如主张信仰宗教自由。当时的欧洲，以“开明专制”为时尚。腓特烈二世即位以后，特别要把自己装扮成“开明君主”、“启蒙运动的朋友”、“人民的公仆”和自由改革的拥护者。他曾接近过法国启蒙运动的卓越人物伏尔泰，有一个时期甚至请伏尔泰在他的波茨坦王宫里作客，以此吹嘘自己尊重和保护作家、学者和哲学家，而后来却对社会思想家采取鄙视和仇视的态度。他进行几件琐碎的不彻底的改革，目的是消除国家行政中最严重的缺点。他标榜推行保护农民阶级的政策，禁止地主把农民赶出份地，而这只是出于保证税收和兵源的目的，并不触及私有土地和农奴制。他推行重商主义的措施，为鼓励国内工业的发展对外来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为适应军需奖励呢绒工业和军工的发展等等。腓特烈二世以“开明专制”来掩饰普鲁士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他同他父亲似有不同，可是实质上他同样是坚决崇拜普鲁士“模范”军事制度的容克地主的代表，

腓特烈二世检阅普鲁士军队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军国主义者。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间，普鲁士以绝大部分的国家收入扩充常备军，在他统治末年达到二十万人。

普鲁士领土的扩张（1740—17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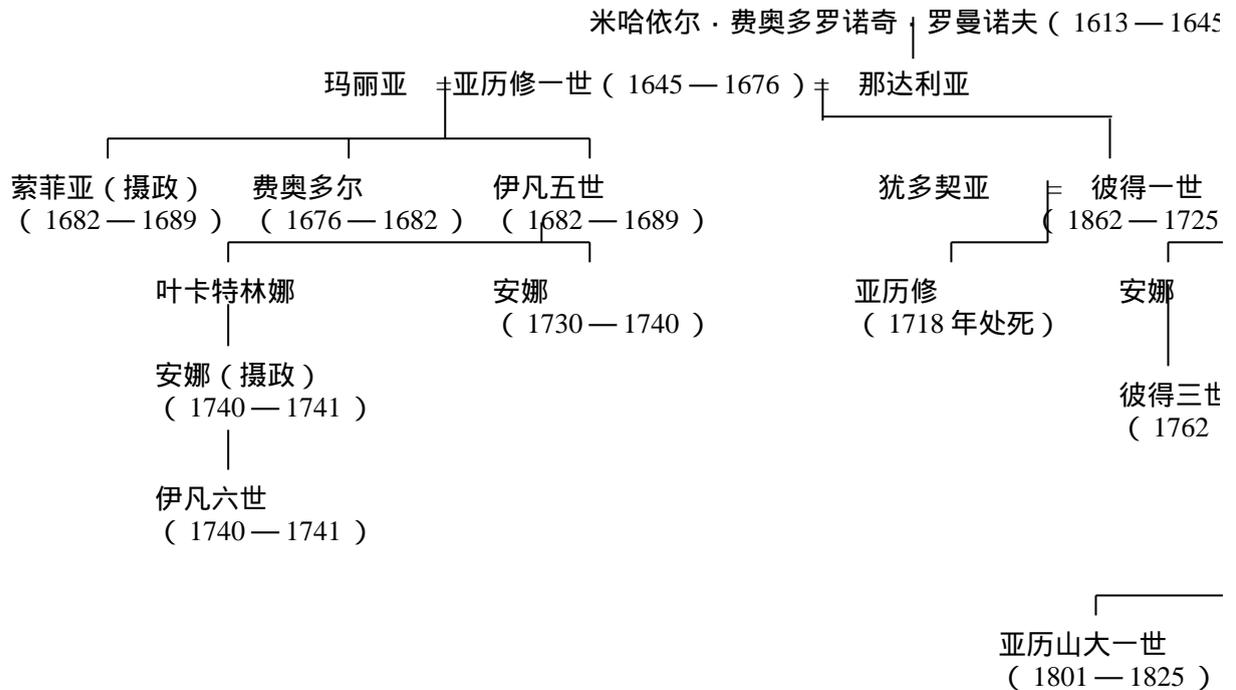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好战，即位的时候正碰上奥地利王位变更。德意志的一些大诸侯不顾他们对“国事诏书”的承诺，都想乘机瓜分哈布斯堡王朝的广大领土。腓特烈一马当先进攻奥国，挑起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由于利害关系，特别由于英法的利害冲突，这场战争很快变为全欧战争。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法国、西班牙和南德意志的巴伐利亚等，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荷兰和俄国等。对英法说，战争还在北美和印度进行，为的是在那里扩大各自的殖民势力并排挤对方。普鲁士通过这次战争，夺取了同它毗邻的奥地利领土——富饶的西里西亚，又通过另一次重大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年）牢固地掌握了这一地区。腓特烈二世一贯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的扩张领土。1772年，他勾结俄国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邻国波兰的领土。普鲁士取得了波兰沿波罗的海的部分领土，把普鲁士和东普鲁士联成一片。当腓特烈死去时，普鲁士已经成为一个牢固形成的、得到很大扩张的和第一流的欧洲国家；在争夺控制德意志各国的霸权上，更加成为奥地利的可怕对手。

1793年俄、普第二次瓜分波兰，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使独立的波兰失去存在。

第四节 俄罗斯

十七世纪俄国的农奴制度 十七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领主、贵族和高级教士手中，其余部分则分别属于国家和沙皇宫廷。据 1678 年的统计，生活在世俗和教会地主土地上的农户，约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他们被称作“私有农民”。农民耕种地主分给的一小块份地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为此，他们必须为地主耕种大片土地和从事其他劳作，或者向地主缴付代役租（实物或现金）。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不得随意离开。根据 1479 年伊凡三世发布的法典规定，农民有权在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犹里耶夫节前后一周的时间内离开主人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后来的几代沙皇，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多次制定法令来进一步限制农民的迁徙权。犹里耶夫节离开地主的权利被取消了。地主有权在一定的限期内把逃跑的农民追寻回来。这个限期开始规定为五年，后来又逐渐延长到十五年，但是地主仍不满足。1649 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1645—1676 年）颁布的《法典》，取消了地主追寻农民的限期，规定

罗曼诺夫家族(1613—1917)



农民不论逃亡多久，只要被找到，就必须连同其家庭和全部财产归还原主。这样就完全剥夺了农民离开地主的权利，使地主成为农民整个生命财产的占

有者。1649年的《法典》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的农奴制度，标志着俄国农奴制度的最终形成。

十七世纪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因素是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全国市场的逐渐形成。到十七世纪末，全国共有手工工场二十家左右，包括冶金、军工、皮革、玻璃制造和纺织等部门。手工工场中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全国各地建立了比较普遍的商业联系。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十七世纪中叶，在俄国本土共有城市二百多个，其中最大的是莫斯科，人口达到二十万。但是，由于在国家主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

与农奴制经济发展相适应，十七世纪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也不断加强。1598年，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去世。随后便是十多年的政治混乱时期。1613年，沙皇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即位，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从这个时候起，沙皇个人权力不断扩大，并且被认为是上帝授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名义上仍然是领主杜马，由领主的上层分子代表组成。但是，沙皇的决定不经领主杜马的讨论和认可照样可以付诸实施。另一个统治机构是缙绅会议，代表性比领主杜马广泛，由领主、贵族、教士和工商业者的代表组成。十七世纪上半期，缙绅会议还时常召开，以后就逐渐名存实亡。十七世纪是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度逐渐向专制君主制度过渡的时期。这个过渡直到下一个世纪才最后完成。在十七世纪，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也继续加强。全国设立了几十个政厅，分掌各个部门和某些地区的事务，例如领地政厅（掌管土地）、使节政厅（掌管外交）、财务政厅（掌管财政）、西伯利亚政厅和小俄罗斯政厅等。地方事务则由沙皇任命的府督全权负责管理。

农奴制经济的发展和专制制度的加强，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654年，沙皇政府发行铜币，规定其价值和银币相等。这就引起了物价暴涨，其中粮价上涨了九倍。受害最大的是城市贫民。1662年莫斯科市民举行了起义。农民因不堪忍受日益加重的剥削和赋税重担，也纷纷起来反抗。1667—167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的领导人是顿河流域贫苦的哥萨克斯捷潘·拉辛。起义席卷了整个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起义军曾经夺取了不少城市。1670年，起义队伍在辛比尔斯克和政府军进行了决战，结果失败，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彼得一世改革 十八世纪初期的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此同时，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也继续发展。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阶级要求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特别是要求加强对外扩张，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对外战争连绵不断。在战争中，他首先感到进行军事改革的迫切性。他改募兵制为征兵制，规定每二十五户出一名终身服役的步兵，同时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建立了一支由步、骑、炮、工四个兵种组成的二十万人的陆军。他还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有四十多艘战船的海军舰队。

为了掌握造船技术，他派遣不少学生去国外学习。在他统治的早期，他本人甚至化装打扮，参加到使节团里，亲自到荷兰、英国的造船厂去当学徒，还在英国进行广泛考察。他又开办各类军事学校，如海军学院、炮兵学校等，培养军事技术和指挥人才。

彼得一世深知要提高国力，增强军备，必须大力发展工业。他兴建了不少官办手工工场，也鼓励工商业者开设手工工场。他特别重视冶金工业，在乌拉尔地区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冶金工业基地。为了解决手工工场的劳力问题，彼得于 1721 年颁布法令，允许商人在购买土地的同时，把该地的农民一起买走。这些农民既耕种土地，又从事工业生产。彼得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凡本国能生产的物品，都限制或禁止进口。但是彼得并不闭关自守。他允许外国人来开办手工工场，并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协助工作。到 1725 年时，全国手工工场已有二百四十多个，包括冶金、呢绒、皮革、造船、丝织等不少部门。生铁产量从 1700 年的十五万普特 增至 1725 年的八十一万五千普特，自给有余，还可供输出。

彼得一世在政治方面也进行了不少重大的改革。1711 年设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参议院，以取代领主杜马。参议院负责拟订法令和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其成员大多是非名门的新贵族代表，由彼得亲自指定。1718 年，设立九个（后增至十二个）院，分掌军事、外交、财政、司法、贸易、工业等各方面的事务，代替了原来职能混乱的政厅。1708 年和 1719 年，全国先后被划分为八个州和五十个省，受沙皇和中央直接管辖。1721 年，废除大教长的职衔，设立宗教院负责教会事务，从而置教会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些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农奴制国家机器。彼得一世于 1722 年颁布了“官职等级表”，把全国文武官职分为十四等，规定所有的贵族子弟都要从低级官吏当起，然后按功晋升；非贵族出身的也可以做官，升到八等以后就被列入贵族。这方面改革的一个后果是削弱了领主和名门贵族的特权，使封建主内部的界线逐步消失，从而扩大和加强了沙皇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在文化教育方面，彼得一世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斯拉夫字母；创办俄国第一份报纸；翻译出版国外的科技书籍；并于 1724 年建立了俄国科学院。彼得还通过各种方式改革习俗，提倡西欧的服饰礼仪和生活方式。

彼得一世的改革受到了旧贵族和教会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彼得儿子阿历克谢和反对派一起，阴谋煽动士兵叛乱，破坏改革。彼得严厉地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并把阿历克谢送交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彼得为一个不高兴的绅士剪掉长须(漫画)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农奴制性质的改革。这些改革扩大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和沙皇本人的权力，扶植了中小贵族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使俄国的农奴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客观上也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俄国在欧洲的扩张 十七世纪末以前，俄国的对外扩张具有地域性蚕食的特点，主要目的是扩大领土。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这种扩张转变为世界性的侵略，目标是争夺世界霸权，重点是欧洲。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要在欧洲扩张，进而称霸世界，首先要解决出海口的问題。彼得一世在制订他的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合 16.38 公斤。

侵略扩张计划时，曾经一再声称：“水域是俄国所需要的”。他甚至把这句话写在自己传记的扉页上。为了夺取波罗的海东部滨海地区，打开由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1700—1721年，彼得一世与瑞典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战争开始时俄国在纳尔瓦城堡败北。但是彼得并不气馁，积极准备卷土重来。1709年在波尔塔瓦一战，俄军大胜。1714年和1720年，俄国新建的海军两次打败瑞典舰队，并在瑞典海岸登陆，直接威胁其首都斯德哥尔摩。战争以俄国胜利告终。根据1721年双方签订的尼什塔德和约，俄国吞并了芬兰湾沿岸和卡累里亚的一部分，以及英格里亚、里夫兰和爱斯兰地区（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大部分），取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为了表彰彼得一世在这次战争中的“功绩”，1722年参议院授予他“皇帝”称号。从此沙皇俄国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在北方战争期间，彼得一世于1703年在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上开始营建圣彼得堡，并于1712—1718年把国家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这里。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了彼得一世企图征服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

魔鬼向叶卡特林娜二世献礼

（十八世纪晚期英国讽刺画。魔鬼手托两个城市，一为君士坦丁堡，一为华沙）

彼得一世以后，历代沙皇都继承他的对外扩张衣钵。1762年，经过三十七年国内政治动乱以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1762—1796年）即位。她是彼得一世侵略扩张计划的忠实执行者。她在位期间，在欧洲进行了六次侵略战争，其中三次对波兰，两次对土耳其，一次对瑞典。这些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吞并波兰和争夺黑海出海口。

俄国在欧洲的领土扩张（1689—1796年）

波兰位于波罗的海以南，是欧洲东部一个大国。沙俄为了巩固自己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必须牢牢控制这块地方。早在十七世纪下半期，沙俄就已经兼并了波兰统治下的东部乌克兰。十八世纪中期的波兰已日趋衰落。大贵族争权夺利，俄国在欧洲的领土扩张（1689—1796年）投靠外国，中央政权不断削弱。一部分贵族要求革新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引起了大贵族的反对。沙俄见有机可乘，便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进行干涉。1767年，沙俄八万军队侵入波兰，镇压了波兰革新运动。1772年，俄、普、奥三国签订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协定。俄国占领了波兰西北部的领土，包括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以及一部分拉脱维亚地区，面积达九万二千平方公里。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以后，国内进步的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仍继续斗争。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他们的鼓舞很大。他们的斗争终于迫使国会在1791年通过了新的宪法（史称“五·三宪法”）。叶卡特林娜二世担心新宪法将使波兰摆脱沙俄控制而重新复兴，便策动波兰大贵族起来叛乱，并在“防止雅各宾瘟疫”的口号下，于1792年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沙俄军队在普鲁士军队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国，恢复了旧秩序。1793年，俄、普两国第二次瓜分波兰。俄国夺得了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一部分，以及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

俄、奥、普瓜分波兰大部分地区，共二十五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1794年，

在波兰发生了科希秋什科领导的人民起义。沙俄急忙派兵镇压。1795年，俄、普、奥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一部分，面积共达十二万平方公里。至此，整个波兰被瓜分完毕。在三次瓜分中，俄国共夺得百分之六十二的波兰领土，从而把自己的边界从第聂伯河推进到涅曼河和布格河一线。

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了打开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于1768—1774年和1787—1791年先后与土耳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的结果，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统治下的第聂伯河与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以及克里木半岛上的刻赤，获得了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通航的权利，还迫使土耳其同意克里木汗国独立（1783年该汗国被沙俄兼并）。第二次战争以后，俄国又从土耳其夺得了南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黑海北岸的地位。于是，沙俄在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后，又夺得了黑海出海口。这就为它进一步向欧洲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早在十六世纪下半期，沙俄的魔爪就伸向了西伯利亚。首先遭到沙俄吞并的是位于乌拉尔以东、鄂毕河中游的失比儿汗国。到了十七世纪，沙俄继续东侵，加紧向西伯利亚全境扩张。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内，沙俄殖民者从鄂毕河扩张到叶尼塞河，又从叶尼塞河扩张到勒拿河。1649年，他们在鄂霍次克海边建立了鄂霍次克城。至此，他们的扩张从乌拉尔山直到太平洋岸边。这种陆地蚕食，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世界殖民史上是罕见的。十七世纪末，沙俄又侵入了堪察加半岛，并且占领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沙俄并不以吞并西伯利亚为满足。它对和西伯利亚紧密相连的富饶的中国领土，更是垂涎欲滴。十七世纪中期，沙俄多次派遣远征队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651年，沙俄殖民者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中游的交通枢纽雅克萨，并在该地筑堡屯兵，作为进一步入侵我国的据点。沙俄的侵略扩张遭到了我国当地各族人民和清朝政府的坚决抵抗。在入侵我国黑龙江的同时，沙俄还向我国漠北地区扩张。1644年，沙俄殖民者抵达贝加尔湖东南的色楞格河；次年又抵达乌格拉河。1648年和1652年，他们先后在贝加尔湖的东岸和西南岸建立了巴尔古津和伊尔库次克两个城堡，作为继续东侵的基地。1688年，沙俄终于强占了贝加尔湖以东的我国大片领土。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文规定格尔毕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东段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

在缔约谈判中，中国政府作了让步，同意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换取沙俄撤离黑龙江流域的雅克萨城堡。但是，彼得一世及其继承者根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始终没有放弃进一步侵略我国领土的企图。

沙俄吞并西伯利亚以后，立即在那里建立起殖民统治。沙皇政府将大批俄国人移居到西伯利亚，并且把农奴制度扩大到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至1701年，在西伯利亚的俄国居民已有八至十万人，大大超过了土著人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沙俄当局时常挑起西伯利亚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同时

关于中俄在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国界，由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和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划定。

还利用东正教作为对土著民族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遇到当地居民起来反抗时，还不惜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西伯利亚各地的督军均由沙皇亲自指派。

从1637年起，在中央设置了专门负责西伯利亚事务的机构。西伯利亚人民受到了残酷的剥削。西伯利亚的资源遭到了惊人的掠夺。它的名贵的皮毛和丰富的矿产，成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

十八世纪的农民起义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他长期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进行的。农民除了给地主服劳役和交租外，还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1718年，彼得一世下令把各种赋税合并为一种高额的“人丁税”，全国所有男性居民都必须缴纳。到了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贵族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更为加重。农民每周要用三天时间为地主服劳役，多的达到五天，代役金增加了一倍以上。地主有权随意处置农民，包括鞭打、流放、出卖，甚至处死。1765年，叶卡特林娜二世明令规定，地主有权放逐“抗命”的农民去做苦役；1767年又下令禁止农民对地主提出任何控告。手工工场在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增加了两倍多。在工场中广泛使用的仍是农奴劳动。工场中有一小部分自由工人，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比农奴好多少，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

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劳动人民的反抗。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就接连不断地爆发农民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705—1706年的阿斯特拉罕农民起义，1707—1708年布拉文领导的顿河哥萨克农民起义和1705年巴什基里亚民族起义等。

1773—1775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十八世纪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叶麦利扬·普加乔夫是顿河流域的一个哥萨克，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后因病退伍还乡。他与顿河、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1773年9月，他结集了一支哥萨克队伍，在乌拉尔河上发动起义。起义队伍溯河而上，连克塔季谢夫和其他城堡，但是强攻省城奥伦堡未获成功。他们便切断奥伦堡与外界的联系，把城市团团围住。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顿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和乌拉尔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达到了五万人之多。农民运动的洪流使得贵族地主和叶卡特林娜二世本人闻风丧胆。普加乔夫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他发布文告，宣布要消灭贵族，解放农奴，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征兵制度，给人民以土地。普加乔夫建立了一个“军务院”，它既是起义军的司令部，又是地方政权机关。他还把起义军编成好几个团，有的团下面还有连，各团的统领均由他的亲信担任。

叶卡特林娜抽调重兵镇压起义。1744年3月，普加乔夫主力所在地塔季谢夫失守，起义军遭受重创。普加乔夫不得不率部退至乌拉尔矿区，以便重整旗鼓。但是政府军继续追击，迫使起义军又撤离矿区，向西部伏尔加河流域转移。6月，在喀山城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起义军刚攻下该城，但又被政府军的增援部队击败，于是不得不改道南下。7、8月间，起义军又先后占领了伏尔加河西岸的一些重镇。普加乔夫计划继续沿伏尔加河南下，回到哥萨克的基地。可是政府军追击不放，在察里津附近一战，起义队伍又遭失败。普加乔夫被手下几个富裕的哥萨克出卖，送交政府。1775年1月，普加乔夫在莫斯科被沙皇政府处死。以后几个月内，起义队伍的斗争仍时断时续，但终于被镇压了下去。

普加乔夫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缺乏明确的政治纲

领，还在于起义军力量分散和没有搞好各民族的团结。这次起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虽然失败，但是有力地鼓舞了劳动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意志。

第五节 西欧各国争夺殖民霸权

西欧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因缘时会的暴发户，兴起猛却又衰败快。亚洲的香料、珠宝，非洲的象牙、金属，美洲的金银、皮货，各地的其他土特产，源源涌来。但是巨额的财富并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大量转变为资本，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西班牙的贵族们认为从事企业活动是有损尊严的。他们大量购买国外商品，金银不断流往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力量增长，开始向西葡垄断殖民地的局面挑战，同时强占新殖民地。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国势如日中天。但是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没，标志着西班牙制海权的衰落。十七世纪起，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仍保有大量殖民地，但是它们已经缺乏力量同新兴的西欧殖民国家荷兰、英国和法国抗衡了。

荷兰的殖民活动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在发展上超过许多欧洲国家，成为“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掌握世界商业霸权。它的商船队拥有一万五千艘船只，在国际贸易往来中起了主要作用，几乎把欧洲南方各国和北方各国之间的贸易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粮食，由它们运往地中海；德意志的酒类、法国的手工业品、西班牙的水果和殖民地产品，由它们运往北欧。但是荷兰资产阶级不以高额的商业利润为满足，还力图从海外活动中占领土地。荷兰参加了强占殖民地的国家行列。

早在取得国家独立之前，荷兰人就已从事海上活动了，从对伊比里安半岛的贸易中取得利益。在他们争取独立期间，特别是1580年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以后，西班牙国王关闭里斯本港口，禁止荷兰商船来往。荷兰人决定同印度和葡萄牙控制的东印度群岛直接交往，从十六世纪末年起，开始探索通往东方的另一条新航路。他们把葡萄牙的船只和财货当作最好的猎获对象，首先拦劫从葡萄牙运货到北欧去的船只，而后捕捉从亚洲运送财货到葡萄牙的船只，而这仅仅是从葡萄牙手里夺取殖民地的先声。1602年，荷兰合并几个贸易公司，组成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政府给予公司以荷兰本土同非洲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垄断权。荷属东印度公司使用粗暴的行动、欺骗、贿赂和不讲信用等方法强占殖民地，1619年在爪哇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然后由爪哇向西侵占苏门答腊岛，向东从葡萄牙手里夺取香料群岛。它还相继侵占了马六甲和锡兰；在亚洲东部一度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不久就被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了；他们还在日本九州岛的长崎取得了商业据点。1652年，荷兰在南非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为它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取得了强大的中继站。

巴达维亚荷兰商人指着他的船队见图版(31)

荷兰人不仅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抗争，而且在西半球扩张。1609年，英国人亨利·哈得孙受雇于荷兰为它探索新的航路，到达北美的一条河流即以

1640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又得独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今雅加达。

今马鲁古群岛。

今斯里兰卡。

他的姓命名的哈得孙河，沿河而上，直到阿尔巴尼。荷兰人以哈得孙河流域为基础，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并在河口夺取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在南美洲，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安得列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荷兰的西印度公司，成立于十七世纪早期，除了经营美洲的殖民事业外，还对西班牙国王及其臣民的船只和财产采取敌对行动，即遇有机会就实行抢劫。1628年，有个名叫彼得·海因的荷兰人在加勒比海上拦劫西班牙的运银船，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那艘西班牙运银船从墨西哥驶出，开赴西班牙。船上载有十七万七千磅白银和大量珠宝、皮货以及其他稀有珍品。海因轻易地截获了这艘船，在荷兰引起狂欢，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荷兰名人。但是，荷兰在美洲作为一股重要的殖民势力为时短暂。而荷属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长达三个世纪，先垄断胡椒、香料，后来又把棉花、丝绸、茶叶和咖啡作为贸易的大宗，为荷兰殖民者赢得无数的财富。

法国的殖民活动 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中南美洲的时候，法国人也在海上探索。在北美探索活动中，雅克·卡提耶是最早的探索者之一。1535—1536年，他航行到北美的圣劳伦斯河，溯河而上，到达现在的蒙特利尔。但是当时的法国内受宗教的和政治斗争的困扰，没有对外开拓殖民的力量，直到十七世纪，情况才有变化。1608年，萨姆尔·德·张伯伦在魁北克建立了法国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居留地。魁北克堡建在悬崖之上，俯视圣劳伦斯河，形势险要，成为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块殖民地“新法兰西”的政治中心。沿着圣劳伦斯河，法国人又建立了另一个殖民据点蒙特利尔。这一地带的法国殖民者同当地印第安居民进行皮毛交易，牟得了暴利。他们当中一些人为了皮货深入林区，被称为“跑森林的人”。跟踪而至的是军人和传教士。他们探索了大湖区，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密西西比河直泻墨西哥湾。1682年，罗伯特·德·拉萨尔沿密西西比河探索，顺流而下，到达河口。他声言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广大土地归法国所有，称这一广大地区为路易斯安那。从魁北克经蒙特利尔，越五大湖直到密西西比河口，法国殖民者设立了一些商业据点和堡垒，但是在这一广大地区，法国殖民者寥寥无几，1660年，在加拿大的法国人多不过二千五百人。相比之下，法国殖民者更多的是在加勒比海地区拓殖，占有海地、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等岛，在那些地方建立大种植园，役使黑人奴隶劳动。

法国人也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在西非，他们先在加塞内加尔河口建立殖民据点；在东非侵占了马达加斯加岛。1664年，法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印度为它侵略的主要目标。公司首先在印度南部建立了殖民据点本地治理（1674年），几年之后又把殖民势力向北推进到孟加拉，设立了另一个重要殖民据点昌德纳戈尔。十八世纪，法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略取领土。杜普雷出任法属印度领地总督期间（1742—1754年），雇用印度人组成军队，使他们成为对印度进行殖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杜普雷极力扩张，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积极对抗。

英国的殖民活动 十六世纪晚期，英国同西班牙的斗争挫损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垄断局面。英国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为后起的却又是强有力的殖民国家。海盗式的抢劫、贩运黑人的血腥交易同一般的商业结合起来，构成十六世纪英国海上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十七世纪起，抢占殖民地又成为英国海上活动的最大目标。

十六世纪晚期，从事经营特定地区商业的特许公司，纷纷在英国组织起

来。在特许公司中，1600年建立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发展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为英国侵占印度的开创者和组织者。1601年，詹姆斯·兰开斯特率领公司的五只船到达东印度群岛，满载香料而归，为公司赚了巨额的利润。当时，荷兰的殖民势力也在向东印度群岛扩张。几次较量，荷兰人把英国人在香料群岛的贸易据点拔除了，这标志着荷兰开始代替西班牙成为英国的海上劲敌。

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启航见图版(32)

英属东印度公司把注意力从东印度群岛转向印度，打破了葡萄牙的阻力，首先在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取得了贸易据点，站稳了脚跟。此后，英国殖民者先后取得了马德拉斯（1620年）、加尔各答（1633年）和孟买（1680年）。十八世纪初，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已经分崩离析，东印度公司主要同印度各地的封建王公打交道。哪里的王公势力衰弱而对英国殖民者顺从，马上得到帮助；哪里须得使用武力，公司毫不迟疑；如果采用贿赂手段最好，丰厚的“赠予”即时送到。英国在印度又蚕食，又鲸吞，使印度成为它的财富重要来源地。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在印度同英国角逐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了。

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受到印第安人的友好接待

对亚洲进行殖民活动的同时，英国又在北美探索航路和建立殖民地。1610年，航行到哈得孙河的亨利·哈得孙为英国寻找一条从西北向通往印度的航路，结果到了加拿大北部的哈得孙湾。在这之前即1607年，一批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居留地詹姆斯顿，以此为中心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一群清教徒不愿受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压迫，移居北美，建立另一个殖民地马萨诸塞。此后百年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不断扩张，相继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英国也攫取了许多殖民地如巴哈马群岛和巴巴多斯等。英国殖民者在十三个殖民地的南部和西印度群岛建立了许多种植园，生产烟草、蔗糖等产品。他们把这些产品运到欧洲，牟取厚利。种植园大量役使黑人奴隶，而黑人奴隶的贩卖又是英国殖民者攫取暴利的手段之一。

英荷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 殖民扩张对殖民地人民是赤裸裸的压迫和剥削，而在殖民国家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它们都要求独占海权，独占原料，独占市场，因此由竞争、抢夺发展到武装冲突。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荷、英法之间的殖民冲突此伏彼起，其结果是英国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成了“日不落”的大殖民帝国。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还拥有广大殖民地，但是力量已经衰退，不复有斗争的活力了。

荷兰从事殖民活动几乎与英国同时，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几乎同时显露出来了。十七世纪早期，两国在东印度群岛的争夺，荷兰的殖民势力占了上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尽管荷兰资产阶级对英国议会保持友好中立，却同时乘机加强排挤英国的海外商业地位。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这就是说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荷兰一向因为商船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完善，成为一个贸易中介国家，成为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中心，海上运输给它带来利润，造成繁荣。英国的新航海条例旨在对付荷兰，打击它在英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荷兰

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拒绝废除航海条例，这就导致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在十七世纪后半期，英荷之间为争夺商业霸权和殖民地一共进行了三次战争。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是一系列大规模海战，是两个海权国家海上力量的较量。每次海战，双方出动数达一二百艘的舰只，往往有二三万水兵参战。虽然荷兰水兵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但是在1653年夏他们在海战中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商船又往往成为英国的掳获物。到1654年双方议和的时候，荷兰不得不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它的殖民地没有损失，它的海上威力却显得不及英国了。

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大海战（1666年6月11—14日）见图版（33）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比1651年的航海条例更加苛刻，荷兰人越发不能接受。由于双方在北美和亚洲的冲突迭起，造成了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荷兰海军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后经过改进，加强了力量，在这次战争中挫败了英国人，一度冲进泰晤士河，威胁伦敦。但是在北美，英国攻占了包括新阿姆斯特丹在内的荷属殖民地，即后来成为纽约的地方。这次战争结束的时候，按照缔结的条约，英国保留了新阿姆斯特丹，荷兰在北美取得了苏里南，从此荷兰的殖民势力退出了北美。英王查理二世屈从法国，七十年代参与了法国企图瓜分荷兰的战争。1772年，第三次英荷战争开始。由于英国资产阶级不满英王屈从法国，更主要的由于国际力量的变化，第三次英荷战争没有引起交战双方地位上的大变化，于1774年结束了。在以后三、四十年，荷兰为反对法国的侵犯一再对法作战，经济遭受破坏。1688年，威廉三世入主英国以后，荷兰成了英国的盟国。到十八世纪中期，荷兰失去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英法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要在欧洲称霸，具体说一要在法国东北部扩张领土，寻求所谓的“天然疆界”；一要把波旁王朝的人置于西班牙的王位上。它遭到欧洲诸国的反对，先后发生了四次战争。其中第三次战争即“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和第四次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都是法国的敌国。在奥格斯堡同盟之战中，英国海军深入地中海，取得了对法国海军的永久优势。通过后一战争，英国取得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巩固它在地中海海上的霸权；在北美，法国人占领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地区都为英国所得。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确已取得了世界商业地位，创造了建成殖民帝国的必要条件。法国历经战争，国力空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两国在争夺殖民霸权上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

1750年北美殖民地

1740年，在欧洲发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接着发生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采取的战略是，在欧洲大陆收买一个盟国，如前一次战争中的奥地利和后一次战争中的普鲁士，以对抗主要敌国法国；借着主要盟国和自己派往大陆的少量远征军牵制法国的兵力，以海军为掩护，集中全力进攻法属殖民地。当时，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印度，都有英法的殖民地。两国争夺的主要战场在北美和印度。“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在欧洲，中间有八年间歇时间；而在北美和印度，英法之间的殖民战争却是不断进行，二十多年里几乎没有间断。

英国对印度和缅甸的侵略（至 1858 年）

十八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衰落，造成了权力中空的状态。土邦王公不断内讧，给英法殖民者提供了干涉和侵略的机会。法国殖民者向一些土邦王公提供武力，借以控制他们，以达到侵略目的。英国殖民者也照样办理。英法殖民者都要填补印度的权力中空，他们之间的争夺日益加剧，1744 年在印度开始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当时，掌握法国在印度殖民事务的约瑟夫·弗朗索瓦·杜普雷狡黠精干。他的对手、英国的罗伯特·克莱武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低级职员队伍中爬上来，在对法斗争中显示了大胆的才干；在殖民扩张中又表现了他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双方的冲突，最初在印度的南部展开，法国一度占领马德拉斯。但是五十年代初，克莱武等指挥的英国殖民武装，一再在卡纳蒂克取胜，实际上成了那个地区的统治者。1760 年，他们还攻下了本地治里。

1763 年的北美和加勒比海——“七年战争”后的形势

“七年战争”期间，英法对印度的争夺进入决定阶段，争夺的重点在北部的孟加拉。英国的殖民据点加尔各答在孟加拉境内，孟加拉王公是同法国殖民者结盟的。1756 年，孟加拉王公为了追捕被英国包庇的敌人，引兵进入加尔各答。克莱武率英军自马德拉斯北上，1757 年普拉西一战击败了孟加拉军队，从此孟加拉完全陷入英国的控制。1763 年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使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大部分土地的统治者。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遭到打击，只能保有本地治里等几个据点，不再有同英国争夺的力量了。从此，英国有了进一步剥削和囊括印度的可能。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搜括。从 1757 年到 1766 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仅从孟加拉就掠夺了六百万英镑。克莱武白手起家，回英国时已拥有二十五万英镑的财产，此外在印度的财产每年还可带给他二万七千英镑的收入。

1759 年 9 月英军攻占魁北克见图版(34)

在北美，英法之间的殖民争夺同样是法国先胜后败。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沿大西洋连成一长列，同西部之间有阿巴拉契亚山脉为屏障。法国在北美有两块主要的殖民地，一块是沿圣劳伦斯河的新法兰西，一块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路易斯安那。法国企图上溯俄亥俄河，下航五大湖区水道，钳取密西西比河以东、大湖以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阻止英国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扩张。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东西通道的杜肯堡，是争夺这一广大地区的战略要地。1755 年，英国进攻杜肯堡，遭到失败，但终于在四年以后夺取了它。从 1758 年到 1760 年，另一个勇敢善战的英国人乌尔夫，在加拿大境内的一系列战役中取胜，攻占了魁北克。“七年战争”结束时，新法兰西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都转入英国手里。在北美也象在印度一样，英国取得了殖民统治地位，不同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不久就爆发了，而印度却进一步陷于英国殖民当局之手。

今匹兹堡，美国的一个重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第三章 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

第一节 北美殖民地同英国关系的恶化

英属北美殖民地 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在北美东起大西洋岸、西到阿巴拉契亚山,先后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为简便,下称十三州)。它们可以区分为三个部分,即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

从英国本土和欧洲其他国家迁入北美的移民包括投机者、贵族和绅士,他们是殖民者。但是广大的移民是逃避政治和宗教迫害的人,梦想得到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被迫出卖劳动力而被运送到北美的契约奴(白奴)。早在1619年,就有黑人奴隶开始从西印度群岛运到弗吉尼亚。1700年以后,黑人奴隶大量运入。不久,他们的人数就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许多地区超过了契约奴。到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十三州的黑人奴隶将近五十万人。

北美的居民,披荆斩棘,发展了经济。在新英格兰,气候寒冷,生长季节短,土地贫瘠,多杂砂石,这都阻碍了那里发展大规模农业,多不过做到自足自给。许多新英格兰农民农忙时在土地上工作,非生长作物季节就到附近城镇或渔港打短工。中部殖民地土地肥沃平整,气候温和,农业规模较大。一家农庄往往占地一百到五百英亩。在哈得孙河流域,少数富有的业主占有大地产,使用黑人奴隶或契约奴耕种。中部殖民地生产的谷物品种齐全。它输出大量的小麦和玉米,为它赢得“谷仓”的称号。南部殖民地盛行大种植园经济,每个种植园占地几百或几千英亩,大量使用黑人奴隶或契约奴。那里除了生产稻米之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早在十七世纪早期,烟草的种植引入弗吉尼亚,很快成为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在南方普遍推广。蓝靛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主要经济作物,由于英国纺织工业需要它而广为种植。因为几乎不用肥料和轮种方法,南方单一作物农业消耗地力很快,种植园主特别急于开发和取得新土地。

1751年弗吉尼亚新建的码头

由于农业收入不多,新英格兰居民注意开发沿海资源。他们从长岛到纽芬兰沿海一带发展渔业生产,把各种鱼类运往中部和南部殖民地,换取面粉、烟草;运往欧洲,换取食盐、工业品;运往西印度群岛,换取热带产品。由于渔业需要,加上当地盛产木材,新英格兰成为北美的造船业中心,沿海船坞林立。1760年左右,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约有三分之一是这里建造的。

十三州的工业发展迟滞,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英国殖民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因为严重缺乏技术工人和资本。虽然如此,那里还有一定的工业。铁矿石炼成铁条运到英国,加工制成工具和器皿。麻布、帆布的织造,硷、盐、玻璃和砖的制造都受到鼓励。锯木工场、面粉工场,特别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很普遍。

十八世纪,十三州人口有显著的增长,从1700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

新英格兰包括马萨诸塞(1630年建立)、罗得岛(1679年)、康涅狄格(1679年)、新罕布什尔(1679年);中部殖民地包括纽约(1664年)、宾夕法尼亚(1681年)、新泽西(1702年)、特拉华(1664年);南部殖民地包括弗吉尼亚(1607年)、马里兰(1634年)、北卡罗来纳(1711年)、南卡罗来纳(1711年)、佐治亚(1733年)。

1770年的二百一十多万人。阶级结构也逐渐定型。上等阶级包括北方的大地主，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各地的大商人。他们企求在衣着、居住条件、社交生活和子女教育方面都足以同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但是并不象欧洲贵族那样游手好闲。中产阶级包括广大的日益成长的独立农民、店老板、船主、自己开业的工匠以及政府低级官员、医生、教师和律师，等等。他们的勤奋作用不容低估。他们中的许多人如著名的富兰克林热心致力于教育进步和民政革新。下等阶级包括佃农、农业工人、流动工匠、普通海员、渔民、自由黑人、合同满期后的原契约奴。他们绝不自甘堕落和忍受压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向西部寻求土地，开辟山林草莱，成为边疆的拓荒先锋，茹苦含辛，上升到中产阶级的行列。至于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则处于社会的最低层。

十三州居民，除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以外，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代表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在一二百年的过程中，经过婚姻关系、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联系，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美利坚民族。十八世纪中期，到北美的欧洲人都会对欧洲移民转化为具有“新观念”的“新人”感到惊奇。

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愤怒 “七年战争”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关系上，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国债倍增，在海外的军政费用增加了五倍。英国政府把眼光投向日益富庶的北美殖民地，想从它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这就导致了关系的紧张，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怒。

十八世纪，英国仍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简单说，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力求向国外多出售商品，少买进的商品，取得收支平衡上的有利地位，使起货币作用的金银源源流入。这种政策具体推行到北美殖民地，就是要求它供应英国稻米、纺织纤维、木材、烟草、蓝靛、生铁、皮货，从英国购买工业品。英国工业不需要的殖民地原料，要经由英国向欧洲大陆出售。殖民地所需要的欧洲大陆上的货物得从英国转口，由英国船运往北美。英国对北美工商业的限制，不一而足，以致十八世纪中期走私之风盛行于北美。

虽然受到英国殖民政策的限制，北美仍然在发展。它的工业生产和农田面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羽毛日益丰满。独立战争前夕，北美生产的铁块、铁条已经超过英国；制陶业和玻璃业的进展已经使英国感到威胁；渔业的竞争能力已经影响到英国渔业的利益。许多工业家和商人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同英国有利害冲突。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殖民地具有同全世界做生意的手段时还只能同英国做生意？为什么英国一定要限制殖民地工业企业的发展？北美人民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抱有信心，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心怀不满。当英国在七年战争之后对北美殖民地加紧压榨的时候，他们愤怒起来了，反抗强烈起来了。

早在1761年，英国为了克服北美的走私活动，发布法令，准许有关人员进入船只、住宅和企业机构进行普遍查抄。波士顿商人十分愤慨，聘请著名律师阿提斯指控查抄是不合法的。阿提斯在法庭上的申诉震撼人心，断然否定英国议会有权发布这样的法令，又进一步指出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是公开地向英国的殖民统治挑战，他的言论从北传到南，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英国统治者一心只想从北美殖民地弄钱，对当地人民的情绪不理解，不同情，对事情的处理缺乏机智。1763年，英王颁布命令，宣布阿巴拉契亚山

以西土地为皇室产业，禁止十三州人民向那里移殖。1764年，英国颁布食糖条例。这项法令又苛又细，涉及范围广泛。在此以前，食糖在北美是一项大宗走私商品，新英格兰的商人十分之九是走私商人。因此食糖条例的实施不仅影响走私商人，而且影响广大居民。当时，英国在北美驻扎正规军一万人，用来保证税收和镇压人民的反抗。1764年，英国发布营房条例，规定缺乏适当兵营的地方，殖民地人民必须为英军提供相宜的住房和生活必需品。这又引起了十三州人民的疑虑，一怕侵犯私人住宅，二怕英军弹压人民。为了支付一万英国驻军的开支，1765年3月，英国又颁布印花税条例，规定商业执照和合同、合法文书、新闻报刊等等都必须加贴印花。每项条例的颁行，都引起了十三州人民的抗议和反对，印花税条例更激起了轩然大波。

十三州人民对印花税的强烈反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们拒绝交纳印花税，举行示威游行，殴打税吏，到处抵制英国货。夏天，由马萨诸塞州发起，十三州的代表二十九人在纽约集会，商讨行动办法。这次集会的意义，一在于它是北美殖民地举行的第一次共同会议，抗议英国的殖民税收政策；二在于它公开宣布，英国议会没有殖民地的议席，没有向殖民地征税的立法权力，只有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有权向殖民地人民征税。

在抗拒印花税的斗争中，北美人民建立了秘密组织“自由之子社”。它不仅组织群众的反抗活动，而且在某些著名人士的指导下，准备坚持斗争到底。他们中间的激进派准备在必要时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

到1765年底，北美的进口商取消了许多向英国进货的订货单，英国的经济受到影响。许多债权人担心丧失他们在北美的四百万英镑债款。英国政府迫于形势，1766年3月撤销了印花税法。北美人民欢庆胜利，但是斗争并不到此为止。

走向武装冲突 斗争的演变表明，问题的根本已经不在于具体的税收，而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弗吉尼亚的一位反英激进派裴特里克·亨利曾经在州会议上断言：“没有议会代表而课税就是暴政！”英国可以迫于形势撤销某一税收条例，但是它坚持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这个原则问题导致了冲突的扩大。

波士顿屠杀（1770年3月5日）从1767年起，英国又颁布一系列向北美课税的有关法令，这些法令取英国财政大臣唐森的姓统称“唐森条例”。其中之一规定，从英国输入北美的玻璃、铅、纸张和茶叶都要课税。唐森还把这些税款的一部分拨作英国在北美殖民官员的开支。为了实施唐森条例，两团英军进驻波士顿。这等于是一支占领军，是暴政的象征。波士顿居民憎恶他们，常常发生冲突。1770年3月，英军采取挑衅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他们开枪射击，造成五人伤亡的波士顿屠杀事件。

英国政府鉴于唐森条例的实施会危及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撤销了那些规定，但仍保留茶税一项，这又引起了北美抵制运入茶叶的活动。与此同时，北美人民加强了组织联系。首先在波士顿，由向来赞成殖民地独立的萨姆尔·亚当斯发起，组成了“通讯委员会”，负责在马萨诸塞各地之间互通情况。后来，在弗吉尼亚，经杰弗逊、裴特里克·亨利等号召，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通讯委员会在北美殖民地纷纷建立，构成联络网，演变成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在以后的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1773年5月，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濒于破产的局面，要求议会

制订了“茶叶条例”，准许东印度公司向北美或其他殖民地倾销它积存的一千七百万磅茶叶。由于英国对这批茶叶免税，售价较低。北美人民认为这是一个圈套，让他们喝便宜茶而接受茶税。他们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出卖茶叶，不许茶船卸货。一批茶船停在波士顿港口。12月中旬，在萨姆尔·亚当斯的率领下，五十名波士顿人，夜间化装，登上茶船，把三百四十二箱茶叶统统倒入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沿着多契斯特海湾飘散的茶叶，好象海边长满的杂草。一位反英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毁掉茶叶的事是如此的勇毅、如此的坚定、如此的无畏和不屈，它一定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和持久的后果，以致我不能不认为它是……历史上的新起点。”事实上，倾茶事件标志着北美人民反抗英国进入了新阶段。

波士顿倾茶事件

听到波士顿的倾茶消息，英王乔治写给首相的信里说：“事情并未结局。殖民地不是必须顺服就是胜利。”在英王的指示下，英国政府决定惩治北美殖民地，特别是“反叛的”马萨诸塞。惩治办法采用议会立法形式，那些法令被北美人民视为“不可容忍的法令”，一共五项。第一项法令封闭波士顿港，不许船只进入，直到赔偿了茶叶损失。第二项法令撤销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授与英国任命官员更多的权限。第三项法令规定英国官员犯法送交英国审讯，剥夺了殖民地人民对他们行为的制约。第四项法令是营房条例，要求各殖民地为境内英军提供营房。第五项法令名为魁北克条例，规定扩大加拿大境内法兰西移民的权利，把魁北克省管辖的地区扩展到俄亥俄河流域。这就是牺牲十三个殖民地的利益以讨好魁北克的法兰西移民，换取他们在未来冲突中中立。

北美各殖民地纷纷支援被封锁的波士顿。宾夕法尼亚运来面粉，弗吉尼亚运来小麦、玉米，远在南边的南卡罗来纳运来稻米，纽

约保证经久供应食品。罗德艾兰和弗吉尼亚议会相继倡议，召开会议，讨论共同行动办法。倡议得到热烈响应，北美各殖民地同意合作。经过通讯委员会的安排，决定会议在宾夕法尼亚首府费城召开。1774年9月5日，五十六位代表，来自十二个殖民地（佐治亚缺席），齐集费城，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大陆会议。

支援波士顿（漫画）

（大树名为“自由树”，笼中人象征被封锁的波士顿人民，船上的人意指各殖民地的支援者）

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包括萨姆尔·亚当斯和裴特里克这样的激进派，主张抗英独立，但是也包括许多温和派和保守分子。大会赞扬了马萨诸塞人民对不可容忍法令的抗拒，又反映了企求同英国和解的倾向。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权利宣言和陈情书》形式，上交英国。这些决议认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是不公平的；指摘1763年以来英国强加于北美的税收措施；要求北美殖民地人民享有在英国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坚持殖民地唯一有权制订有关征税法律；要求撤销在北美常驻军队的惯例。大会决定建立“大陆协会”，由它具体执行大会通过的“三断”决议，即同英国断绝输入、输出和消费的联系。大会还决定，如果英国拒绝了要求，大陆会议将在1775年5月召开第二届会议。

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北美殖民地几乎都在组织和训练民兵，准备对付英国的挑战。在一些殖民地，英国的殖民统治已经瘫痪，当地的议会几乎完全掌握了权力。大陆协会执行“三断”决议很有成效，1775年，从英国的输入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五。

第二节 独立战争

来克星顿的枪声和邦克山战役 整个 1775 年春季，波士顿英军司令密切注视马萨诸塞的民兵动静，特别注意能够紧急应召的民兵的活动。他的侦探向他报告，民兵在波士顿北面的康科德贮存了大量军火。他准备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夺取那些军火。他为

著名银匠保尔·瑞维尔实行突袭作了周密的准备。当地的爱国者对英军的动向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已经侦察到了英军的行动计划，作了应急的准备：如果英军夜间出动，波士顿北教堂的塔尖上将放出灯光。通讯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波士顿的著名银匠保尔·瑞维尔备马以待，等候在远处，当英军一旦出动、塔上灯光亮时就向波士顿和康科德之间的民兵报信。

4 月 18 日夜里，波士顿北教堂的灯光亮了。保尔·瑞维尔和他的助手威廉·戴维斯立即上马飞奔，召唤沿途民兵武装起来。著名诗人朗斐诺的诗句说：“国家的命运，系于那个晚间的驰骋。”

北美独立战争（一）：来克星顿和邦克山之战

七百英军北上，越走他们的指挥官越感惊恐了。沿途的村舍，灯是亮的；成人和少年，在为马备鞍；报警的喊声和铃声，远远可闻。黎明时分，英军前队进到来克星顿，在村里公共草场上，遇到了大约七十名武装民兵。英军指挥官要民兵散开，民兵队长命令民兵：“原地不动，不首先开枪。如果他们要战争，让战争从这里打起！”枪声响了，这是“声闻世界的枪声”。英国同北美之间的争吵过去了，北美的革命战争开始了。

英军勉强到了康科德，但是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一路遭到民兵的打击。从树后，从墙后，从农舍背后，从谷仓背后，枪弹不断射来，英军死伤累累。若非一千五百援军赶到，偷袭康科德的英军就要屈膝投降了。来克星顿枪响之后的一星期内，北美民兵一万五千人把波士顿的英军团团围困起来。

来克星顿的枪声鼓舞了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5 月间，第二届大陆会议又在费城召开。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著名代表人物齐集一堂。他们中间有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韩寇克、萨姆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裴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弗逊。代表中的激进派如萨姆尔·亚当斯和裴特里克·亨利等要求会议宣布独立，北美十三殖民地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对英作战。但是保守派还抱有幻想，希望同英国和解。

早在 3 月间，裴特里克·亨利就在弗吉尼亚一次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对英战争不可避免。他在演说的结尾说：“先生，掩盖事实，是徒劳无益的。绅士们也许会呼吁和平、和平——但是和平是不存在的。战争实际上开始了！下次从北方刮来的大风将使我们听到武器的撞击响声！我们的同胞已经走上战场，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懒散不动！……果真是生命如此可贵，或者是和平是如此甜美，值得以戴枷锁和受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采取什么途径，至于我，不自由，勿宁死！”这篇演说热情洋溢，广为传诵，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也对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产生了影响。

第二届大陆会议虽然还在向英王请愿呼吁，但是它决定把民兵改组为大

陆军，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会议还发表宣言，阐明了北美人民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严正声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是完美的”。

1775年6月17日，即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第三天，波士顿英军进攻驻守在郊外邦克山的民兵。民兵英勇还击，三次打退英军的进攻。最后民兵撤离了邦克山，而进攻的英军却横尸遍野，伤亡超过千人。邦克山之战把武装冲突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北美十三州宣布独立 受命为大陆军司令的华盛顿驰赴前线，1775年7月初在波士顿附近的剑桥，挥剑就任了大陆军司令的职务。

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家里。他们一家都是靠土地投机致富的，包括成年后的华盛顿在内。从十六岁起，华盛顿在弗吉尼亚做官方的土地测量员，前后三年。当英法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争夺土地的时候，他从自己家族的利益出发，站在英军一边。二十一岁，他受弗吉尼亚总督的派遣，前去抗议法国人侵犯了弗吉尼亚的边界。1754年，他被任命为陆军中校，率领他挑选的志愿兵一百五十人，参加了对法军的军事行动，曾经出奇制胜。他本身受到了军事锻炼，在七年战争中又立下了军功，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代表。在此后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斗争中，他虽然属于温和派，却坚持参加了反英斗争的行列。他的用兵才能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气魄，对争取独立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即使在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以后，北美十三州内还有许多有产者效忠英国。那些效忠派分子包括从英王那里获得土地执照的大地主、特权商人、南方一些富有的种植园主以及英王任命的官吏等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和破坏独立战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的是要求到西部取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工场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是北美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阵营里，南方一部分种植园主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阵营里的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有激进派和保守派之分，事情发展的进程却迫使保守派放弃了同英国和解的幻想。事实是，英王指斥十三州人民是叛乱者，要把他们的领导人处以绞刑；大量招募雇佣军开赴北美，加强镇压；宣布封锁十三州海岸，妄图借此迫使北美屈服。第二届大陆会议不是还向英王请愿吗？这就是英国的答复。

1776年1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裴因（1737—1809年）发表了他的著名小册子《常识》。他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指斥英王为暴君，鼓吹北美独立。他在《常识》里指出，辩论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应该用武器来解决争议。时候已经到了，殖民地必须坚决地同英国彻底决裂，再没有理由能使殖民地人民仍旧受英王的统治。《常识》以严密的逻辑、激扬的文辞、充分服人的理由动人心弦，为北美宣告独立作了舆论上的动员，三个月之内就发行了十二万二千份，按当时北美人口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畅行的书。

同年春季，北美各殖民地相继为激进的爱国者所控制。6月，弗吉尼亚议会命令它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团向第二届大陆会议提出议案，建议独立。经过简短的辩论，大陆会议任命杰弗逊、约翰·亚当斯、富兰克林、谢尔曼和李文斯顿组成委员会，负责起草脱离英国的决议，即《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年）。他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家庭里，由于较多

地受到辛勤劳动者的影响，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主权在民”学说的熏陶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起草《独立宣言》时，心里有三个思念。第一提出关于统治的学说，即应该由谁统治，为什么由他统治以及统治的基础是什么。第二用宣言进行政治宣传，使所有北美人民相信，除建立新国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第三向各国显示北美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决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宣言列举了英王的种种暴行，庄严宣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同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并采取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宣言的下一段话阐明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提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则：

签署《独立宣言》

（正在签名的是大陆会议主席韩寇克，对面前排左一人为富兰克林，二排左一人为杰弗逊）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由‘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了这些目的，人民有权改变它、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而新政府必须建立在最能促进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的目的上，它的权力组织形式也应以此为依据。”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消息传出，人民欢腾。街道上、广场上到处宣读宣言，提灯、鸣炮、敲钟，表示庆祝。

《独立宣言》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从此，北美十三州人民进行的战争不再是为了保持殖民地的自由，而是开始为创建新的国家而战了。两者对北美人民说都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就目的说是大不相同的。

独立战争 从来克星顿响起枪声到《独立宣言》发表，一年多的时间里，英国对北美的武力镇压是失败的。继波士顿民兵的英勇行动之后，新英格兰北部的民兵，即“青山少年”在厄坦·艾伦的率领下，攻占了张伯伦湖畔的重要炮台，夺取了许多大炮和军火。后来这部分大炮和军火支援了对波士顿英军的围攻。1775年冬季，大陆军北上加拿大，围攻蒙特利尔，失败撤退。但是1776年3月，在大陆军的炮火轰击下，波士顿英军从海上撤往加拿大，许多效忠派分子随同英军逃走。战争一时胶着，但是交战双方都在加紧准备。

就力量对比说，英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它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本土人口六七百万，连同殖民地人口在内有三千万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工业。它的海军力量强大，当时举世无双。它的陆军装备优良，战争期间派往北美的就有九万人。十三州人口不过三百万，其中黑人五十万而十分之九又是奴隶。它们的经济力量无法同英国比较；海军力量若有若无，1775年才开始把新英格兰的渔艇组织起来。大陆军人数不多，而且军械缺乏，给养不足。在许多州内还有数以万计的效忠派分子从事捣乱破坏。北美人民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满怀决心信心进行战斗，但是的确经历了苦难的历程。

1776年夏，英军的力量加强了。威廉·郝将军率领的英军，在强大舰队的护送下，从加拿大开赴纽约港，8月下旬对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发动攻击。

华盛顿寡不敌众，撤出纽约，向南退到特拉华河流域。英军占领纽约，目的在于把北美十三州的联系切断，使新英格兰同中部和南部隔离开来。

华盛顿率部夜渡特拉华河，奇袭特林顿见图版(35)

北美独立战争（二）：中部战役（1776，7—1777，1）

那年的其余时间，大陆军一再受挫。华盛顿以顽强的意志保持了希望，虽败犹战，尽最大可能给趾高气扬的英军造成破坏。恰恰就在那士气沮丧的日子，裴因发表了他的小册子《美国危机》。“现在是考验人们魄力的时候了。”“只有现在挺得住的人才配受到全国男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象地狱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然而我们有可慰藉的是，斗争越艰苦，胜利越光荣。”这种满怀战斗激情的呼号来得再及时不过了。华盛顿当着士兵的面宣读它，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作战精神。1776年的圣诞节之夜，大陆军渡过冰块充塞的特拉华河，拂晓之前，进攻特林顿，俘虏了九百多英军和大量的武器。1777年1月初，他们又在普林斯顿打败英军。这些胜利驱散了沮丧的情绪，重燃了希望的火光。特林顿战前，华盛顿曾经写道：“我想角逐快结束了。”而在普林斯顿战前，他却发出了愉快的呼唤：“士兵们，这是一场开心的捉狐猎狗。”

北美独立战争（三）：萨拉托加战役

英国企图在1777年平定北美，为此拟订了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计划的要点是完全控制蒙特利尔和纽约之间的河湖，彻底把十三州分割为二。三支军队协同，实现这一计划。一支军队由郝将军率领，从纽约北上，攻占哈得孙河上游的阿尔巴尼。两支军队由加拿大出发，其中的主要一支由柏高英将军指挥，由蒙特利尔南下，同样直指阿尔巴尼。8月下旬，郝将军率领的英军不是北上而是南下，9月中旬打击了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侵占了北美的政治中心费城。

纽约的英军没有北上，给上述的作战计划造成了缺口。而柏高英的进军路线沿着湖河，由北而南，表面上很合理，实际上困难重重。沿途是森林、沼泽和陡峭的峡谷，士兵的食物和马匹的粮草都得不到供应。6月间，盲目乐观的柏高英率领七千英军南下，开头行军迅速，后来爬行进展。北美爱国者砍伐树木，障碍道路。新英格兰西部和纽约州北部的民兵结集起来，数达二万人，在盖特将军的领导下，10月间在萨拉托加封锁了柏高英的前进道路，整装以待。

柏高英向盖特投降见图版(36)

从加拿大出发的另一路英军进到了纽约州的西北部，遭到了民兵的迎头痛击，又面临意外的困难，撤回加拿大。这样，柏高英指挥的英军成了孤军，而又一意深入。他们陷入了民兵的包围圈。一支去搜索粮秣的英军被邦克山战役的英雄斯塔克指挥的“青山少年”击败。其余英军两次突围两次失败。柏高英走投无路，于1777年10月17日向盖特将军投降。北美民兵俘虏了六位英国将军、三百名军官和五千名士兵。

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是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柏高英投降的惊人消息不仅使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打胜，而且也使法国这样相信。法国当时敌视英国，从1775年开始就暗中用武器、给养和志愿人员支持北美，但是它不敢肯定北美是否愿战和能战，所以一直不公开支持。《独立宣言》使法国相信，

北美是愿意作战的；萨拉托加的胜利又使法国相信，北美是有能力作战的。1778年2月，法国同美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后来，法国又说服它的盟国西班牙参加，共同反对英国。法美同盟是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这是富兰克林出使法国获得的成果。

华盛顿同部属在伏奇谷商讨作战计划见图版(37)

美国欢庆萨拉托加的胜利，但是艰苦的斗争并未过去。1777—1778年那个冬天，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驻扎在费城西北二十五公里的伏奇谷，度日艰难。军队缺武器，缺粮饷，缺御寒衣物，甚至缺少鞋靴，士兵往往赤着脚在雪地上行进，军官和将军们常常拿粗毛毯当斗篷。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濒于绝望的寒冬。

1778年春，英国用克林顿代替威廉·郝指挥北美英军。7月，法国第一批军舰开抵北美海港。为了防止受到海陆夹攻，克林顿把英军撤离费城，集中兵力防守纽约。大陆军盯着他们不放，但又缺乏进攻纽约的力量。北方的战局呈相持状态，而南方成了军事较量的中心。

北美独立战争(四):英军的动向(1777—1781年)

1778年12月，大量英军由舰队运往南方，侵占佐治亚的萨凡纳，计划以此为基地，侵占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1780年5月，康华利率领英军夺取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俘虏美军五千，一时得手，继续向北推进。南方的美国将领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使康华利的每一进展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华盛顿派到南方的大陆军又终于迫使康华利把英军撤到海边。英军最后退到弗吉尼亚的约克顿，以便得到英国舰队的掩护。与此同时，弗吉尼亚的民兵越境深入到俄亥俄河流域作战，肃清了英国在那里的大部分力量。

法国军事援助逐步加强。1780年法国舰队躲过英国的封锁线，把六千法军运到美国。第二年，法国的一支大舰队也相继到达。华盛顿认为最后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当时，进攻目标不是纽约就是约克顿。经过美法商讨决定，美法联军将海陆联合打击约克镇的英军。

华盛顿的大陆军和罗尚比率领的法国陆军在纽约的白平原汇合，留下强大的分遣队监视英军，南下弗吉尼亚，9月间在约克顿包围了英军。法国海军在约克顿附近的海湾上打败前来解救的英国舰队。经过一个月的陆海围攻，康华利陷于绝境，1781年10月19日向华盛顿投降。从来克星顿响起枪声到约克顿之战结束，整整六年半的时间。第二年4月，英国承认战争失败了。

约克顿英军投降见图版(38)

美英代表在巴黎举行谈判，1783年最后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为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合众国的疆界西到密西西比河，北起五大湖，南到佛罗里达。这是北美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战斗而取得的光辉成果。

美国独立战争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并且是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战争。这次战争推翻了英国对北美十三州的殖民统治，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在国际上，人们即将看到它的影响，那就是给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程度的推动力。

美国独立战争艰苦备尝，有时几乎陷于绝境。根本问题，一在于兵力不足，一在于财力枯竭。华盛顿直接统率的大陆军最多的时候没有超过一万八千人，经常感到力量薄弱。大陆军是招募来的，很少人服役一年以上，在英军威胁某地的时候，出于保卫乡土的热情，一时应召的可以多一些。至于战争费用，由大陆会议向各州征集，经常不能如数收到。举例说，1781—1783年，大陆会议征集的数目是一千万美元，而实际收到的只一百五十万美元。从战争开始，大陆会议就依靠印发纸币弥补不足，到1779年底已印发了两亿美元的纸币，纸币贬值，一金元的价值已等于一百元纸币的价值。但是由于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人民既慷慨捐输，又踊跃参加民兵。新英格兰的战斗和南方的游击战，多靠民兵。他们的参战，大大补救了大陆军力量的不足。大多数黑人期待这次革命能使他们摆脱奴隶枷锁，积极参军，历次大战役都有黑人参加。外国志愿人员的支援，说明独立战争得道多助。法国和西班牙的参战，无论从兵力和财力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单在战争末期，法国的金钱资助就达八百多万美元。法国海陆军大力参战，在约克顿一战的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联邦政府的建立

战后问题 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面对着许多困难问题。

早在 1776 年 6 月，即在《独立宣言》宣布之前，大陆会议即着手草拟组织中央政府的计划。第二年 11 月，由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送交各州批准。邦联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国家组织形式。由于各州利益不尽一致，这个条例直到 1781 年才由全部十三州所接受。根据这个条例。这个新国家正式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邦联政府组成，代替了大陆会议。邦联政府只设有一个邦联国会，由各州派二至七名代表组成，国会作出决议时，每州只有一票表决权。邦联议会名义上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实际上如果没有得到九个州的同意（即当时三分之二以上州的同意），它无权宣战、缔结同盟、铸造货币和确定币值，不得借债、拨款和确定海陆军的数额，等等。各州保留的权力大，邦联政府能否发挥它的职能解决国家面对的问题，这是美国遇到一个首要问题。中央政府权力该大该小，成为此后一定时期内政治斗争的焦点。

独立战争结束以前，纸币严重贬值。战争结束以后，人民仍然深受货币贬值之苦。邦联政府无权直接向各州征税，国库空虚。各州资助邦联政府的款项，往往只不过上缴定额的十分之一。当时，美国所欠外债数达八百万美元，内债三千二百万美元。如果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就失掉了继续借债的信用。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受英国的排斥，除采取走私等办法外，很难同西印度群岛作有利可图的交易。美国商人于是转向太平洋方面，同夏威夷、中国和东印度群岛交往，牟取厚利。在这同时，廉价工业品又从英国涌入美国市场，1784 年一年之内，英国输入美国的商品等于美国输入英国商品的五倍，贸易的不平衡，造成了美国金银通货的大量外流。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美国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又是当时社会动荡、阶级斗争激化的根源所在。

十三州人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潮涌一般地向西移殖。美国战时的盟国西班牙于 1784 年宣布不让美国船只沿密西西比河进入新奥尔良。这种不友好的措施意味着西班牙对俄亥俄河以南的广大领土有所图谋。至于俄亥俄河以北的广大领土，英国借口美国还未按和约规定偿还英王臣民的债务，迟迟不从某些据点退出。这都是外交上遇到的麻烦。在内部，几个州坚持要求领有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部分领土，吵嚷不已。1785 年，邦联国会通过《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按单元出售，每单元六百四十英亩，每英亩售价一美元。1787 年，国会又通过了《西北法令》，规定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将来可划为二至五个州，每当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到有六万男性公民的时候，那个地区即可成为一个州加入合众国。这些法令推动了向西部移民的运动，而土地的出卖又有助于解决邦联政府的财政困难。但由于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过大，许多劳动者无力购买。大量土地往往数达百万英亩都落到土地投机公司手里了。

1786 年，货币短缺成了劳动人民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新英格兰，很多劳动人民负债。他们的产品卖不出钱，无钱偿还债务。他们被迫拍卖动产和不动产，土地只能卖到原价的约二分之一，牲畜只能卖到原价的约三分之一。他们还得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面临着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以及没收财产和被关押的危险。若干州内因此动乱不安，不断发生起义。1786 年秋，马萨

诸塞州的农民，在独立战争老战士丹尼尔·谢斯的领导下，发动了强大的起义。在城市贫民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包围法院，打断法院对债务农民的审判；打开监狱，释放无辜被囚的劳动人民。马萨诸塞的统治者动员了全州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在第二年镇压了这次起义。动乱不安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忧心忡忡。早在 1786 年华盛顿就在一封信里说：“每一州都充满了可燃之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社会安定下来，又是美国统治阶级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1787 年宪法 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种植园主都已看到，邦联政府太脆弱，没有力量履行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华盛顿曾说：“我们正迅速地临近无政府和混乱的边缘。”“上层建筑摇摇欲坠，……将把我们埋入它的废墟。”许多州的代表要求邦联国会召开制宪会议。国会同意这一要求，通知各州于 1787 年派出代表在费城举行会议，“其唯一的和明确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以保障联合的维系。”

1787 年 5 月，除罗艾兰州以外，十二个州的代表五十五人代表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的利益，在费城独立厅集会。代表们认为《邦联条例》没有很多可以保留的，决定另订一部宪法。会议一致推选华盛顿为主席，但是实际的起草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前者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后者代表南部的种植园奴隶主。他们都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维护有产者的统治。只是前者一度主张君主制，后者主张共和制。

会议代表借口自由发表意见不受本州的弹劾，采取了秘密会议的方式。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会议一开始就产生了大州与小州和资产阶级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争论。

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和争论，起于全国立法机构中怎样分配代表名额的问题：按人口多少的比例分配，还是大小州一律同等？大州如弗吉尼亚提出了一个计划，主张国会两院的议员一律按各州自由居民多少的比例确定名额的多少。这就意味着大州在国会中的代表数多，结果必然是大州在政府里的权力大。小州如新泽西州认为，如果这样，它们定会被吞并，因此反对而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建议大州小州在国会两院中的代表名额均等。大州的代表反问：“那不是宾夕法尼亚的公民人数等于新泽西州吗？”“那不是要求前者的一百五十人等于后者的五十人吗？”

第二个重大问题涉及政府按各州人口比例向各州人民征收直接税的问题。这引起了北部与南部或资产阶级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认为，黑人奴隶是财产，按人口比例征税不能把他们计算在内。可是同时，他们又坚持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代表的名额，应把黑人奴隶的人数计入各州的人口总数。北部资产阶级代表坚决反对，认为不能用两种标准对待黑人奴隶：在纳税时不计数，在派代表时又计数。

经过激烈的争辩，矛盾得到调和。取得的妥协办法反映到了宪法条文之中。1787 年 9 月，会议完成了宪法的拟订工作，提交邦联国会，接着由邦联国会提请各州认可。

1787 年《美国宪法》，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精神把国家职权分为三个部门，即制订法律的立法机构，执行法律的行政机构和解释法律的司法机构。

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按宪法规定，有权确定各种捐税、以合众国的信用借债、同外国安排商务、铸造货币，有权对外宣战、征集军队、召集民兵，有权为实现上述权力而制订必要的和适当的法

律。参议院由每州选出的两名议员组成，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其总数的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按各州纳税的人口比例确定人数并由各州选出，任期二年，到期全部改选。参众两院议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各州计算人口，不把印第安人计算在内。黑奴按照五分之三的人口折算。

国家的行政大权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四年，由各州选出的总统选举人选出，得到总统选举人过半数的票才能当选。总统是最高的行政首长，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经参议院同意，有权任命部长、驻外使节和领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合众国政府其它官吏；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有权缔结条约。总统还有权批准或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

司法权集中于最高法院。最高法官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除非渎职，任期终身。最高法院有最高的裁判权，还逐渐取得了监督立法和解释宪法的权力。

1787年美国宪法完成了美国中央政府的创制工作，“分权”是创制它的指导原则。但是，制订宪法的人注意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不仅必须拥有各自的权力，而且必须互相“制约与平衡”。举例说，国会制订法律，总统可以否决法律；总统有权缔结条约和任命官吏，但必须征得参议院的同意；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通过而又经总统批准的法案与宪法抵触，但总统有权征得参议院同意任命法官，众议院有权给最高法院拨款，而且国会还可以控告法官，对最高法院的裁判权作出限制。“三权分立”而又互相“制约与平衡”，以限制某一权力的专横，避免产生暴政，这有它的积极和进步作用。实际上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1787年美国宪法，调和了大州和小州、资产阶级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在参议院的组成和黑奴按五分之三的人口折算等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人们指出，这部宪法是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也是有产者各种利益的体现。这部宪法的阶级实质一方面从这里表现出来。

1787年美国宪法的阶级实质又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漠视了人民的权利和种族问题。开头，它没有专门条款规定人民的权利。各方面几经斗争，第一届国会取得各州的赞同，于1791年把包括十条内容的《权利法案》作为补充条款载入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信教、言论、出版、集会和请愿自由等等。此外，宪法表现了种族歧视，例如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五分之三的人口折算。黑人奴隶制的存在同《独立宣言》的精神相违背，但是制宪会议慑于南方奴隶主的威胁，不敢在宪法里触及奴隶制度的废除问题，反而在矛盾冲突的争辩中求妥协，在宪法里明文规定在1808年以前，国会不禁止输入黑人奴隶。

联邦政府的成立 围绕着宪法草案的批准问题，美国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称为“联邦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竭力使宪法尽早得到各州的批准。他们利用报刊的宣传，争取广大人民站到他们一边。反对派被称“反联邦党人”。他们仍然倾向于各州分权，不愿意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削弱各州原有的许多统治权力。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宪法草案没有明确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表示不满。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列举了国会的各种权力。

从1791年到1967年，《美国宪法》几经修正补充，共有二十五条补充条文列入。

从 1787 年 12 月宾夕法尼亚州首先批准到 1788 年 6 月新泽西州批准 ,先后有九个州批准了宪法草案。按照宪法有关规定,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批准,宪法宣布生效。邦联国会决定于 1789 年 1 月举行大选。同年 4 月,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获得各州总统选举人一致同意,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当选为副总统。经过参议院同意,华盛顿任命杰弗逊为国务卿,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他的战时伙伴亨利·诺克斯为陆军部长。他们的任命不仅因为他们的才干,而且因为他们是宪法的捍卫者和联邦原则的支持者。

1789 年 4 月就职总统前夕,华盛顿到达纽约见图版(39)

1789 年 4 月 30 日,华盛顿在纽约华尔街就任美国总统。纽约当时作为美国临时首都。同年底,首都迁费城,1801 年正式定都华盛顿。

第四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法国是那些主要启蒙思想家的故乡，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在法国终于显示出来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马赛港见图版(40)

革命前夕，在欧洲大陆，法国是个先进的国家，还虚有其表。它有二千四百万人口，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首都巴黎是著名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宫廷所在的凡尔赛，对法国和欧洲的贵族都具有诱人的魅力。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以讲法语、读法国书、模仿法国风俗为时尚。法国似乎是一个光荣时代的领导国家。从社会经济上看，农奴制度在那里衰落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比较发达。里昂的丝织工业雇用了六万五千工人，在欧洲首屈一指。在洛林省的克鲁佐，有一个冶金公司拥有四座熔炉，两个铸铁厂。在北部，安新煤矿公司有四千工人做工。雇用五十到一百工人的手工工场，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法国的对外贸易仅次于英国，它的烧酒、葡萄酒、布匹、服装、家俱销售欧洲各地。波尔多、马赛、勒阿弗尔、南特等城市已经成为大商港。大规模的造船工业也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了。但是在这些表象的下面深深地埋藏着危机，社会在急剧地腐烂，而封建专制制度还顽固地阻碍任何改革，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举例说，封建行会的存在阻挠了手工工场的设立和活动；省与省之间关卡林立，对转运的商品层层抽税，极大地阻碍了国内的商品流通，损害了国内贸易的发展。此外，度量衡制度混乱，官吏滥用职权，同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很大的桎梏作用。

社会上，封建等级制度牢固地保存着，教士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其余的人属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却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十，加上王室的土地就有百分之四十。他们享有政治特权，却对国家几乎不承担什么赋税义务。他们霸占政治、军事、司法和教会的一切权力，占有大大小小的职位，却只作威作福，不顾人民疾苦。他们借土地剥削农民，教会还对人民抽什一税。当然，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以教士而论，有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之分；以贵族而论，有“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地方乡绅”之分。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是高级教士，教区神甫等等属于低级教士。教会每年剥削所得约为二亿四千万铤，大部分被高级教士挥霍了。低级教士每年只能得到七百或三百五十铤，有的大主教每年收入却多达四十万铤。“佩剑贵族”都是世袭贵族，有的还是王族后代，有的出身“名门”。“穿袍贵族”包括法官，多是官员，有的是用钱捐来的。革命前夕，这两种贵族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就权势和财力而论，“穿袍贵族”胜过“佩剑贵族”。无论第一等级上层还是第二等级上层，除了压榨农民脂膏以外，还从国王那里取得大量赏赐。他们经常住在凡尔赛，出入宫廷，身穿绣金缀银的华服，乘坐华贵的马车，打猎，宴客，看戏，跳舞，只顾及时行乐，不问明天如何。这正如路易十五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法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属于第三等级，其中除了灾难深重的农民，还包括资产阶级、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农民人数最多，占总人口

铤是一种银币，每个重五克。

的百分之九十，所占有的土地只不过全部耕地

农民的悲怨：“仁慈的主啊，把我们从骗钱的律师、猎场看守人、民兵队和税卡管理人手里解放出来吧！”（漫画四幅）

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少地，有的无地。其次，重税压在他们肩上，千万条封建绳索缠着他们。对地主，他们要交地租和其他租税，又遭受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如炉灶税、磨坊税等等。地主饲养的鸽子飞到田里啄食谷物，农民不得轰赶；地主打猎，践踏农民的庄稼，农民无法提出赔偿要求。对国家，农民要交财产税、军役税和盐税。对教会，农民要交什一税。农民一年所得，大部分被剥夺走了，即使丰收年景，也难维持一家温饱。第三，当时法国的农业技术缺少改进，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状态。农民没有财力在田地上施肥，也不可能实行技术上的改进。因此他们不仅缺田少地而且收成又少。1779年，英国著名农业专家阿瑟·杨到了法国，深叹法国农民太穷了，太苦了。

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工场主、律师、医生等等，是第三等级里最有力量的集团。他们有钱，有文化，有才能，有野心。他们占有的土地相当于贵族等级占有的数量。他们还拥有其他的巨大财富，如大企业主狄特里希有新式设备的熔炉和铁厂，波尔多的航业家波拿斐有船三十艘，家财值一千六百万铊。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无权，在社会上深受特权等级的歧视。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处境十分困苦。工人每天做工十多小时，所得不过一铊。遇到荒年，粮价上涨，他们更要在饥饿线上挣扎。

第三等级对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强烈不满，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佃农和农业工人要求获得土地，自耕农要求增加土地。他们不愿再作重税压迫下的牛马，渴望从封建剥削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要求改善他们的境遇。至于资产阶级，他们要按他们的意愿改造法国，具体说，要限制王权，要消除对贸易的障碍和限制，要排除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要制定成文宪法，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他们特别要求平等，“所有的法国人应该有获得政府、军队和教会各级职位的权力和希望”。他们要求对一切财产征税，不管它为什么人所有；要求对一切人征税，不管他属于什么等级。第三等级各个阶层处境不同，要求各异，但是在仇视封建统治、反对特权等级、要求改变现状这些方面都是一致的。他们再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所在。

财政危机 1774年，法王路易十五死去。在他将近六十年的统治中（1715—1774年），不肯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补救旧制度的弊端，而使法国一天天腐败下去。路易十五死的时候，他的孙子和继承人路易十六年届二十。据说，路易十六听到他祖父死去的消息曾经惊叹说：“在我这个年纪，这是多么重的担子！而我什么也不曾学到呀！”他爱吃、爱喝、爱打猎、特别爱摆弄钟表。他的内兄、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说他爱抓小事，不抓大事。此外，他冥顽不灵而又犹豫不决。王后玛丽·安东妮，奥国公主出身，傲慢、轻率、挥霍无度，喜爱干政，在法国越来越失人心。如此国王，而面对的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路易十六

当时，法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法国本非穷国，由于税收制度

不公平又无效能，加上宫廷挥霍无度，以致长期财政亏空，靠借债维持。路易十六即位以后曾任命堵戈为大臣整顿财政。堵戈厉行节约，特别是节缩宫廷支出以减少亏空，还采取其他一些办法稍解民困，这却引起了特权等级的反对，引起了王后的愤怒。1776年，堵戈免职。临去的时候，他警告路易十六说：“陛下，请记住，正是虚弱把查理一世带上断头台的。”

但是财政问题一直是一死结，越勒越紧。年年入不敷出，岁岁国债增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支出增加，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其严重了。据统计，从1774年到1789年，国债增加了三倍，每年偿付利息就要花掉国家岁入的半数。1786年，银行家拒绝对政府贷款，财政濒于破产境地。财政大臣卡伦鼓起勇气告诉路易十六：“加税是不可能的，天天借债是要破产的。”他主张向特权等级征税，为此召开了“名人会议”，邀请特权等级的头面人物参加，要求他们拿出钱来，度过危机。特权等级起来反击，一毛不拔。

尽管财政困难，政府欠债累累，路易十六依然挥金如土。八十万鎊赐给一个伯爵夫人的女儿做陪嫁；二千三百万鎊赐给一个兄弟，供他还债。自己购买一座宫堡花去一千万鎊，为王后购买一座宫堡又花了六百万鎊。1788年，政府收入五亿零三百万鎊，支出需要六亿二千九百万鎊，其中用于还债的达三亿一千八百万鎊。1789年，政府负债四十五亿鎊。路易十六走投无路，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法国的三级会议最早召开于十四世纪初，由高级教士和贵族以及每个城市的两位市民代表参加。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最初本是为了要钱。从1614年以来，三级会议就不再开过。路易十六决定召集它，乞灵于这个久已废置的机构，表明他的政府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了。

第二节 革命开始和大资产阶级当权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1788—1789年，法国进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当时，法国碰上了荒年。1788年小麦歉收，冬季又遇严寒。失业的农民流入城市特别是巴黎去谋生。纺织工业中心的工人严重失业，物价上涨而工资下降。1789年春，面包价格几乎翻了一番。经济上的困难加剧了持续已久的政治紧张局面，各地常有动乱和起义发生。选举时，人民上送的《陈情书》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疾苦和要求。特权等级各选出三百名代表，其中包括倾向改革的贵族拉法夷特等人。第三等级选出六百名代表，尽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包括律师罗伯斯庇尔和投入第三等级的米拉波伯爵、修道院长西耶士等人。资产阶级希望三级会议进行广泛的改革，使他们分享政治权力。农民、工人和平民希望它能解除他们的痛苦。

三级会议开幕式见图版(41)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开幕。衣着华丽的贵族和教士的代表，分坐在国王宝座的两侧，穿着朴素黑色衣服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坐在大厅后边。路易十六讲话，要代表们尽力设法充实国库，警告大家提防革新思想。财政大臣内克的报告只讲财政问题，矢口不提政治改革。第三等级的代表既失望又愤怒。第二天，在开会方式和表决的问题上，特权等级和第三等级展开了斗争。按照旧规矩，三个等级分开讨论，表决问题以等级为单位。如果照旧，特权等级处处能以两票对一票压倒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坚决主张合在一处开会，表决时以人数计票。因此，会议形成僵持局面。

三级会议从它集会的那天起，就成为全国注意的中心。巴黎居民成群地来到凡尔赛，拥挤在三级会议会场走廊里，激励第三等级的代表积极斗争。第三等级的代表行动逐渐坚决。6月17日，他们毅然宣布改三级会议为国民会议。路易十六下令关闭会场，他们转到附近一个网球场集会，发誓不为法国制订一部宪法决不散会（国民会议后又称制宪会议）。路易十六又威胁他们分开，一个代表高喊：“我们在这里是顺从民意；除非刺刀尖驱赶，我们决不离开。”他们先把低级教士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后来整个特权等级的代表都只好同他们合在一起开会。

三级会议改成国民会议，路易十六表面屈从，暗地里却在调集军队，准备镇压已经露头的革命。巴黎人民越来越激动越警觉。广场和林阴大道上，经常聚集着许多人，听鼓动家鼓吹变革的演说，议论凡尔赛传来的最新消息。组织“国民自卫军”的事在积极酝酿着。7月12日，路易十六免除财政大臣内克的职务，用一个著名的反动贵族代替他。消息传出，巴黎居民都感到这是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信号。巴黎罢市，国民自卫军征集起来，当政府军队开始攻击巴黎人民群众的时候，警钟响起来了。工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占领武器库，掀起了武装起义。

释放巴士底狱的政治犯(1789年7月14日)

在巴黎，有座巴士底狱，是一向用来囚禁政治犯的堡垒，久已为人民所痛恨。7月14日，巴黎起义者冲向巴士底狱，浴血战斗，一举冲破了这座象征专制统治的堡垒。人民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首次胜利。巴黎市民张灯结彩，欢庆巴士底狱的攻占。第二天，资产阶级分子巴宜当选为巴黎市长。自由派贵族拉法夷特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巴黎的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

里。

路易十六看到他的军队没有力量压制革命，只得向国民会议保证从巴黎调开军队。他自己亲自到巴黎市政厅，表示承认巴黎革命的既成事实。特权等级中的许多人，看到自己的末日到了，纷纷向国外亡命。

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出，法国各大城市仿效巴黎，纷纷起义。各地农民拿起猎枪、镰刀、铁叉，展开了起义。他们要求取消一切封建义务，要求土地，到处打破贵族地主的庄园，拿出封建文书，当众付之一炬。农民的起义火焰，很快遍及全法国。各地的资产阶级都利用广大群众的斗争夺取了政权。

法国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帷幕。

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 1789年7月14日以后，法国的政权转移到大资产阶级即银行家等大财主手里。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有资产阶级化的自由派贵族。

在农民起义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和特权等级一样惊慌。国民会议企图安抚农民，8月初决定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徭役和其他一些封建义务，又取消了什一税和特权等级不纳赋税的特权。但是它没有废除封建地租，没有给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那正是农民的根本要求。

接着，国民会议在8月27日通过了《人权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原则。宣言宣称：人类是生而自由的并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这些人权。法律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现，每个公民有权亲自参与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宣言》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它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会以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从前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

路易十六拒不接受国民会议作出的取消封建权利的一些决定，又不赞同《人权宣言》，国民会议有些代表还同他勾结以阻止国民会议实行进一步的改革。这都使人有理由怀疑，国王在贵族的支持下，会使用武力反对国民会议。当时，巴黎物价继续上涨，面包十分缺乏，人心浮动。1789年10月5日，缺乏面包的巴黎妇女组成队伍，喊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向凡尔赛进发。沿途，妇女和男子不断加入，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到达凡尔赛，冲进了国民会议的会场，6日清晨又冲进王宫。迫于群众声势，路易十六只好携带家小返回巴黎。两天以后，国民会议迁到巴黎开会。

“到凡尔赛去！”——1789年10月5日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发

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国民会议通过了许多法令。根据这些法令，法国调整了行政区域，把全国分为八十三省。内地关卡撤销了。行会和它的法规取消了。世袭贵族和爵位废除了。教会的土地由政府没收；过去教会管理登记出生、死亡和结婚的职权转交给了国家机构；各级教士受国家管理，薪金由国家支付。1791年6月，国民会议根据律师出身的代表列沙白里哀的建议，通过了所谓的《列沙白里哀法》。这一法律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突出地反映了国民会议怎样利用立法权力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1791年，国民会议给法国制订了宪法，这就是1791年宪法。按照它的规定，法国为立宪君主国，国王和他任命的大臣主管国家行政；立法会议负责立法，两年改选一次；选举产生的法官主持司法。宪法标榜“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实际上它又按财产多少，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只有“积极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于这一规定，法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五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所谓人类生来权利平等的原则立刻化为一句空言。

1791年9月30日，国民会议结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急风暴雨般的斗争环境中，法国得到改造。旧制度崩溃了，新制度建立起来，专制制度和封建特权消逝了，教会削弱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由于《人权宣言》而得到书面上的保证，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国民会议的立法一方面打破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民。这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家说的：“国民会议的基本目的是建立新制度，这一新制度要保证资产阶级和平地行使权力，保证消除专制君主或贵族卷土重来的可能，又保证消除人民群众的统治。”

发稜被截见图版(12)

革命战争开始 路易十六同特权等级一样，绝不愿丧失自己的权力，他早就计划逃出巴黎，早就暗派心腹同外国勾结，要求各国干涉法国革命。率领法军驻在东北边境上的一个反动将领加紧准备，以接应路易十六。1791年6月20日夜，路易十六一家按照计划，一一化装溜出王宫，乘坐事前备好的马车，逃出巴黎，急向东北边境进发。车到发稜，乔装打扮的路易十六终于被当地的驿站站长认出来了。警钟敲响了，群众拿起武器赶到，扣留了路易十六一家。他们一行被押回巴黎，到达的时候，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不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沉寂表示内心的愤慨。这次逃亡事件产生了两个后果：巴黎人民起来示威，要求废除国王、建立共和，但是当权的大资产阶级还在为国王辩解，并且对人民实行镇压。其次是那些一向仇视法国革命的欧洲封建君主们要乘机干涉。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宣言，表示要“挽救”法国国王，并且以战争相威胁。

新选出的立法会议于1791年10月集会。怎样对付和处理流亡贵族，怎样处理国内的骚乱，都是面临的复杂问题。战争危机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

立法会议的七百四十五名议员，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斐扬派”份子，占有二百六十四议席。他们满足于君主立宪政体，力图把革命限制在1791年的宪法的范围内，是立法会议的右派。中派人数最多，占有三百四十五议席。他们变化无常，总是站在最有势力的党派一边。在立法会议初期，他们站在右派一边。左派大体上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占有一百三十六议席。左派的一部分议员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集结在新闻记者出身的布里索周围，后来形成吉伦特派。

1791年，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按照他们集会的所在地，这个团体命名为斐扬俱乐部。它的首领有拉法夷特、巴宜、巴尔拉夫等人。

1789年冬初，国民会议的部分代表经常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聚会，他们组织的政治团体叫“宪法之友社”，通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成员除资产阶级份子以外，开头还有贵族和教士，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组织。1790年，它的成员超过千人。主要城市和许多市镇都有它的地方组织。

不久以后取得巴黎市长职务的佩蒂翁，也是这一派的著名活动家。另一部分议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有库通和卡尔诺等人。他们接近罗伯斯庇尔，主张实行普选权，为了捍卫革命，认为要同劳动群众保持联系。

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为了转移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主张对外战争。吉伦特派也主张战争，因为它代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南方的大船主和商人，认为战争对他们的企业有利；还因为它相信，战争取得胜利将把爱国的法国人集中到它的领导下，以建立它的统治。主张战争恰恰同王室的打算吻合。路易十六有他如意的打算：如果战争胜利，他的地位就会巩固，就有可能扼杀革命。如果战争失败，革命就会被外国干涉者扑灭。王后在9月间给她的哥哥奥国皇帝的信里就明目张胆地说：“武力已经摧毁一切，现在只有武力能够恢复一切。”她梦想着，只要欧洲各国君主挥动武器，法国就会颤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看穿了主战派的阴谋。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说时指出：只有亡命之徒和宫廷的阴谋家希望战争，他们妄图借战争迫使人民投降。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够阻止战争。

1792年4月20日，法国立法会议对奥地利宣战。不久普鲁士加入奥国一边对法作战。从这时起，战争在二十几年里几乎不断地震撼着欧洲。这些年的前若干年，“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它进行的战争巩固了革命的胜利，是正义的战争、革命的战争。

第三节 革命深入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1792年8月10日革命和王位倾覆 战争一开始，法国北部边境的驻军，分头出击，进攻奥国统治下的比利时。法国爱国者期望革命战争旗开得胜，但是军队是旧的，军官和将领大多是贵族。前线进攻开始就失利，某些部队甚至未同敌军接触就向后退却。雅各宾派谴责反革命的人，认为溃退是由于他们的破坏。

军事失败的原因，正如罗伯斯庇尔预见的，是内部的反革命帮助了外部的反革命。指挥前线军队的拉法夷特、罗尚博等故意便利敌军行动；贵族出身的军官在情绪上都是反革命的，许多军官叛逃。几个月里，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布里索曾经指出：“祖国陷于危险，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就是卑鄙无耻的谋臣们使他变成祖国敌人的那个人。”事实上，路易十六暗里阻碍军需品的制造，王后早把作战计划通知了奥国皇帝。但是，人民的爱国热情澎湃。有的人自愿捐献，有的人制造武器，许多人踊跃参加义勇军，全国一致奋起迎击欧洲反动派的进攻。

7月上旬，立法会议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凡是能够拿起武器和参加过国民自卫军的人都动员起来。各地人民组织的义勇军纷纷开赴东北前线。马赛的义勇军高唱《马赛曲》向巴黎汇集。这支歌很快成为一支风行的战歌，激励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

7月26日，指挥普奥联军的普鲁士将军布伦瑞克公爵，以奥皇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他狂妄宣称：联军的意图是结束法国的无政府状态，恢复法国国王的权力，还要惩罚叛乱者。他发出警告：如果国王和王室受到伤害，巴黎必将遭到军事惩罚并且完全毁灭。这个狂妄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法国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国家的野心，对一个伟大的民族使用了胁迫命令和蔑视的词句，激起了法国人民的仇恨，起了加速王位倾覆进程的作用。

布伦瑞克指挥下的普奥联军十四、五万人，于7月下旬分三路发动进攻。他指挥下的中路联军从德意志境内的科布伦次出发，渡过莱茵河，沿摩泽尔河西岸前进，越过法境以后，准备经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进发。右左两翼联军同他配合进攻。

法国人民为前线的形势变化所激动。他们知道局面不利的原因在于宫廷的叛国行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在巴黎人民中间展开了宣传和组织工作。著名政论家和科学家马拉，在他创办的《人民之友报》上，揭露了宫廷的反革命行为，要求拘禁国王和王后。他的宣传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罗伯斯庇尔领导着雅各宾俱乐部，主张解散立法会议，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他还团结了在巴黎的义勇军，组织了秘密指挥部，准备武装起义。巴黎人民纷纷送出请愿书，限期8月9日，要立法会议废除国王。到时候，立法会议没有作出决定。9日夜间，警钟响起来，巴黎人民又起义了。起义者冲向王宫，同军队进行了浴血战斗。8月10日，他们攻占了王宫，国王和他的家属逃往立法会议，后来被囚禁起来。立法会议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国王权力，决定召开国民公会。人民群众推翻了法国君主政体，有力地推进了革命。

这支歌的作者是卢热·德·里列，后来它成了法国国歌。

攻占王宫（1792年8月10日）

8月10日起义胜利以后几天，普奥联军在布伦瑞克公爵统率下侵入法境。不久，他们攻占凡尔登，打开了通往巴黎的大门。刚刚推倒王位的法国人民，斗志昂扬。巴黎的义勇军，一队队开上前线。9月20日，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法国的武装力量，两次打退普军的进攻，迫使他们后退。几天以后，法军反攻。他们把外国干涉者赶出了法国领土，并且打到比利时和德意志境内。瓦尔密的胜利是反击外国干涉者的第一次胜利。法国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挽救了革命。

国民公会开幕，法兰西共和国成立 瓦尔密胜利的第二天，即1792年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代替了立法会议。国民公会由七百五十名代表组成，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讨论了废除王权、实行共和的议题。一位雅各宾派的激进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宫廷是罪恶的制造所，是腐化的策源地，是暴君的巢穴。国王们的历史就是国民受残害的记录。”议案在欢呼中通过，借着火炬的光辉在巴黎向群众宣布。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9月21日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开始的日子，即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纪元。

在国民公会里，吉伦特派的代表约有二百名，坐在会场的右边，构成国民公会的右派。左派代表约有一百名，坐在会场的左上方，因此得到山岳派这个名称，他们也就是历史上通称的雅各宾派。国民公会的多数代表被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开头他们是吉伦特派的支柱。吉伦特派害怕革命的人民威胁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革命到此为止。他们厌恶群众，反对采取暴力手段，虽然拥护共和政体，却又认为它是很难确立和巩固的。山岳派当时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要求进一步推进革命。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卡米尔·德莫林等，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他们在国民公会里虽然只占少数，但是在巴黎很有势力；由于革命态度比较坚决，很能得到下层人民的拥护。他们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通过它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下层群众掌握了巴黎的市区和郊区。

但是，吉伦特派以它在国民公会所占的二百个左右的席位，加上“沼泽派”的支持，不仅控制了国民公会，而且掌握了行政权力。

法国王权已经废除，共和政体已经宣布，那么对于监禁中的废王路易十六又该如何处置呢？这个问题不是路易十六个人命运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审判和惩办他意味着进一步推进革命；免于审判和惩办意味着把革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当权的吉伦特派毫不隐瞒要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雅各宾派认为即使是被废的国王对于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也是危险的。他们顺应民意，坚决要求象对待敌人一样惩治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

1792年11月，在巴黎王宫里发现了一个秘密壁橱，其中藏有处决路易十六的通敌罪证：同外国宫廷和法国亡命徒的往来信件，各种反革命和武装干涉计划，等等。这样，当权的吉伦特派再也无法包庇路易十六了。审判问

1792年10月上旬以前，吉伦特派还包括在雅各宾俱乐部里，10月10日全体退出。在此以后，雅各宾俱乐部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组织。

题决定性地提上了日程。罗伯斯庇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

审判开始于12月间，由国民公会主持。经过激烈的辩论，1793年1月中旬投票表决，国民公会的代表主张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占多数，共三百八十七票。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的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处死。事后，一位国民公会的代表说：“我相信这一行动（指国王受刑）救了共和国并且向我们保证了国民公会的能力。”

推翻吉伦特派 当权的吉伦特派，由于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表示不满而被雅各宾派谴责为人民的敌人；由于企图解救路易十六而被斥为暴君的共谋者。1793年上半年，国内外事件结合起来，很快就摧毁了吉伦特派的权力。

纸币 指券

吉伦特派当政期间，法国财政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792年11月和12月，国库收入仅六千七百万铢，而用费却需三亿六千六百万铢以上。吉伦特派不愿向有产者增税，却采取了大量增发纸币的办法，应付不断增加的支出。纸币的价值不断下跌，日用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不断飞涨。地主和富农把粮食囤集起来，造成了城市的粮荒。这首先打击了工人、手工业者和城乡平民。他们没有钱按上涨的价格购买粮食和其它食品，陷于饥馑状态，在巴黎，有的人每日的工资收入只能买得五磅面包。吉伦特派不肯使有产者分担战争费用。他们的财政经济政策招怨于人民，甚于他们庇护路易十六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巴黎出现了代表平民利益的“忿激派”。它的领导人扎克·鲁愤慨地说：“靠人民的灾难而发财、靠人民的眼泪和破产而进行高利贷盘剥是再大不过的罪恶了。摆脱了暴君桎梏的人民，应该攻击财富贵族的残暴阴谋。”“忿激派”要求实行限价政策，制止物价上涨，要求制裁投机商人，遭到吉伦特派的顽固拒绝。人民生活困苦，骚乱常常发生，1793年2月和3月，巴黎就因粮荒而发生骚动。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开头对限价政策采取否定态度，但是他们确信必须采取措施，缓和平民的困苦状况。

乘瓦尔密胜利而进入比利时和德意志境内的法国军队，被当地人民看作法国革命的代表。他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对茅屋，和平！对宫廷，战争！”在各处受到欢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的执政者为革命在欧洲扩大的威胁而焦急不安。英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各邦利用路易十六被处死为理由，同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在它们后面站着早已同法国断绝关系的俄国。法国的军事形势逆转，已经进入比利时和德意志境内的法国军队相继败退。4月初，前线法军司令官杜木里厄因反革命的政治阴谋失败，公开叛变，投奔奥军。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法国推进。法国孤军几乎对整个反动的欧洲作战，处境艰危。雅各宾派谴责吉伦特派的部长和将军们，怀疑他们串通一气，要把共和国交给敌人。他们希望保卫受到威胁的国土，也希望除掉吉伦特派夺取统治权。他们攻击吉伦特派，要他们承担杜木里厄叛变和前线失利的责任。

物价继续飞涨，社会更加动荡。1793年3月，西部的万第郡及其邻近地区的王党掀起叛乱，造成了火上加油的局面。万第暴乱得到英国的大量金钱和武器的支持，迅速蔓延开来。叛乱份子残害爱国者和革命人士，猖狂一时。万第暴乱震动了许多共和派，他们大批离开不愿采取强硬措施的吉伦特派，日益倾向雅各宾派。这又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倾覆。法国革命又面临一个新危

机。在雅各宾派的鼓动和组织策动下，巴黎人民在 1793 年 5 月底和 6 月初，发动了第三次革命，推翻了吉伦特派，再一次挽救和推进了法国革命。

第四节 革命高潮与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专政的确立 1793年5月到6月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即雅各宾派拥上了统治地位。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升到了高潮阶段。

罗伯斯庇尔

雅各宾派专政的重要机构是公安委员会。这个机构早在1793年4月由国民公会下令组成，顾名思义，它是要以非常的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是在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对立时期出现的，5到6月起义以前，它的成员多属国民公会的中派，但著名的雅各宾派人物丹敦在里面起领导作用。5到6月起义以后，公安委员会几经改组，雅各宾派的代表人物逐渐补充进去。在7月10日的改组中，丹敦由于表现动摇，还力图同吉伦特派言归于好而被清除。在7月下旬的补选中，罗伯斯庇尔进入了公安委员会，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而掌握了领导权。8月和9月，卡尔诺等也进入公安委员会。加上圣鞠斯特和库通等人，公安委员会的大权就完全归于雅各宾派了。

圣鞠斯特

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构就此建立起来，在国民公会的名义下支配一切。它任免高级军官、部长、代表政府的特派员、法官和陪审员，它提出各种措施，它通过特派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它以无上的权威对各郡发号施令。在革命紧急关头，它的成员表现了革命的坚决性和果敢精神；在迫切要求统一和迅速行动的时刻，它那集中的大权的确发生了积极作用。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作为领袖，那就是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革命前在法国北部的阿莱斯城当律师，1789年当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冷静与胆量，敏锐的预见，雄辩的口才，组织的才能，很快为他赢得了声望。他在国民会议中曾经反对宪法里关于“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规定，发出了严厉的质问：“谁授权给你们剥夺人民的权利？”他逐渐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杰出人物，上升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立法会议期间，他通过雅各宾俱乐部参与政治斗争。无论是1792年8月10日起义，或是1793年5到6月的起义，他都起了号召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罗伯斯庇尔是个文雅的人，但是在对敌斗争时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对同时代人发生影响，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并因此而产生的不计生死危险的无畏精神。罗伯斯庇尔生活俭朴，大公无私，清白廉洁，当时人们称赞他是一个“不可收买者”。罗伯斯庇尔代表下层人民讲话，要推动革命继续向前。他因此在下层人民中享有威信而得到支持。他临危受命，同一批斗士结合起来，终于使法兰西共和国渡过难关。

雅各宾派的革命措施 雅各宾派掌握政权的头几个月，法兰西共和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外国干涉者从四面进攻。英国约克公爵指挥下的兵团，在荷兰军队的协同下包围了敦刻尔克。在法国南部，英军占领了土伦港。科堡指挥下的奥地利军队包围北部边界的要塞。布伦瑞克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推向法国的东北边境。西班牙的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领土。国内反革命叛乱还在扩大。许多重要城市如波尔多、马赛、土伦、

里昂落到了叛乱者手里。到6月底，八十三郡中就有六十郡公开背叛国民公会。经济方面困难重重，纸币价值降到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下，资金流向国外，投机活动猖狂，物价不断高涨。在巴黎和各大城市，饥饿威胁着人民，面包店前出现了拥挤的人群。形势表明，要战胜国内外敌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而这就要实行革命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人民的疾苦。为此，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彻底摧毁封建制度，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待完成的任务。国民公会在1793年6、7月作出决定，把没收过来的逃亡的反革命份子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分十年付款，使贫农有可能购买一小块土地；规定各地公共土地按当地居民人数实行分配。接着，它又决定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解除农民负担的封建义务。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封建制度，而且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成了同国内外反革命力量作斗争的支柱。他们懂得为共和国作战，就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作战。

马拉之死

反革命势力猖獗一时。7月13日，一个妇女夏洛特·卡黛，伪装请愿，混进马拉住宅，刺死了马拉。法国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一向把马拉看作自己的代言人，称他为“人民之友”。政治上倾向吉伦特派的夏洛特·卡黛却把他看作“大恶人”。反革命分子还在其他城市暗杀、破坏，在里昂处死了马拉的狂热追随者沙利尔。这一切使主张以恐怖手段镇压敌人的人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根据公安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许多镇压法令，包括《惩治嫌疑犯条例》。许许多多的嫌疑犯被逮捕起来，有的被革命法庭监禁，有的被处死。为了对付欧洲的反动势力，法庭处死了路易十六王后；为了打击吉伦特派，处死了二十多个吉伦特派的代表人物。采取坚决的镇反措施，起了维护革命利益的作用。但是由于嫌疑犯条例很有伸缩性，处分扩大了范围，以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利用惩治嫌疑犯条例任意处分所有的人，利用革命法庭任意处决人命。”许多历史著作因此把雅各宾专政称之为“恐怖统治”。

为了克服经济上的艰苦困难，国民公会下令严惩囤积居奇的商人。公安委员会派人到各地去登记粮食，征发粮食，改善粮食的供应。在人民的压力下，雅各宾派政权实行了限价法令。根据全面限价法规定，各地最必需的商品和日用品的售价，提高价不得超过当地1790年价格的三分之一；粮食、烟、盐、肥皂价格全国一致。这个法令同时限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规定提高数不得超过1790年工资的一半。由于难以按限价来购买日用必需品，限定工资的规定就损害了工人的利益。

加强武装力量对付国内外反革命武装，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国民公会根据公安委员会的建议，8月间通过了全国动员的法案，规定“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第一次征集提供了四十二万人的军队。到1794年初，法国已经有军队六十万人，加上后备队，总兵力达到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内部也实行了改革。那些贵族出身不忠于革命的将领被清洗了，从士兵行伍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指挥官。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劳动人民。例如拉萨尔·何施原来是以赶马车为生的，从士兵升为将军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岁。做过小贩的朱尔丹，开头是个下士，三十一岁时升为北方军总司令。军队装备很差，但是由于认

识自己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作战英勇顽强。1793年9月，法军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洪庶特获胜，开始扭转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0月，北部边境的法军，在瓦提尼战役中击败了武装干涉军；12月，法军收复了南方的土伦军港。经过半年多的苦战，法军肃清了国境内的外国干涉军。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到1793年年底也被平定了。

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措施起了动员人民的作用。人民的力量又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进行。

雅各宾派分裂和热月政变 危急局面地一经消失，雅各宾派内部分裂的局面就公开化和激烈化了。

在革命进程中，丹敦一直是一个风云人物。1792年，外国武装干涉者侵入法国的危急关头，丹敦曾经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公安委员会成立之初，他领导着这个机构。他被排出公安委员会以后，在他周围形成雅各宾派的右翼集团，其中包括卡米尔·德莫林和夫累隆等人。这个集团主张削弱专政，放宽对反革命的镇压，被称为“宽容派”。起初他们攻击雅各宾派的极“左”集团阿贝尔派，后来又攻击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

阿贝尔派由一位能干的新闻记者阿贝尔领导，这一派包括公安委员会委员科罗·得布等人。他们号召无情地惩处敌人。但是在攻击投机分子和包卖商人的时候，他们没有把大批批发商和小商小贩区别开来，主张一律镇压。他们怀有政治野心，企图夺取公安委员会的领导权。罗伯斯庇尔曾经抨击他们的行动是“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动。”

1794年3月，阿贝尔派为夺取政权在巴黎掀起了暴动。公安委员会借此粉碎了阿贝尔派，处死了阿贝尔等人。当时，丹敦派同罗伯斯庇尔的斗争加剧了。不久，罗伯斯庇尔又处死了丹敦和德莫林等人。

雅各宾派因内部分裂和内讧而削弱了。更严重的是雅各宾派政权逐渐地同劳动群众脱离。它推行了限制工资的法令，实施了《列沙白里哀法》，这就剥夺了工人改善生活的可能，侵犯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农村里富农侵占土地，贫农呼吁制止，雅各宾派没有反响。中农又跟着富农一起反对限价和征收粮食。在阿贝尔派被镇压以后，受阿贝尔派影响的城市平民也深感失望。雅各宾派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自然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团结在它的周围。

封闭雅各宾俱乐部

那些在革命时期投机致富的暴发户，渴望终止雅各宾派专政。他们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里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一个反罗伯斯庇尔的集团形成了，其中包括阿贝尔派份子科罗·得布，丹敦派份子夫累隆，国民公会中的代表人物巴拉斯。1794年7月27日，即法国新历热月9日，他们操纵了国民公会，攻击罗伯斯庇尔。他们先打断了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鞠斯特的发言，随后阻止了罗伯斯庇尔发言。罗伯斯庇尔没有依靠人民，坚决回击。当天晚间，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通等人被捕，第二天都被推上断头台。雅各宾派专政终结，热月党统治了法国。

1789—1794年法国革命小结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1793年10月，国民公会颁布了《革命历》，以公历9月22日为一年的开始，一年分为十二月，名次如次：菊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穡月、热月和果月。

五年。革命的发生有它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根源，归结起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求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求得发展。波旁王朝代表封建制度而又不再能够维护封建统治；它成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又绝对不肯自动离开。这次革命如暴风，如骤雨，迅猛异常，摧枯拉朽。革命开始以后，经过了深入和高潮阶段，到雅各宾专政时期，完成了摧毁和根除封建制度、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的任务，使这次革命成为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三个阶段里，人民群众都积极参与，而且一再从危急中把革命挽救过来，进一步推动它向前发展。但是，这次革命终究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是那个历史范畴的任务，衡量法国这次革命的得失，也只能从这个历史范畴里作出结论。其结果固然是一种新的剥削方式代替了旧的剥削方式，但是从封建制度转入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大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经吉伦特派当政，到雅各宾派专政，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达到了历史目的。此后法国历史的发展，是进是退，主要看革命的成果是否能够保持。如果要求法国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似乎是超时代的要求了。

附表：共和二年革命历和公历对照表

第五章 1794—1814 年的法国

第一节 从热月政变到雾月政变

热月党人的反动 热月 9 日政变以后，法国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热月党人取代雅各宾派掌握了法国的统治权，也就是说政权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右翼手里。

热月党人包括国民公会的中间派和右派残余，也包括那些温和的山岳党人。他们中间有西哀耶斯、塔里安、夫累隆、巴拉斯等，代表城乡新兴有产者阶层、银行家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秩序，极力清除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

热月党人处死了公安委员会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通以后，进一步改组公安委员会，排除雅各宾派的成员，由他们取而代之；削弱公安委员会的权力，使它更加从属于国民公会。他们害怕雅各宾俱乐部，指责说：“暴政是在哪里建立起来的？在雅各宾。暴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哪里？在雅各宾。”他们因此纠合资产阶级子弟，组成“金色青年”，向雅各宾俱乐部挑衅，当受到反击的时候，他们就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打开监狱大门，释放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捕的嫌疑犯，下令发还过去嫌疑犯被没收的财产。他们一方面控诉和迫害国民公会里雅各宾的代表；另一方面却决定召回被打倒的国民公会里的原吉伦特派代表，允许逃亡国外的吉伦特派分子回国，并发还他们的财产。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取消了最高限价法。他们取消了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还决定恢复天主教的活动。这都是彻头彻尾的对革命措施的反动。比起雅各宾派专政，热月党人的统治是一个倒退。

取消最高限价法以后，投机倒把又猖狂起来，粮食供应短缺，饥饿又威胁着下层平民。纸币急剧贬值，1795 年春票面价值只等于实际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加上对热月党人反动措施的愤慨，巴黎人民在 1795 年 3 月到 5 月期间两次起义，但都遭到镇压。雅各宾派专政为拯救革命而曾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热月党人为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而对人民群众采取了镇压的措施。

拿破仑·波拿巴 炮轰在巴黎叛乱的保皇党分子（共和四年葡月 13 日）

热月党人的反动，有助于王党势力的抬头。1795 年夏，几千法国流亡分子，由英国装备，乘英国舰只在法国西海岸登陆，妄图恢复封建统治。基贝隆半岛一战，他们被何施将军指挥的共和国军队彻底消灭了。10 月初，王党分子蠢蠢在巴黎举行暴动，约有四万武装人员参加。国民公会起用青年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很快平定了叛乱。热月党人坚决打击王党势力，决不发还已被没收的流亡贵族的财产，这就在根本上同反革命势力划清了界限。他们废除了雅各宾派的许多革命措施，这是他们的反动表现；但是他们没有触动雅各宾派的土地法，维护了共和政体，这又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督政府的统治 1795 年秋，国民公会为法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即“共和国第三年宪法”。由于热月党人需要的是一个由有产者统治的共和国，这部宪法不给穷苦人民选举权，要求公职候选人拥有相当的财产。根据这部宪法规定，立法机关由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组成。元老院议员必须年四十岁以上，

两院每两年改选议员三分之一。由五百人院提名、元老院选定五位督政官，组成行政机关督政府。

1795年10月，国民公会结束，新的立法机关集会，并由它选出了督政官。当选的督政官有贝勒尔、巴拉斯、卡诺等。其中的卡诺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公安委员会的成员，政治清白，从未被控，对共和国的军事胜利起过重大作用，在督政府仍负指挥军事的责任。巴拉斯负责警察部门，是督政府的代表，他随机应变，在道德和生活方面一向声名狼藉。

从1795年10月到1799年11月，督政府统治法国。它软弱、腐败、无能，左右摇摆。投机倒把活动猖狂，纸币不断贬值，物价扶摇直上，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灾难和痛苦加深，社会动荡不安。在巴黎，许多人怀念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岁月，产生了巴贝夫的密谋活动。

诺埃尔—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 - 1797年）是一位勇敢的革命家，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家，探索铲除现实社会邪恶的行动家。1795年，他在巴黎先贤祠建立了俱乐部，许多从前的雅各宾成员参加，这引起了督政府的惊恐，因而在1796年2月被督政府封闭。其后，在巴贝夫的带领下，成立了“秘密公安督政府”，保证要使法国人民“绝对平等，人人都有最大幸福，人人相信这种幸福巩固持久”。巴贝夫宣传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虽然是不科学的，却赢得了巴黎劳动人民的同情。他们的活动以“为了平等的密谋”的活动载入史册。为了建立“共同幸福”，巴贝夫派制定了起义计划，预计在1796年5月起义。起义前夕，打入内部的奸细向督政府告密。起义被扼杀，巴贝夫和其他领导人被捕。一年以后，巴贝夫英勇就义。

督政府扼杀巴贝夫的“密谋”以后，法国政治局面还是动荡不定。督政府在保王党和民主派两大对立力量之间实行见风使舵的政策，以维持它摇摇欲坠的统治；靠对外战争的胜利，掩饰内部的腐败。

巴贝夫

对外战争和拿破仑崛起 热月政变以来，法国对外战争一直处在顺利境地。到1795年末，法国军队已打到了荷兰，比利时、萨伏伊、尼斯都为法国占有，莱茵河西岸的德意志土地也到了法国手里。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都同法国签订了和约，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了。只有奥地利和英国还同法国处在交战状态。英国握有海上霸权，渡海攻击英国，对法国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法国要集中力量打败奥地利。

1796年，督政府派出主要兵力进攻奥地利。法军分为三路：两路分由声名显赫的将军儒尔当和莫罗率领，取道德意志南部，进攻奥地利本土。另一路由名气不大的拿破仑率领，从意大利北部进攻奥地利。它本来是用来牵制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策应前两路法军行动的。但是前两路军队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而拿破仑指挥的这支法军取道阿尔卑斯天险地带，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4月一战打败了意大利撒丁王国的军队，迫使它签订停战协定，把萨伏伊和尼斯割给法国。法军继续前进，连续打败奥军，5月10日进入名城米兰，当地人民把拿破仑当做解放者来欢迎。后来，法军围攻北意的战略要地曼图亚，一再打败奥地利增援部队，并且分兵占领意大利中部

当初当选的有西哀耶斯，由于他坚决不参加，结果由卡诺代替他。

十八世纪早期，奥地利吞并了意大利的许多领土，包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许多地区。

各地。1797年初，法军攻占曼图亚，从意大利进入奥地利本土。取道德意志南部的两路法军在1797年也取得了进展。奥地利被迫同法国签订了和约，答应把比利时割给法国，承认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卫星国——西沙尔平共和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

未完成的拿破仑车像(1798年)

拿破仑从意大利回国的时候，督政府把他当作凯旋归来的英雄来欢迎。在对奥一战中，拿破仑声誉雀起，在法国的众多将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雾月政变 在欢迎拿破仑凯旋归来的大会上，首席督政官巴拉斯致词，对拿破仑表示赞扬和祝贺，敦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雪洗耻辱，恢复尊严，为他一生的功业增光”。当时，只有英国还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中，这次出征目的在于打击英国。为了切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利益，法国准备进攻埃及。这个计划，无论督政府或拿破仑都以为是适宜的。因为从拿破仑在意大利之战的所作所为中，督政府看到他的野心，把一个有野心的将军置于旁边是有危险的。在拿破仑心里，他认为长期无所表现会损害他已经获得的声望，而进行一次新的出征正可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新的声誉。1798年5月，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拿破仑率领一支拥有四百艘舰只的舰队从土伦军港出发，6月间侵占马耳他，7月间侵入埃及亚历山大港。在金字塔附近，法军击溃了埃及军队，侵入开罗，进而占领了上下埃及。但是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指挥的舰队，8月间，在尼罗河口的艾布基尔湾歼灭了法国舰队，切断了埃及法军的援军和补给。埃及人民又纷纷起来反抗侵略者。当时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799年初土耳其派兵途经叙利亚，拿破仑为了先发制人，率军进攻叙利亚。这次进军劳而无功，5月间兵退埃及。就在这时，督政府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危机。

1798—1799年之交，第二次反法同盟成立。英国没有费力就拉拢了奥地利，英国的金钱又把俄国拉进来了。土耳其因为法军入侵埃及，意大利半岛的小国为了消灭法国建立的卫星国，德意志帝国企图收复莱茵河左岸领土一齐加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驻扎意大利的法军轻易地打败了加盟的意大利各小国，但是不久就一再遭到俄奥联军的打击。德意志境内的法军败退到莱茵河左岸。四万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法国本土又有被联军侵入的危险。

由于前线失败和联军入侵危险，督政府被迫实行了一些紧急措施。它起用了一些从前雅各宾的成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向富人发行强制公债，对流亡贵族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实行人质法。大资产阶级感到震动，深恐雅各宾派专政的局面重演。督政府的无能已经有目共睹，它不仅摇摆不定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在这同时，来自保王党的威胁加重了，万第郡又发动了叛乱。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督政府也想依靠军队克服来自左、右两方的攻击，以拥护自己的统治。新当选的督政官西哀耶斯方丈说：“我需要一把剑。”

远在埃及的拿破仑了解到法国的处境，认为攫取法国政权的时机到了。1799年8月，他离开侵占埃及的法军，从亚历山大港出航回国。他在地中海逃过了英国舰队的监视，10月间返抵巴黎。当时法国的军事局面已经有所

1801年8月，侵占埃及法军在英军和土耳其军的夹击下，被迫投降，撤出埃及。

好转，而俄国因为同英、奥闹矛盾退出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是拿破仑夺权的事已经如箭在弦。他一到巴黎，就同西哀耶斯等策动政变。许多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政客如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变色龙达列朗，警察总监富歇，有势力的银行家和交易所老板，都来支持他、资助他。站在背后的还有从前他指挥过的军队。11月9日和10日，即法国新历雾月18日和19日，拿破仑发动了军事政变。他先被元老院任命为巴黎军队的总司令，但是他提出的授权他修改宪法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使用军队，驱散议会两院，然后又纠集一小撮议会代表，通过决议，把政权交给三个执政官：拿破仑、西哀耶斯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罗歇—迪科。拿破仑平步青云，大权在握。

第二节 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从执政官到皇帝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法国政权的时候，刚刚年满三十。他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占有法国的最高权位？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拿破仑·波拿巴 1769 年出生在地中海的科西嘉岛，前一年这个岛才并入法国。他是一个律师的儿子，家境并不富有。早年他进入法国一个炮兵军官学校学习，成绩一般。他作为炮兵军官在部队服役，1793 年接受了雅各宾派的思想。土伦战役中，他部署的炮兵起了重大作用，从而获得声誉，逐渐成为露头的青年将领。1795 年 10 月，他受国民公会之命，协助巴拉斯，迅速平定了王党在巴黎掀起的暴乱。1796 年出征意大利，他又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仅最后迫使奥地利求和，而且从意大利给法国统治者掠夺了亿万财富和无数的艺术珍品。这一战取得的声誉为他日后夺权打开了道路。

拿破仑一向好勇斗狠，又意志坚定、精力过人。他说他童年时，“什么也不怕，什么人也不怕。我打一个人，又抓另一个人，人人都怕我。”他的同伴军官说他“富有才能、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在意大利战场上，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很能激发士兵的战斗精神。他同战士分享甘苦，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和尊敬。他对部队讲话，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有一次他说：“你们没有大炮却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没有桥而渡过了河，没有鞋而进行了强行军，往往没有面包而宿营。”“你们仍然有仗要打，有城市要夺取，有河流要渡过。在你们中有一个人失掉勇气吗？没有。……你们所有的人都抱着一个希望，要扩大法国人民的光荣。……当你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时，你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希望能带着骄傲的口气说：‘我是同在意大利得胜的军队一道的’。”拿破仑怀有野心，在意大利时就自夸说：“我认识到我超人一等，产生了干一番大事的雄心。”

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是得到公认的。1796—1797 年的意大利之战，他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了新的作战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他曾经精心研究过的。当时的科学进步为战争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机动的炮队、精确的作战地图，等等。拿破仑利用了这些条件迅速集中兵力，发动突袭，快速作战。他指挥的法军不是职业雇佣军，而是从法国公民中普遍征集来的，素质好，有战斗激情。他用兵能临机应变，适应形势，掌握大量情况，结合战略上的多才多艺和执行上的精确。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共和国军队在每个战役中集中兵力作战，“拿破仑则在每个战斗中这样做。他把所有军队集中使用，指向有决定性的一点，以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

拿破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在政治上又是一个野心家，以军事起家，又用军事来巩固他的统治。他在法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权。从雾月政变夺权到加冕为帝国皇帝，他一步一步地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

三执政官

(中为拿破仑,右为康巴塞雷斯,左为勒布伦)

1799 年 12 月，法国颁布了新宪法，即共和八年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建立了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执政府。三个执政官分享行政权，但是拿破仑作

为第一执政官，只留给其他两个执政官一点点权力。在立法方面，权力分散：国务院提出法律，保民院讨论法律，立法院表决法律，参议院有权否决法律。以上四院的成员或由第一执政官任命，或经由程序十分复杂的间接选举产生，而这种选举又很易受到执政官的操纵。

作为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还在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权力。1802年，他通过立法机构把他定为终身执政，授权他指定继承人和修改宪法。1804年，他示意参议院拥立他为皇帝。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拿破仑成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巩固了自己的绝对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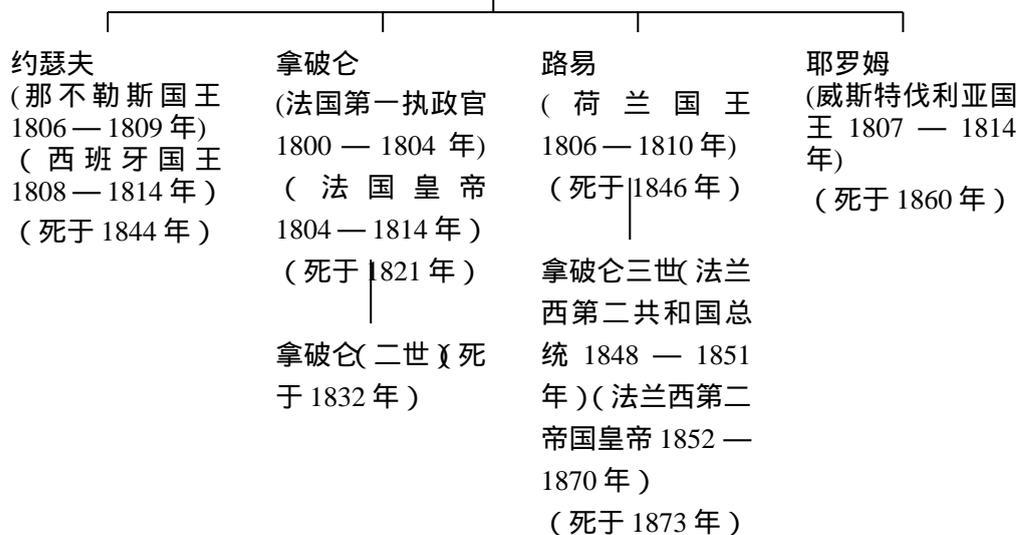
拿破仑加冕见图版(43)

内政 拿破仑掌权的时候，法国的对外战争还在进行。为了整顿内部，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统治，他需要取得一个短暂时期的和平。当时，奥地利的军队又控制了意大利，拿破仑想一战击溃它。1800年5月，他率领四万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直下意大利。在6月中旬的马伦哥会战中，奥军被彻底击溃，造成了法军对意大利的完全占领。第二年1月法奥媾和。以后，参加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国家，相继同法国签订和约。1802年3月，由于英法签订了亚眠和

法军越过圣伯纳德山口（1800年5月）

波拿巴家族

查理·波拿巴



约，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和平局面。

1800年以后几年间，拿破仑政权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了军事独裁制度，但又适应了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社会经济要求，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稳定下来了。

首先，拿破仑政府在重建秩序的名义下，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革命开始以来建立和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被取消了，中央任命的省长和以省长任命的市长和乡镇长代替了民选的地方官员。全国从上到下由集权的行政

根据这部宪法规定，新当选的第一执政官为拿破仑，第二执政官为法学家康巴塞雷斯，第三执政官为过去的大法官勒布伦。

机构严格控制，而行政机构的统治权归根到底又由拿破仑一手总揽。整个国家机器听命于一个人的权力意志，所谓的中央集权实质上变成了个人集权。国家的各级官员和军队的将领都成了一个人的办事僚属，一时得心应手。但是把权力的基础置于一个人的意志上却是十分危险的。此外，拿破仑政权严格控制舆论，1800年查封了许多报刊，只允许听命于它的报刊存在，又建立了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用人方面，拿破仑采取融合政策，对放弃自己主张的派系表示和解态度，从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革命期间被驱逐的人以至从前的雅各宾派都能进入政府，但是拿破仑绝不容任何人的反对。担任警察总监的富歇死心塌地为他防范和镇压反对派。

其次，鉴于天主教的势力在法国根深蒂固，革命以来宗教问题又是社会动乱的一大因素，同时要利用宗教巩固统治，拿破仑改变了雅各宾派的反宗教政策，着手同天主教反抗分子和罗马教皇和解。1801年，他同罗马教皇签订教务专约。按照专约规定，法国政府承认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宗教，教士的薪俸由国家支付；罗马教皇不要求发还革命期间没收的教会土地，并承认法国政府有权监督教士的活动。在这次妥协中，拿破仑坚持了天主教会从属于国家而不从属于罗马教皇的政治原则，但是他要借“神职宪兵”帮助维护统治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白的。在他参与审订的《教义问答》里明确地说：“尊敬和侍奉皇帝就是尊敬和侍奉上帝。”

第三，拿破仑特别要表现他自己是私人利益的保护人和立法者，亲自参与了法典的制订。1804年，法国颁布了《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以后相继颁发了《商法典》和《刑法典》。这些法典排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法规，清除了从前司法上的混乱局面，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它们宣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们的出身和财产如何；它们保障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包括广大农民的小块土地；它们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信教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等。法典的规定远比当时欧洲封建国家的立法进步，但是比革命时期的一些立法却后退了一步。到后来拿破仑为所欲为，以个人的意志代替了法典。

第四，拿破仑深知，统治一个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利。此外，他还想把对外战争的光荣同内部的繁荣结合起来，以炫耀自己的统治。为了取悦农民，他保证他们占有革命期间取得的小块土地。为了取悦资产阶级，他奖励工业发展，扶植长期停滞的对外贸易，平衡预算，实行健全的货币政策，建立关税以保护法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设立法兰西银行作为政府的财务代理人。由于对外战争的掠夺，预算取得了平衡。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发展。除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以外，法国产生了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法国工业革命是从棉纺和毛纺部门开始的，到1812年共有二百多家机械纺纱厂，其中很多是大型的。到1811年，工业生产比1789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拿破仑政权鼓励发展工商业，增加就业机会；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继续实行《列沙白里哀法》，阻止工人结社和罢工。

第五，拿破仑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法国需要有训练的军官带领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官员执行政策法令，需要有技术的人材发展经济。法国的教育体制因公立中学（Lycée）的设立而有所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都受到鼓励。1808年设立了法兰西大学。它一度很象是管理全国教育的机构，为全国学校制订教学计划，并且监督各级学校。

荣誉军团首次授勋

拿破仑政权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完备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说，这是前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拿破仑的内政措施还有明显的倒退的一面。1802年，他建立了荣誉军团，由终身有爵位的人组成，自任军团长。荣誉军团不按出身门第而按军功授勋，这实际上是在建立新的等级制度。拿破仑曾说：“贵族政治总是存在的，在贵族中消灭了它，它会转移到中产阶级的富豪之家。”建立荣誉军团就是开始建立新的贵族阶级。帝国时期，荣誉军团制度发展成为新的世袭帝国贵族，各级文武官员受到不同等级的封爵，从亲王、公爵到伯爵、男爵、骑士。同时，帝国还订立了繁文缛节的宫廷仪式和法规。法国一位历史家说，拿破仑“在以专制制度取代自由之后，又用贵族政治来破坏了平等”。

拿破仑政权的内政措施有进步的成分，其中也反映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有倒退的一面，倒退到某些措施同旧制度相结合。这就是这个政权的两重性。

对外战争 英法的亚眠和约只是一个短期的停战协定，因为英法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争夺霸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英国本来只需要一个短暂的缓兵时机，而拿破仑也没有放弃通过战争胜利扩大个人权势的打算。亚眠和约以后，拿破仑在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扩张领土的行径，给英国造成了决裂的借口。1803年5月，英法绝交，战争再起。1805年，英、俄、奥等国结合起来，组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

法国港口的侵英军事准备（设想图）

这一次，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为此，他在多佛尔海峡法国一边的布伦和加来等港口集中了二千艘船只，十多万兵员，九千匹马和许多大炮。为了引诱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统率的舰队远离欧洲，他派出法国舰队驶向西印度群岛。纳尔逊识破了法国调虎离山的计策，法国舰队回航了。1805年10月，在西班牙西南海岸的特拉法加角，英国舰队歼灭了法国舰队。纳尔逊在这次海战中阵亡，而英国海军取得的这次胜利却使拿破仑入侵英国的计划彻底破产，只好望洋兴叹了。

特拉法加海战见图版(44)

那时候，奥国军队已经进入德意志南部，两支西进的俄国部队准备同奥军会合。拿破仑早已离开布伦，10月初率军十六万渡过莱茵河，到达德意志南部，乌尔姆一战击溃了奥军。这一战的胜利正发生在特拉法加海战的前夕。此后，法军乘胜前进，11月中占领维也纳，12月2日即拿破仑加冕的一周年，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奥联军。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第二天，拿破仑传令嘉奖全军，命令中说：“士兵们，你们以不朽的光辉装饰了你们的军旗。俄皇和奥皇的十万大军，不到四天就被你们切断了或击溃了。”“这样，两个月时间，这个第三次同盟就被打败了，并且崩溃了。”俄军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后撤。奥地利又被迫签订和约，割让了大量土地。

战争的胜利使拿破仑沾沾自喜；国内的阿谀奉承使他飘飘然。对内他日趋反动，对外继续扩张。法国的对外战争此时已经从革命的战争变成了“帝

国主义战争”。1806年，拿破仑驱逐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把他哥哥约瑟夫扶植上去；使荷兰人拥立他弟弟路易为荷兰王国国王；把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十多个邦结合成为莱茵同盟，自称它的保护人；迫使德意志帝国即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撤销称号；又把一些被法国占有的地方强作帝国公爵的封地。这些侵略行为，激使他的敌国继续作战，9月，英、俄、普鲁士、瑞典结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

1805—1807年重大战役

拿破仑和往常一样，以他用兵神速和集中兵力进攻的战术打击同盟国军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同时进行的两个战役中，法军击溃了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不久进入柏林。法军占领普鲁士以后，在波兰同俄军相遇，1807年6月，在孚利德兰战役中击败俄军。到这时，法国军事力量的强盛达到了顶点。

孚利德兰战役以后，俄法开始议和。7月初，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在提尔西特会面。会谈是在普俄交界的涅曼河上一只木筏上举行的。他们签订了提尔西特条约。亚历山大一世承认法国在欧洲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变动，即承认它在中欧和西欧的领导权；拿破仑答应帮助俄国满足它对东欧和土耳其的要求。亚历山大一世还答应成为拿破仑的反英同盟者。俄法结合，妄图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至于普鲁士，在提尔西特条约中，它的领土被割掉了一半。拿破仑把普鲁士割让的易北河以西土地和其他几个德意志小邦合并成威斯特伐里亚王国，派他的弟弟耶罗姆当国王，这个王国加入了莱茵同盟。拿破仑又把从普鲁士手中夺来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让自己的同盟者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

提尔西特会见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崩溃 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以后，拿破仑踌躇满志，权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是法国的皇帝兼任他制造的意大利王国的国王，他是莱茵同盟的保护人和瑞士的仲裁人。他的兄弟几人分任荷兰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威斯特伐里亚王国的国王，而他又是他们的和华沙大公国的宗主。俄国是他的同盟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被他打败，一时不得不听命于他。看来，他在欧洲的强敌就只英国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极盛时期的欧洲形势（1810年）

英法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争霸权，争市场。英国早已对法国实行封锁。法国用武力对付英国已是鞭长莫及，于是改用经济手段，想把英国排出欧洲大陆的贸易关系之外。1806

英法的抢夺（漫画）

（拿破仑刀割欧洲，英国人刀割海洋）年和1807年，拿破仑两次发布命令，宣布封锁英国，绝对禁止同英国人作任何买卖和进行任何交往。如果在法国

参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页。

荷兰国王路易，不听从拿破仑的命令，1810年荷兰并入法国。

和它同盟国领土上发现英国货一概没收。这就是所谓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推行这一政策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诸国之间造成了新矛盾，引起了私人的不满和工商业资本家的责难。它没有起到从经济上掐死英国的作用，却为法兰西帝国造成了困难。英国军舰拦劫法国和中立国的商船，用走私的办法把英国货运到大陆包括法国。

法军枪杀马德里市民(1808.5.3.)见图版(45)

1807年，法国借口经济上依赖英国的葡萄牙拒绝参加大陆封锁，出兵葡萄牙，占领了它。1808年4月，西班牙政变，国王被推翻，他的儿子继位。法国又乘机干涉，出兵侵占了西班牙的许多地方。5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爆发反法起义，各地纷纷掀起反抗侵略者的游击战争，7月间包围了两万法军，迫使他们投降。拿破仑虽然把他哥哥约瑟夫从那不勒斯王国国王的位置上转到西班牙王位上，他自己也曾率领军队去镇压西班牙人民，西班牙人民的反抗烈火却愈烧愈烈。法国统治下各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星火已经燃起来，这又是法兰西帝国的大隐患。

法国军队在法国领土以外作战，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封建制度基础的破坏。在他们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倾覆了，几十个德意志小邦被取消了，从而减轻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割据状态；法军征服的地方，废止了封建农奴制法律，推行了资产阶级的法典，这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开头，拿破仑率军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把他们看作革命军队衷心欢迎。他们相信法军会带来“自由、博爱、平等”，拿破仑也曾经以此为号召。1796年第一次进军意大利，他对意大利人民说：“法国军队是来为你们打破锁链的；法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怀着信心接近它吧，你们的财产、宗教、风俗习惯都会得到尊重。”“我们是作为宽宏大量的敌人而作战的，我们希望消灭奴役你们的暴君们。”事实同言辞相反，拿破仑在被征服地区掠夺财物，送回本国；征发人力、物力，支持他不断发动的战争。他作战的目的本来是为法国在欧洲取得政治上、商业上和工业上的优势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被征服和受压迫人民的反抗。1808年以后，这种反抗在西班牙、葡萄牙起来了，在意大利起来了，在德意志也起来了。欧洲民族主义精神产生于法国革命之中，传播到其他国家，最终导致拿破仑的覆亡。

法俄签订了提尔西特条约，沙皇成了法国皇帝的同盟者。但是法俄之间仍然不断产生利害冲突。拿破仑扩张附庸国华沙大公国的领土，沙皇感到威胁，怕俄国占有的波兰领土会分离出去。俄国谷物一向大量输往英国，从英国输入廉价工业品，大陆封锁政策损害了俄国的利益，拿破仑也怕俄国再同英国结合起来反对法国。为了独自称霸，拿破仑决定进攻俄国。1812年6月，他率领“大军”五十万渡过涅曼河侵入俄国。俄国人坚壁清野，保存实力，回避决战，且战且退。法军统帅部看到远离基地作战很有失败危险，寻求速战速决。法军越东进，供应越困难。拿破仑的一个助手报告说：“看不到居民，抓不到俘虏，拾不到一根蔓藤。我们在俄国居民的心脏地带，但是我们象在大洋上的一条船没有指南针，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9月初，发生在波罗丁诺的一次会战，双方都损失了几万人，但是法军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接近莫斯科了，拿破仑高兴起来，他号召：“前进，让我们打开莫斯科的大门！”法军进城了，那是一座空城。当天夜里，莫斯科起了大火，

拿破仑的妹夫缪拉继约瑟夫为那不勒斯王国国王。

连烧了五天五夜。法军住在有计划破坏的空城里，找不到粮食。俄国不求和，严冬又到了。10月间，拿破仑命令法军西撤，一路遭到俄军的拦阻，人民武装的袭击，加上冻饿，死伤累累，“大军”成了零星残军，退出了俄国。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在报告里写道：“拿破仑率领四十八万军队来，回去的约有二万人，被我们俘虏的至少十五万人，缴获大炮八百五十门。”侵俄战争为法兰西第一帝国敲响了丧钟。

1813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新的反法同盟。拿破仑征集新军应战，但是法军元气大伤，已经难以恢复了。10月间，在德意志境内的来比锡进行一次大决战。对被法国奴役的各国人民说，这是一次“民族之战”。法军在这次决战中败北，法兰西帝国和受它控制的附庸国家开始土崩瓦解。第二年4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意大利西海岸的厄尔巴岛。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回到了法国王位上。

统治法国、叱咤风云十五年的拿破仑，就这样垮了。他虽然把法国革命的思想 and 精神带到欧洲各地，动摇了欧洲的封建统治基础，但是他用专制统治破坏了法国人民在革命中争得的自由，用战争侵犯了各国的独立，激起法国人民的不满，招来了全欧洲的敌意。他一时权倾欧洲，随心所欲，终于众叛亲离，一朝覆亡。他的失败证明，时代已经前进了，专制主义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拿破仑的权势的覆辙就在这里。

“百日”战胜各国代表在奥国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谈判欧洲的分割问题。几个主要国家正为利害冲突相争不已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拿破仑重返法国。事实是，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登陆，北进路上，号召老部下集结起来。路易十八派兵阻截，士兵纷纷倒戈。波旁王朝不得人心的复辟，昔日拿破仑战争的光荣，都对拿破仑的胜利北进提供了帮助。3月20日，拿破仑象凯旋英雄一样进入巴黎，法兰西帝国再生了。作为皇帝，他答应为法国人民建立真正的自由制度，通过真正的选举建立实在的议会。

欧洲诸国再一次结合起来对抗拿破仑。1815年6月中旬，英国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军队和普鲁士布洛克元帅指挥的军队，在布鲁塞尔附近的滑铁卢战场上，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军。拿破仑再次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孤岛圣海伦岛，1821年死在那里。

滑铁卢之战见图版(46)

这就是历史上的“百日”，一个历史的插曲。

第六章 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

第一节 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 1814年春，拿破仑还在军事上作最后挣扎，但是他的立足点已经空虚了。反法同盟联军到达法国境内，直搏巴黎，3月底进入巴黎。

早在3月9日，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签订《夏芒条约》，约定四国结成同盟，为期二十年；同意推翻拿破仑，不许他和他的家族重返法国王位；对欧洲领土的重新安排给予保证。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以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5月30日，法国同同盟国家签订了《巴黎条约》，规定法国本土以其1792年的疆域为界。这个条约还规定交战双方列强派出全权代表到奥国首都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确定安排，以完成本条约的规定。

从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奥国首都冠盖云集。欧洲的王公贵族、高官显宦，怀着各自的目的，赶到维也纳，以庆祝“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这些人有个共同点，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的冲击，他们“什么都没有学到，却什么也没有忘记”。他们忘不了他们的统治权，一心想恢复法国革命以前的政治秩序。他们忘不了寻欢作乐，举行了无尽无休的宴会、舞会。当时的维也纳，“通常豪华的娱乐一应俱全；有些还是很寻常的。花钱象流水一般，仿佛古代传说中的金河冲溃了河岸一样。”有人嘲讽维也纳会议，说了一句令人牢记不忘的话：“会议不是在进行，而是在跳舞。”

维也纳会议

尽管如此，维也纳会议却是一次确定欧洲命运的会议，一次影响十九世纪欧洲局势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很多，但是掌握会议的只是那几个巨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相卡斯尔瑞，奥国外相梅特涅，普鲁士全权代表哈登堡。沙皇以欧洲的救世主自居，但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角色要数梅特涅。梅特涅是一个典型的反动人物，憎恨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仇视革命，轻视人民，把民族主义看作极大的危险。法国虽是战败国，但是它的代表达列朗以其狡诈的外交手段，在会上利用矛盾，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他倡导的“正统主义”原则，正中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心意。因为这个原则意味着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欧洲统治秩序，意味着反对民族民主运动。达列朗代表法国，挤入了英、俄、普、奥的行列，在维也纳会议的决策上起着作用。事实上，重大的决定都是在小型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而由几个大国作出的。

维也纳会议的重大决定 在维也纳，几大国各有自己的扩张野心，因此在重分欧洲领土的问题上矛盾重重，争吵不休。一个参与会议的奥国人说：“亚历山大驾临维也纳以后，就与奥国、英国和法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争执。”最严重的争吵起于萨克森和波兰的领土瓜分问题。俄国同普鲁士达成

文件写的日期为1814年3月1日，有的历史著作指出这个日期是虚构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德意志境内的一个邦，与普鲁士为邻。

谅解，它同意普鲁士争取获得萨克森，而以普鲁士支持它取得华沙大公国为条件。奥国得到英国的支持，反对这种安排。法国站在奥、英一边，利用分裂形势，巩固自己的外交地位。会议在矛盾的激流中拖延。到 1815 年初，几大国由于利害关系结成两个集团：俄普一方对抗英、奥、法一方。后三国还结成秘密同盟。双方的分歧发展到以兵戎相见的地步。最后，俄普后退了。就是在这种争吵声中，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

1815 年的欧洲法国，造成了“百日”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维也纳的争吵。维也纳会议达成了最后协议，条约于 1815 年 6 月 9 日签字。

维也纳会议重新分割了欧洲的领土。按照规定，波兰重被瓜分，十分之九的波兰领土包括首都华沙在内都被俄国占有。此外，俄国还占有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德意志组成邦联，包括三十五个邦和四个自由市。奥地利在邦联里居首席地位，雄踞一旁的有同它争权的普鲁士。邦联内的领土调整，实际是听任普奥宰割。萨克森北部和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奥地利取得意大利的广大地区，重新占有了伦巴底和威尼斯。意大利仍然四分五裂：撒丁王国取得热那亚；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得到恢复；在中部还分为几个小国：托斯卡那、帕尔马和摩地那。这种分裂是按奥地利的意愿造成的，这有利于它对意大利的控制。此外，会议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

同时会议又不顾有关民族的意愿，把比利时同荷兰合并，把挪威同瑞典合并。

至于英国，从加强其海上霸权的目的出发，取得了这些土地：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从法国手里夺得西印度群岛的多哥巴和圣路西亚以及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从荷兰手里取得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和锡兰（斯里兰卡）。

按照会议推行的“正统主义”原则，许多国家被推翻的旧王朝卷土重来。波旁王朝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复辟。萨伏伊王朝在撒丁王国复位，教皇又成为教皇国的首脑，德意志邦联的许多王公恢复了他们的统治，奥伦治王朝再次统治尼德兰。

经过拿破仑的“百日”和滑铁卢的战败，法国只得再同同盟国家签订新的条约——第二次巴黎条约。条约规定，法国的领土以其 1790 年的疆域为界；法国东北的十七个城堡暂由联军占领；它还得赔偿战费七亿法郎，归还掠自各国的艺术品。

维也纳会议的决策者逆时代潮流而动。他们推行“正统主义”原则，一味维护封建君主和贵族的统治权力。他们重划欧洲领土，只顾大国利益，不惜违抗民族主义潮流，践踏民族意识，宰割弱小国家。因此，维也纳会议也是列强的一次分赃会议，它的许多决定为此后的欧洲造成了不安的因素。

神圣同盟和欧洲的反动局面 维也纳会议以后，沙皇俄国一心充当欧洲的宪兵，妄想扑灭革命，扼杀民族运动。1815 年 9 月，亚历山大一世发表宣言，倡议欧洲各国君主建立“神圣同盟”，以保卫君主政体和基督教义。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响应倡议，同沙皇一起首先签署了宣言。他们以“至为神圣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宣布他们维护现状的坚定决心，也就是表示了对任何地方发生的革命都要镇压的反动意志。欧洲大陆的各国君

领土包括庇蒙得和撒丁岛。

主相继签字参加。神圣同盟“是所有欧洲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

1815年11月，英、俄、普、奥又缔结第二次四国同盟条约，相约在二十年里以武力维护巴黎条约和维也纳条约所作的安排，这既包括关于欧洲领土的划分，又包括关于排除拿破仑及其家族重登法国王位的决定。缔约国还同意定期开会，讨论有关的“共同利益”的问题。这就是采用定期会议的办法，维护它们确立的欧洲新秩序，从而把维护“神圣同盟”目的的手段具体化了。

“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控制欧洲局势的机器，一时似乎运转自如。开头，它们注视法国，看它是否不出乱子，是否按期交付赔款。1818年，四国在亚琛开会，对法国的局势表示满意，决定从法国撤出联军。同意法国参加“四国同盟”。会上，沙皇挥舞“神圣同盟”的旗子，要求同盟国家派兵，镇压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英国对拉丁美洲另有自己的打算，反对沙皇的建议。最后，沙皇只好以会议所号召的空泛的“道义的团结”为满足。

四、五年间，欧洲陷于反动局面，各国统治者采用各种措施防止革命发生，防止自由思想传播。在奥地利，不经官方检查，不得印刷任何书刊；政府官员在海关检查外国书籍，以阻塞自由思想越境。在德意志，禁止学生非法结社，实行严厉的书刊检查制，政府派人住在大学监督讲课和学生的活动。甚至在多年有些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严格的政策：1817年停止实行一百多年来沿用的《人身保护法》；1819年颁布《六项法令》，极大地限制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维也纳会议的决策者和“神圣同盟”的头子们采用高压办法，似乎把欧洲的秩序巩固下来了。但是，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接踵而至的革命开始对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猛烈地冲击了。

除教皇和土耳其君主以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第二节 革命新浪潮和神圣同盟瘫痪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维也纳会议以后，“神圣同盟”所造成的欧洲反动局面是短命的。它不仅是荒诞的，而且证明是徒劳的。因为那种局面不仅没有造成各国内部不受扰乱的宁静，相反，从1820年到1848年，几乎在欧洲各地，暴动和革命此伏彼起。

1820年，麻烦首起于西班牙。在那里，复辟的国王斐迪南七世（1814—1833年）停止实行宪法；重新确认封建主的特权；复活宗教裁判所，听任宗教压迫。他还宣布要收拾支离破碎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局面，集合舰队准备载运军队去拉丁美洲，加强力量，镇压那里的独立运动。1820年1月，平地一声春雷，西班牙部队发动了革命，烈火迅速蔓延。革命者要求实行1812年宪法。斐迪南七世慑于革命威力，同意革命要求，宣称自己为立宪君主。

俄国沙皇听到西班牙革命的消息十分惊恐。他知道，如果西班牙革命运动传播开来，各国君主就没有安全可言，而“神圣同盟”也将土崩瓦解。他发出通报，倡议欧洲君主集会，宣告废除西班牙宪法。他声称，压制革命是欧洲列强公认的原则，是作为“神圣同盟”签字国的信条而存在的。沙皇的倡议遭到英国反对。英国外相宣称，英国只承担这样的义务：阻止拿破仑及其家族重返法国王位，维护维也纳会议所作的领土安排，没有责任去干涉别国内政。

恰在同时，意大利半岛上的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都爆发了革命，要求民主，要求宪法。奥国首相梅特涅从维护奥地利控制意大利的目的出发，同意沙皇的倡议。1820年，一次国际会议在特洛包举行。会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现了对革命如痴如狂的仇恨情绪，诱导奥、普共同发出通告，重申三国决不承认人民有权限制他们君主的权力。英国再度表明它的立场，外相在英国议会讲话，表示同特洛包通告“缺乏共同的认识”。同盟国家之间的裂痕扩大了。而奥地利为了控制意大利，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于1821年悍然出兵意大利，镇压了那里的革命，稳住了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的统治，也稳住了奥地利对意大利人民的奴役地位。

1822年秋冬，另一次国际会议在维罗纳召开。议程上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本来是希腊的独立革命问题，但是会议开幕之前，西班牙的形势更紧张了，以致会议把注意力集中到西班牙革命问题上。会上，法国征询与会列强是否同意它派军队进入西班牙。英国反对武装干涉，阻止了同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去干涉西班牙。1823年，法国采取单独行动，派兵到西班牙，恢复了西班牙国王的反动统治，取消了西班牙宪法。

“神圣同盟”虽然镇压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运动，凶相毕露，但是它本身也露出了破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希腊民族起义 就在奥地利军队镇压意大利革命的时候，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素丹的民族起义。四百年的外族统治，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但是，希腊人民始终保持民族特点，为争取独立长期战斗不息。

从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希腊资产阶级基本上以航海和商业起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他们的民族觉悟也提高了。

在德意志境内。

在意大利北部。

希腊这块欧洲文化的发祥地，自从马其顿王南侵以来一直命运多舛，先处在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后又遭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人们怀念古希腊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着希腊“文艺复兴”的思想，渴望重振古希腊的声势，恢复希腊的独立。希腊杰出的诗人和革命家利加斯（1757—17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革命活动和启蒙运动。希腊爱国志士在各地纷纷成立秘密团体，酝酿起义。1821年3月，他们在摩里亚半岛（即伯罗奔尼撒）点燃起义烈火，迅速波及整个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成千上万农民拿起棍棒、镰刀，纷纷加入游击队。他们摧毁土耳其地主的庄园，杀死土耳其政权的代表人物。1822年，他们召开议会，制订宪法，成立政府，宣布希腊独立。

开奥斯岛屠杀见图版(47)

土耳其素丹政府对希腊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实行残酷屠杀。例如土耳其军在开奥斯岛的暴行骇人听闻。全岛十万居民幸免于难的不到二千人，其余的不是被屠杀，就是被卖为奴隶。反动的“神圣同盟”还斥责希腊人民的民族起义是反对“合法君主”的叛乱。梅特涅甚至提议进行干涉，帮助土耳其素丹。

但是，各国人民对于外国统治下的希腊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其光辉的《哀希腊》的诗篇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感情：一方面哀叹希腊人民遭受外国压迫，一方面期待他们象古代希腊人反击波斯侵略那样奋起战斗：

也好，置身在奴隶民族里，
尽管荣誉都已在沦丧中，
至少，一个爱国志士的忧思，
还使我作歌时感到脸红；
因为，诗人在这儿有什么能为？
为希腊人含羞，对希腊国落泪。

* * *

我们难道只能对好日子哭泣
和惭愧？—我们的祖先却流血。
大地呵！把斯巴达人的遗骨
从你的怀抱里送回来一些！
哪怕给我们三百勇士的三个，

让温泉关英勇的决死战复活。而今，希腊人民起来战斗了。拜伦亲身投入，并且献出了生命。

欧洲列强怎样对待希腊民族起义，一时成为欧洲的一个问题。“神圣同盟”各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英国外相坎宁刻画说：“各国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它们由于利害冲突，意见分歧，各行其是，顾不得维护“神圣同盟”镇压革命和民族运动的信条了。

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下，希腊人民几经苦斗，于1829年赢得了独立。这一结果直接打击了“神圣同盟”，大大削弱了它。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沙皇俄国在国外充当“欧洲的宪兵”，在国内加强反动的农奴制，强化专制统治。但是，沙皇政府阻止不了封建制度

译诗转引自《唐璜》第三章第二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个别词作了改动。温泉关决死战故事见本书《古代希腊》一章希波战争目。

解体的进程，扼杀不了进步思想的发展。从反法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国内并不平静，反农奴制运动开始出现高潮，从 1816 年到 1820 年，发生了领地农民骚动八十多起。1816 年以后的十年间，军队中发生了十五次兵变。俄国先进人士进一步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腐朽，认清了专制农奴制度是俄国发展的障碍。

俄国革命家要求变革。由于俄国经济发展缓慢，资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弱，在革命最初阶段，一部分有教养的贵族先进分子起了带头作用。最早起来斗争的是一批青年军官。他们曾经出国作战，亲眼看到德国声势浩大的解放运动，法国尖锐的政治斗争，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惊人变化。他们在国外读到各种政治书刊，深受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热切地要求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活动。1821 年，一些军官在乌克兰建立了“南方协会”，领导人是佩斯捷尔（1793—1826 年），提出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解放农奴并无偿地给予他们土地等要求。1822 年，在彼得堡成立了“北方协会”，领导人是军官尼·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律耶夫（1795—1826 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废除农奴制度，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这些组织在各地组织分会，吸收会员，相机起义。

十二月党人起义见图版(48)

1825 年 12 月 1 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死去。他没有直接继承人，皇室为决定人选使皇位中断半月之久，最后决定由亚历山大的一个兄弟尼古拉为继承人。北方协会决定利用统治集团发生混乱的机会举事，拟于 12 月 26 日把倾向革命的军队集中到参议院广场，一方面表示拒绝对尼古拉宣誓效忠，一方面迫使参议院发布文告，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制宪会议。到时候，士兵迟迟才集中到广场上。起义开始了，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尼古拉一世却抓紧时间调来首都卫戍部队，采用大炮轰击，把这次反对沙皇制度的公开起义镇压在血泊中。起义者死伤几百人，又有许多人被捕。

半月以后，“南方协会”在乌克兰发动的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这次起义首先发生在十二月，所以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运动。由于俄国的革命条件还未成熟和贵族革命家的脱离群众，起义没有成功。但是它唤起了更多的人起来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统治。从国际上看，它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整个欧洲反对反动君主制度革命运动的一个环节。

沙皇俄国是“神圣同盟”的支柱，貌似强大，实际上不过是银样镗枪头。

法国“七月革命”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一度实行白色恐怖，杀戮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活动家；广泛进行政治迫害，有近十万人被认为有政治危险而被革除了国家职务。亡命归来的贵族和教士，妄图恢复革命期间丧失的政治特权和财产，猖狂一时。

国王路易十八（1814—1824 年），就个人倾向说，宁愿做一个专权的统治者。但是他敏感，深知完全恢复旧制度是不实际的。他在 1814 年颁布的宪章里，一方面说：“法国的权力掌握于国王”，另一方面又把立法权授予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议会。面对当时形势，复辟王朝不得不肯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变化，包括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及拿破仑法典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所实行的关于所有制性质和财产分配方面的主要变革，复辟王朝不得不承认下来。那些已经转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地产，仍归新主所有。法国统治权操在贵族和教士手里，但是

法国的经济仍然在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1820年以后，法国复辟王朝慑于西班牙的革命运动，政治上更趋反动。极端王党分子，在路易十八兄弟阿都瓦伯爵周围，形成极右反动集团，恨不得一朝就恢复到1789年以前的局面。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阿都瓦伯爵即位，称查理十世（1824—1830年）。从此以后，贵族和教士组成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狂。查理十世公然任命天主教教士管理国家教育。他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拨付十亿法郎以补偿归国的亡命贵族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这项法律使农民惊恐；又由于筹集这笔补偿金，把国债利息从百分之五降为百分之三，直接触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对于议会，如不听他摆布，他就任意解散它。他还任命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波林雅克为首相，推行反动政策。对外，复辟王朝开始侵略北非的阿尔及利亚，1830年侵占阿尔及尔城。

为了同贵族和教士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一些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秘密集团烧炭党就准备起义，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波林雅克组阁，全国哗然。处于秘密状态的烧炭党支部和共和派团体都活跃起来。1830年3月，众议院对波林雅克内阁表示不信任，被查理十世解散。夏天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结果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君主立宪派击败了政府派，形势更加紧张。

《自由引导人民》（名画）（在“光荣的三天”里，圣安东区的克·莱辛姑娘奋勇争先，在街垒上高兴三色旗）见图版（50）

查理十世顽固到底，决定镇压反对派。7月25日，他发布几项命令，宣布解散新选举的众议院，重新选举；减少议员人数，重定选举资格，以限制和取消工商业企业主的选举权；对报刊实行检查制度，以扼杀反对派舆论。7月26日晚间，巴黎人民在街头同警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街头示威发展成武装起义。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群起构筑街垒，圣安东郊区和其他工人区的街垒特别多。在“光荣的三天”（7月27日至29日）里，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在巴黎圣母院顶上升起了红旗。军队后来拒绝向起义者开枪。查理十世见大势已去，逃往英国。以巴黎人民特别是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要动力的“七月革命”胜利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

由于工人缺乏组织、共和派软弱无力，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决定把王冠授予奥尔良家族—波旁王朝旁系的路易·菲利浦公爵。新国王代表金融贵族（即工商业和银行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被称为“钱袋子”的国王。经过“七月革命”，资产阶级君主制在法国确立起来了。

法国“七月革命”在欧洲掀起了一阵风暴，横过比利时、意大利半岛、德意志和波兰。其中只有比利时取得了成果，达到了同荷兰脱离而独立的目的。“神圣同盟”国家中的俄奥很想干涉，但是自顾不暇了。比利时的独立，首先突破了维也纳条约的决定，打开了一个缺口。1815年以来，“神圣同盟”代表反动势力，力图阻挡当时的两股潮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它逆时代潮流而进，终于力不从心。它瘫痪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第七章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帝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在三百多年的统治中，宗主国所关心的只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和压榨殖民地人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强盗行为和抢劫是西班牙寻运者在美洲的唯一目的”。

为了紧紧控制住它在美洲的属地，西班牙设立了庞大的殖民机构。1524年建立起来的“印度等地最高理事院”逐渐成为处理美洲殖民地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凡殖民地所发生的事情，最后必须由它裁决。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西班牙先后把它的美洲殖民地划分为四个总督区，它们是新西班牙（包括今之墨西哥和中美大部）、秘鲁（即今之秘鲁和智利）、新格兰那达（包括今之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拉普拉他（包括今之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此外还设立了五个自治都督府。正是通过这一套复杂而又重叠的机构，马德里政府才牢牢地把广大的殖民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教会在殖民统治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宗主国在美洲的重要支柱。殖民者刚一踏上美洲的土地，教会也就接踵而来。它的势力深入各地，并且和殖民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镇压和剥削殖民地人民。从1569年起，宗教裁判所便在各地建立起来，对稍有反抗的居民都施以酷刑，甚至活活烧死。教会在一些地方权力很大，俨然是国中之国。十九世纪初，墨西哥教会拥有的财产占全国不动产的二分之一，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教会势力的过份膨胀甚至引起西班牙当局的不安，导致某些矛盾和冲突，但是共同的利益却又驱使它们狼狈为奸，一致维护残酷的殖民制度。

殖民者首先垂涎的是美洲广阔的沃土。他们在“监护制”的名义下把大片印第安人的土地夺为己有，并迫使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为自己无偿地进行劳动。西班牙国王随意把土地分授给殖民地的贵族、将军和冒险家，而这些“监护者”又自然成为土地的绝对主人。这种办法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分封制”、“授地制”没有什么两样。授地的规模是惊人的，在农业区最少为二千五百英亩，在牧业区最少为四千四百英亩。

西属殖民地金矿井里的印第安人

（此图原出自1590年出版的一本书，从纵断面反映印第安人挖金沙的情景）

恩格斯说：“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西班牙殖民者确曾到处疯狂地寻找所谓“黄金国”。为了开采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他们驱使大批印第安人到矿山去做苦工（在墨西哥为成年人的百分之四十，在秘鲁则为百分之十四）。尽管这种叫“米他”的苦役表面上有一些限制，如一年规定为四个月，但由于劳动极为繁重，造成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据记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7卷，俄文版第100页。

设立都督府以后，委内瑞拉和智利分别从各自所在的总督区划出，成为都督府。其他三个都督府是危地马拉、古巴和波多黎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页。

载，在墨西哥和秘鲁矿井的周围终年躺满着印第安人的尸体，而殖民者却榨得了大量财富。仅以秘鲁为例；那里的矿井在三百年间为宗主国提供的金银便值二十五亿比索。

殖民者还想尽一切办法来盘剥印第安人。如在秘鲁，每个十八到五十岁的男子都必须向国王交纳五到八比索的所谓年贡。但这只是字面上的规定，实际上却经常向不满十八岁和超过五十岁的男人勒索贡税，即使残废者也不能例外，到最后连妇女都无法幸免。又如在厄瓜多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少年均被列入纳税者的行列，但由于印第安人不识字，又不会保留收据，所以往往被迫重新纳税。与此同时，殖民当局还把印第安人并不需要的商品如眼镜等强行推销给他们，以牟取暴利。

宗主国千方百计地限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竟然规定凡它已有的产品便不准在殖民地再进行生产。如在新西班牙便严禁种植橄榄、葡萄、大麻、亚麻等作物，从 1679 年起，连养蚕也被禁止，并把所有的桑树都砍光。迷恋于重商主义的西班牙，希望通过对殖民地的贸易，为自己累积尽可能多的财富，顽固地推行垄断和限制的政策。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各地区之间是禁止有任何商业上的来往的。至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则通过“双船队制”来进行，即每年从西班牙港口塞维利亚派出由商船和战舰混合编成的两支船队，分别驶向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大陆，在指定的港口（维拉克鲁斯、卡塔黑纳和贝里欧）进行贸易，然后再返回西班牙。这种办法既不灵活，效率又低，如秘鲁总督区的商品要由船队先运到巴拿马城，然后再用骡队转运到贝里欧和停泊在那里的宗主国船队进行贸易。庞大的船队在海面上来往旷日持久，还要冒被海盗袭击的风险，在经济上极不合算。但是“双船队制”作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经济上的唯一纽带，竟然维持了两百多年。

殖民者疯狂屠杀土著居民，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早在拉斯卡萨斯的记述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幅可怕的残杀情景：“...小西班牙岛是基督教徒最先踏上的一个岛屿，在这里开始了消灭和屠杀...基督教徒起初是毁灭和蹂躏，尔后则开始掳掠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基督教徒用自己的战马和剑矛在印第安人中间进行血腥屠杀，表现出极端残酷。”大规模的屠杀很快使西印度群岛上的居民几乎绝迹，这种现象接着在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有人估计在西班牙人入侵后十二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便被屠杀了好几百万。虽然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目击者和历史学家都确认，印第安人到处锐减，并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补充劳动力，又从非洲输入黑人供他们驱使。1502 年，第一批黑人来到了西印度群岛，以后源源不断，很快分布到整个西属美洲。三百多年间，被贩运来的黑人奴隶，最低限度也有一千万人。黑人作为奴隶，到处遭到残酷的剥削和虐待，如在基多，规定黑人奴隶第一次逃跑时抽打一百鞭，第二次逃跑时切断右脚的两个脚趾，第三次逃跑时则处死刑。在智利也宣布黑奴在第一次“犯罪”时鞭打两百下，而在第二次“犯罪”时割去一只脚。强迫成千上万黑人远离故乡移到美洲大陆的历史充满着血和泪的故事，也是殖民者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拉斯卡萨斯（LasCasas）（1474—1566 年），西班牙教士，曾多次到美洲，于 1516 年受西班牙王室委派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他同情印第安人，在许多著作中揭露了殖民者的残暴和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

即海地岛。

巴西黑人奴隶在钻石矿场洗矿

辽阔的巴西曾遭到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争夺，但是最终还是落到了葡萄牙的手里。葡萄牙在巴西的统治和西属美洲有许多类似之处。总督全权代表国王，总督府下设十三个都督区。在掠夺土地方面则推行和“监护制”相仿的“领主制”，所不同的只是领主一般均系葡萄牙贵族，因而拥有更大的权力。葡萄牙对殖民地同样实施限制的政策，如曾三次下令在巴西禁止盐的开采和买卖，结果盐的价格在巴西要比在宗主国贵上二十五倍。甚至到 1785 年，葡萄牙还禁止在殖民地从事一切工业活动。输入黑人，在巴西具有更大的规模，自 1600 到 1750 年就从非洲运入了三百三十万人。通过剥削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劳动，葡萄牙殖民者掠夺了大量财富，单单黄金从 1700 年至 1801 年就开采得一千吨；而从 1500 年至 1822 年巴西向欧洲输出的商品总值竟达五亿三千六百多万英镑。没落的葡萄牙正是靠巴西输血才得以苟延残喘的。

在漫长而又黑暗的殖民统治岁月中，被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智利的阿劳坎人前后反抗了二百七十年，始终没有屈服过。他们曾迫使殖民者在头一百三十年就损兵折将达四万人，耗资几千万比索。从 1633 年到 1695 年，巴西的黑人聚集在丛林中，建立了巴尔梅尔斯共和国，坚持斗争达六十二年之久。他们组成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和殖民者血战到底，最后全都壮烈牺牲。

独立战争前的殖民地社会 尽管宗主国采取了种种限制和掠夺的政策，但在三个多世纪中殖民地的经济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到十八世纪末，这种变化的迹象到处都可以看到。

墨西哥的白银早就驰名于世，秘鲁的白银和水银生产也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在拉普拉他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还在十七世纪初就向外输出肉类和皮革了。即使是一向落后的古巴在十八世纪末也有了很大的起色，榨糖厂增加到了四百七十八家，糖的生产开始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巴西发展了采金业和畜牧业，质量优良的巴西木材一直畅销国外。十九世纪初，巴西还出现了制铁、纺织和制革等各种工业。此外，拉丁美洲各地普遍发展了棉花、咖啡、烟草、可可的生产。这些产品有不少是运往欧洲的。这就使拉丁美洲的经济和世界市场发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转移，拉丁美洲社会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开发美洲的过程中共同努力，相互融合，逐渐形成拉丁美洲的各个民族。

据比较可靠的估计，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在 1800 年约为一千四百多万。社会的最上层是“半岛人”，他们直接来自宗主国，一般不在殖民地作长期停留，却都身居要职。尽管这些“半岛人”为数不过三十多万，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权都操在他们的手里。

其次就是三百万的土生白人，也叫克利奥尔人。他们均系西班牙人的后裔，一般都是地主或中下级的官吏。土生白人和劳动人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又都受到“半岛人”的歧视，要跻身到社会的最上层去是很困难的。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被任命为总督和都督的七百五十四人中，只有四名总督、十四名都督是克利奥尔人，其余七百三十六名都是半岛人。克利奥尔人对自

巴尔梅尔斯来自葡萄牙文 palma，意为棕榈树。

己的政治地位很不满意，其中的一部分人便积极要求改变现状。

再下面便是庞大的混血人种集团，他们约有五百多万人。其中有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叫墨斯提左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后裔叫穆拉托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后裔叫桑保人。他们构成了社会上的广大劳动群众如手工业者、小贩、自由牧民等。由于都深受殖民制度的压榨，混血人种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支骨干力量。

尽管殖民者推行人种灭绝政策，但印第安人在独立战争前仍占整个殖民地人口的一半左右。黑人人数不多，主要散布在西印度群岛、中美和南美的沿海地区。他们和印第安人构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在未来的独立战争中并肩战斗，起了最积极的作用。

我们在巴西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1808年时，巴西的人口估计为二百万至四百万之间，其中三分之一为黑人，五分之二为混血人种，白人为数不多，而白人中的地主、贵族更是绝对少数。

除了社会最上层的一小撮反动份子外，其他阶层的人都越来越感受到和宗主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在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日俱增，到十八世纪末，“我们是美洲人”的说法已在殖民地广泛流行。

随着欧洲大国争霸的日趋激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势便江河日下，美洲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象巨浪一样冲击着腐朽的殖民统治。1780—1781年在秘鲁爆发了由图帕克·阿马鲁所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六万名印第安人所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古城库斯科附近大败西班牙政府军，他们响亮的口号是“不独立，毋宁死”。印加子孙的胜利唤醒了被压迫的人民，震撼了美洲大陆。只是在集中大量正规军后，殖民政府才把起义镇压在血泊中。

1781年，新格兰那达的市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斗争。就是在沉寂多年的巴西，1789年也在米纳斯吉拉斯成立了密谋社，为首的是巴西解放的先驱者——牙医师若泽·达席尔瓦·沙维尔。尽管密谋失败了，但“拔牙者”的誓言——“假如我们都愿意，那末就能够使巴西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却始终鼓舞着巴西人民的斗志。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大陆，拉丁美洲独立的先行者米兰达，为了使西属美洲殖民地摆脱殖民枷锁，也在风尘仆仆，奔走于欧洲大国的宫廷。弗兰西斯科·米兰达（1750—1816年）出身于委内瑞拉的一个有钱的土生白人家庭，曾在西班牙军中服役，升到上校。1781年，他出任古巴都督的副官，后因同分立主义者交往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指控，先后逃到美国和欧洲。他想借外国力量达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的目的，先把希望寄托在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和法国革命的身上，然后又求助于英国庇特内阁。1806年，米兰达试图在委内瑞拉登陆没有成功，然而这一举动却预告着西属美洲殖民地更大风暴的来临。

海地革命——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 最早起来反对欧洲殖民统治并取得成功的是英雄的海地人民。

海地岛于1492年为哥伦布发现，随即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697年，海地岛的西部转归法国所有，东部仍属于西班牙。法国人称这个岛为圣多明各，西班牙人仍称它为小西班牙。海地后来便成为法国海外最富庶的殖民地。

根据印第安古语，“海地”（Haiti）意为多山的地方。

独立革命前的海地岛，白人只有四万左右，其中又分为大白人和小白人。前者一般都是大奴隶主、大商人大工场场主，盘踞在社会的最上层；后者大半是小奴隶主、小商人、律师和小手工业者。两者之间固然也有矛盾，但在维护奴隶制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其次是三万名左右的穆拉托人。他们在经济上很有势力，然而在政治上却受到歧视，所以也有变革的要求。最底层的五十万黑人奴隶一向受到最残酷的压迫，他们每隔五年到十年就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或暴动，并组成名叫“马隆”的游击队在深山中长期坚持斗争，以致殖民者不得不哀叹自己“简直是在火药桶上走路”。

杜桑·卢维杜尔

1791年8月22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海地的黑人终于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最初的局面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美英政府公开支持殖民当局，西班牙也乘机插手，企图混水摸鱼；另一方面法国的立法会议，甚至国民公会都对黑人的斗争抱着冷淡以至敌视的态度。面临重重困难，起义队伍屡遭挫折。但在杜桑·卢维杜尔（1746—1803年）的领导下，他们顽强地坚持斗争，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赶走西班牙殖民者，接着又在1798年10月迫使英国撤走它全部的侵略军。到这时候，忙于欧洲战争的法国无法再进行干预，杜桑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整个海地岛的局势。

1801年，杜桑把西班牙人从海地岛的东部清除了出去，解放了整个岛屿。紧接着杜桑利用短暂的喘息时间，制定了宪法，大力发展经济，使某些农作物的生产接近革命前的水平。

海地人民的胜利，使法国大资产阶级特别是17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拿破仑大为恐慌。拿破仑久已梦想以海地为跳板，建立一个美洲帝国，现在看到黑人起义打乱了他的计划，恼羞成怒，悍然在1802年派出两万多人的远征军前去海地“平乱”。

原以为能够轻易取胜的法国侵略军很快就碰了壁。在阿尔蒂尼波特河畔，黑人浴血奋战了二十多天，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侵略军伤亡惨重。但黑人由于缺乏武器和弹药，也不得不撤出许多战略要地。到最后，侵略者竟运用诡计，借谈判的机会逮捕了杜桑·卢维杜尔，并把他押送法国。1803年4月7日，这位海地人民的杰出领袖英勇牺牲在法国狱中。

杜桑·卢维杜尔的被捕和牺牲激起了海地人民更大的反抗。全体黑人手执武器，奋起保卫祖国。他们由杜桑的战友戴沙林等统率，继续顽强战斗，挫败法国侵略军。1802年底，侵略者只得龟缩到几个大城市中去，并且在1803年底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1804年1月1日，海地正式宣布独立。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诞生了。海地革命的胜利为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它动摇了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揭开了伟大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1810—1815） 1808年法国拿破仑派出法军，越过比利牛斯山，侵入西班牙，到1810年，西班牙本土大都被法国占领。宗主国政权陷于瘫痪，有利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酝酿已久，遇此时机就一发而不可阻止了。1810年北起

马隆是法文 Marron 的音译，意为逃入森林的黑人。

1844年，岛的东部独立，称多米尼加共和国。

墨西哥，南到阿根廷，到处树起独立大旗，拉丁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战争有三个中心，即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拉普拉他地区。按其情况，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10年到1815年是第一阶段，各地相继独立而又相继挫败。从1816年到1826年是第二阶段，独立战争日益向高潮发展，而且取得了胜利。

1810年9月16日，在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偏远村落多洛雷斯，几千名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发出了“独立万岁！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的怒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它掀起了声势浩大、最具有人民性质的墨西哥独立战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四十七岁的教士伊达尔哥。从1803年起，这位熟读法国启蒙著作的教士便开始主管多洛雷斯教区。他不顾宗教裁判所的威胁和迫害，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军官和教士，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组织，终于从多洛雷斯开始了墨西哥人民漫长的斗争道路。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和混血人，踊跃加入起义行列。起义队伍迅速壮大，不久就达到八万人。

起义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伊达尔哥颁布了法令，宣布解放奴隶，禁止奴隶贸易，取消人头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起义军占领了瓜达拉哈拉，伊达尔哥在那里组织了自己的政府，并宣布把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但是起义军坐失了攻占墨西哥城的良好时机，并在1811年初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接着内部发生分裂，这又加速了失败的到来。伊达尔哥本人在1811年3月被擒，英勇就义。兽性大发的西班牙殖民者竟陆续绞死了三百多名起义军战士。

继承伊达尔哥革命事业的是另一位贫苦的教士莫雷洛斯。他以墨西哥的南方为活动的中心，并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来打击敌人。到1811年底，莫雷洛斯的起义军已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迫使殖民军退守几个大城市。起义军没收顽固派的地产，再把它均分给贫苦的农民；还在1813年9月14日召开的“美洲最高国民会议”上宣布取消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并广开对外贸易。11月6日，大会又庄严通过了“墨西哥主权和独立宣言”。殖民政府惊慌失措，调集大批军队加紧镇压。莫雷洛斯坚持苦斗到1815年，最后失败，并为墨西哥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多洛雷斯教区的神甫 伊达尔哥

在拉普拉他，最闭塞的上秘鲁走在运动的最前面。1809年，在拉巴斯爆发了起义，成立了革命政府。殖民者利用起义者内部的矛盾把它镇压下去。领导起义的穆里略在临刑前大声宣布：“谁也扑灭不了我点燃的火炬”。拉巴斯烈士用鲜血点燃的火炬很快就在拉普拉他引起了熊熊大火。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会议驱逐了拉普拉他总督，把政权拿到了自己的手里。在那一天，市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上街游行，把克利奥尔人的领导人物马里亚诺·莫雷诺等进步人士选入新建的洪他。洪他积极活动，对手工业和商业采取奖励措施，出版报纸，开办学校。革命的影响扩大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拉普拉他整个地区独立运动的中心。

由于洪他内部不久就发生了分裂，莫雷诺被迫出使英国，死于途中。由

即后来的玻利维亚。

洪他是西班牙文 gunta 的音译，意思是委员会或联合会。

于拉普拉他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企图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种力量之间很快就开始了冲突，几个地区各自为战。巴拉圭于1811年宣告独立，走上了一条完全独特的发展道路。乌拉圭人民在阿提加斯的领导下于1811年举行起义，接着又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巴西的葡萄牙政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过长期斗争才在1828年最终赢得了独立。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兵上秘鲁的多次尝试都告失败，所以迟至1816年，才在图库曼召开的国民议会上最终宣告“拉普拉他联合省”的独立。

西蒙·玻利瓦尔

南美北部的独立运动是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以及整个南美的解放战争都是和玻利瓦尔的名字分不开的。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出生在加拉加斯一个克利奥尔人大地主家庭，从小就深受启蒙主义的熏陶。后来他又漫游欧洲，足迹遍及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当时，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正经历着深刻的改革，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是欧洲各民族的觉醒。深受这些历史事件影响的玻利瓦尔于1807年回到自己的祖国，立即投身到解放运动中去。1810年，玻利瓦尔受秘密革命组织的委派到英国进行活动。当时，米兰达正在英国，玻利瓦尔热烈邀请他一同返回了委内瑞拉。

1810年4月18日，加拉加斯人民推翻了殖民政府，组成革命洪他。接着在米兰达的直接领导下，又在1811年成立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但由于没有发动草原上的牧民，再加上1812年加拉加斯的强烈地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委内瑞拉共和国遭到失败的打击。

百折不挠的玻利瓦尔退守新格兰那达，在得到一定的支援后又越过丛山进入委内瑞拉。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终于诞生了。但是玻利瓦尔并没有能巩固自己的基地，得到增援的殖民军迫使他放弃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又被扼杀。

到了1815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瓦解，乌云在整个欧洲上空翻滚。回到西班牙王位的斐迪南七世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决定用刺刀在美洲重建殖民秩序。为此他增派出一支多达万余人的政府军前往西属美洲。他们横行在新格兰那达、委内瑞拉，到处散布死亡和恐怖。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殖民军还是占领了波哥大和加拉加斯，到这时候除海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少数地区外，拉丁美洲各地的独立斗争都遭受挫折，殖民统治的阴影又笼罩了整个拉丁美洲。

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的第二阶段(1816—1826年) 1815年后，西属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些年代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

玻利瓦尔在失败后流亡牙买加。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从挫折中他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尽管前途曲折，但殖民者终究是可以被打败的。在著名的《牙买加来信》中，他预言万恶的殖民统治必然崩溃，在广阔的美洲大陆上将出现许多繁荣昌盛的共和国。接着他又避难到海地，受到了更为热情的接待，取得独立黑人的慷慨援助。海地为斗争中的拉美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它名义上包括前拉普拉他总督区的所有地区，实际上巴拉圭、乌拉圭和上秘鲁没有参加。1826年，“拉普拉他联合省”改组为阿根廷联邦共和国。

1816年12月，玻利瓦尔带着一批勇士在委内瑞拉重新登陆，他随即宣布解放奴隶。接着玻利瓦尔在奥里诺科河畔建立起军事基地，并扩建了自己的队伍。他知道加拉加斯驻有重兵，便决定先进军新格兰那达，然后再完成解放祖国的大业。1819年6月，他亲率两千五百名战士翻越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那是一次艰苦的进军。为了避免同山间的西班牙殖民军的岗哨发生接触，他们选择了最难走的羊肠小道。很多战士习惯于平原上的奔驰，缺乏爬山经验，一登上空气稀薄的高山就头晕目眩，不少人坠入万丈山谷，还有许多死于饥寒。玻利瓦尔排除万难，坚持前进，终于把安第斯山抛在背后。1819年8月初，他的军队同西班牙殖民军在波耶加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取得了胜利，然后挥师直捣波哥大，一举加以占领。1819年12月，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玻利瓦尔被选为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和最高统帅。

1821年初，玻利瓦尔利用西班牙国内发生革命的有利局势并经过充分的准备，再次越过安第斯山，进兵委内瑞拉的北部。在卡拉博博平原，他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了殖民军，乘胜解放加拉加斯。

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玻利瓦尔又命令自己年青的助手苏克雷将军分兵进击厄瓜多尔。1822年5月22日，起义军在皮钦查战役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迎来了厄瓜多尔全境的解放。

就在玻利瓦尔连年征战的时候，圣马丁在南美南部接连获胜的捷报也频频传来。对西班牙殖民军实行南北夹攻，最后一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何塞·圣马丁（1778—1850年）对南美的解放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出生在乌拉圭河畔，父亲是西班牙官吏，七岁时随家迁西班牙，后来成为一名军官，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抗击过拿破仑的军队。由于接触到来自南美的爱国志士，他早就向往南美的解放事业，遂于1812年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多次战役中，他显示出自己的军事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远大的眼光，认识到南美各地区在解放斗争中是休戚相关的。于是他摆脱了内部的纷争到西部库约省去积蓄力量，为解放智利作准备。

圣马丁的行动受到了人民的热切支持。山区的居民很贫困，却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他，许多黑人都加入了他的队伍。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圣马丁终于组成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

圣马丁

1817年初，圣马丁带着他的远征军（其中三分之一是黑人）开始了翻越安第斯山的壮举。勇士们踏着皑皑白雪，冒着严寒，经过几星期的艰苦行军，终于如神兵自天而降出现在智利平原上，在圣地亚哥附近屡败西班牙殖民军。1818年4月5日在沃依金斯为首的爱国军的协助下，他们在迈普大败殖民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18年智利宣告独立。

圣马丁在进军智利以前就制定好了直捣殖民者老巢——秘鲁的计划。1820年8月，圣马丁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率军从智利经海上前往秘鲁。北上军队顺利登陆，占领秘鲁总督区首府利马。1821年7月，秘鲁独立，圣马丁被授予共和国“保护者”的称号。但是圣马丁前面还有两万多名武装

1830年又分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之南。

得很好的殖民军尚待消灭。他认识到，要从动荡的拉普拉他取得更多的援助是不可能的，只有和在南美北部胜利进军的玻利瓦尔联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最终解放敌人顽强据守的秘鲁。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会合见图版(49)

1822年7月下旬，南美独立战争的两雄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终于在瓜亚基尔港会面了。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它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因此谈些什么只得由人们去猜测。会晤后圣马丁写信给玻利瓦尔说：“我已经作出决定。我已经请求秘鲁第一届国会在下月20日开会，在开幕的次日我将乘船去智利。我确信我的在场会成为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进入秘鲁的唯一障碍。对我来说，在美洲的自由赖他而获得的一位将军的号令之下打完独立战争，将是最大的愉快。……”后来圣马丁如他所说的那样，离开了秘鲁，最后隐居到欧洲。他这种以独立大局为重、激流勇退的精神受到了后人的称赞。

圣马丁隐退以后，完成全部解放秘鲁的任务落到玻利瓦尔肩上了。1823年9月，他率领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军六千人进入秘鲁境内。他们同阿根廷和智利军四千人联合起来，于1824年8月6日在胡宁平原一举击溃敌人。同年12月9日，在阿亚库巧展开了“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玻利瓦尔的战友苏克雷以少胜多，大败秘鲁总督属下的九千名政府军，俘虏了秘鲁总督、四个元帅、十个将军和二千名官兵。秘鲁获得解放。苏克雷接着进军上秘鲁。1825年上秘鲁独立。为了纪念玻利瓦尔，改名玻利维亚。

1815年后，墨西哥的局势保持了相对的平静，但人数不等的游击队一直活跃在各地，“土地和自由”的口号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1820年西班牙发生革命，墨西哥政局出现了生机。掌握兵权的伊都维德将军乘机出来活动，提出“宗教、联合和独立”的口号，在1821年宣布了墨西哥的独立。伊都维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竟乘宣布独立之际发动政变，自称奥古斯丁一世，把墨西哥改为帝国。这个短命的伊都维德王朝只维持到1823年，便被人民推翻了。1824年墨西哥共和国终于宣告成立。

在墨西哥革命的影响下，中美洲也在1821年宣布独立，并在1823年成立“中美联合省”。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国旗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黯然下降。

三百多年的黑暗统治结束了，西属美洲大陆殖民地取得独立，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巴西脱离葡萄牙 和西属美洲殖民地不一样，巴西没有经历长期的流血战争，但是它取得的独立同样是人民艰苦斗争的结果。

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后，摄政王若奥带领整个王室连同他母亲国王玛利一世，在英国海军护送下仓皇逃到了巴西。为了缓和巴西人民和葡萄牙统治之间的矛盾，若奥不得不放宽对外贸易；取消对采矿和工业活动的限制；1815年又宣布成立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在名义上把巴西置于与葡萄牙同等的地位。他还企图用对外扩张的办法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第二年公然进犯乌拉圭。

1816年，若奥成为“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的国王，称若奥六世。由于对外贸易萎缩，加上侵犯乌拉圭战争引起的新的经济困难，巴西的状况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72页。

1838年又分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

益恶化，人民对葡萄牙王室的统治更加不满。1817年3月6日，在北部的伯南布哥省，爆发了巴西独立斗争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起义。人民振臂奋起，高呼“独立万岁”、“自由万岁”的口号，并且纷纷武装起来，在三天内控制了整个伯南布哥省。起义者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许多黑人奴隶得到解放，参加了起义军。在重重围困的情况下，起义军坚守阵地，抗击万余敌人达七十六天之久。伯南布哥省的起义说明独立的浪潮势不可当。

1820年8月，葡萄牙本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消息传来，巴西局势顿时沸腾，独立情绪弥漫全国。甚至反动地主、教会及殖民地官吏也不愿受葡萄牙议会的统治。1821年，若奥六世返回葡萄牙，把王子彼得罗留在巴西摄政。为了把巴西抓在王室手里。若奥临行前对彼得罗说：“如果巴西走自己的路，与其让它随许多冒险家，不如让它随你。”

若奥六世离开以后整个巴西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遍及全国，不少地方成立了革命洪他。另外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又尖锐起来，新成立的葡萄牙议会企图剥夺殖民地已经得到的各种权利，并且把巴西划为许多独立的将军辖区以加强控制。迫于这种情势，彼得罗遂在1822年9月7日宣布巴西为帝国，脱离葡萄牙而独立。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说，这样的独立只意味着换了一个主人。但是，巴西毕竟自此摆脱了葡萄牙三百年来殖民统治。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伟大意义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在比欧洲还要大得多的辽阔土地上进行的，从海地开始前后持续了三十六年，席卷了整个大陆，在美洲以及在人类的历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独立战争摧毁了殖民统治，新独立的国家摆脱了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这就为它们以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开放了对外贸易，取消了对工农业的限制，不少地方还宣布解放奴隶，统一赋税，归还印第安人被剥夺的土地。这些措施有利于新独立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

打碎了殖民枷锁，拉美各国就取得了和世界其它国家平等往来的权利。这样的情况对拉丁美洲，对整个世界的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由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大都出身于上层克利奥尔人的家庭，他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和被压迫的印第安人以及黑人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所以独立战争在改善人民处境，进行社会改革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落后的封建势力得以在拉丁美洲长期保留下来，加上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涉，拉美各国还得继续从根本上挖除贫穷落后的根子。

第八章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期，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扩展到欧洲大陆、北美和世界许多国家。“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这个革命开始是生产技术上的革新。但是，它终于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状况，工业革命则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在工业化国家里，城市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勃兴，财富神话般地在资产阶级手里增长。那里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造成了“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历史进程说明，工业化是近代文明和富强的基础，而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劳动人民的天堂。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成熟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因为它首先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条件。十八世纪中期，世界上唯有它拥有那些条件。

英国资本家若干年来通过对内对外的剥削集中了大量的资本。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政府常常向资本家借债，十八世纪中期国债达到一亿镑以上。国债利息高，政府付息还本都靠税收。税收取自人民，通过政府之手大都落到资本家手里了。在国外，英国在十六世纪打败了西班牙，十七世纪打败了荷兰，十八世纪中期最后打败了法国，掌握了海上霸权，成了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它对遍布世界的广大殖民地血腥的掠夺，举例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1757—1766 年间，仅在印度孟加拉一地的敲榨所得就达六百万镑；1757—1815 年间，在印度掠夺的财富多达十亿英镑。同时，英国利用它的海上霸权建立了世界贸易市场。十八世纪，它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六倍，给它带来了大量的利润。在这中间，英国殖民者从贩卖黑人奴隶的肮脏交易中又得到了大量的金钱。形形色色的掠夺手段，使财富源源不绝地汇集伦敦。资本的积累一年多一年，给发展工业提供充足的资本。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权以后，英国的圈地运动加速进行起来。议会以法令使圈地合法化。十八世纪下半期，自耕农在英国完全消灭了。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是沦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工，或是流浪到国外，绝大多数流入城市，做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当时，英国人口急剧增长。1730 年，大不列颠岛的人口总计六百万，1851 年增加到二千一百万。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人手，为工业品提供了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增大了提高生产的压力。英国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给发展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

英国本土具有相当的煤铁资源，这是当时发展工业需要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英国的地理有利于开凿运河，不列颠岛上的任何地区距海和距可以通航的河流都不超过九十公里。从 1750 年开始，那里掀起了兴建运河的热潮，四十年间，运河纵横，沟通了主要河流，通过水上运输，可以把原料运送到各个地区。便宜而又有效的运输，也为发展工业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此外，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的供求关系很紧张，要求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提供充足的商品。

工业生产的革命已经是迫在眼前的需要，而英国又具备了这方面的前提条件。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开展起来了。

珍妮纺织机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它的成就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开始的。早在 1733 年，英格兰中部兰开夏的一个工匠凯伊发明了飞梭。这个小部件借助于一条特别的绳索带动织梭，代替了双手交替抛梭的劳动，大大加快了织布的速度。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感到棉纱荒。据当时人记载：“一个织工早上走三、四公里路，跑五六家纺户，收买到的纱只够他当天其余时间织布用。这种事是很普通的。”就在这样的需求之下，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纱机，叫做“珍妮机”。“珍妮机”同时可以纺十几根纱，提高了纺纱效率。但是它纺出的纱不够结实，又要用人力转动机器。1769 年，钟表匠出身的理查·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它借用水力推动，生产的纱质量也较好。后来，经过赛米尔·克隆普顿的继续改进，综合了上

述纺纱机的优点，造出了功效很好的“骡机”。纺纱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织布技术的改进。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牧师爱德蒙·卡特莱特设计出第一台动力织机，它每天的产量相当于四十个手工织工织出的布匹。接着，棉纺织工业中还相继发明了一系列成龙配套的机器，毛纺和麻纺工业也开始机械化了。

机器相继发明，动力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用水力推动机器运转是一个进步，但是工厂只能建在河边，很受限制。十八世纪初，英国已经使用蒸汽泵在煤矿里排水，但是那种机械消耗的热能多而功率低。六十年代初，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制造工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钻研改进蒸汽泵的技术，吸收前人和当时人的经验，结合他们的成果，经过一再改进，终于在八十年代制成改良蒸汽机。这种蒸汽机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能的关系问题，是第一个把热能转化为有效率的机械运动的装置。1785年，改良蒸汽机首先用来带动纺纱机。后来随着机器的扩展，它推广应用到其它需要动力的机器中去了。布尔顿—瓦特合股公司制造蒸汽机，在1800年之前总计达五百台，有的销到英国以外。蒸汽动力先用于机器生产，接着用于交通运输，打下了工业革命的基础。有人强调它的重要作用，说人类从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瓦特

机器的发明、使用和推广，影响到冶金、采煤和交通运输。从前英国用木炭炼铁，十八世纪中期，木材资源枯竭，铁的产量低落。但是制造机器又增加了铁的需要量。在这种条件下，英国改进和推广了用煤炼铁的方法。冶金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进了采煤业。为了运送煤铁和其他物资，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也不能满足要求了。交通运输的继续改进又提上了日程。

上述状况逐渐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从前的手工生产慢慢为机器生产所代替，作坊和手工工场慢慢为使用机器的工场所排挤。1771年，阿克莱特建立第一座水力纺纱厂。1788年，这种水力纺纱厂就有一百四十二座了。九十年代初，使用动力织机的工厂开始兴建。工厂资本雄厚，生产效率高，对手工业生产起了摧毁作用。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经济地理开始发生变化。以前，东南地区人口稠密，手工业发达。从工业革命开始，英格兰中部和北部成了新兴工业区，大量劳动者向那里汇集，新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物浦崛起。整个兰开夏成了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英国忙于对法作战，但仍保持了工业革命的势头，对外贸易增长了三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铁路的兴建，工业革命受到新的推动。

工业革命的进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1764年英国加工棉花三百八十万磅，1789年激增到三千二百万磅。铁的产量1800年为二十五万吨，1850年激增到二百万吨。煤的产量1800年突破一千万吨，1816年到1856年，从一千六百万吨激增至六千五百万吨。机器制造业发展到借助机器来制造机器。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纺织、冶金、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1850年前后，英国的生铁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半数；它的棉纺织业雇用了四五十万工人，整个纺织业雇工超过百万人，纺织品行销世界各地，成了英国工业发达的标志之一。

英国的工业发展，结合它的海上霸权，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又奠定了它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原料产地、市场、海上交通都抓在它手里。世界海洋运

输吨位的百分之六十都是英国的；从 1834 年到 1847 年，在英国港口卸载的吨位从六百万吨增加到一千四百万吨。这生动地说明，英国的繁荣又是多么依赖于海外贸易。在金融方面，1815 年以后，伦敦已经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银行的中心；1819 年以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欧洲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1850 年左右，英国不仅胜利地成为“世界的工厂”，而且是世界范围的船主、商人和银行家。

1851 年夏天，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海德公园里，建造了一座玻璃大厦，里面陈列了一万三千多件展品。从 5 月到 10 月，有六百万人参观了博览会。这次博览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将近百年以来欧洲的工业收获。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扩展

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的扩展 工业生产技术上的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英国由于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但是这个进程不会局限于英国，很快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展了。

西欧的法国本是大陆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重新当权的贵族和教士推行反动政策，却无法使历史潮流逆转。法国的经济依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着。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继续进行。1830年革命以后掌权的“七月王朝”，以路易·菲力浦为首，建立了金融贵族即工商业和银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统治。“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同英国一样，工业革命开始于轻纺工业。1831年加工的棉花为二千八百万公斤，1845年增加到六千四百万公斤。在那以后的一、二年间，动力织机达到一万台，纱锭一百七十万支。用氯漂白棉布的技术，织造复杂图样的织布机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法国缺乏煤铁资源，1815年，它的煤产量比起1789年的产量没有显著的增加，1847年才达到五百万吨，铁的产量近六十万吨。四十年代，法国也掀起了建筑铁路的热潮，但它的煤铁一部分需从英国进口。1846年左右，产业工人受雇于大工业的刚达百万。他们拥挤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工业区：亚尔萨斯、诺曼底和北部的纺织工业区，洛林和卢瓦尔河流域的冶金工业区，里昂周围的丝织工业中心。法国的工业多半还是小企业。在生产服装和奢侈品的巴黎，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主雇用十个人以上的工人。

同欧洲大陆各国相较，比利时的工业革命的进展是首屈一指的。在拿破仑和荷兰统治时期，它的工业都在高速度发展。1830年即它争得独立的那一年，煤产量就达到六百万吨，多过法国。列日是比利时的冶金中心。比利时的机器销行荷兰、德意志和俄国。比利时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成为西欧商业货物的集散地。英国一个考察团在报告中说到比利时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按领土大小和人口多少的比例说，比利时的的发展，超过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

德意志联邦政治上四分五裂，统治阶级推行反动政策，都严重地影响它的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德意志一些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显著加快了。在莱茵河上兴起了科隆、爱北菲特、巴门等工业城市。在萨克森，纺织工业发展很快。普鲁士所辖的西里西亚，有大量工人从事亚麻布的生产。德意志象比利时一样，富有煤矿资源。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煤矿和铁矿，有利于这些地区工业的发展。1815年以后，这些地区矿藏开始加速采掘。到1846年，仅普鲁士的煤产量就有三百二十万吨。在莱茵区，克虏伯等工厂兴建起来了。在工业技术方面，德意志的农业化学占有突出地位，对于煤的有价值的副产品的利用，也首先闯出了路子。

马拉收割机（1862年）

在工业革命最早扩展所及的国家中，美国的资源和地理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1790年，美国人仿照英国的式样建立了第一座纺纱厂，二十五年以后，美国的纱锭合计有十三万支。1814年，波士顿一个商人和一个机械工人合作建立了第一座织布厂，使用新的动力织机是经他们改进的。工厂在美国发展很快，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从纺织工业发展到其他各种工业，遍及东北部各

州。1816年，在匹兹堡建立了炼铁厂和轧铁厂，冶金工业兴起来了。1860年，美国的铁产量近百万吨，匹兹堡成为著名的冶金中心。1820年以后，采煤工业开始发展，1860年的产量已经达到一千四百万吨以上。185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并且早已由入超国家变为出超国家。在工业革命同时，大量人口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进而向密西西比河以西迁移。虽然人口有很大的增长，加上外国移民的涌入，人口总数从1800年的五百余万增至1850年的二千三百多万，但是劳动力仍感不足。这就促使许多经济部门加紧技术改造，采用机器。十八世纪末，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天为原棉脱籽的工作量相当于五十个人用手脱籽的工作量。轧棉机的发明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有利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而且使美国南部新兴植棉业兴旺起来。惠特尼在康涅狄格州创立了武器工厂，他在那里试制步枪的标准部件成功，为大量生产机器部件开创了先例，打下了基础。有人说，大量制造标准部件是近代工厂制度的开端。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发明了很多机器，如造纸机、缝纫机、制鞋机、轮转印刷机等等。1834年，马克科尔米克发明收割机以后，美国相继创制了许多农业机械。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展出的农业机器模型，数量最多。发明机器和广泛使用机器以补劳力的不足，是美国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特点。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北大西洋世界组成一个经济体。那里，英国为首。1850年以后，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都处在工业起飞的进程中，使英国日益敏锐地感到它们的竞争压力。至于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工业革命进展很慢，其完成有待于统一之后。东欧的俄国和亚洲的日本，到十九世纪晚期才真正纳入工业革命的轨道。

交通运输的革新 工业革命的势头，不仅表现在向一国之外的工业领域扩展，而且同交通运输、农业互相促进。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欧和北美的道路很差，往往不过是长年累月人们践踏出来的便道罢了。雨天泥泞，晴天尘积，到处是车沟、马迹，坎坷不平。载客的驿车一天行车百里，就算不是不错的速度了。载运货物多靠马匹，运输能力很受限制。由于工业发展需要便宜而又便捷的交通，十八世纪晚期，英国除了大量开凿运河之外，又在改进陆路。私人集资修筑大道。沿途设栅征税，因此称为税道（turnpike）。苏格兰人约翰·马卡丹设计了新的筑路方法，用碎石铺路，路中偏高，便于排水，路面平坦光滑。这种路因此取其最初设计人的姓，简称马路。至于运河，由来已久。从1775年到1850年，欧美修运河风行一时。在英国，河流和运河构成水网，1790年左右，经由河道可以到达英格兰的各个地区。运河便利了运输，又带来了大量利润。例如英国牛津运河，在三十多年里每年为投资者提供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在美国，1817年开凿伊利运河，沟通了五大湖和哈得孙河。这条运河给纽约提供了一条通达五大湖的水道，便利了它同中西部的商业交往，促进了它的迅速兴起。伊利运河的成功，掀起了美国开凿运河的热潮。

《克莱蒙号》在航行中

快帆船

在欧美修建运河的热潮中，汽船发明了。一种发明常常是许多人对同一问题独立钻研和试验的结果，汽船的出现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末，有好几个

发明家试验用蒸汽动力推动船只航行,但是到 1807 年美国富尔敦试制的汽船才获得真正成功。他的《克莱蒙号》汽船,用蒸汽机推动船两侧的明轮破浪前进。这条船第一次试航,由纽约至阿尔巴尼,溯哈得孙河而上,三十二小时航行二百四十八公里。从它试航成功以后,汽船成了内河的便利交通工具,许多城市之间都有定期航班汽船往来。《克莱蒙号》试航之后的十二年,美国轮船《萨凡那》横渡大西洋,航行二十九天,帆和蒸汽机并用。1838 年,美国的《大西号》轮船,单用蒸汽机推动,横渡大西洋,只用了十五天。1840 年,一个苏格兰人在大西洋上开办定期轮船航班,运送旅客,来往于英国的利物浦和美国的波士顿之间。由于推进器的功效不高,耗煤量大,燃料往往占去舱位的一半,很不经济,因此轮船还不能排除海洋上的帆船。1850 年左右,螺旋桨代替了明轮,钢铁船壳开始代替木结构的船壳,水上交通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大西号》轮船

陆路交通的决定性的变化,起于铁路的兴建。十七世纪,英国铺设木轨,从矿场运送矿产到河边码头。十八世纪晚期,铁轨代替木轨。但是仍然是用马在轨道上拉车。也有人试验在道旁设置牵引机械,用缆绳拉车行进。蒸汽机在工厂使用以后,英国有人试制蒸汽机车。1814 年,一个矿工的儿子乔治·史蒂芬孙(1781—1848 年),经过长期钻研,制成了蒸汽机车。1825 年,从达林顿到斯托克顿的铁路通车,史蒂芬孙驾驶他设计的蒸汽机车,拖带三十四节小车厢试行。1830 年,在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线上,正式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史蒂芬孙的《火箭号》机车创造了每小时二十九公里的速度。火车载运旅客速度快,费用省,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兴建铁路的热潮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勃起。1848—1850 年,不列颠已建铁路六千多公里,法国二千公里,德意志三千公里,五十年代,铁

运煤的木轨道(十八世纪、英国)

史蒂芬孙和他的“火箭号”机车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显示了筑路技术。在美国,铁路更有大发展。1869 年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成。1870 年,全世界铁路长度已经超过二十万公里,发展如此迅速是大出当初倡导者的意料的。

铁路的兴建对煤铁工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铁路本身需要迅速沟通沿线情况,这又直接推动了传递信息方法的改进。十八世纪,科学家们经常论及用电传递信息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制成传导工具。1833 年,两个德国教授才在一千码的长度内建立了有线电讯联系。不久,美国人莫尔斯成功的制出了电报机,1844 年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建立了有线电报,开辟了电讯途径。1851 年在英吉利海峡敷设了海底电缆,沟通了英法间的电讯交通。在大西洋底敷设电缆,沟通欧美,几经挫折,也终于在 1866 年办成。

世界大小依旧。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改进,人们的交往频繁了便利了,而世界也似乎缩小了。

明轮又称蹊轮(paddle-wheel),借它开动的船称为轮船。后来改用螺旋桨代替明轮。有的书说在五十三分钟内行驶了十二公里,详见《西方文明史》,英文版第 527 页。

工业革命与农业技术革新 1770—1870年这一百年间，工业与农业在欧美并肩进行变革。工业革命造成了城市的迅速成长和对粮食与原料的大量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农业得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工业革命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农具和运送农产品的便捷手段，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农场与工厂在一系列变革中结合起来造成了近代物质文明。

欧洲农业一向落后，中世纪的农业耕作制度如三圃制一直保持不变。十七八世纪，荷兰人首先改进耕作方法，英国人起而继之。十八世纪初，英国人发明了条播机，废弃了撒播方法；还提倡使用马拉耕耘机，粉碎田垅间的土壤。作物轮作是耕作方法上另一个革命性的发展，那是在一块土地上每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几年重复一次，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那里种植同样的作物。轮种有助于保持土壤的肥力，采用轮种法就不必每三年休耕一块土地了。十八世纪，英国人试验在科学的基础上饲养牲畜。为了鼓励科学种田，1793年英国设置了农业局。

欧洲的农具还是古老的农具，以犁说，使用的还是木犁。这种犁只是尖上有点铁，不能深耕，直到十八世纪末，铁犁才代替木犁。比起我国战国时代使用的铁犁铧来，木犁就落后了二千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欧美的农具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收割机器首先出现在英国，但是最省力的农业机器是美国的发明。马克科尔米克发明了收割机。这个人既是个巧匠又具有深刻的洞察力。1847年，他在芝加哥创办农机厂，他相信芝加哥将成为谷物产区的中心。他在那里制造了多种农业机器，奠定了农业机器这一大工业的基础。至于打谷机本是英国人创始，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从英国输入，经过仿制改进，成了重要的农业机器。农业机器的发明、使用和推广，给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创立了必要条件。

农业机器是节省农业劳动力的手段，提高产量除了改进耕作方法以外，还需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休耕和轮种只起到保持土壤肥力的作用，采用肥料才是新的突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意志的化学家来比宣传有机化学在农业上的应用。他指出，植物的生长依靠三种基本元素，即氮、磷、钾，土壤中的这些基本元素要靠肥料来补充。这就从科学上说明了施肥的道理。为了提高产量，自然肥料不够使用，化学肥料成了农业的一大支柱。

第三节 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技术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影响到人们经济地位的改变，是社会关系上的革命。

新兴的工厂使用机器生产。建厂房，买机器，需要大量资本。工厂大量生产商品，雇工人，买原料，又需大量投资。从这个意义说，近代工厂是资本的产物，资本家就是这样占有生产资料的。在工厂制度下，工人进行生产。他们受雇于资本家，凭出卖劳力而取得工资，没有资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者。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处境相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同，作为一个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主要的和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根子在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英国煤矿中的女工和童工（1842年前）

在工厂制度下，生产上的分工比工场手工业时期更细致，更专门。工人们分别在生产过程中一个小环节上工作，生产一个小部件，或者仅在一个小部件上加工，因此只掌握那一部分技术，而且工作单调。工人们操纵机器，却往往又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家常常因此大量雇用童工、女工，排挤成年男工，加重剥削。工人在政治上不同于奴隶和农奴，人身是自由的，但是在经济上仍处在依附地位，资本家可以雇他，又可以使他失业，劳动权没有保障，而又仰仗着受雇来生活。

饥饿不饱的童工见图版(51)

工人的苦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劳动的时间长，往往一日十多小时；工资低，常常不能养家活口，在饥饿线上挣扎；工作条件差：厂房空气污浊，人多拥挤，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伤亡事故；生活环境恶劣：大量的人聚集在贫民窟里，肮脏、拥挤、嘈杂，病疫流行，秩序混乱。

当然，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经过生活的磨练又成了一个勇于斗争的阶级，为了生存不能不进行斗争。起初，工人认为机器的使用是他们痛苦的根源。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初，工人常常捣毁机器。据传这是英国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卢德首先发动的。因此，捣毁机器的斗争被称为卢德运动。曼彻斯特、里兹等工业城市都发生过卢德运动，十九世纪初特别炽热。1812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以死刑来威胁卢德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并不能把工人斗争的烈火扑灭下去。

法国罢工工人

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为了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八世纪晚期就组织了工会。但是，工会组织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在英国，企业主运用他们对议会的影响，使议会通过法案，禁止所谓的“工人非法结社”。1800年，议会通过的最后一个这类的法案，规定对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结社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禁。法国的《列沙白里哀法》也禁止工人结社。由于工人坚持不懈，在英国，1824年工人终于迫使议会废止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法案。此后，他们继续斗争，迫使统治阶级通过了许多改善工人境遇的“工厂立法”。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给无产阶级造成的苦难作辩护。

例如英国一位教士出身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把贫穷归咎于人口的增长。他在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里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 2, 4, 8, 16, ...）增长的，粮食是按算术级数（1, 2, 3, 4, 5, ...）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虽有天灾人祸都不足以阻止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强调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而在于企图说明人类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这无异说，无产阶级的贫困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另一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虽然同亚当·斯密一样坚持劳动价值论，阐明了交换价值规律，但是他也认为工人的贫困无可避免。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里，李嘉图说，劳动力也象其他商品一样，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多则便宜，少则昂贵。他认为人口象马尔萨斯预见地那样在增长，这意味着工资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到工人仅足糊口的最低的水平。如果工资增加，工人将生更多的孩子；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量，又会迫使工资再降低。这就是他所谓的“铁的工资法则”。有所谓的“铁的工资法则”，等于说无产阶级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结果也是徒劳的。

资产阶级尽管说教，无产阶级还是走自己的路，而且一天天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他们的斗争也将从自发的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

工业资产阶级崛起 工业革命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影响在于它把财富和力量赋予了企业主和工业家。1815 年左右，他们在英国、法国、尼德兰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中的新兴一代，正在发展壮大取代资产阶级旧世家的地位。他们反对政府为农业利益而加于工商业上的限制，要求取消过时的法令，特别要求取得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权利。结果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成为十九世纪中期欧洲要求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这在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反映得十分明显。

英国议会

经过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英国成为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家，但是远非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议会说，它的产生和组成都不民主。议会的上院议员都是主教和世袭贵族，还有由国王任命的新贵。下院议员固然由选举产生，但是他们并不是按选区人口比例由选民普遍选举产生的。在各郡，只有地主有选举权；在自治城镇，只有一小撮有产者有选举权。议席不按人口比例分配，按旧办法，每郡和每个自治城镇一律两个代表。由于剧烈的变迁，许多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出现了，如曼彻斯特、里兹、伯明翰等等，但是它们都还没有代表占有下院的议席。相反，一些选区早已荒凉，或者已经没有人烟，或者已经消逝，但是原先据有它们的大贵族或者控制那些选区议席的贵族，仍旧指派代表，占有下院的议席。这些选区被称“腐败城镇”或“腐败选区”。

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改革议会的呼声四起。对法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民坚决要求实行议会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特别积极。辉格党赞成改革，托利党反对。托利党首脑威灵顿公爵认为现存制度只有“人的智慧”才能设计出来，勿须改革。他的顽固态度导致了他的内阁垮台。1830 年，辉格党人格累爵士组阁，他们答应提出议会改革法案。

1831 年，辉格党内阁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在下议院被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英国的习惯法，不是内阁辞职，就是由内阁提请英王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831 年的大选，辉格党得胜。内阁的改革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但

是两次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当时，实行议会改革是人心所向的事。上议院的行为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形势紧张，经常有暴动发生，英国处在内战边沿。首相格累请求国王加封倾向改革的人为勋爵，使他们进入上议院，以便改革法案能在上议院通过。几经斗争，议会改革法案终于在议会通过。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调整了选举权，各郡的富有农民和城镇的有产者取得了选举权，成年男子的选举人数从 1830 年的四十七万八千人增为 1832 年的八十一万四千人，在英国二千四百多万人口中仅占三十分之一。居民中的大多数包括城市工人、广大农业劳动者和妇女，都被排斥在外。法案规定中普遍受到欢迎的是取消了五十多个“腐败选区”，减少了许多选区的代表席位。空余下来的代表席位分配给新兴的城市和某些人口增加的郡。因此，这个法案在英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其实质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上日益取得重要地位。而且，这次改革为以后英国的政治、社会的改革打开了大门。

由于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拥有权势的阶级。他们在英国取得的地位，预示着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资产阶级的命运。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的产生过程，完整反映了英国议会和内阁之间的关系，当它们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正常程序来解决的。这些办法相沿到现在。

第九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

工业革命先在英国而后在西欧和北美造成了社会面貌的变化。工厂制度的兴起，人口的增长，人口大量流往城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贫民窟、失业、工矿的童工女工、恶劣的工作条件、工时长、工资低、工人境遇悲惨等等，日益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此后的一定时期内，大约每隔十年，资本主义就受到一次经济危机的袭击。为什么社会财富迅速增长起来而创造财富的人却摆脱不掉贫困？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消除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受剥削？又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导致那个社会产生？这些问题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思考，出现了许多改造社会的蓝图，形成了一股时代思潮。这股强大的时代思潮统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期诞生了科学共产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苦心孤诣，企求改造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代表人物，在法国有圣西门和傅立叶，在英国有欧文。

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1760—1825年）出生在法国一个贵族家庭里，十六岁当军官，曾经以志愿兵身分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始终同贵族断绝交往，并且放弃伯爵爵位。他利用自己的资财同学者们交往，掌握了当代的科学思想成就。他晚年一贫如洗，有时靠偶然的进款生活，有时靠朋友们的接济为生。他的著述正是在这段生活艰苦的时期写成的。最早的著作是1802年写成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书信》，最后的一部著作是1825年写成的《新基督教》。

圣西门深切了解法国特权等级的寄生生活，目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又看到当权的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行为。他理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的斗争，又是贫苦大众同有产者的斗争。他能够看到阶级的对立，恩格斯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圣西门在他著名的《寓言》里指出，皇室、贵族、高官、教士、财主都是社会的寄生虫。如果失去他们，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给予法国力量的是从事科学、从事劳动、从事商业的人。如果失去他们，整个民族就会失掉灵魂。在他看来，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一切人都应当劳动”，未来社会应当属于劳动者。圣西门不是单把工人看作劳动者，还把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包括在里面。他不能看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

圣西门

圣西门所向往的社会没有生产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按计划进行；没有寄生集团，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在那里，政治就是有关生产的科学。对人的政治治理，将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指导。圣西门希望克服生产无政

它通称《日内瓦书信》。

府状态，却没有提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思想。同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创造社会的力量，并且幻想着帝王将相来实现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

另一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查理·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于一个中等商人家庭，很早就到一家商店当店员。他一生中有很长的时间靠当店员、推销员、交易所经纪人谋生。他的实际生活使他深刻地了解到商人的诡诈和投机，认识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竞争和危机，认识城乡的对立和劳动者的无权地位。

傅立叶

傅立叶作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辛辣地嘲讽了和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他指出，一小撮游手好闲之徒蔑视广大的劳动者。七个不幸的家庭为一个享受幸福的家庭而劳动。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和消费是不合理的。分配的不合理反映在贫富的两极化上。消费的不合理表现为生产者消费少、寄生虫消费多。傅立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却没有找到它的根源。

怎样改造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呢？傅立叶幻想建立合作公社——“法郎吉”。他设想的“法郎吉”是生产和消费的合作组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每个法郎吉拥有成员一千六百人到二千人，生产以农业为主，工业其次。每个成员都能找到他爱好的工作。为了使劳动变成愉快的事，他设想每人每天可以更换几种工作。建立法郎吉需要资金，傅立叶建议吸收资本家作股东，并且给投资者以优厚的利息。他象圣西门一样，希望国王、大臣实行他的计划。他宣布每天中午在家，等候慷慨之士送钱来建立“法郎吉”。他每天中午赶回家，望眼欲穿，始终没有人来敲门。

欧文

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早年当过学徒，二十岁时就在曼彻斯特一个工厂里当经理。1800年到1819年，他在苏格兰的纽拉纳克，以股东兼经理的资格，管理拥有二千多工人的大纱厂。

欧文洞悉资本主义的剥削，他发现纽拉纳克棉纱厂二千五百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因此他问：“这二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那都落到资本家手里了。欧文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企图发现一种方法，借以改善贫苦人民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同时又有利于企业主。在纽拉纳克，欧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他把工人的工作日缩减到十个半小时，又付给较高的工资。他为职工子女修建了学校和托儿所，为工人组织了伤病储蓄会，改善了工人的住宿条件。虽然为工人的福利增加了支出，工厂的财富还是不断增加，股东们仍然获得优厚的红利。当时欧文只是一位慈善工业家，英国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倾听他的意见，并且赞扬他。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欧文突破了慈善工业家的局限，梦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建立由劳动者组成和管理的公社。在那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将被废除，资本家和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他多次向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呈献他的计划，希望得到赞助。为了试验他的理想，

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新哈姆尼地方，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接着他又在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其他地方，建立了十八个公社。在资本主义的大海里，欧文的公社到1828年完全覆没了。他回到英国以后，统治阶级把他看作共产主义者，尽力排斥他，打击他。

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安立的公社见图版(53)

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在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欧文同傅立叶一样，相信合作制的公社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灾害。欧文胜过傅立叶的，是在他设想的公社里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同圣西门一样，都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人类将造成一个平等、美好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他们的设想中处处闪烁着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毕竟是不成熟的理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愈是制定得周密详尽，就愈是陷入空想。

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抱着深切的同情，但是他们只看到这是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阶级，看不到他们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更看不到他们所负的历史使命。他们憧憬美好的未来，用圣西门的话说：“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他们中间的傅立叶把社会历史到他那时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很有发展观点。但是他们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他们都希望用和平方式改造社会，指望依靠剥削者的自愿来消除剥削制度，这特别突出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当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开始进行独立政治运动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就显得落后了过时了，是不足以作为锐利的理论武器来武装无产阶级的。

第二节 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独立工人运动在欧洲兴起。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在菲力浦的“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劳动者本来指望这个由革命产生的政权会给他们改善生活状况。这个指望很快落空了。工人愤慨地说：“我们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我们赶走了有称号的暴君，却遭受着百万之富的暴君的治疗。”工人们产生了初步的阶级意识。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两次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里昂是法国中南部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一向是丝织业的中心，十九世纪早期，在那里的丝织工业中，工场手工业占主要地位，家庭手工业同时大量存在。丝织工人多半是小作坊主和帮工。他们给资本家订货加工，按件计酬。他们深受剥削，生活状况不断恶化。

1831年，里昂有三万多帮工和八千多作坊主。他们反对资本家任意压低工资，要求订出标准工资。资本家开头被迫答应，马上又背弃了诺言。11月21日晨，丝织工人们离开作坊，四人一排，挽手向市中心进发。他们的旗帜上出现了这样的战斗口号：“工作不能生活，勿宁战斗而死！”他们手持长矛、腰刀、棍棒和步枪，打退了军队。23日，起义工人完全掌握了里昂市。他们恢复了里昂的秩序，却没有建立政权，进一步把里昂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反动政府的军队就在市郊，增援军队又源源而来。12月初，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从1831年起义以后，工人物质条件毫无改善。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开始认识到“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工人们积极酝酿建立工人团体，遭到政府压制。1834年4月，里昂工人再次起义。这一次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而且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在里昂城里，工人同军队激战四天，最后失败。法国许多城市的工人，在里昂斗争的影响下也举行了起义。

里昂工人起义，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这是在同一社会里有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斗争。从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历史上开始居于首要地位。

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里昂工人起义被镇压了，但是法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广泛发展，罢工运动，粮食风潮，抗税斗争时伏时起；秘密革命团体不断产生，在工人阶级中影响很大，有的逐渐成为工人团体。广泛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各种社会学说的产生。

政府军在里昂镇压起义

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秘密团体的活动中，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二十年代，布朗基就参加了秘密革命团体，从事活动，反对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革命中，他在巴黎同工

人并肩战斗，为推翻波旁王朝而负伤。新建立的“七月王朝”的所作所为，使布朗基大失所望。他积极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因此1831年初被警察逮捕入狱。这是他第一次入狱，以后多次被监禁，一生中有三十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家族社”(1835—1836年)、“四季社”(1837—1839年)和“中央共和社”等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多次起义，多次失败，但是仍然坚持“不断地斗争”。

布朗基不仅是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受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巴贝夫的“平等思想”，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深信“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而那是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特权，消除了贫困、混乱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他一生写过许多著作阐明他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倡导的思想，通称工人共产主义。比起空想社会主义来，这种思想表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但是，布朗基更主要的是一位“实干家”。他相信用秘密的方法、严格的纪律把少数人组织起来，举行突然的武装起义，就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布朗基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他那种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进行革命的观点却是错误的、有害于革命的。他多次起义失败，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与布朗基同时，对法国工人运动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还有以布朗和蒲鲁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路易·布朗(1811—1882年)是法国的记者和作家，常用锋利的文笔指责“七月王朝”政府，在民主集团中获得了声名。他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断言工人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坚信每个人都有劳动权。他无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相信政府的干预对工人是有益的。1839年，他写的《论劳动组织》一书里说：“无产阶级所需的是生产工具，提供这些工具是政府的职能。如果我们给国家下个定义，我们的回答是：国家是穷苦人的银行家。”他认为，政府要资助和监督生产设备的购置和“社会工厂”的组成。一旦工人站稳了脚跟，政府就不再进行干预了。他相信，“社会工厂”逐渐在法国普及之时，社会主义企业将取代私人企业，工人将成为社会上的唯一阶级。他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实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出身于手工业者的家庭，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在国内外博得了盛名。在回答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时，蒲鲁东沿用了法国前人的一句话：“财产就是盗窃。”这本书以尖刻的讽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从而激动了读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46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

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资本主义给手工业者和小农带来了破产和贫困，作为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蒲鲁东表达了小资产者的愿望：保护小私有制，反对大私有制。他主张建立这样一种

在《共产党宣言》里，蒲鲁东主义被列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论蒲鲁东》一文里，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它的全名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社会，那里人人独立生产自己独特的产品，可以把产品拿去交换等价产品。他认为，交换的不公平是万恶之源，要消灭这一罪恶，就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平等交换，消除中间剥削。他主张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互助会，建立手工业者合作社，成立交换银行向他们提供无息信用贷款。企图通过公平交换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不要求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也就根本上谈不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反对任何国家政权，包括无产阶级政权在内。他主张建立“无政府状态，没有国君，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日益接近的政府的形式。”在《贫困的哲学》里，他以极端仇视的态度攻击共产主义。

英国宪章运动 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没有给工人带来选举权。1834年，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实际上剥夺了失业者和贫民得到社会救济的权利，如果要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在济贫院里，得接受监狱般的纪律、繁重的但又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家庭得拆散，生活极为艰苦。这种做法，目的在于迫使失业工人贱价就雇。积极参加议会改革斗争的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受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欺骗，看到了议会立法的资产阶级实质。英国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产生了宪章运动。工人相信，不取得选举权，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展开了新的改革选举的群众运动，要求按民主原则改革议会的下议院。工人的要求写在《人民宪章》上，这运动遂以“宪章运动”的名称载入史册。

《人民宪章》是由“伦敦工人协会”草拟的。这个协会在1836年6月，由木工洛维特为首的一些工人和手工业者所创立。1837年6月，《人民宪章》以议会法案的形式提出。它要求：（1）成年男子享有普遍选举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4）选举采取秘密投票方式；（5）设立平等选区，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废除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

宪章运动的一次群众集会(速写)见图版(52)

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宣传由伦敦开始，迅速遍及全英国。各地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到会的人常常数以万计。演说者发表具有战斗性的演说。有人更把争取选举权的要求同无产阶级的生活联系起来，说“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有人公开号召起义。起初，参加宪章运动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成份庞杂。在运动的当前目的和最终目的上，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上，都有不同的意见。以洛维特为首的一群人成为运动中的右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用和平方式达到改革的目的。左派的代表人物有鄂康诺、奥布雷恩、哈尼等人，代表工人阶级的要求。他们主张，如果议会拒绝《人民宪章》，就运用一切手段斗争，直到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们的口号是：“如果可能，我们和平解决；如果必须，我们武力解决。”

1839年出现了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7月间，要求实施《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提交议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当议会拒绝请愿书的时候，宪章主义者准备号召举行总罢工。由于缺乏团结，总罢工没有能够实现。英国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手段，逮捕了鄂康诺和奥布雷恩等领导人，判处他们十八个月徒刑。许多地区的起义刚一发生也被军队镇压下去了。

但是，宪章派很快地恢复了力量。1840年，全国宪章协会成立，这是英国的一个工人党。它成长很快，不久就拥有四万会员。1841—1842年，英国

遭遇到新的经济危机，促进了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那时候，宪章运动已经摆脱了同路人，具有更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1842年，宪章派向议会送交了第二次请愿书，在上面签名的有三百万人。这一次，宪章派除了要求实行《人民宪章》以外，还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保障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实现合理的工资等等。这些要求再度为议会拒绝的时候，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有的地方发生了起义。英国政府再次残酷地镇压。成百的宪章主义者被法院审判，鄂康诺又被判徒刑。运动再一次转入低潮。1848年，宪章运动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是随后就完全消沉了。

鉴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威力，英国统治阶级不得不作一些让步。1847年，它被迫实施对女工和少年男工的十小时劳动日法案。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英国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标志着英国工人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突出地反映了宪章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空想社会主义者否定阶级斗争，不能给无产阶级指出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进展，特别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在历史上，以科学的斗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马克思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城，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律师。青年时代，马克思享受了家庭的欢欣。他的辉煌的天赋，在父亲心里唤起了将来有功于人类的期望。同时，父亲又觉得儿子的性格里含有坚如岩石的东西，反倒常常为此暗里担忧。1835年，马克思在特里尔高级中学毕业。毕业证书上的评语说他的作文流露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同年秋天，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按他父亲的意思学习法律。第二年，他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不过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研究历史和哲学。1841年，他在耶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讨论古代希腊哲学问题的，论文里充满了斗争精神。他引用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话说：“不怕神威，不怕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

自到柏林以后，马克思深深感到，不论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还是由于思想斗争的需要，都得学习哲学。柏林大学是当时思想斗争的中心，1818—1831年黑格尔在那里讲过学。他逝世以后，许多讲座仍由他的门生主持。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开始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参加了倾向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等人。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早年欢迎法国革命，赞成政治改革，到柏林大学以后开始转向反动。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的根基都是“绝对观念”的发展，物质世界仅仅是观念的反映。但是黑格尔深入而广泛地试图论证历史有其内在联系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他详细地探讨了以发展思想为出发点的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是存在着的，同时又是不存在着的，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变化和消逝。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形成着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黑格尔的哲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摒弃了唯心主义的外壳，后来又向前发展了辩证法。

费尔巴哈

1842年，马克思接触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的哲学思想。他怀着由衷的激情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在这本书里，费尔巴哈指出，世界和人的存在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什么“绝对观念”。二者是“由于自己本身并通过自己本身而成为必然的”，并且是“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的”。人的存在只能归功于自然界，并且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柏林大学充满了为反动势力服务的御用思想，把论文呈交这所大学进行答辩有损于荣誉，因此把论文送交耶拿大学，申请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

自然界、存在是第一性的，并且不依附于人和人的知觉而存在。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上帝。宗教是人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不久，马克思就指出，费尔巴哈只是从生物方面的性质，而没有从社会方面的性质去理解人，这

《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反对封闭《莱茵报》的一幅漫画）

就妨碍了他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

1842年，马克思移居波恩，开始为科伦的《莱茵报》写稿。他的稿子讨论时事，切中时弊。几个月后，他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编。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公开为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辩护，反对普鲁士的专制统治和德意志的封建势力。《莱茵报》越来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马克思任主编前，它的订户只有八百多户，到1843年猛增到三千多户。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既恨又怕。不久，马克思被迫离开主编职位，《莱茵报》也被封闭了。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以后，同燕妮·封·威斯特华伦结婚。当时，他决定到国外编辑和出版革命杂志，1843年11月举家迁往法国巴黎。巴黎的生活是马克思一生发展的转折点。在那里，他热心研究唯物主义哲学，研究法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根据办报的经验，根据他开始探索而遇到的问题，例如什么因素、什么原因制约着各个阶级的产生，促进或阻碍他们的发展又最终使它们消灭呢？究竟什么力量影响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将导向什么目的呢？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首先致力于研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两位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

马克思在巴黎同卢格合作，创办了《德法年鉴》杂志。马克思要求杂志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竭力向被压迫的人民指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斗争”。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一、二期合刊号，其中刊有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他在论文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不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用武器来批判。他认为革命必须彻底，而具有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一个有力量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阶级。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的论文表明，在哲学思想上，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已经结束；在政治思想上，他的革命民主时期也走到终局。他已经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德法年鉴》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仇视。普鲁士政府下令缉捕马克思，严禁《德法年鉴》入境。《德法年鉴》因遭受迫害夭折了。马克思受到法国当局的驱逐，在1845年1月移居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恩格斯（1845年）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城，那里是当时德意志最发达的工业区。他的父亲

1842年1月创刊，是资产阶级创办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该报起作用，使它逐渐有反普鲁士专制统治的色彩。

是一个工厂主，思想保守，虔信基督教。青年时代的恩格斯对工厂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困苦状况有清楚的了解，对他们怀着深切的同情。他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信仰上帝的父亲深感不安。中学还没有毕业，他父亲就让他弃学从商。恩格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扩大了自己的眼界。1839年，他就认为宗教同科学是对立的，他说他的宗教信仰已经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了。1841年，他到柏林服兵役，细心研究军事学，很快地成为一名熟练的炮手。服役期间，他抽空到柏林大学去旁听哲学课，也信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服役期满以后，他父亲派他到英国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商业。

恩格斯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接近完成。当时，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象在英国那样清楚地认识无产阶级。恩格斯漫游过英国的许多大城市，观光热闹街道，访问工人栖身的贫民窟。他在英国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曼彻斯特，公余的时间常到工人住宅区观察工人生活状况。他也积极地参加过宪章运动。恩格斯根据研究所得，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一经典著作中，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系列现象，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工人和劳动群众所受剥削的日益加深等等。他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同时他又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它能够团结和组织起来，去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伟大使命。

恩格斯也给《德法年鉴》写了论文。在论文里，他指出社会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日益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类。但是，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利用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为一切人服务。文字上的交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起来。1844年，恩格斯在回国途中路过巴黎，访问了住在巴黎的马克思。那时候，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一致，对无产阶级的未来抱有同样的信心。巴黎的会晤和探讨，为他们之间的终生战斗友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居住下来，不久恩格斯也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初次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指出，历史过程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条件和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真正的历史创造者是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事理论的著述，而且给自己提出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他们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同英、法、德各国的革命团体广泛联系，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那时候，西欧有一个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它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流亡工人在巴黎组织起来的，后来它的组织扩展到英国、瑞士和德意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正义者同盟的许多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的思想在正义者同盟中广泛传播，很有影响。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出生于德意志的马格德堡，当过裁缝工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巴黎，参加并领导正义者同盟。1842年，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激烈批评，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它的战斗性的言论对当代人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论述已经接近于达到这样的认识：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并且要通过革命行动解放自己。但是，用什么手段和走什么道路来实现这一解放，魏特林的认识依然是空想的。他还不理解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而不是单纯诉诸他们的感情和朴素阶级本能的宣传；需要的是由一个政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而不是自发的起义和宗派主义的密谋策略。马克思曾对魏特林给予高度评价，1846年魏特林到布鲁塞尔时又竭力帮助他放弃空想，争取他成为同盟者。但是，魏特林固执己见，以致陷于孤立，对正义者同盟的影响也迅速衰退。

魏特林

1847年，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派人到布鲁塞尔，正式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并且表示倾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原理。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恩格斯前往参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章程上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的文献——《共产党宣言》 1847年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亲自参加。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1848年2月他们写成的纲领发表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的文献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简明扼要地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共产党宣言》（封面）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指出，共产主义已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了。“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时候了。”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个旧的社会制度，不是和平的，而是在阶级斗争中完成的。因此阶级斗争构成了阶级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宣言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主阶级的斗争中，壮大了经济力量，并且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曾经大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迅速增长和扩大，必然会引起商业萧条，生产停顿，形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克服这些危机，终于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宣言又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壮大起来了。这个阶级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并且将在工人政党的领导之下，起着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作用。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

有觉悟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为的是“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在宣言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里也指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须废除的。

为了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消灭贫困，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建立自己的政党，没有自己的政党，就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就不能获得解放。宣言强调，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推翻现存的全部社会制度。宣言显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它的结尾说：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它给了国际无产阶级无比锐利的斗争武器。后来“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本目引文未另注出处的都引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244页。

第十章 1848 年欧洲革命

1848 年至 1849 年，在欧洲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是继十七、十八世纪英法革命之后的欧洲第三次革命大风暴。在这场革命中，法国革命的任务是要推翻金融贵族的独占统治，实现民主改革；多民族国家奥地利革命则是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系列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德意志革命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灭国家的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匈牙利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各个国家的革命任务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1848 年革命》（油画）（德米耶作 Daumier）

1848 年欧洲革命具有明显的历史特点。这次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发生的。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为争夺政权而斗争的时候，西欧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这次革命的主要动力。资产阶级在领导这次革命时，由于害怕站在他们身旁的无产阶级，表现出畏首畏尾、动摇、妥协、甚至背叛革命。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虽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第一节 1848年法国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 革命前夕，统治法国的是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这个王朝的政权不是掌握在整个资产阶级手中，而是控制在金融贵族手里。这个资产阶级集团只实行有利于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了“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加强，但是，在法国，除金融贵族外的各阶级、各阶层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受排挤，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日益陷入贫困与破产，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七月王朝的统治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与反对。苏尔特内阁（1840—1847年），特别是基佐内阁（1847—1848年）统治时期是七月王朝最反动、最腐败的时期。弗朗斯瓦·基佐（1787—1874年）是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老政客。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以温和自由派的面目出现，同银行家拉菲特结合在一起，作为波旁王朝的反对派。七月王朝时期，他成了路易·菲力浦的忠实走卒，从温和自由派变为凶恶的反动派。1840年入阁，是苏尔特内阁中的实力人物，1847年出任内阁首脑。1840年以来，基佐实际上代表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对内，他执行独裁政策，反对任何的革命变革，对外，他仇视各国的革命运动。基佐内阁时期，各阶级、各阶层与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七月王朝的声浪日益高涨；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共和国的宣传遍及全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反税收、反饥饿的斗争此伏彼起，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运动层出不穷。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造成的饥荒以及1847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法国革命的爆发。

1847年夏，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结合起来，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发起了反对七月王朝的聚餐运动。国王路易·菲力浦认为要求进行选举改革的聚餐运动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命令基佐政府拒绝任何改革要求，严厉镇压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下令禁止资产阶级反对派预定在1848年1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聚餐活动。资产阶级反对派决定把这次例行聚餐会改在2月22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基佐政府再次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还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资产阶级反对派开始屈服。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甘心退却，于2月22日向聚餐地点集合，然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住宅，军队几乎都保护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傍晚时分，示威游行分散到附近各条街道，开始动手构筑街垒。第二天（2月23日），大批国民自卫军不仅不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且公开支持革命，宣布“打倒基佐、改革万岁！”

亚眠的聚餐会（速写画）见图版（54）

路易·菲力浦听到起义越发高涨和国民自卫军要求撤换内阁首脑的消息时，惊慌失措，决定把基佐免职，授命素有自由主义声望的莫尔伯爵组织新政府，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阻止革命继续发展。基佐下台的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准备和七月王朝妥协，共同执政。但是，巴黎

的无产阶级决心彻底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制度。他们坚守街垒，继续战斗。23日夜，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高举火炬，喊着“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举行了通宵的全城示威游行。

起义迅速地扩大了，到24日晨，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革命群众高呼“打倒路易·菲力浦！”“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向王宫进攻。路易·菲力浦看大势已去，不及整装就逃往英国去了。工人群众占领了王宫后，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狱广场的烈士纪念柱前烧毁，并冲入波旁宫，驱散了立法会议，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立宪君主制的阴谋。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烧毁国王宝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焚毁王座的时候，资产阶级趁机窃取了革命果实，2月24日晚在市政厅大厦宣布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成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取。律师杜旁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以反对七月王朝著名的诗人、共和派代表人物拉马丁为外交部长，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为内政部长。拉马丁是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参加临时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代表阿尔伯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尾巴。2月25日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在资产阶级窃取政权的情况下，这个共和国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劳动共和国”或“社会共和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它“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

在路易·勃朗的阶级调和论的影响下，许多工人都错误地认为：只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迫使共和国颁布劳动权利法令，并在政府里设立一个劳动部来保障劳动权，就有就业和生存的保障。因此，巴黎工人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要求临时政府实现“劳动权”，成立劳动部，建立工业或农业的“劳动组织”。在工人们的威迫下，临时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工人劳动权利的法令，设立了一个以路易·布朗和阿尔伯为首的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所以也叫做“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它既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又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分化无产阶级，于2月28日颁布开办“国家工厂”的法令。从3月2日起，先后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成立“国家工厂”，收容失业工人。“国家工厂”采用半军事的组织形式，每天安排工人从事笨重的非生产性的劳动，每个工作日的报酬是两个法郎。当工人们由于工资低，生活困难而产生不满情绪时，资产阶级就趁机对工人说：“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呀！这就是劳动权啊！”借以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挑拨工农关系，煽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就以维持“国家工厂”为名，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这些负担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身上。这当然要引起他们的不满，而资产阶级便恶意地说：“这是为了养活工人”。资产阶级的挑拨使巴黎工人在未来的战斗中陷于孤立。

临时政府的让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实际上在积聚力量。它把二万多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编组为二十四营别动队，准备用来对付巴黎工人。当它羽毛丰满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对无产阶级步步进逼。5月4日，临时政府解散，由拉马丁等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行使政府权力，排挤了路易·勃朗和阿尔伯。5月15日，执行委员会下令逮捕了工人领袖布朗基、阿尔伯和拉斯拜尔等人；任命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巴黎；接着于6月21日，悍然下令解散“国家工厂”。法令颁布后，工人群众为抗议这一法令整日在巴黎市区进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反对解散国家工厂！”“打倒马利！”等口号。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起来斗争。他们以大规模的起义回答了资产阶级的挑战，展开了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的战斗。

巴黎的工人迅速筑起了巷战工事，从6月22日到23日，街垒布满了巴黎东半部。街垒上空迎风飘扬的红旗上写着：“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万岁！”等政治口号。这些口号充分显示了六月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

6月23日晨，起义工人同政府军展开了战斗。虽然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组织和领导。起义的领导人是各街垒的领导人 and 互不联系的流动司令部。在起义的领导人中大部分是“国家工厂”的队长、革命俱乐部的工人和革命活动家。其中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占多数。起义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是由“人权和公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退伍军官盖尔索济（1789—1874年）制定的。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巴黎工人区集中四个纵队，分四路一齐进攻，夺取市政厅。这是起义成功的重要标志。

从6月23日起，巴黎处在激烈的巷战中。从23日至24日，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24日上午，起义者占了绝对优势，巴黎的四周郊区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在市区，起义者分四路进攻市政厅，起义队伍冲到了市政厅附近，有的队伍离市政厅仅六十步远。这时政府决定授予卡芬雅克军事独裁大权。卡芬雅克调来大量炮兵，用霰弹、榴弹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轰击，用燃烧弹焚烧整个东城。各地反革命援军纷纷开进巴黎。工人们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坚定如一，视死如归。由于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大批工人牺牲了。到25日，优势逐渐转到政府军方面。这天，资产阶级集中了优势兵力向起义者发动了残酷的大屠杀。但是，英勇顽强的起义者毫不畏惧，奋勇战斗，并向蒙马特尔居民宣布：“不是他们消灭我们，就是我们消灭他们，我们绝不后退。”直到26日黄昏，政府军才攻下起义者最后的根据地圣安东区。六月起义失败了。战斗结束了。但是卡芬雅克的屠杀并未到此为止，接连而来的又有一万一千多人被草率处决和军事审判处刑。

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敌人力量过分强大，力量对比悬殊外，主要由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还不成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孤军作战，没有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使工人们认清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者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要想迫使二月革命后的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只能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达到。六月起义后，出现了一个新的

亚历山大·马利当时是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

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路易·波拿巴政变 六月起义是1848年法国革命的转折点。资产阶级镇压六月起义以后就更加走向反动。6月28日，资产阶级把屠杀巴黎工人的刽子手卡芬雅克推上政府首脑职位。这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一上台，便立即从共和派营垒中挑选最反动的分子充当部长；下令解散各地“国家工厂”，封闭政治团体和革命报刊；延长工作日，实行四十五生丁附加税。总之，人民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所争得的一点点权利被剥夺得精光。

卡芬雅克政府为了从法律上巩固其统治，于11月12日颁布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即1848年宪法。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赋予一院制的议会，三年改选一次。行政权赋予总统，四年一任，由选民直接选举。1848年12月10日进行了总统选举。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当选可能性最大的是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

路易·波拿巴（1808—1873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的早年生活是在一系列的冒险活动中度过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流亡国外，浪迹四方，在意大利，他还参加过当地的秘密革命组织。“七月王朝”时期，他曾两次组织暴动，第一次失败后被捕而被流放外国，第二次失败后被判终生监禁。六年以后，他越狱逃到英国。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他卷土重来，期望登上政治舞台。他才能平庸，但个人野心很大，一直想在法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在总统竞选中，他采取欺骗、行贿、自我吹嘘和许以诺言等手法博得了法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支持，以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四十五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卡芬雅克，当选为法国总统。1848年12月20日，路易·波拿巴就任共和国总统。在就任总统时，他装得忠诚、谦恭、温顺和礼让，企图以此来掩盖他那副极端虚荣而又毫无原则的投机家的真实嘴脸。他虽然口头上宣誓忠于共和国，遵守宪法，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做法国的皇帝。

波拿巴任总统后便选用毫无原则、贪图禄位的巴罗组阁。巴罗上台后，马上集结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织了秩序党和秩序党内阁。这个内阁恰巧符合波拿巴的心愿，起到了从资产阶级共和制向君主制过渡的桥梁作用。

此后，路易·波拿巴便加强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他首先利用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的矛盾，借秩序党之手打击山岳党。山岳党被击败后，秩序党更是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秩序党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于是，路易·波拿巴乘机打击秩序党，并四处网罗亲信，在巴黎组织了“十二月十日会”。这个组织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他利用这个组织同秩序党进行斗争，派该会会员殴打秩序党议员，指定凶手阴谋暗杀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尚加尔涅和立法议会议长杜邦。在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十二月十日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路易·波拿巴为了夺取军权，不惜采用卑鄙的收买手段，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军官和士兵。为了超越国防部长而进行活动，路易·波拿巴的顾问弗列里于1850年组织了一个隶属于总统办公室的特别“军事小组”，专门讨论他们在军队中所搜集的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奥尔良派是拥戴路易·菲利浦家族的保皇党人，正统派是拥戴波旁家族的保皇党人。

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它在议会的七百多个席位中占有二百多席。社会民主派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秩序党是大资产阶级的党。

军官和士兵的不满情绪。由于波拿巴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不仅控制了巴黎的卫戍部队，而且在军队中逐步建立了以危险分子为骨干的支柱。当波拿巴感到自己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军队时，便根据宪法关于总统有权指挥军队的规定，于 1851 年 1 月撤换了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的职务。尚加尔涅的被撤职标志着军权从秩序党手中转移到了波拿巴手中。

路易·波拿巴在各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就嚣张地要求议会修改宪法和取消禁止总统连任的条款。当这个要求被议会否决后，波拿巴便决定举行政变。1851 年 12 月 1 日夜，他调集七万多军队，占据巴黎重要据点，第二天宣布解散立法国民议会，逮捕秩序党分子和反对他的议员。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路易·波拿巴政变。

1852 年 1 月 14 日，路易·波拿巴公布新宪法，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11 月 21 日至 22 日，路易·波拿巴强迫人民赞成议院提出的恢复帝制的决议。12 月 2 日，波拿巴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年）。路易·波拿巴即皇帝位，称拿破仑三世。

第二节 1848年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革命

柏林三月革命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各邦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势力最大,它们是进行残酷的封建统治的堡垒。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1834年1月关税同盟建立以后,德意志境内的贸易障碍消除了,工业发展的速度显著加快,生产的机械化逐年增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更加迫切地要求结束德国的分裂状态和专制制度的统治,以利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深受封建贵族统治和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情绪尤为强烈。因此,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加快了革命的爆发。巴黎二月革命迸发的火花点燃了德国柏林三月革命的烈火。

1848年3月13日,在柏林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16日,发展成为人民群众和军队的街头流血冲突,有一百五十多名群众被打死打伤。这次枪杀示威群众事件,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为了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维持自己的统治,国王威廉四世不得不下令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召开议会,制定宪法。柏林的工人群众认为国王的让步只对资产阶级有利,与工人群众是无关的。因此,柏林的工人群众决定斗争下去。3月18日工人群众包围了王宫,并要求把军队撤出柏林。工人群众为了抵抗威廉四世军队的枪杀,在街头筑起街垒,进行武装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革命群众把反动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政府军终于被击退。威廉四世被迫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释放被捕的革命者,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3月19日获得胜利的人民抬着阵亡的烈士走过宫廷时,一向骄傲专横的国王被迫脱帽鞠躬,向阵亡的革命者致敬。柏林三月革命胜利了。

柏林街垒(1848年18日到19日)

1848年柏林起义群众在王宫前打败国王卫队见图版(56)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马上夺取了胜利果实。3月29日,威廉四世任命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组成资产阶级自由派新政府。这个政府保存了全部旧的国家机器,与封建势力结成联盟,极力阻止革命的发展。当工人要求普选权、劳动权和设立劳动部时,康普豪森内阁马上请求国王把军队调回柏林,用来对付工人。

在柏林3月18日革命的影响下,普鲁士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他们到处赶走征收租税的官吏,砍伐业主的森林,攻打贵族的城堡,销毁地主的账簿。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并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形成了一种对革命极为不利的政治局面。地主贵族随时准备反攻倒算,革命和反革命到处都在激烈斗争着。

1818年,普鲁士政府消平了本国各省之间的税界,建立了统一的税收制度。1826年,邻近普鲁士的几个小邦加入了普鲁士的关税体系,经过扩大,到1834年组成了关税同盟。它包括十七个邦,辖区内有二千六百万人口。

比利时政府驱逐马克思出境（1848年3月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 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当局把马克思夫妇驱逐出境，他们到达巴黎。马克思在巴黎同来自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士沙佩尔·莫尔和来自布鲁塞尔的威廉·沃尔弗重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沙佩尔担任秘书，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不久恩格斯也到了巴黎。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他们首先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革命纲领，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这一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把德国变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革命纲领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共产党人时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的越彻底，对无产阶级下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有利。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革命的领导权争取到自己手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共产党人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建立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左翼的立场，保持独立地位，推动革命前进，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而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是，在德意志革命过程中，这一革命纲领，受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波尔恩和哥特沙克右的和“左”的干扰和反对。为捍卫革命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批判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全力以赴地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其他流亡在外的德国革命者返回德国参加革命，到4月初就有三、四百名革命工人回到德国。为了直接参与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回国，先到美因兹，然后奔赴科伦。不久，恩格斯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到了爱北斐特，沙佩尔到了威斯巴登，从事革命工作。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为德国革命所制定的纲领，马克思于1848年6月1日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个报纸是“民主派机关报”，马克思任总编辑。《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是：主张用革命的办法，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号召欧洲各国人民对沙皇俄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这个报纸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这场革命，并以战斗的姿态及时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叛卖行径，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动摇。它热情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沙皇俄国干涉和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新莱茵报》的重要社论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亲笔撰写，他们的战斗声音，鼓舞着人们前进。

柏林起义人民冲击军械库（6月14日）（版画）

法兰克福议会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柏林三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希望在普鲁士或奥地利君主领导下，实现统一，主张由各邦选出代表组成全德议会，制定一个所谓统一的帝国宪法，然后推举一个邦的国王作为德意志的皇帝。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开幕。在这个会议上，分“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前者主张把德意志邦联的全部领土和奥地利的全部领土统一起来，组成一个以奥地利为首的德国；后者主张实现以普鲁

士为首的德国的统一，排除奥地利。两派争吵不休。他们争吵和清谈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把德意志统一起来，结果反而给了反革命势力准备力量的时机。6月14日和15日，普鲁士国王以武力镇压了工人、手工业者和市民的起义，解除了群众的武装，成立了反动的奥尔斯特瓦和汉泽曼内阁。11月普鲁士国王下令改组政府，任命勃兰登堡伯爵组织新政府，这个政府完全排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到1848年底，普鲁士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

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终于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这部宪法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但是，尽管如此，德意志各邦君主也都予以拒绝。封建统治者对帝国宪法的敌视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德各地都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群众运动。但结果都先后遭到了失败。随着维护宪法运动的失败，《新莱茵报》被封闭，法兰克福议会被强行解散。所有这些，标志着1848年德国革命的终结。

维也纳起义 十九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匈牙利和捷克都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独揽大权，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深受国王斐迪南一世的赏识和信任。

因梅特涅而得名的“梅特涅制度”不仅维护着奥地利的封建统治，而且无情地镇压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因此，在奥地利呈现出一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巴黎二月革命和柏林三月革命加速了奥地利境内革命的爆发。3月初，维也纳到处举行革命集会，资产阶级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3月13日议会开幕的早晨，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聚集在议会前的广场上，高呼“打倒梅特涅！”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帝国政府派军队镇压群众，引起了第一次流血事件。这次流血事件恰巧成了动员群众的号令。广大维也纳居民，特别是工人奋起参加战斗，坚决要求梅特涅去职。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王被迫在3月14日解除了梅特涅的职务。这位在奥地利掌权三十四年的反动政客，最后只好乔装逃出维也纳，避往国外。人民革命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梅特涅逃跑了（漫画）

当革命刚一胜利，资产阶级便开始退却，妄图同封建势力妥协。新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以奥地利皇室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仍然掌握着统治权。所以，4月23日颁布的宪法草案和5月11日公布的选举法仍然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无权的地位。这就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工人、手工业者，尤其是大学生再次提出降低选举的财产资格，实行选举民主化。但是，政府不但拒绝人民的要求，而且于5月14日颁布了皇帝关于解散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命令。为了回击政府的反动措施，5月15日维也纳群众又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筑起街垒，准备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让步。5月17日，奥皇斐迪南一世及其宫廷成员逃往因斯布鲁克。

奥皇的逃跑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彻底失败，相反他们聚集在因斯布鲁克，四处搜罗反革命力量，时刻准备反扑。8月11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后，为镇压波澜壮阔的匈牙利革命而积极武装耶拉契奇的军队，并于10月3日对革命的匈牙利正式宣战。维也纳人民为抗议和阻止奥皇镇压匈牙利革命而举行了十月起义。但终因敌人的力量过分强大和维也纳人民的孤立无援，起义遭到了失败。

匈牙利革命 维也纳三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匈牙利时，布达佩斯的革命者于3月15日，在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起义人民要求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争取匈牙利独立。他们热情地通过了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即著名的《十二条》。《十二条》通过后，越来越壮大的游行队伍到兰德列尔印刷所时，便占领了这个全市最大的印刷所，立即印刷了《十二条》和裴多菲在前一夜写成的《民族之歌》。将近中午时刻，革命群众便控制了整个首都，成了布达佩斯的主人，并成立了起革命政权作用的公安委员会。

3月15日革命促进了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情况下，斐迪南一世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授权巴蒂安尼组织匈牙利第一个责任内阁。政府成员中包括著名的匈牙利爱国志士科苏特。但是斐迪南一世却企图使这个内阁成为自己在匈牙利进行统治的工具，并竭力拖延匈牙利议会所制定的诸如责任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军事和财政独立自主，取消劳役制、什一税和现金税，实行普遍课税等法令。当斐迪南一世的这些阴谋被粉碎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决心要扑灭匈牙利的革命烈火。

裴多菲

科苏特

当斐迪南一世从因斯布鲁克回到维也纳以后，于9月4日正式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军队总司令。9月11日，耶拉契奇便大举进攻匈牙利。

在面临反革命武装向革命势力进攻的关键时刻，匈牙利人民的爱国热情特别高涨。政权转归以科苏特为首的保卫祖国委员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积极响应科苏特的号召，踊跃参加自卫军，但是斗争的局面非常艰苦。当耶拉契奇的军队向布达佩斯推进时，以莫克为首的一部分匈牙利军官对奥军妥协，不加抵抗。匈牙利人民积极响应国防委员会的号召，开展了游击战，袭击耶拉契奇的部队。9月29日，匈牙利自卫军在帕科兹德和科苏罗附近同奥军的决战中，得到起义农民的很大帮助，一举击溃了耶拉契奇的军队，获得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次胜利。10月10日，追击耶拉契奇的匈牙利军队直逼奥地利边境。

奥地利政府镇压了维也纳十月起义，便集中力量于12月中旬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反革命进攻。奥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匈牙利挺进。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民准备诱敌深入，采用游击战拖垮敌人。但是，由于严寒已到，所有的江河与沼泽结冻，匈牙利便失掉了有利的防御条件，不到二十天，匈牙利军就逐步退却到布达佩斯。1849年1月5日布达佩斯陷落，匈牙利议会迁至德布勒森。

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废黜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匈牙利独立。科苏特被选为国家元首。4月19日，匈牙利军队在纳沙罗决定性的战役中粉碎了奥军，4月26日解放了多瑙河上游的科马罗姆要塞，5月21日攻克布达佩斯，光复了匈牙利首都。

当奥军被逐出匈牙利后，匈牙利政府内的右翼势力又开始猖獗起来，竭力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妄图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同时匈牙利内部的投降分子戈尔盖同谢米尔勾结在一起，反对科苏特，秘密策划投降。加上科苏特未能很好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农民的土地问题，得不到少数民族和农民的有力

支持。这就给奥地利反动派组织新反扑和沙皇俄国的镇压造成了良好的机会。

沙皇俄国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革命人民的胜利进军使沙皇尼古拉一世十分恐慌。因为匈牙利革命的胜利必然导致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波兰等东欧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样一来，俄国在波兰等国和巴尔干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不能容忍匈牙利革命胜利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应奥皇的请求，于5月下旬派出两路俄军，进犯匈牙利。一路十万人，侵入加里西亚；一路为三万八千人，侵入摩尔多瓦和拉瓦赫。俄国兵力总计约为十四万人。

沙皇俄国出兵干涉，使匈牙利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6月初，在匈牙利西部边境、东部和东北部，科马罗姆要塞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区，战斗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戈尔盖实行不抵抗政策，只是坐在布达佩斯，等待投降。所以6月以后，特别是在7月的科马罗姆会战中，匈牙利军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枪杀匈牙利爱国者见图版(57)

7月中旬，俄军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后，继续向首都推进，准备在那里和奥军汇合，两面夹攻集中在西部边境的匈牙利军队。由于奥军没有理解俄军的行动计划而单独向南推进。于是，俄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加上粮食缺乏，霍乱流行，使俄军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形势对匈牙利十分有利。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科苏特命令戈尔盖在科马罗姆要塞留下一支强有力的卫戍部队，将其余部队向西挺进，以便同那里的匈牙利军队汇合，共同抵抗俄军。但戈尔盖拒绝执行科苏特的命令，暗中同俄军进行投降谈判，并采用两面手法，把匈牙利军队引进俄军的包围圈。8月13日，戈尔盖在维拉格什向俄军投降，出卖了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欧洲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沙皇俄国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扼杀匈牙利的民族运动，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它充当欧洲宪兵的狰狞面目。

